

編輯鍾叔河

紙上的紀錄片

彭小蓮 汪劍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open access

本書電子版為開放取用圖書，在遵守相關授權條款的前提下，公眾可以免費閱覽、下載和傳播。開放取用電子書的出版獲得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資助，特此致謝。

建議引用格式：彭小蓮、汪劍著：《編輯鍾叔河：紙上的紀錄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DOI: 10.978.988237/1262

This book is freely available in an open access edition thanks to funding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It may be read online, downloaded, and shared under the terms of a Creative Commons (CC-BY-NC-ND 4.0) license.

Suggested citation: Peng Xioulian and Wang Jian, *A Paper Documentary on Zhong Shuhe, The Editor*.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9. DOI: 10.978.988237/1262

編輯鍾叔河

鍾叔河先生是一位有獨立思想的學者型出版家，他引用繆塞的話說「我的杯很小，但我以我的杯喝水」。

他始終關注着中國如何在繼承傳統和學習世界的過程中走向全球文明。他1980年代編輯的「走向世界叢書」被時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的李一氓譽為「整理古文獻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學性和創造性的一套叢書」。

在這套書出版37年後的2017年東亞出版人會議上，獲授「特殊貢獻獎」的鍾叔河先生中肯地告訴我們：「走向世界的步伐不會停止，我們還在路上。」

——董秀玉，出版人、原北京三聯書店總經理

自上世紀80年代中國內地出版開放，出現了一批出版界的知名人士，鍾叔河先生自是其中之一。他本着濃厚的人文精神，出版人的使命，以開闊的眼界，時代的需要，過人的魄力，細緻的出版工作，策劃了幾套膾炙人口、引領知識和思想潮流的叢書，當時對開啟知識界的閱讀視野，起過很大作用。

——陳萬雄，資深出版人、香港饒宗頤文化館名譽館長

「走向世界叢書」是當代中國出版史上，最有思想性與系統性的一套叢書，1980年代以來對中國知識圈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鍾叔河先生不僅是編輯人、出版人，更是一位知識人。他以知識人的視野與關懷進行他的編輯與出版工作，是當代編輯人、出版人的典範。

——林載爵，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

1988年在三里河拜見錢鍾書先生時，大陸叢書熱已開到荼靡，問錢先生怎麼看，他說鍾叔河「走向世界叢書」最有意思。那時候，我剛剛走出校園，自己讀書的園地裏都是周作人，書架上的知堂老人都是鍾叔河先生編輯的。三聯的范用先生，岳麓的鍾先生，是我出版生涯中的南鍾北范。

——林道群，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學術部總編輯

《編輯鍾叔河》是有靈魂的。既有受訪者的靈魂，也有採寫者的靈魂。這本書能讓我們看到一個劫後歸來的人，是如何地生活在風雲變幻的紅塵之中，又怎樣地置身於遙望星空的紅塵之外。

——周實，原《書屋》雜誌主編

編輯鍾叔河

紙上的紀錄片

彭小蓮、汪劍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編輯鍾叔河——紙上的紀錄片》

彭小蓮、汪劍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19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78-988-237-126-2 (平裝)
978-988-237-793-6 (電子書)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學

傳真：+852 2603 7355

電郵：cup@cuhk.edu.hk

網址：cup.cuhk.edu.hk

A Paper Documentary on Zhong Shuhe, The Editor (in Chinese)

By Peng Xioulian and Wang Jia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8-237-126-2 (paperback)
978-988-237-793-6 (ebook)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cup.cuhk.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本書電子版採用創用 CC 授權條款 CC-BY-NC-ND 4.0，提供免費閱覽和下載，
具體使用條款請參見：<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The digital edition of this book may be downloaded and shar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atives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BY-NC-ND 4.0).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is license, se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DOI: <https://doi.org/10.978.988237/1262>

目 錄

緣起 汪劍 / ix

序言 支離破碎的年代，一個完整的靈魂 黃子平 / xv

認識鍾(叔河)先生 / 1

與鍾先生閒聊(一) / 29

汨羅江邊的薪火 / 37

陽光少年 / 59

與鍾先生閒聊(二) / 93

關於「四十八條」 / 105

活下去 / 129

與鍾先生閒聊(三) / 153

倒翻的紅墨水 / 163

圓+方=境界 / 193

與鍾先生閒聊（四） / 225

一個人的文字遠征 / 237

與世界達成協議 / 263

與鍾先生閒聊（五） / 281

附錄一 鍾叔河行年簡表 / 289

附錄二 鍾叔河作品簡表 / 293

緣起

汪劍

七年前，接過彭小蓮導演手裏的那本書《走向世界——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歷史》的時候，我不會知道從這本書開始，會引出那麼多的書——我搜羅了市面上幾乎所有能找到的鍾叔河先生寫作或者編輯出版的書，一本本地看下去，實在是太好看了！

我也不會知道，從那本書會引出眼前的這本書《編輯鍾叔河——紙上的紀錄片》；我更不會知道，或者說不願意去面對，這會是我與彭導最後的合作……

2017年，彭導和我一起糾纏在一件惱人又鬱悶的工作中，好容易暫告一個段落，她打電話給我，大聲地說：「汪劍，我們去長沙看鍾先生吧。」

於是，5月份的一天，我和彭導背着一台老式的、應該淘汰的攝像機去了長沙，見了之前一直通信、電話，神交已久的鍾叔河先生。謙遜的鍾先生婉拒了我們想要花一週的時間採訪他，為他寫小傳的想法，說自己就是個退休的普通編輯，不值得我們這麼寫。他只同意我們跟他談一天（然而，那之後的兩

年間，我們數次努力「叨擾」鍾先生，終於完成了這部彭導心心念念的書《編輯鍾叔河——紙上的紀錄片》）。

還記得那一天美好又漫長，我們看着陽光灑滿鍾先生寬大的客廳兼書房，又慢慢褪成金色、淡去，轉暗……一直到即將接近鍾先生的休息時間。我們帶着滿滿的收穫和興奮離開，回到隔着一條馬路的旅館房間，才忽然想到我們還沒有跟鍾先生合影呢，又趕快打電話給他，很不好意思地說：「我們能跟你合個影嗎？」鍾先生說：「來吧來吧。」

在當下的時代，僅僅因為發自內心的情感就全心投入地去做一件事，無疑是非常奢侈的，近乎不可能。但彭導就是不由分說地「推」着我向前走：「鍾先生太值得寫了，我寫一部分，你寫一部分，我們就把它寫成一個鍾先生的小傳，不是面面俱到的那種傳記，是要把我們自己擺進去，寫出他的學問，他的強大，他的力量，也會特別特別好看的。你就放開手腳寫，不要去想能不能出版的問題。」

書稿完成後，我們寄給鍾先生看，鍾先生反覆說：「你們怎麼來寫我，我都沒有意見，我只修改跟我有關的事實方面的問題。」然而收到鍾先生寄來的修改稿，我愣住了，這簡直是書稿編輯的教科書！他不僅修正了與他有關的事實，還對於文辭的錯漏、引文的體例，甚至阿拉伯數字的使用都提出了修改意見。他的意見整齊清晰、密密麻麻地手寫在打印稿上，一目了然。

拿着這份屢經修改並仔細確認過的書稿，彭導分別聯繫了多家出版社，然而得到的答覆都是「不能出」，不是因為書稿

本身的質量，而是……眾所周知的原因。而此時，彭導已經獲知自己癌症復發的消息，她說最後的心願就是能看到這本書的出版。

鍾先生聽到彭導病重的消息後，始終非常關切，每次在電話中跟我討論與書稿有關的問題，他都會問起彭導的病況，並一再地囑咐我：「這本書就完全按照她的心願去做吧。」

好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終於接受了這個凝結了兩代文化人的心血卻又無處可去的「孩子」，編輯老師們又精心為它梳妝打扮，準備將它體體面面地呈現在眾人面前。

2019年6月19日上午10時許，彭小蓮導演因病在上海猝然離世，享年66歲。

我飛奔趕去醫院的時候，彭導已經走了，而前一天下午，她還在微信中跟我說，她多年來收藏的大批電影碟片該如何處理。我站在醫院的大廳裏，身邊是紛紛趕來的、彭導的家人、好友、她多年的老同事，我說不清自己是什麼感受，似乎我面對的，不是我生命裏最重要的一位前輩、老師、朋友的永別，而是像過去時常發生過的那樣：彭導因為不耐煩等待，或者氣憤別人的不守時，匆匆地、一陣風地，先走了。

醫院的玻璃大門外是這個城市悶熱的6月，濕熱的風裏纏着每一個人，這突然的告別像一塊沉重的巨石壓在我的心上，我完全無法思考，也無法感受，整個人都是懵的。

離開了醫院，我獨自一個人步行了十幾公里，想要從那種發懵的狀態中掙脫出來，哪怕大哭一場也好。然而，找到情緒

宣泄的出口竟如此艱難，我依舊平靜地接聽着彭導的好友、合作過的編輯、媒體記者的電話，平靜地，過於平靜地重覆着這個我不想面對又無處可逃的冰冷事實：彭導真的頭也不回地，走了。

過了幾個小時，我接到了鍾先生打來的電話，他說自己作為一個行將90歲的老人，聽到比自己年輕的彭導離世的消息是非常難過的，他又一次問起這本書，再次叮囑我說：「完全按照她的心願把那本書做出來吧。」

我不禁再次回憶起兩年前和彭導一起在鍾先生家，那個春天的晚上。我翻找出當時的筆記，發現那一次我們跟鍾先生告別的時候，彭導跟鍾先生談論的，竟然就是死亡。而當我們完成了大半的書稿，計劃帶着問題再赴長沙訪問鍾先生的時候，彭導已經因為癌症惡化而無法成行了。我去長沙之前，她特別叮囑我說：「不要跟鍾先生說我生病的事，就說我突然重感冒，不能去了。」

那個春夜留在我錄音筆裏最後的話，是彭導說自己最怕患了老年癡呆或者絕症又走不掉，說安眠藥現在也吃不死人，87歲高齡的鍾先生用慢悠悠的長沙話說自己有個朋友老了住醫院，吃了三盒安眠藥也沒死成，又被拖去洗胃更受罪，說你在家裏怕什麼，直接從窗戶跳下去，或者從橋上跳到江心……這是一段聽起來有些驚心動魄的黑色幽默，但也只有我才知道，那時「張牙舞爪」、做事永遠風風火火、全情投入的彭導，和眼前慈祥卻依舊犀利幽默的鍾先生，他們真的是至為有力地活過，所以，才能如此毫不遮掩地談論死亡，談論生命的另一種

形式。他們早已開始像曾經努力地活着一樣，認真地修習有關死亡的課程了。而我只能膽戰心驚地旁觀着那份熱烈，猶豫猶豫地笑兩聲。

跟彭導最後會面時，她已經非常虛弱了，腫大的癌組織壓迫着她的氣管、食道和聲帶，她說不出話，只能跟我耳語一樣地交談。她急迫吃力的呼吸聲至今仍在我耳畔回響，我聽見她努力地對我說：「我九月裏一定會走了，太痛苦了，好在鍾先生的這本書馬上就能出來了，想想還是蠻開心的。」

2019年7月



彭小蓮（右一）、汪劍（左一）與鍾叔河先生合影。

序言

支離破碎的年代，一個完整的靈魂

黃子平

彭導彭小蓮，籌得到錢的時候，拍電影，故事片或紀錄片；籌不到錢的時候，寫作，虛構或非虛構——通常是籌不到的時候居多。這回她和汪劍合作，寫了一本《編輯鍾叔河——紙上的紀錄片》，非虛構的傳主，是湖南出版家鍾叔河先生。這本書有三個不同卻又相通的敘述聲音，敘事在當下和往事之間穿插剪輯，讀來真有一種看電影的感覺。

鍾叔河老先生，平江人，因為他在茶陵洣江農場勞改過九年，自稱是祖籍茶陵的彭導的「半個老鄉」。其實小蓮以前沒聽說過這人，問過朋友圈裏二十個人（大半是文化人），不好意思，都沒聽說過。彭導聽到一個故事，一個場景，極感動，老想着要是拍電影，怎樣才能拍得讓觀眾跟她一樣感動。她把這故事講給很多朋友聽，不覺間越講越生動。

上世紀60年代的一天，在長沙街頭拖板車的「無業遊民」、右派鍾叔河，在偶然間得到一本書，英國人勞斯(W. H. D. Rouse)寫的《希臘的神與英雄》(*Gods, Heroes and Men of Ancient Greece*)，譯者是周遐壽，文字看着親切，似曾相識，後來才曉

得周遐壽就是知堂老人。從小喜讀知堂散文，這位身處社會底層的賤民，給他仰慕的五四前輩寫了一封長信，情辭懇切，說：「我一直私心以為，先生文章的真價值，首先在於它們所反映出來的一種態度，乃是上下數千年中國讀書人最難得有的態度，那就是誠實的態度——對自己，對別人，對藝術，對人生，對自己和別人的國家，對人類的今天和未來，都能夠冷靜地，然而又是積極地去看，去講，去想，去寫。」

信中索書、索墨寶。周作人給這位素昧平生的年輕人寫了自己的兩首舊詩，也應其要求，寫了藹理斯 (Havelock Ellis) 的一段話：

在一個短時間內，如我們願意，我們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們路程的周圍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炬競走——這在路克勒丟斯 (Lucretius) 看來，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徵——裏一樣：我們手裏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從後面來，追上我們，我們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樣的將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遞在他的手內，我們自己就隱沒到黑暗裏去。

(鍾叔河《念樓隨筆》)

小蓮和汪劍，不忍看到這人文主義的火炬和火炬手隱沒到黑暗中去，她們追問，如何才能在一个謊言充斥的年代，保有中國讀書人「對自己，對別人，對藝術，對人生，對自己和別人的國家，對人類的今天和未來，都能夠冷靜地，然而又是積極地去看，去講，去想，去寫」？這並不容易，而且正如鍾叔河先生的畢生經歷所昭示的，這必須付出代價，難以想像的代價。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風刀霜劍嚴相逼。小蓮在書中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她說，這個人在黑暗裏，認識了黑暗的本質，智商很高，情商也很高，如何能夠從勞改農場一出來，一步「走向世界」，一門心思做這樣的大事情（出版了「三部大書」）？其實鍾先生有一個很平實的回答，他說：「我講自己大好年華都用到拖板車和寫檢討上去了，外語也沒學會一門，但也撿了一個『便宜』：從1957年到1979年，二十四年裏我不需要作命題作文，也不需要按模式思想，在勞動之餘，盡可『自由』地考慮中國的過去和未來，也能蒐集整理一些材料。我前後大概瀏覽過近三百種1911年前中國人親歷西方的記載，蒐集到的有一百多種。1979年9月平反，剛到湖南出版社就提議編一套『走向世界叢書』。二十多年的積累就用上了。」——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寫作，這個自由，也包括他的湖南同鄉黃永玉說的「白天受壓抑，晚上在被窩裏做幾個鬼臉」的自由。這還包括了「不寫的自由」：出來之後不願意回報社去，選擇到出版社去。他說做報紙趕任務，出一個三八紅旗手，你要去寫，有人跳到河裏救小孩，你要去寫；這些人和事都很偉大，但不是他的活兒。

藹理斯說的那支火炬——人文主義的火炬——是傳到了鍾叔河先生的手裏和心裏了。這種文化傳承的連續性，或曰人文生命的完整性，不單體現在苦難日子裏的煎熬和堅持，更體現在「前腳剛踏出勞改農場，後腳就直奔北京柏林寺圖書館去抄寫《三述奇》」。此後多少年，鍾先生頂着四面八方的壓力，編輯出版「走向世界叢書」一百種、出版《周作人散文全集》、

出版《曾國藩全集》。當然，也體現在本世紀，他的隨筆《小西門集》的書稿輾轉於山東、南京、北京、上海的五六家出版社，鍾先生始終不肯刪減他26歲那年寫下的右派罪證「四十八條」。當權力與文化對峙的時候，鍾先生選擇站在文化一邊。權力不僅沒文化，而且蔑視文化，敵視文化。「權力是沒有靈魂的，而且它來自於沒有靈魂。它建立在喪失靈魂的基礎上和從中汲取的力量，靈魂的闕失維持着和恐懼的聯繫……任何始終捍衛他的靈魂、他的內心正直的人，不可能被恐懼所壓垮，他因此變成一個權力控制的範圍之外的、真正的自由人。（伊凡·克里瑪〔Ivan Klíma〕）」這也正是鍾叔河先生題簽的意思：「萬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靈魂的完整，即在於不被恐懼和謊言壓垮。

《編輯鍾叔河——紙上的紀錄片》裏偶爾會閃過那些「喪失靈魂的人」的鏡頭，那些散布恐懼的人，對三部大書到處告狀的人。正是他們，構成了鍾叔河先生的文化事業的「必要的背景」。他們並沒有消失。他們的思維，他們的語言，仍在繼續，仍在傳承。不了解這必要的背景，就不能讀懂鍾先生及其事業的意義。讀書多，有學問，並不意味着靈魂的完整。汪劍問道，別人也讀着《三國》、《水滸》、《曾文正公家書》長大，長大了也讀朱自清、周作人和何其芳，怎麼你就讀成了1949年之前的左翼學生，1949年之後的極右分子？鍾老先生笑笑，答了兩個平常之極的關鍵詞：常識和良知！在那個全民族都失魂落魄的年代，他憑着常識和良知，接通了人文傳統中不可磨滅的生命源流。

鍾先生全力編輯出版的這三部大書，幾千萬字所勾勒出來的「知識範式」，人文經驗的擴展和積累，在漫長的年月裏都是權力所無法夢見的。權力除了本能地預感到真正的文化的惘惘威脅，完全不具備理解真正的知識和學問的能力。「曾驚秋肅臨天下」，誰能感知千里外長沙城小小的編輯部裏的「敢遣春溫上筆端」？這就出現了跟前述的那個故事、那個場景相對應的另一個故事和場景——錢鍾書讀了鍾叔河在《讀書》雜誌上發表的「走向世界」叢書的「敘論」，說寫得好，建議他結集單行，並提出來，為這本書寫序（楊絳說，「他生平主動願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這件事，錢先生用了一個很重的詞：「共襄大業」，這絕不是文人之間的客套，可惜至今很少人體會到這個詞的分量。其實鍾叔河先生自己的話已經點題：生活在晚清一個不正常的國度，要走出去看看正常的世界，人是怎麼活的。當然，正常和不正常，鍾先生有他自己的界定。然後，錢鍾書在序裏狠狠的加了一句：戴着鐐銬也要走向世界……

此即「大業」之所以為大——大哉鍾叔河！

2019年5月



鍾叔河先生近照。
他正在給自己的《與之言集》一書的文章做編輯修改。

認識鍾(叔河)先生

「走向世界叢書」是鍾叔河先生在80年代初編成的一套叢書，他把晚清最早走出國門的人，他們寫的遊記／日記／隨筆，匯編成叢書出版了，以至於像李普(1918.9–2010.11)這樣的老學人、大記者都會寫一封讀者來信寄給晚輩編者——鍾叔河(1931.3–)。那是1981年的夏天，他在信的末尾寫到「八月十八晨三時，半夜醒來，不復成寐，乃寫此信」。他如此急切地寫信，也是因為看了鍾先生編輯的「走向世界叢書」，深切地體會到「你寫這些文章，看了不少書，查了不少資料。不多寫點出來介紹給讀者，不是也很可惜嗎？再花一點功夫，也未必太費事吧？」

實際上，是很費事的！費到鍾先生不斷地努力，得罪了不少人。他白天在出版社編書，晚上回家查資料寫敘論，把那些難以理解的歷史背景、人物簡介寫給讀者。他太「努力」了，於是遭人討厭！鍾先生說：「長沙就像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小說裏的『外省人』，格局小，是小地方出來的人；所以隨便你想做點什麼事都極其費力，得費力去說服他。」為了

想讓讀者明白每一本書背後的事情：他為什麼出國，出國的機會和原因？於是，就在每一本書前寫一篇敘論（導言）之類的文章。這一寫，最短的一萬字，最長的就寫成了四萬字的文章。特別是像鍾先生——古文底子厚實的編者，惜字如金，幾行字裏就蘊含了大量的信息。他寫了這麼多，費了不少時間和精力，那時也是拿不到稿費的，他不計較。因為他實在是是在寫作中，找到了一種樂趣，不僅是知識的樂趣，是他在書寫時，因思考而悟、修煉而覺的樂趣。這種樂趣，沒有任何物質回報，這點鍾先生自己就很清楚，他對我說：「做事寫作，是我生活裏的一部分，你說，寫東西，能掙幾個錢？生意做得好，不是掙錢容易得多？我也不是沒有能力去做生意的，就覺得那些事情沒有什麼意思。」但是，大多數人很難理解、接受他這樣的感受。有的「主管」和「領導」就不高興了：「我們不贊成搭車發表編輯自己的文章。」可是不寫，現在的讀者怎麼讀得懂這些舊文啊！要想趕緊把書出版，又不能跟他們有爭議，鍾先生會動他的小腦筋，把每一篇的敘論以筆名發表：「谷及世」（古籍室）、「何守中」（鍾叔河倒轉）、「金又可」（鍾叔河之半），他實在不想製造「搭便車」的嫌疑。鍾先生說：「我從來不習慣跟在領導屁股後面察言觀色，先意承志。領導想要出什麼書我就出什麼書，那我辦不到。」於是就有了這種特例，鍾先生自己選題，自己找書，自己編輯，自己加工，自己寫前言後記，自己設計付印。他大聲地告訴所有的人：「一句話，這是借前人的書講我自己的話，是我自己的編輯作品。」

鍾先生不愧為湖南佬，就是不來虛的。為什麼歷史上一直

被視為封閉、偏僻的湖南，卻出了那麼多奇特的文人，從曾國藩、郭嵩燾、沈從文一路走來？鍾先生對我們說：

湖南，清朝雍正年間才設省。湖南雖然不是政治意義上的邊疆，卻是漢文化的邊緣，所以沈從文才將湘西的小城鎮叫「邊城」。走向世界的思潮為什麼很早出現在湖南人身上呢？因為洋人是從廣東進來的，從澳門、廣州那些地方來的。湖南緊挨着廣東，洋人進來首當其衝，原來又是非常封閉保守的，那反差就特別明顯，反差特別明顯的地方衝突就特別強烈。我父親曾經告訴過我，他在進「時務學堂」之前，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曾到湘江邊朝洋船扔石頭。有很多保守的人像我父親早年那樣的，逢「洋」必反。先知先覺的先進分子如魏源、郭嵩燾者，正是在這種充滿矛盾衝突的地方才會冒尖出來，「相剋相生，相反相成」，人才作育的道理正是這樣的。

當「走向世界叢書」要推出的時候，有的人又有意見，說是「一年最多讓你出四本」——聽聽，「讓你」，顯然是不喜歡他的「積極」態度，讓你出書，已經恩賜你了，怎麼還想多出？鍾先生是否表現得有點「出人頭地」了，他這是在幹什麼？可是在鍾先生看來，一下不推出十本以上，還叫什麼「叢書」啊！就這麼折騰來折騰去，書，還是陸陸續續出版了，成了那個年代的大事。著名學者李一氓（1903–1990）說：「這確實是我近年來所見到的整理古文獻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學性和創造性的一套叢書。」

在完成張德彝¹ 註的《三述奇》後，張家的後代，在石家莊市第十五中學任教的孫子張祖銘，充滿感激地寫信對鍾先生說：「先祖遺物，除送交國家者外，由於眾所周知之原因，業已蕩然。……若無先生之努力，先祖遺作恐亦無人能知，湮沒於世矣！」

80、90後的孩子，估計並不知道什麼是「眾所周知之原因」吧？我們的時間在日子裏常常是被掩埋了，日曆也總是缺頁的。寒天歲月，為了補上這殘缺的一頁，1979年底，鍾先生跨出涿江勞改農場的第一步，就是踩着殘雪去北京圖書館尋找資料，在雍和宮那裏的戲樓胡同二號，終於尋覓到張德彝八部《述奇》的抄本，其中包括了最有價值的《三述奇》。

張德彝一生八次出國，每次都完成一部日記體裁的「述奇」，而他的《三述奇》正趕上普法之戰與巴黎公社革命。鍾先生的文章裏介紹說：

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二年，張德彝作為崇厚的譯員，隨崇厚到法國處理天津教案遺留問題。他們到馬賽時，普法戰爭已經開始；到波爾多時，巴黎公社的革命就爆發了。張德彝奉命先去巴黎，在巴黎親歷了這一場翻天覆地的大事變。他在《隨使法國記》中，逐日記載了在巴黎、凡爾賽等處的見聞。「走向世界叢書」根據張氏家藏稿本，把唯一一部中國人寫的巴黎公社目擊記貢獻給了讀者。書中有很多珍貴的史料，如巴黎被圍時用氣球和城外聯繫，爭奪布爾日村(Bourges)的戰鬥，拆毀旺多姆圓柱(Vendôme Column)

的現場，外國人眼中的被俘女戰士……毫無疑問會受到研究法國政治史和巴黎公社史的學人的重視。

1918年張德彝去世時，他慎重地把自己的稿本交給了次子張仲英保存；到1951年的時候，張仲英也覺得自己老了，沒有這個能力保存，乾脆將它們捐贈給國家。最後，這些稿本幾經週轉，收藏在北京東北角一條叫戲樓胡同1號的柏林寺裏。寺廟早就不見蹤影，沒有恢宏的建築，只有一道舊木門，上面貼着鐵皮的小門牌號，除此之外什麼都看不見。是在北圖工作的老先生，西南聯大畢業的圖書館員——張玄浩先生的帶領下，鍾叔河去到了那個地方。僅僅是「西南聯大」幾個字，就讓我們肅然起敬，老先生的學問一定不可等閒視之，他看見鍾先生在尋找卡片時的專注、認真，聽說他想出版「走向世界叢書」後，熱情幫助，立刻畫了路線圖，讓他趕去柏林寺查找。又怕鍾叔河有困難，自己都是上了年紀的人，隨後卻騎着自行車從老北圖趕來。查找了好幾天，終於找到了線裝78卷本的《述奇》原稿，它們被藍色布函護封得完整無缺。

鍾叔河幽默地在他的《柏林寺訪書》的文章裏描述到：

柏林寺——北京圖書館分館。此處位於北京內城東北角，原是一座以藏經著名的古剎。但建築和人一樣，它的時運並不因肚裏的書多少而轉移，很久以來，這裏的香火就衰落了，遠不如鄰近的雍和宮。那裏是雍正皇帝的「潛邸」，又有表現人獸交媾的歡喜佛可看，故能吸引多多的善男信女。四九年以後，柏林寺沒有能夠作為佛教勝地

保存下來，卻因為有幾楹藏經樓可以利用，便成了一處存放古籍的地方。

（鍾叔河《小西門集》）

柏林寺的工作人員，都帶着老舍筆下老北京人的特點，操着最禮貌的語言：「您走啦，走好嘞，您明兒早來！」屋子裏沒有空調暖氣，工作人員的棉褲角紮得緊緊的，穿着老式的黑色蚌殼棉鞋，升煤爐燒開水，弓着腰為鍾先生倒水，搪瓷缸上的搪瓷脫落了，可是他們把茶葉放進去，沖進滾燙的熱水，當杯子上冒起熱氣的時候，再寒冷的冬天，都被他們的禮數所溫暖着。他們有教養、有禮貌且為人謙虛。

北方清晨的寒氣，透着乾冷的清爽，這讓鍾先生記憶猶新，特別是在那破舊的樓房裏，藏着這麼多珍貴的古書，讓人無法不流連忘返。從月壇的北小街招待所出發，橫穿整個老北京城，在那些躺着的線裝書裏，終於為讀者尋找到時間，為我們缺頁的日曆打上了小小的補丁。大早進門，最後一個離開，真的是「戀戀不捨」！多少年以後，張玄浩先生早已作古，但是鍾先生還與他的女兒保持着聯繫！

難得的「走向世界叢書」，留下了多少老人付出的心血，錢鍾書先生一眼就看見了。當他看到每本書前的敘論時，覺得非常有意思，雖然他都不知道從哪裏冒出來一個叫「鍾叔河」的，他的古文、國學底子是怎麼修成的，但還是覺得文章寫得好看。於是錢先生關照《讀書》雜誌的董秀玉，如果鍾叔河什麼時候從長沙到北京，帶去他家見見。這太讓人匪夷所思了。

錢先生不要見人是大大有名，那些描述是非常仔細的，他家的門上，掛着小鏈條，敲門以後，門是打開了，但是主人隔門縫朝外看，那小鐵鏈就拉開了主人和外人的距離，多數的來者都被拒之門外。怎麼就這個剛滿50的鍾叔河，他的文章、文字會讓錢先生產生興趣？他邀請鍾叔河做客不算，見了面還鼓勵他，把那些敘論集結單行，並表示願為之作序。[見書信二、三]序言的開頭是：「我首次看見《讀書》裏鍾叔河同志為『走向世界叢書』寫的文章，就感到驚喜，也起了願望。」這個願望就是錢先生給鍾叔河的信上說的：「弟素不肯為人作序，世所共知，茲特為兄破例，聊示微意。兩週來人事蜩集，今急寫就呈上，請閱正。」

在年輕的鍾先生面前，信箋上，錢先生按舊式禮貌的習慣，稱自己為「弟」，也嚇了我一跳。多年以後，楊絳先生收到鍾先生寄去他的新書時，錢先生已經去世多年，她在給鍾先生的回信裏說：「他（錢鍾書）生平主動願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在這些「名人」的讚美之下，領導們也不再給鍾叔河「提要求」了，「走向世界叢書」和《走向世界——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歷史》都順利出版。那些筆名也得到轉正，正大光明出現著者的名字——鍾叔河。

等到我閱讀錢先生的序言和《走向世界——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歷史》時，已經是二十年以後的事情。無地自容，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在北京讀書，卻不知道有這樣一套叢書！更不知道有一個叫鍾叔河的學者。現在，我老老實實地讀，讀完

了以後，又買了好多本送朋友，因為我交的也是一些沒有讀過這書的朋友，甚至做歷史研究的朋友（雖然做的是日本經濟史研究），對於中國歷史，我們都缺少基本的認知！真想把微信上的那些小貼圖，那個流淚或者是焦慮紅臉的形象貼在自己的文章裏，一份很深的羞愧感。

朋友認真看完書以後，立刻給我打電話，她說：「我不同意鍾先生說的，這不是第一次中國人出國對國外的描述和認知，早在中世紀的時候，就有中國人漂洋過海了。」我一聽，覺得朋友說的有道理。這就是我們這些缺少常識、看書抓不住重點的人的「思考」。直到很久以後，我問鍾先生這個問題時，他只用很簡單的一句話就回答了我：「是的，這不是國人第一次漂洋過海；但這是第一次，國人用文字記錄下了他們到歐美後的所見所聞！」

看完這本書以後，我開始把鍾先生出版的書，一本一本地買回家閱讀。每次放下書，抬頭看去，總是看見那個身材魁梧的人，站立在你面前，他踩着左—右—左的步子，有力堅定，跟隨着隊伍中一個個挺胸闊步的戰士在朝前走。我窩在台階上看書，操場上列隊整齊的年輕人，加上那響亮的口號聲，讓人會不由自主地站立起來，向所有邁着正步的人舉手敬禮。人，就是這樣被環境感染和改變，我一點都不覺得自己愚蠢，我甚至比走正步的鍾先生更有一種儀式感，莊嚴得匪夷所思。只是有一天，我站立在鍾先生邊上，與他合影的時候，突然發現他不是那麼高大，我的個子幾乎都快和他一般高低。我怎麼也不

會想到，這個古文底子那麼深厚，對歷史有着深切理解的人，曾經也是一個激進、天真，甚至單純得有點愚蠢的陽光少年。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夏在長沙讀書，那時我被視為左傾學生；到一九五七年，卻成了右派分子。這看似奇怪，其實正常。國民黨的確太腐敗太黑暗了，我感到不民主不自由，很不喜歡它，共產黨在地下一鼓動，就帶頭罷課，帶頭上街遊行，自然成了左傾學生。一九五七年在共產黨的報社裏，我仍然要民主、要自由，於是又成了右派。想起操場上齊步走情形，不禁感慨係之。

（鍾叔河《左右左·左右左》）

我哈哈大笑之後，還是會想到鍾先生1949年在「留校護校」的運動中，和三青團幹架的事情，至今他的右眼眉宇之間，留着舊傷疤；作為當年左傾學生，為他留下了一個記憶的念想。聽鍾先生說話，總是有一份幽默感。他在那裏東拉西扯，苦難也變得滑稽。他從來不笑，一張冷漠的面孔，可是說到最後一句結束語時，談話一定落實在一個思考點上，明確、簡單且清晰，它直指事物的本質。我們的笑聲戛然而止，需要開始認真地思考。

是看了太多鍾先生的書，實在忍不住想給他寫信，因為鍾先生不也是那種會給作者寫信的讀者嗎？一次一次跟朋友敘述着，我從鍾先生文章裏看來的故事。上個世紀60年代初，被打成右派的鍾先生在長沙城裏拉板車，一天就是那麼幾毛錢的

收入。有一天在歇腳的功夫，他在街頭的舊書攤上，看見一本書《希臘的神與英雄》，隨手拿起來讀，讀着讀着，不僅忘記了勞作的辛苦，竟然讀出了彷彿周作人的氣息，那文字的韻律還有那種境界。他把一天拉板車的收入全部付上，買下這本舊書，作者叫周遐壽。他不知道這個人是誰，問朋友，朋友也不知道，於是讓朋友給出版社寫信，出版社是很負責的，他們把信轉給了作者。誰都不會想到的是，作者回信了，這才知道周遐壽就是周作人。

我不斷地跟朋友說這個故事，說得越來越細節化，以至於我甚至看見鍾先生拉板車時，滿身滿臉的汗水，衣衫不整的樣子。我自己都被這個故事感動得熱淚盈眶，因為誰都沒有想到，周先生在天之靈也不會想到，三十年以後，正是這個拉板車的，將周作人的散文集，在1949年以後第一次集結出版，這個板車夫是怎麼完成的？我常常會想，如果拍成電影，要下怎麼樣的功夫，才可以將這個充滿戲劇化的故事，讓觀眾信服？！這靈魂上的交流，會給予觀眾什麼樣的衝擊啊？當時間、生命和死亡在一條平行線上拉開的時候，遠在天上的周作人會有這樣的期待嗎？生活裏，原來並不需要那麼多「傳奇」，幸福的生活應該是平庸的，而他們這些大師，為這些「傳奇」付出了殘酷的代價。

直到有一天，我跟鍾先生對話的時候，他在電話裏告訴我：「不是這樣的。最早給周先生寫信的是張志浩，是批判胡風以後的事情，還沒有開始反右。我看見一本舊書，叫《希臘

的神與英雄》，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再版的時候，就給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了，作者叫周遐壽，這是周作人早年的筆名，當時我不知道。所以，你說我有學問，我連他的筆名都不知道，我哪裏有什麼學問啊！我就覺得這個書的文筆好，但是那些阿波羅啊、神們的名字啊，翻譯得都和我平常看見的不一樣，我很奇怪。我就通過總編室的張志浩給出版社寫了信，因為我在財經組，我寫信就不方便嘛。然後出版社，就把這封信轉給作者，我這才知道，是北京新街口八道灣13號周作人。你可以去看《青燈集》，第27頁上，『三封舊信』，這個事情寫得比較清楚！」

網上買不到《青燈集》了，我去「上圖」找到了這本書。再看一遍，還是感動！

跑舊書店是鍾先生的一大嗜好，他說，當了「右派」以後，變得更加「肆無忌憚」了，因為沒有人、沒有單位管了。那個被我描述成用「一天的拉板車的錢換來的周作人的書」，是我感動以後杜撰出來的，但也不完全是我瞎編，一定在哪裏看見過這情景。直到重讀《小西門集》時，才確定是鍾先生在舊書店買書的故事。他在那裏看見了周作人的《苦竹雜記》，不是歇腳在馬路上的地攤。那會兒舊書店裏的書，一般都是三毛錢一本，但是這本書開價竟然是五角。鍾先生拿不出錢，他轉身就跑到隔壁的舊貨店，毫不猶豫地摘下頭上唯一像樣的呢氈帽，人家說：「這帽子也就值一塊錢，回家拿戶口簿去吧！」鍾先生着急，怕回家以後，《苦竹雜記》就被別人買去了。他說：「帽子，就作九毛錢賣給你吧！」因為一元以下的舊貨，

是不需要戶口簿的。書，總算是買到了。畢竟是1949年以後，市面上，即使是舊書店，也不是那麼容易尋覓到周作人的書的，如果依然在單位供職，鍾先生說，他會猶豫着，是否要將它買回家。

現在，鍾先生手上不僅珍藏着周作人的書，還有他家的地址，於是距離上次寫信五年以後，1963年深秋，他又給老先生寫去了一封長信。那已經不是讀書的年代了，階級鬥爭天天講，運動一個接一個。黑暗中，鍾先生依然在拉完板車以後，燈下讀着周作人的書。為了給周作人寫信，這個「勞動人民」手無寸紙，為了表達自己的虔誠，特為跑到家對面的小店裏，買了幾張一面光潔一面粗糙的「材料紙」，又買了一小瓶墨汁和一枝最低廉的羊毫筆，用老式豎寫的格式，給周作人寫了一封信，並且得到了先生的回覆。

那時候誰都不會把這些東西保存下來，現在說給人家聽，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太像天方夜譚裏的故事了。鍾先生沒有向周作人做任何解釋，只是說自己「迫於生計」，無法購置稍微合適的紙筆，周作人沒有詢問，而是給他回信，在那個年代，鍾先生並不願意提及此事，因為這多少是有點危險的；但是在籌備做《周作人散文全集》時，他和周豐一（周作人的兒子）常聯繫，有次周豐一發現了近三十年前的鍾先生去信的手跡，複印以後便寄給他了。[見書信四]

周老先生：

從友人張志浩君處，拜讀先生手書及大著二種，得知先生仍然很康健，十分高興。

從三十年代我初讀書時起，先生的文章就是我最愛讀的中國的文章。二十餘年來，我在這小城市中，不斷搜求先生的各種著作，凡是能尋到的，無不用心地讀，而且都愛不能釋。說老實話，先生的文章的美，固然是對我具有無上的吸力的，這卻還不是使我最愛讀它們的頂主要的原因。

我一直私心以為，先生的文章的真價值，首先在於它們所反映出來的一種態度，乃是上下數千年來中國讀書人所最難得有的態度，那就是誠實的態度——對自己、對生活、對藝術、對人生、對自己和別人的國家、對人類的今天和未來，都能夠冷靜地，然而又是積極地去看、去講、去想、去寫。

不論是最早慷慨的〈死法〉、〈碰傷〉等文，後來深遠的〈家訓〉、〈試帖〉諸論，甚至就是眾口紛紛或譽為平淡沖和或詈為「自甘涼血」的「茶食」、「野菜」那些小品，我看起來全都一樣，都是藹然仁者之言。

先生對於我們這五千年古國，幾十兆人民，婦人小子，愛是深沉的，憂憤是強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藥方也是開得對的。二十餘年來，中國充滿了各種事變，先生的經歷自是坎坷。然而公道自在人心，即使不讀乙酉諸文，我也從來不敢對先生有何怨責，不幸的只是先生數十萬言為之剴切陳詞的那些事物罷了。

我最引以為恨的，就是雖然經過刻意搜求，先生的一些文集仍然無法看到。如今我所藏的，不過是《自己的園

地》、《雨天的書》、《知堂文集》、《苦茶隨筆》、《夜讀抄》、《瓜豆集》、《風雨談》以及解放後幾冊回憶錄而已。此外還有兩本從前上海野雞書店胡亂編印的集子，實在不能算數，只因為有上述各書不收的文章，也在珍藏之列。先生究竟老了，我輩迫於生計，也無法多尋書讀書，看將起來，這恐怕將會成為永遠難償的心願了。假如先生手邊尚有存留的文集，無論舊印新刊，能夠賜寄一冊，那就足以使我歡喜萬分了。

此外，我還想學志浩君的樣子，求先生為我寫一條幅，字句就用先生無論哪一首詩都好。先生最喜歡的藹理斯的那一段話，用在這裏也許適合，先生就請把它當作交給別人手裏的一支火把亦可耳。

回示請寄 長沙市教育西街十八號。敬祝

康健！

鍾叔河 十一月二十四日

無法購置稍微合適的紙筆，要請先生原諒，又及。

一封長信，在那樣的年代，給這樣一個漢奸寫了如此深情的信，他就不懼怕？這讓我困惑了很久。有一天，看着我的父親留下來的舊書裏，發現裏面有一張讀書卡片，日期也是在上世紀60代初期，在頁20上，他同樣是抄下周作人的句子：

周作人 / 人的文學

我所說的人道主義，並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

施濟眾」的慈善主義，而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用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學，便謂之人的文學。

當我看見這卡片時，背脊同樣發涼，手上卻濕漉漉地冒着汗水，雖然已經遠離那個年代，可是我還是感覺到一種懼怕。我記憶裏的青海，總是那樣窮困和黯淡，黑夜茫茫之中站立着父親，看不見他的臉，因為對他我沒有清晰的記憶，只是不明白，為什麼他在流放青海的日子裏，依然認定了「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為什麼他和拖板車的鍾先生，都會在那樣的年代，閱讀着周作人的書？父親已經是50歲的人了，可是鍾先生才三十剛出頭，他們怎麼都成了「反革命」？這些落入人間底層的庶人，怎麼都在思考一個共同的課題？好像思考這樣問題的人，都會成為「反革命」，沒有例外，只有先後。原來被戴上帽子，與事實本身沒有關係，關鍵在於你不能具備思想，你不該有太多的思考。他們到底在尋找什麼？

周作人果然將「藹理斯的那一段話」寫給鍾先生了：

在一個短時間內，如我們願意，我們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們路程的周圍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炬競走——這在路克勒丟斯（Lucretius）看來，似乎一切生活的象徵——裏一樣：我們手裏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從後面來，追上我們，我們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樣的將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遞在他的手內，我們自己就隱沒到黑暗裏去。

這裏有太多傷心的體驗，似乎父親，也是這樣隱沒在我的生活裏的火炬手，他消失了，走得悄然無聲，我沒有看見他的遺容，是他去世很久很久以後，我才知道，父親已經不在世上，他最後被發配去「河南農學院」，不知道是一個什麼樣的身分，我太小了，不懂政治不懂父親。他被置放在樓梯下，一個在生理上就不能抬起頭的空間裏，面前放着一張小桌子，桌子上放着改錐²和剪刀，他躬着背坐下，整日整日地修補着圖書館裏的舊書。不久，他渾身是傷和瘀青，屍體泡浸在福爾馬林的藥水裏一百天了。1968年7月我的大姐被通知去認領屍體。我沒有機會給他送終，我也沒有必要大聲向組織表示「與反革命父親劃清界限」。回頭看去，在黑夜裏，只有父親留下的——他的書櫥。這成了他傳遞下來的火炬，沒有遺囑、沒有訓導，只能再次上路尋找。而此刻，我不願意看見鍾先生的消失，他們這些有學問的人，怎麼會落入生活最黑暗的地方，我想知道他們在黑暗中的體驗，他們為什麼要接過那個火炬？他們看見了什麼，為什麼還想在黑暗中舉着火炬，朝前走向哪裏？

我也給鍾先生寫了一封信，我沒有寄到出版社，我請求朱正先生將信轉去，因為從鍾先生的書裏，我知道他們是一個「反黨小集團」的成員，一起進《湖南日報》，一起打成右派，一起判刑在茶陵沅江勞改農場，一起服刑。朱正先生我雖然只見過一面，那是在我拍攝紀錄片《紅日風暴》時，他非常直率且充滿了思想回答了我的提問。我重提舊事，搭上關係，請朱正先生幫助。

很快，我接到了鍾先生的電話，在話筒的那一頭，是我熟悉的湖南話。鍾先生叫我捧（彭）笑（小）臉（蓮），他說我跟你半個老鄉啊，你祖籍是茶陵人，文革中我是在茶陵服刑九年啊！隔着電話，看不見鍾先生的模樣，難以想像一個遙遠陌生人說話的樣子，但是我忍不住要對鄉音有一份感動，那種突然衝進我生活裏的湖南口音，在提示我父親的存在，那裏蘊含着家庭溫暖的氣息，同時又散發出那種失去鄉音以後的恐懼和陌生，它們混雜在一起，讓我有一份傾聽的渴望。

鍾先生說話是不動聲色的，但是幽默得讓你接不上話題，他的第一句「認老鄉」，就拉近了我和他的關係。我想像中的鍾先生，就是這樣強大、剛正不阿且善良的老人。後來在俞潤泉（1925–2003）寫給朋友的信上，對鍾先生的性格表現，有了具體的描述，信上說：

此外，還告訴您一件事。1978年³我們還未恢復工作以前，承柳思照顧我與鍾兄、謙老，在楊堅領導下在圖書館租一書齋，編校《郭嵩燾日記》。有一天偶然碰到了孟樹德也去借書，鍾上前一步，老孟，還認得我嗎？我是鍾叔河。孟退一步，鍾逼上一步，孟再退一步，鍾又進一步。鍾說：聽說您已出長湖南師範學院，我們還在打流⁴哩。我怕出事（其實決不會），把老鍾拉進我們的小書齋，孟公未答一言。魯迅說：「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嗚呼！學太上之忘情不易也，何況我是小人乎。

鍾先生的文章裏，提到過1958年4月20日，一個叫M的

在全社大會上，惡狠狠地宣布右派分子的處理，「情節嚴重態度惡劣者送勞動教養，其中情節特別嚴重、態度特別惡劣者，並開除其公職」。鍾先生就是屬於最惡劣的這一類。是否被鍾先生緊緊逼近的孟樹德，正是M先生了？當年他一口氣宣布了他們小小的報社裏五十四個右派分子。《人民日報》才出了十幾個右派，可是一個小小的地方報紙，卻整出了那麼多右派。M志得意滿的樣子，大獲全勝的氣焰，鍾先生是記憶猶新的。俞潤泉老先生從來是好好先生，但是鍾先生可是「左翼」出身的學生，對這些壞人，他一定是嫉惡如仇的，怎麼會輕易「相逢一笑泯恩仇」？想像得出，鍾先生那咄咄逼人的樣子，那直挺挺的拉板車的身胚，絕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原則！

「右派」都曾經絕望過，事後，太多的人選擇了沉默。很多人不再提起往事，即使看見陷害他們的人，也會以「寬容」的姿態轉過身去。不論他們是怎麼想的，但是，這不是鍾先生的性格，這也與復仇無關，他的表達，是替所有的「右派」分子代言，他把迫害在身體最深處的痛苦放射出來，他不隨便相信什麼「寬容」，曾經流逝的歲月、生命和時間，絕不會就這麼簡單地被放棄。如果，你經歷了那些殘酷的折磨後，撕碎的是人的「尊嚴」和精神上的東西，「一笑」是無論如何都無法泯恩仇的。

正因為有這麼強烈的憤怒，就會有鍾先生最細膩的情感，他的觀察和寫作，讓我常常想到，如此一個敏感的人，他怎麼能度過那麼艱辛的歲月，從肉體到精神，不斷地被摧殘被蹂躪，怎麼挺過來呢？似乎在生活裏，什麼都逃不過他的眼睛。與他交往不多的「老戴」，他是這樣描述他的背影的：

一九九三年夏天，我因事到北京，在版協的會上，我倆又相見了。王子野同志叫我重印亞東圖書館標點分段的古典白話小說，急切間找不到原本。老戴得知後，自告奮勇幫我找。先到朝內大街人文社圖書室，找不到又走北牌樓胡同去范用家。我想叫出租車，他卻說：「不遠，不遠，一下便走到了。」結果書未能找得，但胡同中快步向前走的老戴，他那單瘦的背影，舊紡綢短袖襯衫後心見濕的背影，每當心中想起，彷彿仍在目前，因得小詩一首相送：

人生如寄死如歸，事本尋常不足悲。

記得當年尋小說，為君一哭到墳堆。

寫下這些短詩短文，是因為「如今他先我而去，為他出紀念集，采及葑菲，自當勉作小文，以為惜別。」鍾先生，可以「為君一哭到墳堆」，如此情感深切地對待朋友。起源是因為這位原來與他「素昧平生」的老戴，在讀他的書後，在《讀書》雜誌上寫了第一篇熱情鼓勵的書評。他們那一代人，是在寥寥無幾的字裏行間，讀出他們共同的不安和同情，體味到相同的人生，他們曾經都被剝奪的價值，讓他們感受到生存的本質，活着的意義。侮辱，讓他們感受到一種無法擺脫的恥辱，也是因為經歷了那樣的歲月，他們深深意識到一個人的尊嚴，情感在尊嚴面前變得更加脆弱。後來在談到另一位老友之死時，他感慨地說：「我年紀大了，寫文章太動感情。老成凋謝，星辰寥落，這些老輩人不可能再有了，使我非常感傷。」

鍾先生的堅強和他的感傷，總是那樣不和諧地交織在一起。想讀明白他，真不是那麼容易……突然，突然我掉過頭

去，不再繼續寫下去，恨不能對着牆壁一頭撞去，一種羞辱的感覺，丟人啊。這一下讓我想起了2014年的春天，我不知道着了什麼魔，竟然冒出一個念頭，為自己快要出版的新書，寫信請鍾先生給書名題簽。我得意洋洋，寫了很長一封信，完全不了解鍾先生，更不會意識到自己的庸俗和無聊。沒有，一點意識都沒有。我就是那麼愚蠢地把信給鍾先生發出去了。

收到回信時，看見鍾先生允諾的口氣，我就後悔了，他是那麼有教養、有禮貌，但是他並不樂意，他沒有拒絕，他說：「不給你寫字，顯得很矯情，我的字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寫字的話，就是不要在書名下面題上我的名字，這是你寫的書。」我意識到了自己的無聊，真想回信說：「算了，不用寫了。」但是這樣做的時候，又讓我想到契訶夫 (Anton Chekhov) 的「小公務員」，⁵我變得更加矯情，人家已經答應你了，你什麼意思？要和鍾先生抬槓？我去問我的汪劍（因為信是通過她轉發的，我當時在國外，email給她），我是否需要撤回我的請求？她說：「不必了，鍾先生已經答應你了。」是的，信的末尾，鍾先生問我，是橫着寫書名，還是豎着寫。我說，各寫一幅吧！很快鍾先生就用上好的宣紙，橫排、豎排，各寫了兩個小條幅用掛號信寄來了。

看着鍾先生的毛筆字，工整、率性、有力，不知道怎麼向他老人家交代。因為按照鍾先生的說法，自己的書，就是自己寫字，哪怕那字寫得並不漂亮。

書，出版了。我讓出版社給鍾先生寄去兩本以作謝意，再也不敢提這事情。出版方堅持要在鍾先生書寫的書名下題簽他

的名字，我不同意，這是我答應鍾先生的條件，我和他們爭執了很久，他們說：「那鍾先生的字，沒有他名字的題簽，就沒有意思了。」「為什麼沒有意思，那麼漂亮的書法！」「字，寫得好的人，多了去了。」「我不認識這些人。」「我們要的是鍾先生的名字和名氣。」多麼明確！一下就點到了我的死穴，難道我當初不也是帶着這樣的虛榮去要求的嗎？現在，只有一個改正的機會，堅持我對鍾先生的承諾。我說：「絕對不能出現鍾先生的名字！」出版方火了，說：「那個字不適合我們的封面設計，只能用仿宋體的書名。」鍾先生的題簽，放在了書的內頁。

我再也沒有和鍾先生提起過這事，見面也沒有提。我想，在本質上我是虛榮的，儘管我堅持了原則，但是我的起點就是俗不可耐的願望。我不好意思給鍾先生寫信了，不知道說什麼好。我拖住汪劍，任何事情都請她幫助，我幾乎有點害怕直接跟鍾先生在電話裏對話，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又會流露出我的俗氣。

有一天，我和汪劍背上了我十二年前買的PD-150攝像機，去長沙一起看望鍾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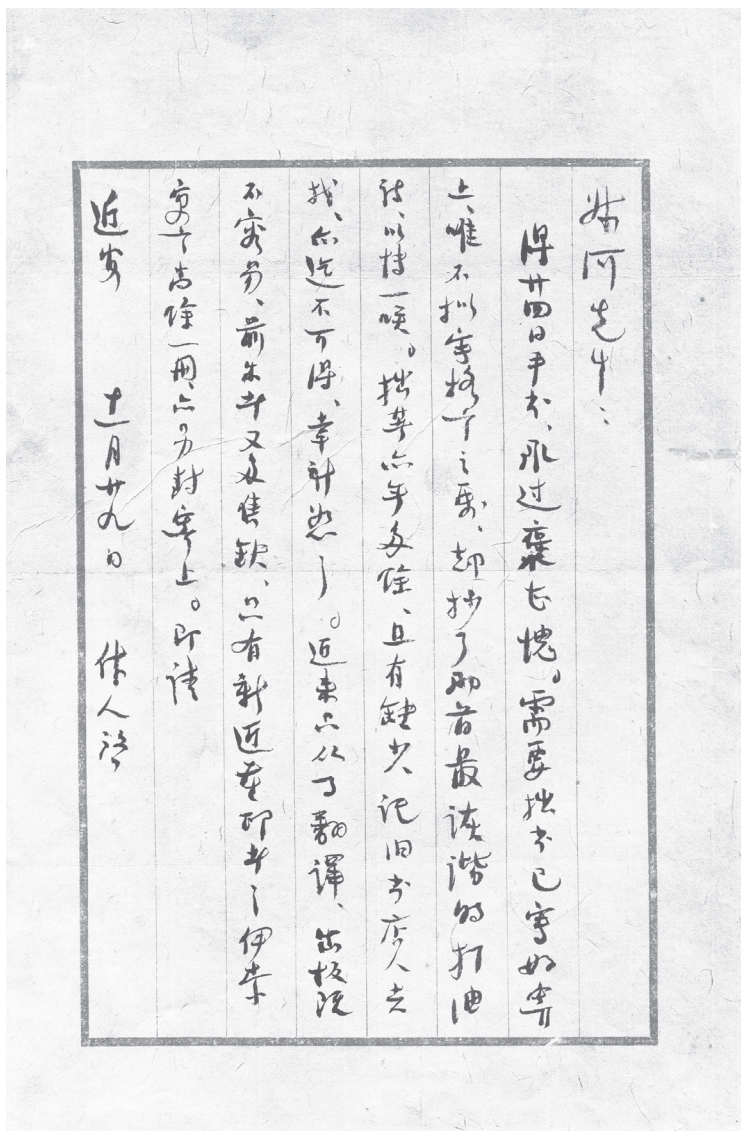
彭小蓮

註釋

- 1 張德彝(1847–1918)，祖籍福建，後遷遼寧鐵嶺，生於北京，出生時家道中落。同治元年(1862)，考進外語學校同文館。1918年，張德彝病逝北京，享年71歲。一生八次出國，在國外共度

過二十七年。每次出國，皆寫下詳細日記，依次成輯《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四述奇》直至《八述奇》(第七部「七述奇」未完成)，共約二百萬字。

- 2 編註：即螺絲刀、螺絲起子。
- 3 原文如此，見《俞潤泉書信集》，頁160。鍾先生1979年才從淞江勞改農場回來，所以是俞潤泉記憶錯誤。
- 4 編註：無業、在外遊蕩。
- 5 編註：指契訶夫作品《小公務員之死》(*The Death of a Clerk*)中的主角。



書信一 周作人回覆鍾叔河之信件。（王平攝）

第 1 頁

《走向世界》序

我最初在《讀書》里看了鍾叔河同志《走向世界》的文章，感到興趣，也起了^願望。差不多四十年前，我想用英語寫一本有關晚清輸入西洋文學的小史，曾涉獵叔河同志所講的那一類書，當時它們已是冷門東西了。我的視野很小，只局限于文學，遠不如他眼光普照，~~能~~願^願瞻到歐、美以至日本文化的全面；更不用說，我對這類書，也~~不能像~~他那樣耐心地搜訪，虛心地流覽。我~~的~~會面時，~~我~~發表過的旧稿片段向他請教，并~~他~~願他快快完成《走向世界叢書》的編校計劃。^{（給與研究者以便利。）}李一氓^{同志}和我談起《走向世界》的文章，表示贊許；晚清文獻也屬於一氓同志的博學的範圍，他的意見不同泛泛。對中外文化交

15 × 20 = 300

文學研究所稿紙

書信二 錢鍾書為「走向世界叢書」所作序言（一）

第二頁

流史素有研究的李侃同志，也很重視叔河同志的文章和規劃。我相信，由於他們兩位的大力鼓勵，叔河同志雖然工作^{條件}不很順利，身體情況更為惡劣，而又搜輯，又校訂，又^{一篇篇}寫序文，不到三年，竟大功告成了。

“走向世界”，那还用說！難道有可能“走出世界”嗎？我們不情不願^{（兩腳彷彿拖著鎖）}，也只好走向這世界，因為^{我們}絕無辦法走出、逃離這世界，即使兩腳生了翅膀。

中國“走向世界”，事實上也是“世界”“走向”中國；咱們開門出去也由於外面有人敲門、撞門甚至破門^{（或跳窗）}進來。“閉關自守”、“門戶開放”那種簡括利落的公式語，很便於記憶，作為標題或口號大有用處。但^是歷史過程往往不為歷史編寫者的方便着想，~~它~~它不肯直截了當地、按部就班地推進。在我們日常生

15 × 20 = 300

文學研究所稿紙

書信二 錢鍾書為「走向世界叢書」所作序言（二）

第 3 頁

活里，有时门和窗大开，有时开或半开了窗却
 关上门，有^時門和窗都緊閉，只留下門窗縫和鑰
 匙孔透些兒氣；門窗洞開難保不傷風著涼，
 門窗牢閉又怕會窒息。文化交^流是否也可以打
 這種家常的比方，我^不知道。叔和同志的這一
 系列文章，中肯扼要，不僅增添^了我們的知識，
 而且很能引起我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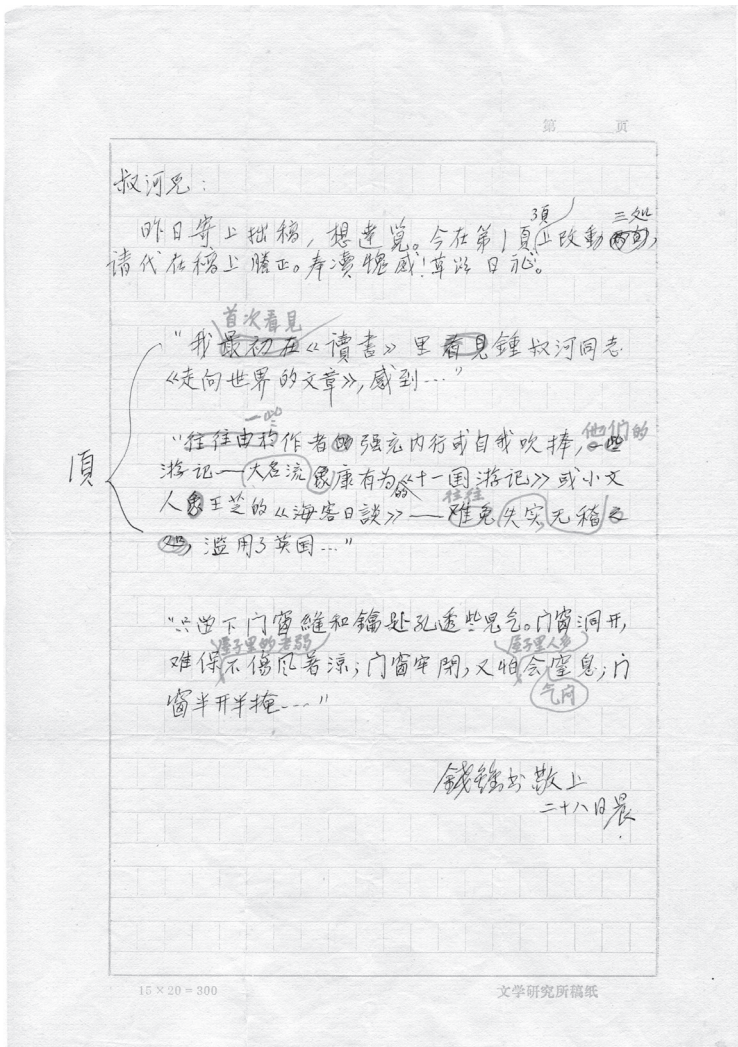
錢鍾書

1984年3月。

15 × 20 = 300

文學研究所稿紙

書信二 錢鍾書為「走向世界叢書」所作序言(三)



書信三 錢鍾書給鍾叔河序言修改信件

與鍾先生閒聊（一）

2017年的春末，我們從上海趕去長沙看望鍾叔河先生，他不喜歡出門，我們想請他在家對面的電影院看《摔跤吧，爸爸》(*Dangal*)，他拒絕了。但是，我們在他家聊了整整一天。晚上想起來沒有跟他合影，得到許可，又趕回去照相的時候，鍾先生在量血壓，這讓我們非常慚愧。但是，聊天的過程是受教育的過程，受益匪淺。真希望是他的鄰居，隔幾個月可以去看望他一次。

鍾：「走向世界叢書」裏有些書，是我在小學的時候，初中的時候，在家裏就看過的。最早看的是容闕的《西學東漸記》，我看的是「萬有文庫」的本子，它在抗戰前就收入了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不是一本難得的書，但是前人好像也沒有很充分地評價這本書。康有為、梁啟超的書家裏都有，也還有黃遵憲、黎庶昌的書等。黎庶昌是曾門四子之一，曾國藩的幕僚裏面有幾個會寫文章的人，他算一個，貴州遵義人，遵義會議那個地方。那個地方很怪，它在貴州，很偏僻，但是出來好幾個很有名的學者和文人，黎庶昌就是其中一個，還有鄭珍、莫友芝，

所謂遵義三傑。鄭珍是很著名的經學家，用現在的語言來講，他是中國古代的哲學家和經學家，莫友芝是著名的版本學家、文獻學家，都是很有著作的，學術地位很高。但是黎庶昌就是一個讀書人，讀出來首先在曾國藩的班子裏面做事，當時相當於入了曾國藩的幕府。清朝的官職是幕府這些人，都是私人聘用的，跟他是一個主賓關係。師爺，政府不發工資的。做得好，跟的這個人對了，這個官（就）提拔上去了，可以保舉他做一個官。李鴻章開始也是曾國藩幕府的人才，後來他文章寫得好就讓他去搞洋務，黎庶昌後來當了外交官，到國外去，就寫了《西洋雜誌》，寫西班牙和法國，寫自己在那裏的見聞，文章寫得是蠻好的。這些書，家裏都有一些，自己當時看不很懂，但是知道了有這樣一些書。我的家庭是一個舊家庭，父親是教數學的，他因為有些朋友和同學是國民黨早期的黨員，即所謂「民黨」，辛亥革命有了地位，幫帶我父親也成了個「民主人士」，家裏於是有了些書。其實，後來這些人都不當權了。湖南人自從宋教仁被殺了以後，在國民黨裏面就不當權了。如果宋教仁沒有死，是在國民黨裏最有話語權的。孫中山是一個大炮，孫大炮，名義上的領袖，做組織工作的是宋教仁。宋教仁死了就是陳其美，蔣介石是陳其美提拔出來的，陳立夫、陳果夫是陳其美的侄兒，就是浙江人當權了。因為舊中國的政黨是舊中國社會的縮影，是很講地方主義、講山頭、講派系的。

彭：就是幫派。

鍾：中國的傳統社會裏，有三種力量是很大的；一種是地方關係，一種是宗族關係，另外一個是科第關係，比如「同年」。不是說

我和你都是1931年生的，就叫「同年」。而是我們都在31年中的進士，這叫「同年」，都在31年中的舉人，也是「同年」，此種「同年」是一輩子的關係。後來湖南人不當權了，但是我父親，畢竟是老黨員（國民黨）老官僚（周震麟、仇鰲他們）還是有一點影響，父親也沾了點光，家裏還是有些書。我看書看得比較早，首先看，看不懂，多看就懂了。所以我想，學外文多看就懂，我覺得這是至理名言。文言文我就是自己看懂的，看不懂還會有興趣往下看嗎？沒有別的什麼活動，又不准走出大門去跟農村孩子交朋友。因為抗戰，到鄉下去了，老家裏很少有同齡同輩分的孩子可以玩，只能拿着書看。這裏面就包括了康有為、梁啟超他們的書，也包括他們「走向世界」的書。這個書原來看了也沒有觸動自己神經，小孩子讀書沒有什麼目的的，更沒有功利的目的。你說讀這個書我有什麼目的啊，做編輯、做學問？沒有，就是以讀書打發日子。但是讀了還是有用，後來就變成了我的一種「待遇」，因為畢竟在1949年以前，一個讀書人家裏讀過些這樣的書。其實嚴格來說，我的父親還不算現代知識分子，他是一個過渡性的人物，實際上是一個士大夫出身的讀書人，他是一個老式的讀書人，介乎新式讀書人之間的這一代人。他是魯迅和周作人那一代的人。魯迅和周作人也應過科舉，但他們完成了舊的士大夫到新式知識分子的轉變，我的父親沒有完成這個轉變。對於我而言，父親最大的好處是允許我讀書，不干涉我讀書，這是很感激他的一個事情。

我已經接觸了這些書，當然也會更多地接觸新的人寫外

國的書，最普通、最有名的是朱自清的《歐遊雜記》、《倫敦雜記》，文筆寫得也好。介乎新舊之間的，還有一個女作家是呂碧城，¹她也寫過《歐美漫遊錄》。她是一個很怪的女人，她寫舊詩詞，生活又很歐化，但是她的觀念還是士大夫，把自己定位為李清照那樣的人。但是她的文筆非常漂亮，也寫歐美生活。我原來大量去看這些類文學作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文學時期，或長或短。我的文學時期很短，參加工作以後，文學時期就結束了。在這個短短的時期我看了大量的書，在平江沒有出來時，舊小說基本上都看完了，包括《金瓶梅》。我很早就看《金瓶梅》。所以，看書不會去犯罪的。但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看《金瓶梅》，性的描寫對自己有沒有刺激？有，但有也不會導致去亂搞，因為總還是個有教養的、有約束的孩子嘛。但平心而論，中國的舊小說寫性是不適於青少年看的，因為傳統的性觀念是錯誤的，不科學，也違反自然，包含了很多荒謬的東西，會影響這個人以後的觀念和生活，如果不經過科學的洗禮。

彭：鍾先生，我插一句，為什麼說傳統的性觀念是錯誤的？

鍾：這是一個專門問題，不是三言兩語談得清的，舊時中國人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三綱五常，絕對男性中心的社會。它有兩個很大的錯誤，一個是以男性為中心，這樣後嗣就非常重要，統治者最重要的是必須要有後代，要保證有大量的後代，怎麼辦？就一夫多妻。所以這個一夫多妻，在中國不僅是習慣，而且是法定的。哪一級諸侯應該有多少個配偶，規定得很詳細，怎麼樣輪班去陪睡都規定了，君夫人「專夕」，一個人陪一晚，三個妃子共一晚，更低等級的女人則九九八十一天輪上一晚。

如此廣種薄收，國君哪怕做一年就短命死了，他也有後代。他也不一定是有意識地朝這個方向走，這是一個根源，絕對的男權主義。另外一個最為錯誤荒謬的東西是，原始的道教思想，即所謂「採陰補陽」。這種採補關係，是敵對的關係，有的書上寫的就是「敵人」兩個字，它總是無限誇大男性的性能力，怎麼樣能夠征服女人，「黃帝御百女而成仙」，事實上不可能那樣的。反過來女人如果當了權，武則天當皇帝，也是正常的，但作了女皇帝就像男皇帝那樣對待異性，對張昌宗、張易之兄弟，對薛懷義、沈南蓼等人，完全把他們當成洩慾的工具或採補的藥物，用道家的術語說即所謂「鼎器」，煉丹藥的鼎。把一個人看成是一個鼎，一個器具，這很荒謬、很變態了，對於兩性都是摧殘，是不利於健康的。這個觀念深入人心，它有書有理論，既違反科學，又違反自然。當然這個問題是一個專門的問題，要由學者去思考，我在這方面也沒有研究，讀書也接觸了這些方面的問題，這個要去探究，不是三言兩句講得清楚的。但是我認為要有學者去研究，確實要進行科學的啟蒙，要把這些事情說清楚。為什麼我講周作人有先進性？他在這個方面的觀點是很先進的，他是從生物的分工來談論這個問題的，女性擔負了生育的功能，生育的功能是有週期的，所以性應該是以女性為本位、為主。原始社會是母系社會，這是後來的推論，誰也沒有看見原始社會，原始社會也沒有錄音也沒有錄像，說北京山頂洞人在洞裏面，有巢氏在巢裏面，是什麼樣的兩性關係，只能憑猜測。但是我們可以從動物的生活去考察，作為人最接近的是類人猿，類人猿都是很混亂的，是以雄性為

中心的，就是猴王。猴王得不斷與猴奮鬥，誰鬥贏了誰就占有全群的雌性。這裏是沒有終身制的。從猿到人，但是人畢竟是人，人脫離了動物。人脫離動物的標誌是有道德自律，有精神世界，有精神追求。人脫離了動物世界，所以不能用我們的表兄弟，就是類人猿的生活來作為我們生活的解釋。

關於性學我沒有很多發言權，現在已經有人研究性科學，像李銀河他們。但是還差得很遠，還沒有很好地、科學地講清這個問題。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大問題，不能迴避的。社會學和人類學應該研究這個問題。我編過一本《周作人分類文編》，有一卷「人與蟲」是談草木蟲魚的，還有一本「上下身」就是談兩性問題、兒童問題、婦女問題的。周作人其實不單純是一個文學工作者，他沒有寫很多純文學作品，我給他定位是一個文化學者，他是一個思想者和一個文化學者。他的訓練也不是文學的，他在中國是海軍學校畢業的，南京水師的，派去日本是學土木工程，他沒有學，去學希臘文了。海軍學的是技術，他經過現代科學的訓練，這是他的一個優勢。他不像魯迅。魯迅學路礦，書沒有讀完就走了。他在南京水師是畢了業的，因為近視眼不能上兵艦了，派去學土木，回來築炮彈，也是技術工作。所以周作人既能以科學的態度，又能從人文的角度思考「性」的問題。周作人著作有他進步的意義，到現在也沒有過時，他的文學觀、他的社會觀，都有很多可取的地方。當然我不是說他一切方面都好，我不崇拜他，我不崇拜任何人，我不可能成為宗教徒。我可以崇敬一個人，但是我不會崇拜任何一個人，我認為崇拜就有宗教的因素在裏面了，我不敬神、不信神。我認為我是一個人，我們人作為一個物種來講不夠完善，

遠遠沒有達到完善的程度。

我其實並沒有讀很多書，家裏也沒有那麼多書，看小說有很多也是借的，因為那些舊小說過去農村裏面還是流通的，過去農村裏面還是有文化的，這種文化當然集中在地主之家，後來把地主階級打倒了，農村的文化（當然是舊文化）也就被打倒了。

彭：為什麼打倒了地主就沒有文化了？

鍾：這些書本都是在地主家裏的，農民不識字他就不會看小說嘛！農民如果幹得好，成了富裕中農、富農，他才會送兒子去讀書。他要自己有了田，要雇人幫他種田，他才需要理財，才有進出帳目，才會想到要兒子去識幾個字，兒子才有可能看一點唱本什麼的，小說還很可能沒有程度看。所以能夠看書的，在鄉村裏面只有地主的子弟。地主成年以後，老了以後，他也要消遣，也要看書，所以這些書就都在這些人家裏。中國的社會本來就是一個超穩定的結構，如果沒有外力去推動它，照原樣運作幾百千把年沒有問題。什麼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什麼最初是原始社會，後來是奴隸社會，後來是封建社會，再後來是資本主義社會，都是人造的公式，不一定是這樣走的。郭沫若說周朝就不是奴隸社會了，但清朝《紅樓夢》裏還有奴隸，晴雯就是家生子，晴雯的嫂子他們都是賈府的家奴，花襲人也是家奴，但她是買來的，可以贖回去的，是半自由的，贖回去可以談婚論嫁的。晴雯就不是，是家生子，是奴隸。清朝乾隆年間還有奴隸，大清律規定奴姦主婦斬立決，主姦奴妻罰款了事，怎麼說呢？社會嘛，不能夠拿到現在來講，不能在那個語境裏面去談問題，是談不到的。所以中國的事情不是那麼簡

單。我很老式，我既不會錄音，也不會錄像，手機短信都不會看。我家阿姨用的是先進的手機，她的手機比我的先進，我是一個老年手機，但能說她的思想比我先進嗎？我認為不能光用技術普及的程度來評定社會發展的程度，我們現在的人文科學水平還差得相當遠。

註釋

- 1 呂碧城(1883–1943)，安徽旌德人。著名作家、詞人、教育家、政治人物。提倡女學，是素食主義者和動物保護主義者，佛教居士。1904年被《大公報》聘為助理編輯，同年創辦北洋女子公學，後任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監督。辛亥革命後，被袁世凱聘為總統府機要秘書，後因其復辟帝制而辭職居滬。1920年，赴美留學並周遊歐美各國，後在瑞士長住。1939年返回香港，1943年病逝，終生未婚。

汨羅江邊的薪火

鍾叔河先生出生於1931年11月19日，湖南平江人。

湖南，是任何矚目中國近現代史的人都無法迴避的地方，我們目力所能及的這一百多年間，從清末重臣曾國藩、郭嵩燾、左宗棠，到戊戌變法殺身成仁的譚嗣同，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胡耀邦……中國近現代史的關鍵節點上始終閃爍着湖南人的身影。遇到鍾叔河先生，我不免好奇地問道：「為什麼湖南出了這麼多引領時代的風雲人物？」鍾先生不緊不慢地用他的湖南鄉音說：「因為湖南一直就是個閉塞保守的地方，太閉塞了，太保守了，所以從這裏能出頭的人，非得比一般的人更強悍、更有力、更能抵抗才行，他的生命力會更強。」這時我才知道，自以為讀過了一些書，有過一些經驗和思考，其實還是一無所知。

平江在湖南省的東北角，省會長沙的北面，緊挨着長沙，但歷史上的「長沙府」（簡稱「長郡」）卻獨獨將這座小城排除在外。環繞長沙的湘陰、瀏陽、醴陵、湘潭、湘鄉、寧鄉、益陽、攸縣、安化、茶陵、善化和長沙一起並稱「長郡十二屬」。

創立於1904年的長郡中學，也只招收這十二個州縣的學生，其中包括距離長沙兩百多公里以外的安化和茶陵的學生，但與長沙為鄰的平江人卻沒有入學資格。

鍾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這奇特的現象與水系的分布有關：

「長郡十二屬」的資、瀏、淶、漣、瀉、沅等水都是湘江支流，都是相通的。

平江卻只有條從東到西橫貫全境的汨羅江，它來自江西修水，到磊石山入洞庭，前面就是岳陽，與湘江並無關係。兩地不通舟楫，徒步翻山越嶺，往來自然不便。……汨羅江是平江的源頭，是平江人的血脈。平江話是汨羅江帶來的贛方言，長沙話卻屬於湘方言，語言不通，感情即不免隔閡。平江（尤其是東鄉）的風俗，也多同於江西的修水和銅鼓。

（鍾叔河《青燈集·平江和平江人》）

這個因為山和水的關係與省會長沙疏離的小城，一千八百年前的三國時代就是古戰場。唐朝安史之亂後，中書侍郎徐安貞等六位朝廷重臣自長安避亂南下，隱居於此，史稱「六相隱平江」。這裏自古人才輩出，據說宋代有過三次全省會試，平江人都大包大攬。清朝近三百年間，平江籍正四品以上的武將有五百餘人，其中最赫赫有名的余虎恩進入了平江廣為流傳的童謠：「平江出人了不得，余蠻子帶兵打外國。李次青，張岳齡，七篇文字鍾昌勤。」

晚年的鍾先生仍然記得兒時母親在昏黃的桐油燈下一邊納鞋底，一邊用這首歌謠鼓勵他，說：「平江出人，會做文章的有鍾昌勤，你也姓鍾，要爭氣啊！」

最初知道鍾叔河先生，還是彭小蓮導演向我推薦了一本「特別特別好看的書」——《走向世界——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歷史》。一翻開這本書，馬上被牢牢地吸引住了，都是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故事，慢慢看進去，與其說是在鍾先生的帶領下看古人如何走向世界，不如說是我自己在這些傳奇裏，一步步地走向一個被牢牢遮蔽的世界，當我在這個世界上行走了近四十年，才剛剛發現的一個「新世界」。

讀着讀着，經常有不認識的字、詞跳出來，「拂菻」、「竅要」、「嚆矢」、「虺虺」……我一邊查着《現代漢語詞典》，一邊臉紅、冒冷汗，讀完整本書，密密麻麻列滿了生字和詞義的八、九頁A4稿紙告訴我，這是一個顯然已經被我，或者「我們」丢失了的世界，而曾經，這樣的語言和文字是我們這個年紀讀書人的日常。在這個丢失的世界裏，有我們並不很遙遠的長輩、祖先的生活，他們從小修習的古代經典，他們待人接物的禮節禁忌，他們熟知的典故俗話，他們讀書、思考、和選擇……這會讓我們明白自己從哪兒來，要去哪兒，為什麼往那個方向走……這麼一想，又是一身冷汗，讀了這麼多年書，卻很少花時間去思考這些事，小時候也曾有過好奇，但父母說起這些的時候總像在捉迷藏，總是告誡我「有的能說，有的不能說」。我走到人生的中段，發現腦子裏竟然是一片空白。

鍾叔河先生自己的故事是從平江西面的神鼎山開始的：

神鼎山在平江邊境，西距湘陰（汨羅）界十里，南距長沙界六里……山前則田疇平行，地名田坪，歷來為鍾姓聚居之處。五百年前的明朝弘治年間，有一戶鍾姓人家始於山麓造屋，自耕自食……曾祖父生了七個兒子，伯祖父參加後期的湘軍，不斷升官，在左宗棠徵西、李光久抗日（甲午之戰）時，都當了營務處總辦（後勤部長），也帶過作戰部隊，以「軍功」使曾祖父得到正三品封贈，並提挈我祖父（他二弟）成了湖南協標（軍區直屬部隊）的一名「藍翎儘先補用都司」，算五品武官，祖母向氏也得稱「宜人」了。

祖父不如伯祖父能幹，卻喜歡「玩」，他後來乾脆出錢在省城長沙開了家旅館，讓宜人和少爺住在老家，自己只年終回去一次，平時則長住旅館，夜夜不是看戲，便是吃花酒，「玩」。祖母比祖父早死，她去世時我父親才十歲，虧得曾祖母還在，給照顧着。祖父並未再娶，兩年後將父親接到長沙來讀書，自己仍很少管，還是照樣「玩」，一直「玩」到老。他老人家的福氣也真好，兒子破例地會讀書，等旅館「玩」完，兒子又能做事掙錢，奉養堂上了。民國五年他壽終正寢時，老家分得的一份田產居然還「守業弗失」，這和「有子成材」同為他平生最得意的兩件事。父親後來告訴我，祖父的遺言就是這麼說的。

（鍾叔河《青燈集·神鼎山》）

鍾先生的父親鍾昌言先生聰穎好學，廢科舉前曾應縣、府、院試，成為一名「廩生」；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考入當時湖南維新派開辦的「時務學堂」，成為第二班的外課生（不寄宿，住家中去上學的學生）。

當時湖南巡撫陳寶箴（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的祖父）、學政江標、按察使黃遵憲，作為提倡經世致用的開明官僚，正在湖南大力推行洋務運動，培養新式人才。他們推行的新政，第一項就是開辦「時務學堂」。「時務學堂」比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的建校還早一年。

「時務學堂」有巡撫陳寶箴的支持，不僅從本省礦業收入中撥出一部分款項作為辦學經費，還申請到了朝廷的撥款，於是，一躍而成為清朝的官辦學堂。學堂由著名的湘西才子熊希齡負責，黃遵憲和譚嗣同共同參與。黃遵憲推薦梁啟超擔任中文總教習。因為有了梁啟超和他的朋友們的參與，把西方歷史和社會科學融入了「中學」，抨擊君主專制，倡導民權民主，推崇西方的議會制度，一時間，「時務學堂」成了當時思想最新銳的學校。梁啟超後來回憶當時的情形，有過如下的敘述：

除上堂講授外，最主要者為令諸生作札記，師長則批答而指導之。發還札記時，師生相與坐論。時吾儕方醉心民權革命論，日夕以此相鼓吹……

鍾昌言先生正是在這樣一個維新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走進了「時務學堂」，親耳聆聽過梁啟超的「民權革命論」，在當時的著名學者許奎元、鄒代鈞等人的教導下，學習數學和地理。

那段難忘的歲月終生銘刻在昌言先生的記憶中，以至於幾十年後他跟幼子鍾叔河談起當年學堂的往事，「猶神采飛動」。當他帶着只有5、6歲的鍾叔河，經過長沙中山西路北邊的一處建築時，向那裏一指，告訴幼子：「你快要進學堂了，進了學堂要好好讀書。這裏是我進學堂的地方，蔡鐸便是從這裏讀書出來的。」

可惜昌言先生考進「時務學堂」的第二年，戊戌政變失敗，維新派的陳寶箴、江標等都被革職永不敘用，黃遵憲被「放歸」，「時務學堂」被改為「求實書院」（後又改為「湖南大學堂」）。維新派人士就此散去，他只能埋頭學數學了。

鍾叔河出生的時候，父親已經58歲，在他童年的記憶裏，父親是一個好脾氣的白鬍子老頭兒，他跟父親的交流不多，但能感覺到父親是很喜歡他的。1938年秋，日軍逼近湖南，父親趕緊把妻兒送回神鼎山的老家。這一年，鍾叔河7歲，正是要上學讀書的年齡，神鼎山附近卻沒有學校，於是父親像傳統的中國家庭一樣，親自承擔起「課子」的責任，但他還要經常返回長沙料理事務，大部分「課子」的時間只好讓鍾叔河「自己用功」。對於正是貪玩年紀的小男孩來說，「自己用功」就是「自己遊戲」。

在平江神鼎山的老宅，鍾叔河第一次見到了生長在田裏的稻穀和蔬菜，房前屋後四處亂跑的雞狗鴨鵝，因為把麥苗認成了韭菜而遭到了鄉下兒童的譏笑，但又很快跟他們打成一片。他常常帶着鄰居家的小女孩一起去大門外看白鵝泅水，看農夫犁田，捉蜻蜓。清晨去採最新鮮的雛菊，為了不讓草叢中的露

水打濕衣衫，鍾叔河常常脫了鞋襪，讓小女孩幫他拿着，赤腳去採來大把的野花，編成花環來盡情玩耍。

鍾叔河的母親對他很嚴厲，讓他要向自己的哥哥學習，懂聽話、好好讀書。但頑皮的他很不以為然，覺得年長7歲的哥哥總是指使他幹這幹那，他就常常躲起來，讓哥哥找不到他，等到要吃飯了，才不緊不慢走出來。家裏規定在飯桌上是不能「罵人」的，他就這麼一次次地混過去了。哥哥責怪他偷懶，他卻會說：「你自己怎麼不幹？」就這樣，媽媽越是訓斥他不聽話，他就越是變本加厲地「淘氣」，躲得遠遠的，躲出去跟「野孩子」們玩：

我確實從心裏羨慕他們，口袋中又常有從「斑石神」廟旁小店買來的粗點心，什麼條子糕、小花片、麻占之類，可以拿出來與他們同享，於是很快就彼此融洽了。他們對我也很慷慨，常餉我以各自從家裏「偷」出來的紅薯片或炒豆子。印象最深的一次盛宴，則是將釣得的小鯽魚撒上鹽，用不知從哪裏弄來的黃草紙包好，然後打濕草紙，在一處墳台後生起火來，將紙包的魚烤熟，那個香和鮮啊，居然給了我兩條。

（鍾叔河《青燈集·神鼎山》）

頑皮歸頑皮，該讀書還是要讀，抱一本書安安靜靜坐下來讀。鍾叔河說他一生裏最感激父親的事，就是在讀書這件事上，父親從來不限制他，他想看什麼書，愛看什麼書都可以，不像其他讀書人家的孩子，連環畫都是不允許看的。唯獨有一

次，父親從長沙回到平江，吃驚地看到10歲的鍾叔河在看《金瓶梅》，仔細問了來由，才知道是一位堂叔拿給他的，是有意要捉弄孩子。這次昌言先生是真的生氣了，平時性情溫和的他氣得漲紅了臉，立刻抓起一根竹槓子追着堂叔打，厲聲地責罵這位荒唐的長輩。這一場讀書的風波才算就此收場。

那時平江非常閉塞，新書很難傳到那裏。鍾叔河就只能翻看家裏的古舊書，《史記》、《左傳》很難看懂，最後找到一部《閱微草堂筆記》，一開始很多字不認識，就硬着頭皮看，會囫圇吞棗地認錯字，但慢慢也就認識了很多字。比識字更難的，是明白詞義。鍾叔河在《閱微草堂筆記》中一直搞不懂一個經常出現的詞——「承塵」。幾年以後才終於明白，書裏的「承塵」就是天花板，而平江的老房子，抬頭只看到瓦，完全不知道「天花板」到底是什麼。

不受限制地讀書，養成了鍾叔河一生的讀書習慣。讀不懂的，就想盡辦法去找答案。讀書，讓他對世上的一切都充滿了好奇。

早在長沙的幼稚園時期，鍾叔河就迷上了圖畫書，那時已經有引進的外國童話《列那狐的故事》(*Roman de Renart*) (見圖一)和《阿麗思漫遊奇境記》(*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都曾是他的最愛。回到平江後，老宅裏大多是刻本和石印的舊小說，半文半白的看不懂，鍾叔河就翻看裏面的插圖。才子佳人的小說編像，每本書都差不多，小男孩很快就覺得沒意思了，還是舞刀弄棒、神怪熱鬧的《封神演義》、《西遊記》最有趣，深深地吸引着他。幾年看下來，這兩本書裏的生字和內容他已經完全通解了。



圖一 《列那狐的故事》插圖

鍾叔河在書櫃中翻到一套《繪圖第五才子書》，打開一看是金聖嘆批註的《水滸傳》，書裏畫的梁山好漢們姿態各異、栩栩如生，他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很快，他就看完了。好漢們行俠仗義的事跡，令他尤為佩服。於是就想把書裏這一百零八將的畫像一張張地拓描下來，單獨訂成冊。這套石印本的書，拓描的難度非常大，描起來只要一筆出錯，就前功盡棄了。鍾叔河兢兢業業地描描畫畫了很長時間，雖然最終沒能全部完成，但那段時光特別快樂，令他終身難忘。後來，他讀張岱的《陶庵夢憶》，書中提到畫家陳老蓮「畫水滸四十人」，「古貌古服，古兜鍪，古鎧冑，古器械……英雄忠義之氣，鬱鬱芊芊」，想起自己曾拓描過的水滸人像，不由得更加神往。

有一次，母親讓鍾叔河去集市上買油豆腐，他捧着好不容易借來的《三國演義》，一邊走一邊看，走到油豆腐攤前，付錢秤好了豆腐，請小販用稻草穿好，提着就走，另一隻手仍舊舉着書本看。快走到家的時候，才想起忘了找錢，母親給的又是一張大票子，不禁大驚失色，趕緊回頭往集市上跑，書也顧不上看了。幸好賣油豆腐的小販最終核對了錢數，爽快地把錢找給了鍾叔河。晚年回憶起這件小事，他還是感念於平江人的淳樸忠厚，讓他「圓滿」完成了母親布置的任務，開開心心地捧着《三國演義》和油豆腐回家了。

舊書翻完，鍾叔河又去看哥哥姐姐們留下來的國文課本，裏面收錄了很多白話文章，比如葉聖陶的《藕與蕪菜》，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匆匆》，蘇綠漪的《鴿兒的通信》，也有周作人的《賣汽水的人》、《故鄉的野菜》和《金魚、鸚鵡、叭兒狗》。這些大家的白話文章帶給鍾叔河很多新鮮的感受。一開始，他最喜歡朱自清的文章，特別是文章中對於時光流逝的感慨，深深地觸動着他敏感的內心：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

但是反覆讀過好幾遍之後，又覺得好像少了些什麼，不再像第一次遇見的時候那麼感動，那麼喜歡了。反而是一開始並不喜歡的周作人，讀起來不是很好懂，含義也很模糊複雜，但是卻越讀越有味兒，越讀越有更深入的理解，每次重讀都會有新的感覺：

他的文章看起來是平淡的，卻有着更深的意義；去解讀這個更深的意義，就給了我的好奇心廣闊的空間。我後來有一點寫作能力，就是從看這些文章得來的。

（鍾叔河《與之言集·說說我自己》）

終於，調皮的孩子走進了學校，跟着國語老師張先生一起讀油印的課外讀物——豐子愷、葉聖陶的文章，在地理老師李先生的帶領下，用白紙板測試塘壩中水的透明度，由此養成了對於寫作和自然的愛好。縣裏學校的教員有的是鍾叔河父親的學生，所以父親會常常到學校裏來找他，帶他出校遊玩、吃東西，順便查考他的學業。父親帶着鍾叔河賞遊平江各處的風景，指給他看「秀野春光」、「碧潭秋月」、天岳書院巨大的石亮窗、三陽街的鷹架橋、石碧潭對岸「開花一條線」的板栗樹，這些都深深地印刻進少年的心裏。

偏僻的平江，本來就沒有電燈，抗戰時期連「洋油」都沒有了，好在平江盛產茶油，那散發着青色火焰的茶油燈，陪伴着鍾叔河在故鄉度過了無數個岑寂的夜晚。看「閒書」是那時唯一的娛樂。深夜的老宅裏，他獨自一人沉浸在那些荒誕奇特的故事裏，搖曳的燈火將巨大的人影投射在昏暗的牆上，彷彿故事裏正在出沒的神鬼，讓他覺得又緊張又刺激。後來他讀到蘇東坡寫給友人的短信，談到冬夜燈下讀書的樂趣：「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讀到陸游的詩句「青燈有味似兒時」，那跳動着的青色火焰照耀着如此漫長的歲月，照耀着他們共同的夜讀時光，遙遠的古人頓時親切起來。

初中二年級的寒冬，第四次湘北會戰，鍾叔河跟着學校逃難到大山中，每天晚自習跟同桌共用一盞油燈，自習結束必須熄滅，寢室熄燈後也不得再點燈。有一次，他借來一本《儒林外史》着急想熬夜看完，忽然想起古人勸人苦讀經常要舉出的「囊螢映雪」的例子，想到可以學習晉代買不起燈油的窮書生孫康，借着外面雪地的反光看完這本書。他立刻圍上圍巾跑出屋子，「全副武裝」地站在雪地的月光下，才忽然明白，書裏的故事竟然就是騙騙人的，書上的字在雪地明亮的反光下，依然難以辨認，只好悻悻然回房間睡覺去了。

十幾歲的少年鍾叔河就這樣戳破了一個流傳千百年的「勵志」故事。讀鍾先生的書，會發現他常常就是這樣帶點少年人的調皮和喜感，拎出一個個我們習以為常的詞語、概念，用他自己的方式去「重述」那些「無比正確、不容置疑」的話語。那些被我們用得滾瓜爛熟，甚至帶着某種不敢觸碰的「禁忌」的詞彙，忽然就有了陌生的意義。我常常會突然地因為他的這種狡黠而哈哈大笑，但笑完又會覺得他是如此的犀利，輕易就揭開了那些「崇高」語彙的精緻外套，露出它們本來的樣子，而自己多少年來，只會跟着大家一起背誦、默寫，一遍遍地毫不遲疑地用在自己的文章裏，好像只會跟着人流低着頭向前走，從來不會問一聲：「我們這是要去哪裏？」，更加不會停下來問問自己：「我，要往哪兒走？這，是我要的嗎？」

解放前夕，鍾叔河經常參加進步的學生運動，是校內公認的左傾分子。一天，有個地下黨員（學校附近一座孤兒院裏的女教師，叫伍迅雲）將他叫去，表揚他「有覺悟，很勇敢」，「要

發展他入黨」。同時跟他說：「你有兩個缺點，一個是個人英雄主義，一個是自由主義。我們首先要擺正個人和黨的關係，黨是一部革命的大機器，黨員個人只是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鍾叔河聽完就說：「我不怕死，願意入黨，但自覺的戰士不應該是沒思想的螺絲釘。」於是他當然不夠條件，入黨的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時在1949年4月，鍾叔河還不滿18歲。

跟鍾先生聊天，我一直都又興奮又緊張，一邊飛快地在筆記本上寫下幾個關鍵字，一邊總忍不住要「偷瞄」我的錄音筆——看到它錄音的紅燈在閃動，我才能放心，因為鍾先生太有智慧也太幽默有趣了，我絕對不想錯過他講的每一個故事、他獨有的那種「鍾式幽默」。這種興奮和緊張讓我沉浸在他的故事裏，急於記錄，急於追趕他回憶的腳步。直到他講起這個18歲的故事，我像被人突然在頭頂拍了一掌似的，那個一直讓我遠遠地景仰着、追隨着的鍾先生，一下子變得這麼近，近到讓我控制不住地走神了，驟然想起自己的18歲。

那一年我在部隊軍訓，大隊政委也是這樣找到我，連談話內容都驚人的相似，還記得那個瞬間我怦怦的心跳聲，覺得自己似乎一下子被籠罩在一個光環中，那個光環曾經籠罩過我少年時崇拜過的電影裏的英雄，但突然它就這樣出現在我的眼前。那是一個我無法命名的巨大光環，而我竟然能夠被接納其間，做一顆小小的螺絲釘，這太令人激動了！

那次談話之後，我立刻給父母寫了長長的信，說部隊要發展我入黨，但我還是覺得我做得很不夠，距離黨員的標準還相

差很遠……那次談話和後來我遇到的很多類似的談話，都令我記憶深刻，一直到鍾先生跟我講這個故事之前，我都沒有去想過到底什麼是「螺絲釘」，我們不都是渺小的個體嗎？能為一個更大的有機體貢獻自己的力量，不是很光榮嗎？為什麼更加一腔熱血、同樣18歲的鍾叔河，在比我所處的90年代更加沸騰的洪流裏，馬上就敏感到了這個字眼，他停下了腳步，認真思考着，並就此終生保持着思考的習慣——盡可能獨立的思考的習慣！

到底是什麼造就了那樣的鍾叔河，那個在18歲就會理性地說「不」，一生堅持「用自己的杯子喝水，用自己的頭腦思考」的鍾叔河？

每當我們這麼問鍾先生的時候，他總是擺手說：「我沒有什麼，我不過直率講出了自己的想法，當時我不過是一個高中生，一個高中生的想法而已。」終於有一次我問他：「您為什麼總能在大家都贊成的話裏，很快地發現問題，明白哪些是假話，哪些是真話？您為什麼能一直這麼厲害？」他說：「我也不是有多麼厲害，能特別地發現什麼。我不過就是像周作人說的那樣，一個正常人，要求合情理，也有點常識，就是了。」

鍾先生的「情理」和「常識」，是怎麼一點點積累起來的呢？一個從小自願自地看筆記小說，跟大家一樣讀《三國演義》、《水滸傳》的孩子，怎麼就會在成千上萬的人邁着整齊的步伐，向着同一個方向前進的時候，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思考，終生追求「情理」與「常識」，始終知道自己該走向哪裏呢？我只好繼續讀他的書、做筆記，希望在他寫過的文字裏，找到答案。

抗戰期間，位於湖南省中部藍田古鎮上的國立師範學院，是那時最著名的大學之一，也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所獨立設置的師範學院。當時的國民政府把改善和發展教育當作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內容，為了讓中學的師資接受正規的師範教育，特別撥款三十五萬元於1938年10月創辦了這所國立師範學院。一時間，大批的著名學者來到這所師範學院任教，名師之多、名氣之大，僅次於當時的西南聯大。國文系主任是赫赫有名的國學大師錢基博，年輕的英文系主任則是他的兒子錢鍾書。這所師範學院在抗戰時期不僅培養出了一批未來的著名學者，也為湖南的中學培養了優秀的師資力量。不得不說，那時的初中生鍾叔河，亦曾直接受惠於這所堪稱「教育奇蹟」的師範學院，他的英文老師就畢業於此，是錢鍾書的學生。

翻看這所國立師範學院的資料，很快理解這個所謂的「教育奇蹟」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一大批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在抗戰的險惡形勢下，抱着「傳承文明」的信念，殫精竭慮、辛勤耕耘的結果。

國立師範學院的第一任校長是教育心理學家廖世承先生，廖先生自美國布朗大學博士畢業後回國，全身心投入師範教育。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幾次聘請他去當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長，他都回絕了，但當委派他去湖南創辦國師時，他卻立刻啟程前往任職。在國師創辦的過程中，廖先生非常重視「擇師」的工作，他多方延聘著名學者、海內泰斗，國文系有錢基博、馬宗霍、駱鴻凱、宗子威、鍾鐘山等教授，教育系有孟憲承、黃子通、郭一岑、王士略、董渭川、劉佛年、錢頻

等，英語系有錢鍾書、汪梧封等，數學系有李達、任孟閒、李新民等，公訓系有袁公為、儲安平、周世輔、劉修如等，史地系有皮名舉、李劍農等，體育系有金兆鈞、江良規等，音樂系有唐學詠、周崇淑等。這些來自上海、江蘇等地的著名教授匯集於此，在敵寇環伺、炮火連天的險惡環境下，奮發圖強，為國育才，治學氛圍盛極一時。

年過半百的錢基博先生，正是在廖世承先生的懇請下，從浙江大學當時遷至的江西泰和，路途遙遙地趕赴湖南，擔任國立師範學院國文系主任。一年後，錢基博先生又寫信召來了在西南聯大當教授的兒子錢鍾書。當時在國師擔任錢基博助教的吳忠匡曾回憶起這一對父子學者：「老先生（錢基博）每天自清晨到深夜，總是端坐在他的大書案前無間隙地、不倦怠地著書立說，編撰中國文學史，寫讀書日記。（錢）鍾書也是整天埋頭苦讀，足不出戶。一般午前的時間，他都用它來閱讀外語書籍，大部分是他從國外帶回來的。剩餘的時間，他閱碑帖，臨寫草書。」

錢基博先生在國師教書期間，深深地被湖湘近代以來「獨立自由之思想，堅強不磨之志節」所感動，寫下了記述百年來十四位湖南學者事跡的《近百年湖南學風》，錢先生在該書的「餘論」中說：「談者徒稱其博聞多知，罕會其苦心危言。」而書中詳細記述的正是這些湖南先賢的「苦心危言」之處。而他寫作此書的目的正在於：「張皇湖南而不為湖南，為天下；誦說先賢而不為先賢，為今人。」他在彼時民族存亡的危急時刻，用這樣一本著作來盡述湖南人的精神，並希望以此來喚起國人戮力抗敵，重振民族精神。

近半個世紀後，鍾叔河憑藉自己半生的經歷和思考，編著成了煌煌百萬字的重磅書稿「走向世界叢書」。錢鍾書先生正是從這套叢書的敘論中，認識了這位湖南人鍾叔河。當鍾叔河向錢先生提起那段因為國立師範學院而起的師生之緣之後，錢先生特別抄錄了他當年在國師任教時寫的一首詩相贈：

孤螢沒竹淡收光，雨後宵涼氣挾霜。
細訴秋心蟲語砌，冥傳風態葉飄廊。
相看不厭無多月，且住為佳豈有鄉。
如缶如瓜渾未識，數星飛落忽迷方。

這也是錢鍾書的妹妹錢鍾霞記憶中的山居秋夜，她在父親的著作《近百年湖南學風》1985年再版後記裏，充滿感情地記錄了父親寫作的情形：

寒風之夜，李園四周，萬壑松濤在響。西側一室，橘黃的燈焰搖晃着，父親在燈下一筆一筆認真地寫這本書稿。四十多年了。

而這本書，在「文革」初期被當作「四舊」銷毀、散失！但是《近百年湖南學風》深深地影響過當時還是初中生的鍾叔河，以至於四十年後，他又找到了這本書的初版本，重新付印，讓錢基博先生的「獨絕智識」和「襟懷風度」再一次重現於世人面前：

湖南之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四塞之國。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為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

流於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或風氣自創，能別於中原人物以獨立。人傑地靈，大德迭起，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宏識孤懷，涵今茹古，罔不有獨立自由之思想，有堅強不磨之志節。湛深古學而能自辟蹊徑，不為古學所囿。義以淑群，行必厲己，以開一代之風氣，蓋地理使之然也。

前輩學人的智慧與學識滋養着戰亂時代的少年，他沉醉在書的世界裏，飛快地閱讀着所有能接觸到的書籍，從一冊冊細小字體的筆記小說，一路走向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巴爾扎克、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等，他的思想和靈魂在其中自由生長，日漸強壯。

15歲時，他開始了自己第一次的創作，在稿紙上工工整整、落筆不改地寫上聽來、看來的奇聞軼事，還自己設計了封面，用毛筆寫上書名「蛛窗述聞 叔和署」(原書照片如此，為「叔和」)，那活潑有力的筆畫依稀可見當年的雄心。全書一共四十一篇文章，每篇幾十到幾百字不等，他自擬題目，「腹中人語」、「古杖」、「殺秦檜」、「槐抱榆」等等，字裏行間顯現出他讀過的《閱微草堂筆記》、《聊齋志異》等古代筆記小說的影子。其中一篇〈槐抱榆〉，他詳細記錄了對於一棵奇特大樹的觀察：

啟明女師校址，故縣署也，有大院落，西北角一巨槐，蒼幹斑駁，大可數抱，中空而生一榆，大亦抱餘。二樹柯葉，蔭蔽全院。樹下有碑，篆額四字云，「槐抱榆記」，記文則模糊不辨矣。

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用自己的筆去記錄。他跟隨着好奇心去探索這個世界，在頭腦中描畫未來的樣子，渴望的生活。

抗戰勝利了，鍾叔河回到了省城長沙，「鄉裏孩子進了城，目迷五色，一下子見到那麼多書，讀都讀不贏。」他對於歷史和考古產生了極大的熱情，總想探索求證古人的生活，想知道古書裏的老子、莊子當年是怎樣待客、吃飯穿衣的。他也計劃着將來要去讀大學，讀考古專業，或者去研究那些有意思的樹木，讀植物學。

1947年，16歲的鍾叔河該考高中了，父親建議他去考長沙的文藝中學，說那裏的老師好、條件好，特別是校長正是他「時務學堂」的同學曹典球先生。於是，鍾叔河去那裏參加考試時，父親還特別寫了信，要求他要面呈老校長，請老朋友「照管」自己的愛子。後來考試發榜，鍾叔河名列第三，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文藝中學。入學後，老校長特別找鍾叔河談話，笑着對他說：「故人有此佳兒，憑本事考盡夠可以了，何必寫信呢？」

在文藝中學，鍾叔河學習成績始終名列前茅，幾學期都免繳學費。但時局動蕩，國民黨官員的貪污腐敗，經濟形勢的惡化，政府的專制墮落，都讓這個少年不得不去思考，究竟什麼才是理想的社會。他的興趣又漸漸轉向社會科學。他讀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Mutual Aid*），其中論述的生物在競爭中彼此互助的思想，讓他眼界大開、興趣盎然；而克魯泡特金在《我的自傳》（*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中所呈現的正直的革命家形象，令鍾叔河深感敬佩，他認為偉大的革命家就應

該像克魯泡特金一樣，也應該是偉大的道德家，政治道德和私人道德都要好，而不應該是「無法無天」的痞子和不擇手段的奸雄。

他開始不滿足於眼前這張平靜的書桌，激烈地反對腐朽專制的國民黨政府，是罷課遊行的積極分子，高喊要民主要自由，「有點不要命的樣子」。曹校長對這個天資優異的「優等生」極為關注，對於他積極投身學生運動的一腔熱情，婉轉地加以箴規，他曾經在端午節以屈原為題，專門寫了首詩給鍾叔河：

救國深心託九歌，欲徵湘士荷吳戈。

楚雖三戶亡秦必，何事懷沙赴汨羅。

終於，學生運動越演越烈，進步學生和國民黨三青團組織發生了激烈衝突，首當其衝的鍾叔河被打得頭破血流送進醫院。衝突的新聞也被登在長沙的報紙上，他頭上裹着紗布的照片赫然在目（見圖二）。當時已年逾七旬的老父親匆匆趕往醫院，看着兒子躺在病床上的樣子，不禁哽咽。

父親是一九六五年秋天去世的，享年八十八歲。和他同活在世上的三十五年中，我就只見他哭過這一回。他老人家去世已經四十七年，我也年過八十了。直到如今，每當想起父親時，浮現在我面前的，還是老人家的一雙淚眼。

（鍾叔河《左右左·父親的淚眼》）



圖二 鍾叔河中學時參加進步學生運動被打傷

曾經忘我地埋首書本的少年，就這樣風風火火地走進了青春，他熱烈地表達着自己，書本和紙上安靜的文字已不能承載他蓬勃的激情。他像那個時代大多數的年輕人一樣，高呼着「民主自由」的口號，被時代的巨浪裹挾着，向前飛奔。

一次，他乘船過江，坐在船邊，將手伸入江中，感受到清涼的江水從皮膚上輕輕流過，但是突然，他感受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感傷，感受到自己的生命正如同這流水，一刻不停地緩緩流過，稍縱即逝。他不禁問自己：「我的生命，難道不也會像這江水一樣，一刻也不停地流過去，流過去，什麼痕跡也不能留下麼？」這感觸帶給他深深的痛苦，以至於回家後竟一夜無眠。

大時代的浪潮並沒能完全沖洗掉這個敏感少年內心深處的自我，他在獨自一人的時刻，被某種來自於「永恆」的東西緊緊抓住，又一次異常清晰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

三十多年後，正在監獄中的中年人鍾叔河，在極端的孤獨和苦悶中，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記得青山那一邊，年華十七正翩翩；

多情書本花間讀，茵夢餘哀已卅年。

而此刻，讀着這首小詩，我眼前浮現的，還是那個高傲又容易激動的文弱少年，他戴着厚厚的眼鏡，臉上是嚴肅的、總在思考的神情，他拒絕了要求他做一顆螺絲釘的組織，他認定自己是一名自覺的戰士，他要為那個平等、自由、民主的社會繼續戰鬥。他大步地向着自己選擇並堅信的美好未來，走去。

汪劍

陽光少年

見到鍾先生的時候，他已經完全是一個「先生」的姿態了，不「老」，但是非常的「先生」！滿臉的睿智、深沉和嚴肅，即使在他幽默地敘述時，都蘊含着他的思想，與他年輕時候的照片相比，判若兩人。我怎麼也想像不出，照片上那個天真、單純的鍾叔河會如何說話、寫作。18歲的他，竟然在一個比自己小3歲的女孩子面前，也表現得羞羞答答，他的那些「思想」是從這裏起步的嗎？青春，就是想摒棄過去，那些行將就木的昨天，那些說教的「傳統」，他們希望從自己開始，展開一個全新的世界。這些「理想」、衝動都不是思想，他是到成年以後才認識到這麼簡單的道理……

鍾先生在讀中學的時候，看着雜書，渴望着有一天，上大學讀植物學或考古學專業。因為那個時候，他從心裏瞧不起那些以文墨謀生的人，文學這些東西都是虛的，但是科學是真傢伙，一加一就是等於二，有它自己的標準，不容你質疑。科學，在那裏有太多神秘的東西呼喚着他，所以鍾先生根本就沒有在文字上下過功夫，拿到什麼書，都可以從頭把它看完。那

時候，他更不會想到，在75歲接受《南方都市報》採訪時，跟記者說：「我這個人的『學』很不足，畢竟只有自己看書看來的一些知識，七零八碎。『才』也不怎麼樣，中人之資，頂多及格線上。只能夠說，文字功夫還是有一點點，邊做邊學也算積累了一點經驗，對於中西交通，對於周作人，對於民俗文化這些方面有一點興趣，談不上有什麼專門研究和學問，寫點散文也看不出有多少才情，不過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多少有一點自己的見識，這是唯一差堪自信的。」

他就是這樣評價自己，把思想說成是一點「自己的見識」；同樣，他也不喜歡把自己稱為「知識分子」，僅僅是個讀書人而已。只有像陳寅恪、錢鍾書他們，才能被他稱為知識分子的。1949年，18歲的鍾叔河只是一個想「去上大學」的年輕人，這是他從來就認定的事情，家裏人便是這樣按部就班地走下去的。記者問他：「聽說您家小時候家庭條件是不錯的，是世家子弟？」

回答的時候，他多少帶着一份幽默的苦澀：「世家根本談不上，只是個普通讀書人家，當然也不是勞動人民出身。過去，祖上要做大官，後代要有封蔭，有穩定的產業和地位，生下來至少也是個『承仕郎』什麼的，才能算世家。我的先人沒這個資格，只是個普通的讀書人家。」

父親早就退休了，在國民黨省政府「文獻委員會」掛個閒職做個委員，拿一份收入。後來，共產黨來了，也是讓他在「文史研究館」掛個閒職，當個館員，依然有一份收入，雖然減少了很多，但畢竟是有一份收入，可以維持基本生活了。這讓鍾先生有了一個不壞的家庭出身，不是地富反壞，沒被殺關

管教嘛！這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說起來，就是他成分還好！在他們那個年代，「成分」好，甚至比人品好、學業好還重要！畢竟是沒有歷史問題啊！那會兒，北京的大學幾乎都空了，清華、北大好多學生都不要文憑，南下「幹革命」了。留在學校完成學業的人不多了，朱光潛、馮友蘭這樣的老先生也不教課了，用鍾先生的話說，那會兒「只講社會發展史，講猴子變人了」。而且，在那時，讀大學又不收費了。這樣一個「成分」好的高中生，上大學是斷然沒有問題的。

但是好動、好交朋友的鍾叔河，認識了低班的同學谷士鈞，跟着他去報館玩，通過介紹，又認識了編「學生版」的梁中夫，這樣一串一串地轉下去，就擴大到校外，認識了當時還在長沙周南女子中學讀書的尚久驂。看鍾先生的文章，覺得他比女孩大3歲，這樣算來女孩當時應該才15歲。如今，看見鍾先生保留的尚久驂的信，真是不敢相信，一個那麼年輕的女孩，鋼筆字寫得真是漂亮，不是娟秀的那種，而是帶着一點陽剛氣和古典風格，豎寫的格式，繁體字，完全沒有了小女子的姿態，只是他們之間的談話，依然充滿着孩子氣。



圖三 少年時代的尚久驂

叔和：剛才由一個同學搭封信把你，回屋裏看見了你咯封信。不，我不是怪你。你瞧，我起初不是很高興麼？我只偕在鐵軌上走着？起初聽你們講話，後來我不曉得禾是突然想起星火一個同學給我簽的名：「無畏者前頭就有路。」於是聯想到那天我生日的晚上，你說過我不強。是的，我一點也不夠強，但是碰得風砂多了，也會一天天強起來吧。就聯想到思想鬥爭是好痛苦。我在鬥爭中悶着一個人死想死想。我頂不願意別人瞧見我悶。我從來不訴苦的。我總是這樣想：「我苦點要麼不緊，苦夠了，強了，像鋼鐵一樣了，多好。我就敢向着大大的、紅紅的太陽痛痛快快笑了，就聯想、聯想……扯起好遠好遠、不快活的回憶去了。對於這些倒霉的往事，我從來不去想的，一想可也就吃苦不小了……我情願悶在心裏。

我的確是這樣，高興點好吧。我跟你在一起不是蠻快活麼？我總是蠻快活、蠻快活，偶然一兩次不快活也是小事。不要這樣講，我沒有覺得你什麼大不了的習氣是我看不慣的。你不好的地方，你自己都講把我聽過。我看到了，為什麼會不說呢？莫亂猜。我不好怎樣來解釋了，每次我笑的時候，你冒看見？偶然一次不快活就要多心。相信我，叔和，我不是撒謊，這些真話你偕不相信麼？那我要怎樣呢？別苦我。[見書信五]

那時候，是青春期的年代，說話都是帶着女孩子發嗲懇求的口氣：「高興點好吧。我跟你在一起不是蠻快活麼？」、「別苦我。」不知道鍾的信上，苛求了她什麼？怎麼就讓她受「苦」

了？他們自己都不知道如何表達感情，他的同學勸鍾叔河給校刊寫文章，可是哪裏有心思啊？他們一幫年輕人都是那麼騷動着，東張西望，不知道在尋找什麼，為什麼騷動更是說不清楚。在1949年的上半年，鍾先生和尚久驂幾乎是每天一封信，不是嗎？尚久驂的信剛托朋友帶去寄出，她「回屋就看見了你(鍾)咯封信」。那些日子，鍾先生晚年回憶起來，就是「除了上課、看書、遊行、喊口號，許多時間全用在看信和寫信上，寫時還帶着18歲少年的感傷。」何止是感傷，還有他們自己也說不明、道不白的思念。實際上，那都是一些少男少女的小脾氣。

我在病裏寫過一點傢伙，以後找出來了，把你看。有些地方你就不得亂猜了，媽媽把它丟了。(莫寄信到我屋裏，寄到一中好了。這次我偕吃了頓西餐。)說我不務正業，新詩有麼子好，……鍾凡最懂得這些，所以不願到我屋裏來。

不寫了，我好亂。毛綫衣那個同學偕冒拿來。莫催好吧，我也曉得你要了。[見書信五]

想想真是，她亂什麼呢？鍾叔河又在那裏胡亂猜着什麼？那種青春期的慌亂，每個人經歷過以後，當自己成年時，都會意識到它的幼稚。但是，這也沒有什麼可以慚愧的，誰沒有走過這一段路呢？

同班的地下黨員賓新城就批判鍾的「自由主義太嚴重，太浪漫。」鍾知道，這是從「組織」那兒來的，從伍迅雲那裏來

的，但他「偕」是那樣地浪漫着，連痛苦都是浪漫的。受同學的影響，他也開始在壁報和油印的刊物上發表作品，他寫的詩刊登在報紙上了，這實在是給他太多意外的喜悅，讓他有了點成就感。不管你怎麼看，不管他是否在「為賦新詩強說愁」，他還是寫得非常壯烈；可是有一天，他真的坐牢了，關於監獄的詩歌，他一個字都沒有留下。當年，他用筆名楊蕾發表了這首詩：

〈牢獄篇〉

窗

窗，/ 安放在 / 堅實的牢牆上。

從窗中，/ 每天 / 有受苦然而倔強的眼睛 / 永恆的在守候……

窗，/ 是狹窄的；/ 而窗外，/ 有着廣闊光亮的明天。

有窗，/ 囚犯們，/ 就有希望。

牆

你——/ 陰森的，/ 潮濕的，/ 堅固的，/ 牢牆呵！

緊緊地，/ 你扼殺着，/ 囚犯們的自由和生命。

血，/ 使得你更強悍；/ 壓迫，/ 使得囚犯們更憤恨了。

我知道：/ 憤怒是會成為力量的！

門

染着死屍的血腥，/ 帶着統治者的嘉許，/ 豎立着，

在閃亮的刺刀光裏，/ 獠笑。/ 而囚犯們的血肉，/ 就

這樣一大口一大口地被你吞噬了。

門裏：/ 陰慘，窒息，黑暗，/ 而邈遠啊……

天上的太陽，/ 起了又落了，/ 牢中，/ 永遠是窒息，黑暗：

死的威脅，/ 加強了生的信念；/ 囚犯們，/ 於是，更倔強。

他們知道，/ 總有一天，可以守望到光明。

那——/ 衝垮了巴士的獄的，/ 衝垮了冬宮的，/ 人間的太陽光。

那天，/ 毀了你，/ 將有無數囚犯們，/ 暴怒地
向統治者狂喊：「復仇！」

（鍾叔河《小西門集·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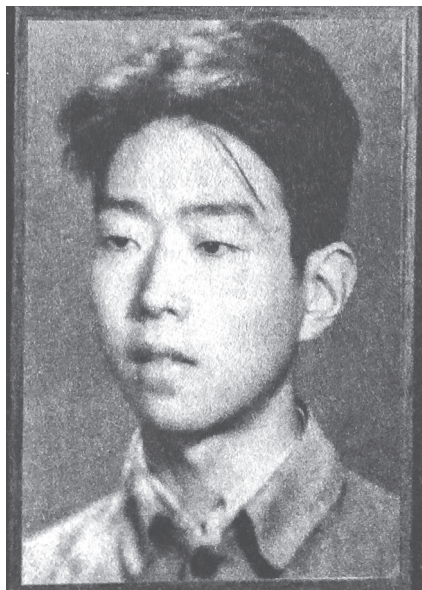
這位還在嚮往「衝垮了冬宮」的年輕人，父親是教數學的，哥哥是學農的。所以，他也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文藝細胞」。雖然寫了詩歌，畢竟是心血來潮的，他的好奇心，是去讀考古學的願望。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一個偶然的因素，命運被改變、被顛覆了。他沒有去考大學，掉頭跑去報考當記者了。鍾叔河在晚年告訴我們說：「我考新聞幹部訓練班純粹出於偶然，那時我才18歲，正是青春期，有一個女孩子，我對她有好感，她要考新幹班，我便跟着她去考了。」

這個女孩子，就是尚久驂。鍾先生就這樣懵懵懂懂從追求科學走向了文字工作，大方向改變了；大學的事，再也不成為話題出現在他的生命裏。很快，鍾叔河進了報社，那時候進報社就等於參加了革命，不讓去讀書了，再要去，那就是脫離組織、脫離革命！晚年，鍾先生說：「你想我參加革命的時候，

都沒有滿18歲，我和朱正是一樣，我們同年同月，他是陰曆初三，我是初十，所以說我們還是未成年人，就走上社會了。現在來講，18歲以前犯法還是未成年犯，還不能完全負刑事責任，還只負一部分刑事責任，因為心智還沒有成熟。但是我和朱正在思想上是比同年人要早熟一點，因為想的事多一點，但畢竟還是少年，是很單純的。我們是出於對國民黨的不滿，對社會的不滿參加革命的。」

沒有發榜之前，鍾叔河被招生處叫去談話，一見面領導就有點吃驚，說是，「你這麼年輕啊，年紀還這麼小嘛！算了。現在報社發展很快，馬上需要人工作，你們幾個人作文還可以，你不必進訓練班學習了，明天就到報社報到。」鍾叔河沒有參加培訓，而這時候鍾叔河最關心的，是尚久驂是否被錄取了。確認她也被錄取以後，就去報到，開始工作了。等他從外地採訪回來，才發現尚久驂沒有來報社工作，因為家裏不同意，希望她把學業完成。就這樣，那些朦朦朧朧的思念和交往，就因為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了。鍾先生會非常感慨地說：「偶然的遇合，就這樣決定了人的一生。五十年前的往事，回想起來，真如一夢。」

這個新幹班，似乎是長沙一群精英老報人共同的美好回憶，六十多年以後，新幹班的人，幾乎都是80以上的老人了，他們依然在互相打聽，老彭（華平）還在尋找、蒐集聯絡方式，認認真真做出一本《新幹班通訊》。他們重新相聚，在《通訊》上發文章，寫舊體詩、照相合影，留作紀念。



圖四 剛剛進入《新湖南報》工作，18歲的鍾叔河。

六十年前，當鍾叔河走進長沙經武路261號見報社領導，信封上面寫着「李朱社長啟」。他還不懂黨的幹部說話的一種風格，就像後來叫「劉鄧大軍」，都是把姓放在一起稱呼的。他懵頭懵腦地問傳達室：李朱社長在哪裏？傳達室同志奇怪地看着他：「你到底是找李社長還是朱社長？」李，就是李銳社長；朱，就是朱九思社長。鍾叔河這才恍然大悟。

站在報社樓房前，這個261號不久前還是國民黨新一軍軍長潘裕昆的公館，現在已經改頭換面了！新中國的氣息撲面而來，鍾叔河內心充滿了激情，像所有年輕人一樣，張開了雙臂，全身心地擁抱着新時代！

鍾叔河2012年4月在給朱九思老社長寫信的時候，他說：

四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新幹班口試第二天，手持廖經天同志寫的介紹，走進經武路二百六十一號時，是您親切地接待了我。初見未滿十八、一身稚氣的鍾雄，您的神情略顯意外……

（鍾叔河《左右左·致朱九思》）

即使「略顯意外」，領導還是派鍾叔河立刻下到縣裏採訪，開始做見習記者。第二天，報社給了鍾叔河一支短槍，讓他和另一位新人隨同兩個黨員老記者一起下鄉。他們打上背包出發，徒步30、40里的路程，那是去「幹革命」的。鍾先生來不及去買蚊帳，報社發給他一床。過了一陣子，他們從下面回來，聽見報社員工都在談李銳，他的幽默，他的能力，還有他的學問，讓大家佩服得不得了。共產黨的幹部啊，那可是了不得啊！但是，說來說去，大家最喜歡講的還是他的幽默。

報社要在院子裏搭涼棚，找了幹部D去執行，結果就是不見動靜。李銳去問D，D說沒有考慮好啊！那李銳就問：「你自己會搭嗎？」「不會。」「那就請會搭涼棚的木匠師傅來就可以了。」最關鍵的不是這個，是後面李銳說的話：「你只會生小孩對不對？小孩倒會生，也生得蠻好，這該不必請師傅了。搭涼棚，自己不會，就要請師傅，交給會做的人去做。當個區長，也要懂得領導方法嘛！老D，我看你，當個區長還要費力哩！」這些笑話，讓大家開心，或許是因為對那些沒有能力幹部的譏諷，更讓人解氣。

還有傳說的是，一位女記者寫了篇新聞稿，李銳去晚班編輯室看大樣，不滿意。一看，都是一群男人在坐班，於是說：「這條新聞，真是雞巴沒抓到，只抓到一把雞巴毛。」正說着，那個女記者推門進來，聽到了最後一句，也看見大家在那裏哄堂大笑。李銳知道自己失言，趕緊修改說：「不要誤會，我說的是，雞婆沒抓到，只抓到一把雞婆毛。」想想，李銳那口流利的湖南話，讓所有人笑得不可收拾。他完全沒有架子，那平等待人裏面，是因為他的能力，他的學問，還有他的經歷和全部的自信。總之，那時候剛剛解放，一股新氣象，沒有等級觀念，又加上李銳、朱九思這樣具有個人魅力的領導，於是大家對領導的服從，是由衷的，甚至是帶有點小小的崇拜。

但是，對於鍾叔河來說，他對李銳印象深刻的是，社長對能力的判斷和工作效率的尊重。那時候，鍾叔河他們去下面採訪一名1926年的農民老黨員，老記者寫了篇通訊稿讓鍾叔河看，鍾覺得寫得不夠好，於是自己另外寫了一篇稿子，貼上郵票就扔進信筒發給報社了，不過他還是沿用了老記者文章的標題。過了幾天，鍾叔河在鄉下看見報紙上登出了自己的文章，由老記者和他共同署名，文章卻是自己寫的。回來以後，同事告訴他，李銳晚上看大樣的時候，說：「題目是好，文章卻沒有寫好；撤掉它罷又捨不得這個題目。」於是就有人說，同樣標題的，還有一篇，就是鍾先生寫的那篇。為此，李銳還用紅筆在大樣上寫了很長的批示。意思就是說，選用稿件要看文章的質量，不要看作者的名字：老同志的文章未必都好，新同志的文章未必不好。

寫完了，將紅筆批過的大樣在飯堂裏貼出來了。即使李銳對他有一份賞識，但是鍾叔河與李銳交往很少，畢竟是領導，剛進報社的小青年，沒有主動接近他的必要嘛，但是李銳的形象卻深刻地記憶在他心裏。那會兒，鍾先生還是快樂的，加上不久以後，他就墮入了戀愛。長沙就這樣挽留了鍾叔河：「我的生活很簡單，我是生活簡單，思想複雜。我除了坐牢，從小到老，就沒有離開過長沙。」李銳、朱九思的領導，自然也給他帶來很多的鼓勵和信心，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剛進報社的時候，生活是新鮮的，連生活方式都是全新的，那時候是供給制，沒有工資，拿很少的一點零用錢，按時去領生活用品，鍾叔河竟然糊里糊塗跟在女同志後面去領衛生費，被呵斥回去。他們八人一桌集體吃飯。李銳是吃小灶的，但是偶爾也會出現在大廳裏，和大家一起吃大灶。大家都有感於當年的幹部，李銳與群眾打成一片，毫無架子（其實現在想來，如果自己花錢吃飯，就不會有差別了，上哪裏坐不都是一樣的嗎？原來，幹部的級別是追求着「人人平等的供給制」，結果卻變成了等級制。那個時候，誰又會質疑這樣的問題？）。共產主義，領導安排、組織分配，一切生活方式都是集體主義的。秋季的時候，給每一個人發1丈多的藍布，自己拿去裁縫店做衣服。如今，鍾先生享受着離休幹部的待遇，看來是合乎歷史條件，他是從供給制的年代裏走來的。

變化是一點一點開始的。參加報社工作那會兒，鍾叔河充滿了熱情，國家到底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啊！他痛恨國民

黨，他說：「我對國民黨從來就是非常反感的，根本沒有把中國搞好。1945年以後，中國哪裏像一個勝利的國家？孫中山和蔣介石的私德很壞；你說孫中山跟宋慶齡的父親是朋友，他怎麼可以跟人家女兒搞上了？這不是亂倫？不舒服嘛！愛情，還是要講真善美，你這不善不美啊！」

現在是「新中國」成立啦，他覺得自己也要以全新的姿態出現。

五十年代開頭幾年，是舊書最不值錢的時候。土改中農民分「勝利果實」，最沒有人要的便是地主家的書，只能集中起來用人力車或木船送到長沙城裏賣給紙廠做原料。街頭小販擔頭掛一本線裝書，一頁頁撕下來給顧客包油條或蔥油粑粑，成了早晨出門習見的風景。這真是有心人搜求舊書的大好時機。可惜，我那時正因為愛看舊書不積極學習猴子變人受批評，年年鑒定都背上個大包袱，正所謂有這個賊心沒這個賊膽，眼睜睜地錯過了機會。

（鍾叔河《天窗·買舊書》）

鍾叔河開始學着寫新詩，寫小說。晚年的時候，鍾先生回過頭會去譏笑着那個「楊蕾」（他的筆名）的文學夢。1950年發表了小說《季夢千》，可是他自己所在的《新湖南報》的文學副刊「湘江」就立即組織了公開批判，說它「缺乏思想性」，「看不出怎樣痛苦地和自己的舊思想作堅決的鬥爭」。很快，他發出去的另一篇稿子，《人民文學》也退回來了，同樣是「思想水平還不很高，沒有寫出我們的力量與曾經如何戰鬥」。文學，漸

漸被「鬥爭」、「革命」、「批判舊思想」所替代了。那時候，打垮了一個國民黨政府，所有的呼喚就是進攻、破壞和改造，建立一個全新的世界。誰也不會想到，文化是需要傳承的，它沒有新舊，它是在自己的道路上慢慢地前行，修修補補，發展和延續。雖然，年輕人更喜歡接受一個「新」字，但這又讓他們漸漸陷入焦慮和困境，無法解釋。他們的激動、嚮往，到底是奔向哪裏？創作、文學和思想，到底是屬於個人還是社會和組織？當概念占據了頭腦，鍾叔河的寫作只能往死胡同裏走。現實是複雜的，所以讓人費解，又讓人好奇、驚訝，你不知道什麼事情將會在新社會發生，這個「新」是有實質的內容的，它——反對國民黨；它——反對獨裁政府；它——要民主、自由；更重要的是，它——將建立一個人民自己的國家！

這個「新」不可能不具有魅力和希望。

一個「新」字，就可以調動起年輕人全部的熱情和嚮往。但是，不會有人想到另外一個現實，口號的美麗並不意味着未來。只是，鍾先生和大多數人一起，陷入在這美麗的口號裏，他努力改造思想，要融入這個新中國。他漸漸地消耗了太多的才氣，他的創造力也在「新的改造」中萎縮，可是他依然跟自己鬥爭着，他還不曾意識到這些「新」是違背人性的，他努力給自己找到解釋和結果。

不到兩年的時間，李銳從《新湖南報》調到湖南省委去工作了，到1952年又被調往北京，主管水電。1953年的時候，

朱九思也調離《新湖南報》到武漢去辦華中工學院。他們走了，報紙辦得不如從前，群眾說他們的報紙是「布告牌、留聲機」。這些閒話，讓鍾叔河聽了也不舒服。他去常德時，看見那裏的人喜歡坐茶館，他想努力用「新思想」寫一點新鮮的東西，讓報紙變得有點生氣，於是給報社寫了散文〈常德的茶館〉，因為茶館的客人改變了，已經是勞動人民。即使這樣，文章也不能發表。一點一點，你就感覺到意識形態的進入，文字越來越枯燥。

現在，這些批評都讓我們覺得那些文章的空泛，調子越拔越高，塑造的人物越來越概念，差不多只剩下喊口號了。我們的文學就是這樣漸漸地被改變，被侵蝕。早在幾年前，這種氣候已經蔓延出來，鍾叔河似乎還不夠「敏感」，只清楚記得開國大典的前幾天，他熱情地對着幾個男女生朗誦何其芳的〈預言〉，他依然記得開頭的幾句：

你一定來自那溫鬱的南方，
告訴我那裏的月色，那裏的日光。
告訴我春風是怎麼吹開百花，
燕子是怎樣痴戀着綠楊。
我將合眼睡在你如夢的歌聲裏，
那溫暖我似乎記得，又似乎遺忘……

突然一聲喝令，南下幹部的科長沉下臉問道：「啥玩意啊，念得那麼起勁？有精神不休息，為啥不多讀幾遍《評白皮書》？」崩潰！索然無趣，一個個灰頭土臉地散開了。也許，

別人很快就忘記了。可是鍾叔河忘不了，幾乎是難以承受的痛苦。

周作人的書，是不能看了，儘管舊書店還有賣，但是他已經學會自我篩選曾經閱讀的書，自我洗腦開始了；郁達夫的書，也是要受批評的。怎麼連何其芳的詩都不可以念呢？科長說：「這是何其芳加入共產黨以前寫的，也是小資產階級的東西。」

真是左得可怕，鍾先生不能明白他為什麼要這樣，很久以後他搞清楚了，這位老左，是自己有歷史問題，參加過假共產黨，於是他盡量以左來表示自己的進步和革命。最受不了的是，天天晚上要組織學習兩小時，連星期天的晚上，都要回單位學習，等回到宿舍就9點多了。根本就沒有了個人的時間和空間。鍾先生最煩的還有胡風，說他也左得可怕。「他（胡風）的萬言書開篇就引用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語錄，還舉例說，朱光潛參加過國民黨，為什麼還要讓他教文藝心理學。我就想，不錯，朱光潛是國民黨，但是只要他對文藝心理學有研究，為什麼不能叫他講呢？」

看見我的時候，他笑了，他說：「我知道你父親是被打成胡風分子，整得很慘，結局很慘。但是，這和我不喜歡胡風是兩回事。我一直說，胡風被毛澤東定為『反革命』，這是無論如何不對的。搞反革命活動是不可告人的，怎麼會上萬言書呢？這是常識嘛！彭小蓮，你說對不對？」我也笑了，連聲應道：「對，對！」為此，鍾叔河在肅反運動中，成了「肅反對象」，罪名就是「居然說胡風不是反革命」。

看來，進報社以後，鍾先生就越來越不快樂，從尚久驂的信裏，我們看見了當時的鍾叔河有多麼痛苦！

楊蕾：看到了你的信，嘿，我以為你參加工作以後變明朗了些的性格。哪知偕是這樣陰鬱咧。我有個好朋友講過這樣的話：「人生是美麗的，因為你有希望，人生是扼鬱的，因為你的幻念破滅了」。我以為這句話也有他的道理。你從前和現在的「內憂外患」（你自稱。）我雖不知道，但是我想：世界上可憂的只有（一）在精神上是孤獨的，在友誼上是被封凍的，——憂自己。（二）整個的人類在懸岩的邊緣。許多人被損害、被侮辱。（三）敏感和幻想使你多生閑愁。希望的死滅也是你悲傷的（這是我的想像。因為我偶一的憂愁不外乎這三點）。你假如有點相同，把他（它）克服了，看穿了。我相信你會要好點了。一個人有了陰鬱的性格就要多比明朗輕快性格的人苦些。多愁善感的病態文人是過時了。楊蕾：你是有希望、有前途的，克服困難，掃開障礙，在苦悶中要娛樂自己和別人。做一個好的革命工作者吧！

青年人的通信即使談着情緒，依然在思考着遠大的理想，要做好一個「革命的工作者」！我們已經不會被這些幼稚的文字打動時，鍾叔河還珍藏着它，六十年過去了。只有鍾先生會在裏面讀到一種難言的理解和自己的青春。

哎哟哟，你偕來佩服我，其實我進不了新幹班，一直就是不快活的，而且使我鬧了好久情緒。直到今天我跟你

寫這封信時我偕是一樣的在苦悶中。但是我找了好多辦法安慰自己，娛樂自己，所以我的苦偕不頂大，要是你這樣說我是很不安的。我真感到慚愧。我是不配的。

我說你由主義作風改了好多嗎？你始終不回答。是改好了些吧！

……總之我的工作死呆呆的，一點也不好，那裏有你那樣好的咧！

……

你為什麼老氣橫秋的寫：「永遠使我想起過去的生涯。」你偕很年青哪，你經歷了的偕少咧，就這樣老了偕行嗎？我記得你是比我大三歲，那並不大。楊蕾，你莫就自以為老了吧。別的人雖年紀大，內心卻是年青的，何況你咧。太多愁善感了也不好。

那天早上碰（見）了你，我沒有跟你講什麼話，因為想問的太多了，不如慢慢問，很匆忙地走了。真對不起，你莫以為我是假忙吧。實在那天也是忙不過了。同時也有些感觸，下次進城到周南來找我好不。如果不准會客你就找同學來喊我。以後要再見面就很難了，不是嗎？

偕告訴你個好消息哪：我參加大地歌唱團時練音時，那個指導員講我的聲音很好，可以學聲樂。你看多好，偕可以學了彈鋼琴和指揮咧。嘿，嘿我真快活咧。恭喜我呀。

寫了一大篇雜把弄，算了吧。你一定看得皺眉頭了。好，再見吧。祝福你。

方實 10 日深夜

寄上點花生米，表示我是個小資產階級的人物，何如？找點事情快活快活好不？有書看嗎？給我的壁報「旗」寫稿好不？最好能快點回信來，我等着呵。[見書信六]

方實，是尚久驂的筆名。這些信發出不久，尚久驂帶着女孩子的天真，「去新疆看美麗的天山了」（摘自鍾先生的文章），沒有想到的是，就此永遠地留在那裏。

回憶往事，鍾先生這樣對我們說：「她比我小2歲，很年輕，那時候只有16歲，很早熟的；另外一方面，她很聰明，講個人的稟賦我是不如她的，當時，好比我們兩人同樣拿一本外國小說，沒有接觸過的，看看誰能先背，她總比我先，而且她一面跟你講話一面可以做另外的事，真很聰明！她後來確實沒有做出什麼成就，這與她的性格有關係。晚年，她想回長沙，想把她的丈夫安排在出版社，她自己到湖南電影製片廠去搞劇本創作，那裏也要她去，廠長也是原來一起玩的，也是落實政策的右派。但是她的丈夫那時候已經得了痴呆病，和領導一見面就不同意搞一個病人來，他已經不正常了。人，是一個很好的人，也是一個離休幹部，他們是在中山大學讀書認識的。他是東北人，也是建國前參加工作的學生，叫吳雲龍。」

現實裏面沒有這麼多浪漫，跟書裏寫的不一樣，「她到新疆去了，因為長沙報紙上公開批評了她，她寫了『解放軍是挺好的，但是住在我家的解放軍是不好的』。她寫了這樣的讀者來信，寄到《湖南報》。就這樣一句話，《湖南報》把她的信作

為不搞好軍民團結的例子，共青團員還寫這樣的東西，要學校的團委批評她，她就跑到新疆去了。我不願意她到新疆去。那時候我還沒有跟朱純好。講真話，後來跟朱純好，就是因為我喊尚久驂回來，她不肯回，的確有這個因素在內。那時候年紀輕，有一點火氣。於是跟朱純很快就把關係確定下來了，就結婚了。我要尚久驂回來，也不是因為新疆太遠，我認為漢人沒有必要去新疆殖民，所有的殖民都是難得成功的」。再講，那時候的鍾叔河已經是「公家人」，他也不再有任何追着女孩子去新疆的自由。幸虧沒有去，否則他與朱純擦肩而過，會是他人生最大的失誤！

尚久驂在新疆的日子，竟然出現在王蒙寫的自傳裏，短短的描述，卻凸顯出她是一個多麼特別的女孩：

尚久驂腦子快，說話尖銳，使氣小性，但快人快語，令人快活。我贈一首打油詩給她，曰：「……每秒八千轉」，指她的思想速率，並稱之為「回旋加速器」。她的才能超出常人，但有點散點放射，未能集中做好一件事情。在「文革」年頭搞「專業創作」也是注定了無所成就。但本人還是很急躁，很急於求成。人生不過幾十年，求成不成，不是最終極易變成一事無成嗎？

（王蒙《王蒙自傳》）

進了報社，鍾叔河立刻觀察到，解放以前的老報人，都有幾套西裝，褲子還可以穿，西裝背心還是可以穿，但是西裝上衣就沒有人穿了。在幹部裏面，1949年以後，都以穿南下的

幹部服為榮，「我們很怕別人說你是一個學生，好像去採訪，到單位去，省報也該是南下幹部，於是就學會了抽煙，因為別人發煙，就抽煙。我首先來敬你一支煙，你說不會抽就覺得很丟人，衣服就盡量的幹部化，穿制服。解放以前就會認為是服裝不整，中學生也是管着裝的，家裏也管，不能穿得很不整潔就出去了」。那時候的鍾叔河，是穿着華達呢（Gabardine）中山裝的年輕人，很酷！

1950年的秋天，報社裏突然又來了幾個年輕記者，民盟辦的《民主報》停刊了，就把其中幾位能幹的記者調了過來。他們中間站着朱純，一個安靜、大氣、睿智的女孩子，剛滿20歲。看着她年輕時候的照片，實在可以說，她是漂亮的、純淨的，那兩條粗粗的辮子，帶着時代的特徵和青春感，讓人心生好感。誰都不會想到，這一臉沒有苦難的女孩，是在孤兒院裏長大的，顯然她的成熟超過了她的年齡，她已經有自己的



圖五 年輕時的朱純和《民主報》的同事們（前排左二為朱純）

人生閱歷了，憑着她的努力，拿着獎學金，從小學一直讀到高中畢業。鍾先生說：「那時候，國民黨的孤兒院是要保證每一個孩子讀到初中畢業，這樣就有生存能力；高中就要憑你自己的本事去讀書了。」

現在，朱純站在《新湖南報》裏，鍾叔河一定看見她了。雖然，朱純被派去駐衡陽站的記者，而鍾叔河已經是留在報社做編輯了，但是鍾叔河在等待着從衡陽回來，等待着跟她打個照面，也等待着她的稿子。如果以往是青春的萌動，他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麼，現在他一定是清楚的。他主動和朱純打招呼，主動交往。很快，似乎有點太快了。兩年後，21歲的鍾叔河和23歲的朱純結婚了，結婚當年就生下了大女兒。鍾先生常常自嘲地說：「我是早婚早育。」實際上，在這自嘲後面，我們聽見了隱藏着鍾先生的得意和驕傲。晚年，當他概括自己



圖六 和鍾先生戀愛時期的朱純

的人生時，他說：「我和朱純結婚，是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

婚姻再成功，日子還是越來越不好過。當年，鍾叔河是真誠地希望接受改造，去掉自己身上的小資產階級情調，可是連何其芳的詩都不能念，他就想不通了。這又不是徐志摩、戴望舒的作品，更不是胡適和周作人的啊！等兩位社長離開報社以後，報社也從供給制，改成薪金制，鍾叔河和朱純都評上了18級。¹可是級別還是不能給鍾叔河快樂，他在努力思想改造後，終於清醒了，從「楊蕾」的夢想裏走了出來，這個筆名鍾先生再也沒有用過。

鍾叔河不再搞文學創作，但是他伏案做編輯，還是與文字打交道，那個時代，這是最危險的工作。即使是奉命寫作，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站錯了隊。儘管「站隊」哪一個隊伍是由上面決定的，腦子已經開始掛靠在組織這裏，命運的走向變得不由自主。他被安排寫的評論文章，一定只能用筆名，「柴荊」（財經）、「龔橋」（工交）、「辛文」（新聞）諸如此類。一直到文革的時候，這些筆名就變成他的「化名」，好像是他「潛伏的特務代號」，也有「江洋大盜」之嫌。

不論如何「思想改造」，這個從中國傳統文化走出來的人，內心還是希望達到一份小小的心境的自由，像莊子那樣，心靈是自由自在的。他一直思考這樣的問題：「知識分子的本義，是智者，是思想者，而不只是學校畢業、拿了文憑的人，不只是認識多少字、讀過多少書的人。古代中國的士大夫，是依附於統治者，靠統治者吃飯的讀書人。現代的知識分子，則應該

是憑自己的本事即知識吃飯的，是心境自由的。要做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既要融入社會，又要保持獨立人格。」每一個人，必須首先是自己。他的好朋友朱正在描述反右後，鍾叔河與朋友見面的場面，依然感動於鍾叔河的堅持：

馬克思在一篇文章中以贊同的態度引用過一句話：「受難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難。」馬克思引用的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

也正是在那時候，鍾叔河的一位學生時代的好友從新疆回到長沙來了。應該說，這是一位好心的同志。我陪他去看她。談了一陣之後，她知道無法說服鍾叔河改變對「運動」的態度，搖搖頭，嘆口氣，說：「對於你我是沒有什麼好說的了。我只擔心你的孩子，你將給她們什麼樣的影響。」立刻，鍾叔河回答說：「我將以我自己為榜樣來教育她們！」當時我從心裏讚賞他的這個回答。我很少能記住翻譯的詩句，但是阿拉貢的〈法蘭西晨號〉開頭兩行的大意，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如果我能夠重新生活一次，我將依然走這一條道路。」在這一點上，鍾叔河和阿拉貢一樣：深信自己所走的道路並沒有錯，即使必須為此付出代價也在所不惜。他明白：他從來也不曾反黨反社會主義，從來也不是人民的敵人。至於說，為了探求真理而不得不承擔苦難，那麼，他不但不是最初的一人，而且也將不是最後的一人。

（朱正《述往事，思來者》）



圖七 1980年鍾叔河與尚久驂重聚（左一為尚久驂）。

這裏——這個好心人，就是尚久驂。在追求革命、思想改造、意識形態的控制下，她和鍾叔河對社會的理解和認識，已經相去甚遠，顯然她已經說服不了鍾叔河，只能最後拿出「擔心你的子女」的理由來制約他。可是，鍾先生已經是一個有自己腦子的人了，他不會被別人的諄諄教導去認識問題，更不願意讓自己的價值觀被腐蝕。他不再相信神話。而在尚久驂的勸告裏，我們看見的是她的糾結和痛苦。

青春是沿着時間往前走的，未來將走過哪些道路，走向哪裏，誰都不曾預測。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青春的純潔和稚氣就漸漸黯淡了。在給尚久驂的父親去送葬時，鍾先生還是回想起五十年前，他跑去尚家，在長沙老式的平房大院子門下，叫喊着十五六歲的姑娘尚久驂出去玩的情景，他為老伯寫了首傷感的輓聯：

百歲老人星，都道是天上神仙，十方祥瑞；
兩行從子淚，全為了少時朋友，一世交情。

（二〇〇〇年四月）

可是怎麼也沒有想到，兩年以後，68歲的尚久驂也去世了。鍾先生在〈做輓聯〉的文章裏，特為寫了一個「補記」，是藉着時間的延續，留下變化中的微妙，可是一切都被抹去了，只剩下無奈的回憶……

二零零二年春節打電話向久驂拜年，發現她聲音低啞，大異平時，詢知醫診為心衰症，我和朱純都很擔心。而天各一方，烏魯木齊又別無熟人，實在幫不上什麼忙，心裏則確實惦念着。但心想她比我還小兩三歲，平素精神又好，總會健康起來的吧！誰知元宵前夜她在長沙的弟弟告知，說她已於前日凌晨去世，兩個兒子都遠在國外，丈夫又因老年痴呆早被送入醫院，身邊無人，夠淒慘的了，思之不禁淚下。

（鍾叔河《偶然集·做輓聯》）

陽光少年，如今已成為鍾先生了，他會說：「我從小就沒有叱吒風雲的雄心，毋寧說我本來不過想靠小聰明混一口安靜飯吃。讀書時曾奉『平生無大志，只求六十分』為座右銘，十七八歲起開始談戀愛，很容易感傷，追求的都是長得不怎麼漂亮卻被我認為很聰明的女孩子。她們都取笑我，把我叫『羅亭』……完全是『反右』運動逼着我讀書思索的。當了『右派』後在長沙市內幹零工謀生，才認真讀歷史想歷史。1970年被判刑十年，又進一步給了我讀書的動力和時間，使我在『平反改正』之後能做一點點事。回想一生，自己也覺得好笑，說我『搞學問』，其實我何嘗有什麼學問？」鍾先生的自嘲裏面，滲透了

他的感慨，其實他也誇張了自己的「胸無大志」，不管怎麼說，當年在校的時候，他永遠是前三名的優秀生，他是拿着獎學金讀的高中。

但是，青春很快就過去了。似乎也沒有留下多少「無悔的青春」記憶……

彭小蓮

註 釋

- 1 18級當時是「省政府一等科員」。

叔和：剛才一個同學搭封信把信，回屋裏看見了你的畧封信。不，我不是怪你，你唯。我起初不是很高興么？我們坐在鐵軌上走着，起初你們講話，後來我不曉得是怎麼想起星火一個同字給筆簽的名。無名者前頭還有說：於是聯想到那天我生日的晚上，你說過我不過，早的我一定是吃不夠，但是懂得向心抄寫，也會一天天強壯起來，就联想到恩慈半生如痛苦，我在半中間着一個人死或我想，我原不想受人瞧見我降，我從不許我的，我還是這樣想，「我要怎麼以聖」（？），（？），像個鋼鐵一樣，（？），我就敢向着太陽，紅紅的太阳痛痛快快笑），就聯念、聯想——（？）
打起勁來，好遠不快限的回憶去，對於這些倒置的往事，我從來不去想的，一想不就吃，不小了，——（？）——我順順得在心里。

我的確是株「高興草」吧。我跟妳在一起不是要快活么；我總是喜歡快、愛快很。偶過一兩次不快也是小事。不要這樣講，我沒有覺得你什麼大不~~的~~冒火我總是不惱火的。你不好的人也。你以為~~我~~^講得比你好。我看到，為什麼不說呢？莫忘情。我不好這樣來作平釋了，每次我哭的時候你看見么？偶過一次不快快就~~心~~到~~心~~。相安無事，知如，那都不是指這事。這些真係你信不信隨便，那我就~~不~~提~~提~~了。

姐姐的良朋是使我要怪你的地方。我为什么不更坚决地责难自己呢？我把你看成
一点都不真实。你让我我要看假美少女。姐姐的良朋是使我决定做女子，更使我警觉，不要感什么
放在心里，跟谁闹着玩。而你又疑惑，为什么会说错话，这本来做得对呀，我没有由此不
快乐，你是最蠢吧？

我在屋里写定~~了~~你伙、以后书来信,把你看有些地方你就不懂得乱猜了。瞎扯地去了。(莫草这到到屋里来,莫草一中好,这次你留的吃西点。)说我不搞正菜,新得有43好,--金月最懂得这些,所以初到到到屋里来。

不穿，我好乱。毛绳衣那个同学留鼻拿来，莫催好也，我也晓得你要。

43

287 320分.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開放取用電子書

49.10-10

楊蕾：看到了你的信。哦，我以為工作以後產生了些的性格，所以信是這樣寫的。我有個好朋友講過這樣的話：人生是美麗的，因為你有希望，人生是短暫的，因為你的幻念破滅了。我以為這句話也有他的道理。你從前和現在的「內憂外患」（你自決）我雖不知道，但是我認爲：世界上美麗的只有（一）在精神上孤獨的，在友誼上是被疏遠的。（二）能（三）覺悟的人是在最廣的遠處。許多朋友是（四）被（五）破壞和幻想使生活生悶。希望的破滅也是你悲傷的（這是我所望，因為我傷心的憂愁不（六）在乎這三）你（七）假如只有相同，把他（八）免脫了，希望了，我相信你也會快樂了。一個人（九）陰鬱的性格就要比他（十）聰明快活性格的人某些（十一）更強盛的病歷文人是（十二）進步了。楊蕾：你（十三）是有希望，有前途的，先服困難，操勞操勞，在艱難中要（十四）自己（十五）和別人（十六）做一個好的革命工作者吧。

胡俊復倒楣，你代我問候他吧，他與你的描寫是很相似的，他需要書和什麼，我是願意而且希望去弄。你（十七）徵求意見知不？看（十八）如（十九）強壯的人這樣去弄是抱不平，唉，要克服社會中的時形和自然就（二十）好，我們這些好的，健康的人更要努力，才要保（二十一）你（二十二）呢？

你們泥土人的下落，大致我都曉得，又有新城市了，是了，該校再請你來，說（二十三）你中間大概會說，解放後，你們一個（二十四）走，把（二十五）新城市（二十六）走，如果（二十七）真的，也太使他（二十八）進，了，楊蕾（二十九）我的（三十）很少的經驗告訴我，一個朋友是（三十一）值得我（三十二）的，不要（三十三）麼的把（三十四）一些（三十五）交（三十六）手（三十七）了，（三十八）我（三十九）是沒有（四十）瞭解你們的（四十一）情況，是（四十二）下（四十三）批評，我也（四十四）是（四十五）批評，是（四十六）個（四十七）意見而已。

唉，（四十八）你（四十九）留（五十）來（五十一）服（五十二）我，（五十三）我（五十四）進（五十五）了（五十六）新（五十七）學（五十八）班，（五十九）一直（六十）是（六十一）不（六十二）快（六十三）活（六十四）的，而且（六十五）使（六十六）我（六十七）悶（六十八）了（六十九）好（七十）久（七十一）情（七十二）緒，直到（七十三）今天（七十四）我（七十五）跟（七十六）你（七十七）進（七十八）行（七十九）交（八十）談（八十一）時，我（八十二）還（八十三）是（八十四）一（八十五）樣（八十六）的（八十七）在（八十八）苦（八十九）悶（九十）中，但是我（九十一）找（九十二）了（九十三）好（九十四）多（九十五）方（九十六）法（九十七）安慰（九十八）自己，（九十九）使（一百）我（一百一十）的（一百一十一）苦（一百一十二）悶（一百一十三）不（一百一十四）大（一百一十五）了，要是（一百一十六）你（一百一十七）這（一百一十八）樣（一百一十九）我（一百二十）是（一百二十一）很（一百二十二）不（一百二十三）的，我真（一百二十四）到（一百二十五）慚（一百二十六）愧（一百二十七）我（一百二十八）不（一百二十九）配（一百三十）的。

我說你自由主義作風改了如否？你始終不回答，是改了些吧，

我在學校裡做（一百三十一）團（一百三十二）體（一百三十三）廣（一百三十四）衆（一百三十五）的（一百三十六）工（一百三十七）作，（一百三十八）你（一百三十九）知（一百四十）道（一百四十一）一（一百四十二）個（一百四十三）打（一百四十四）球，（一百四十五）唱（一百四十六）些（一百四十七）離（一百四十八）譜（一百四十九）的（一百五十）人（一百五十一）是（一百五十二）多（一百五十三）和（一百五十四）人（一百五十五）搞（一百五十六）熟，我（一百五十七）又（一百五十八）而（一百五十九）心（一百六十）以（一百六十一）他（一百六十二）們（一百六十三）品，所以（一百六十四）這（一百六十五）是（一百六十六）我（一百六十七）做（一百六十八）得（一百六十九）好（一百七十）些，慢（一百七十一）些（一百七十二）和（一百七十三）他（一百七十四）們（一百七十五）混（一百七十六）一（一百七十七）些（一百七十八）問（一百七十九）題，（一百八十）混（一百八十一）之（一百八十二）這（一百八十三）是（一百八十四）我（一百八十五）混（一百八十六）工（一百八十七）力，但（一百八十八）我（一百八十九）負（一百九十）責（一百九十一）校（一百九十二）康（一百九十三）樂，（一百九十四）做（一百九十五）好（一百九十六）不（一百九十七）好，和（一百九十八）常（一百九十九）來（二百）的（二百一十）大（二百一十一）鬧（二百一十二）起（二百一十三）來，（二百一十四）弄（二百一十五）些（二百一十六）晚（二百一十七）會，（二百一十八）天（二百一十九）天（二百二十）要（二百二十一）跑（二百二十二）上（二百二十三）去（二百二十四）下（二百二十五）來，（二百二十六）忙（二百二十七）得（二百二十八）要（二百二十九）取（二百三十）消（二百三十一）息（二百三十二）的（二百三十三）日（二百三十四）子（二百三十五）都（二百三十六）盡（二百三十七）了，所以（二百三十八）我（二百三十九）決（二百四十）不（二百四十一）幹（二百四十二）了，（二百四十三）團（二百四十四）體（二百四十五）做（二百四十六）回（二百四十七）國（二百四十八）家，（二百四十九）推（二百五十）重（二百五十一）何（二百五十二）苦（二百五十三）的（二百五十四）工（二百五十五）作（二百五十六）了，（二百五十七）因（二百五十八）為（二百五十九）一（二百六十）做（二百六十一）領（二百六十二）導（二百六十三）工（二百六十四）作，（二百六十五）就（二百六十六）是（二百六十七）累（二百六十八）死（二百六十九）累（二百七十）死（二百七十一）的，（二百七十二）重（二百七十三）力（二百七十四）提（二百七十五）廣（二百七十六）衆（二百七十七）心（二百七十八）了（二百七十九）就（二百八十）要（二百八十一）提（二百八十二）高（二百八十三）了，所以（二百八十四）嘛（二百八十五）我（二百八十六）這（二百八十七）副（二百八十八）身（二百八十九）子（二百九十）是（二百九十一）不（二百九十二）能（二百九十三）不（二百九十四）在（二百九十五）廣（二百九十六）衆（二百九十七）中（二百九十八）修（二百九十九）養（三百）好（三百一十）些（三百一十一）時（三百一十二）間，（三百一十三）才（三百一十四）能（三百一十五）做（三百一十六）上（三百一十七）面（三百一十八）的（三百一十九）工（三百二十）作，（三百二十一）說（三百二十二）之（三百二十三）我（三百二十四）的（三百二十五）工（三百二十六）作（三百二十七）是（三百二十八）死（三百二十九）死（三百三十）的，（三百三十一）一（三百三十二）是（三百三十三）不（三百三十四）好（三百三十五）的，（三百三十六）那（三百三十七）是（三百三十八）有（三百三十九）你（三百四十）那（三百四十一）樣（三百四十二）的（三百四十三）工（三百四十四）作（三百四十五）嗎？

跟（三百四十六）妻（三百四十七）子（三百四十八）也（三百四十九）搞（三百五十）不（三百五十一）來，（三百五十二）整（三百五十三）天（三百五十四）的（三百五十五）吵（三百五十六）（三百五十七）不（三百五十八）是（三百五十九）以（三百六十）和（三百六十一）暗（三百六十二）鬥，（三百六十三）他（三百六十四）的（三百六十五）笑（三百六十六）話（三百六十七）也（三百六十八）真（三百六十九）多，（三百七十）下（三百七十一）回（三百七十二）講（三百七十三）吧，你（三百七十四）不（三百七十五）弄（三百七十六）好（三百七十七）這（三百七十八）才（三百七十九）性（三百八十）格，（三百八十一）他（三百八十二）老（三百八十三）是（三百八十四）病（三百八十五）了，你（三百八十六）不（三百八十七）在（三百八十八）家（三百八十九）里（三百九十）低（三百九十一）頭（三百九十二）苦（三百九十三）思（三百九十四）苦（三百九十五）思（三百九十六）的（三百九十七）工（三百九十八）作，（三百九十九）他（四百）也（四百一十）到（四百一十一）了（四百一十二）青（四百一十三）島（四百一十四）會（四百一十五）上（四百一十六）就（四百一十七）會（四百一十八）做（四百一十九）出（四百二十）工（四百二十一）作（四百二十二）了。

書信六 尚久驂信·1949年10月10日（一）

我的數學本來很差，但學期一用心，倒很容易。我們這科學副科，又是太早，有些不懂，而且講一些專門的科學，但是激發我的興趣倒不少。我本來就喜歡搞研究，管它，我在朋友圈裡有幾位是搞有進取的，就他們地方，得益真不少。看了些自然科學的書，從這又到人，人，金雷和魯大，電子，蛇，……等入門讀物，可惜時候太忙，不然我要更用真功夫才好。

我一直過得很平靜，現在我全不可怕，直到最近我的好朋友在軍隊裡死了，我才嚐到了那個滋味。他有跟我一樣的性格，比我大一歲，我們從相識的，玩，讀書，……都一樣，喜歡，他比我還要老，略老成，我知道在他心裡，在他^心信的外表下，有一颗成熟的心，而且是充滿了仿徨的。他一死，我真想他，我不覺得那是真的，我不相信那麼年輕的人能“死”，我喜歡一個人想他，想那些過去的日子，……我真是有是像，但是我希望你也有這種情況，你有同感沒有？（也許會變成你所創性格的遺囑中也有吧。）

你為什麼老氣橫秋的生？永遠使我想起世上的生，你留很年青啊，你進廠了，的保少啊，就這樣者？信嗎？我記得你是比我大三歲，那也大，相當，你莫論這以為老了也，別的人雖年紀大，而心却是年青的，你說你啊，不必憂慮了，也不如。

那天下午，我沒有跟你講什麼話，因為肚餓的太甚了，不如叫個飯，低力，忙地走了，真对不起，你莫以為我是假忙吧，實在那天也是忙又忙了。同時也有些感觸，下次進城到南來找你好，如果不會會你，我就同學去喊我，……後要再見面就難了，不是嗎？

留在你，你回信，信嗎？我本以為你也在唱國時，像音樂，那個指單兒，薄我的聲音，所以，你莫以為我，留不，除了彈鋼琴和指揮啊，……是，我真快活，到，來找我，寫一大篇寄往地，……你，也看學數目，……好，再見吧，祝福你。

方安 10日深夜

方安先生來表示我是一個愛座留級的人物，何如？我莫事情快活，信嗎？有若嗎？信我的健康，我生病紅不？最好能快是回信來，我莫著。

書信六 尚久驂信，1949年10月10日（二）

P.D.

身體却不能做一點你想做的事。于是我伏在
手裏哭到醒來——什麼兒孫呀，什麼也及不
了，我又像在路上像停下來了。四周是白的，不
的，有一聲，很慘的哭聲，叫著，跟我的聲音
大響，小聲，哭聲，我站著，一直到月亮的
了——

于是我發覺力量，站著，把別的人，這些
不是一定好，並儘量壓倒自己，光明，美，到一
——丁丁是路，我站到了，但是我不是生而在
書裏哭呀！

你今夜睡也睡不著吧，我知你笑又笑不出
——從前我試着用平靜的聲去安慰自己，也笑別人
——把這些悶在肚裏，又不做事，手裏的到自
己就覺不安，這也不對，那裏來的這
太美的，一睡也睡不了，你呀，我也在個個
快原里呀！

我已丁丁是路，是路吧，也不許自己之
呻吟吧，在你們手裏是路，是路吧，是路，
這很好笑，我也希望我變笑，跟你們一樣，只
你們變笑的呀！

20 X 20

P.IV.

這不是好極的，這是生活，我不就不應
的這樣對他，除了這，我也只得到力量，
我多麼愛你們，多麼愛呀！

在我是這環境，我會指了井說，你手裏就有
這環境，在我這環境，不是自環境，你手裏就有
一天，一天，這環境，大環境是不會，
好嗎？我在的日，這環境是有名的呀！

——我這環境，從前太環境了，如今來了，
是了，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是了，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房主人開了電燈，我在房裏，這環境，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這環境，這環境，這環境，這環境，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別說，別說，別說，別說，別說，別說，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這環境，這環境，這環境，這環境，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這一個個，這一個個，這一個個，這一個個，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0 X 20

書信七 尚久驂信，1949年2月22日（二）

與鍾先生閒聊（二）

時間對於我們一直是缺頁的，對於很多歷史問題，我們也一直搞不清楚，似乎我們要在一種既定的概念裏讀歷史，鍾先生一點一點告訴我們他所了解的，以及生活裏的基本常識，於是一種「既定」的東西在動搖。

鍾：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搞學問的人，更不會是什麼大師。說話一定要有分寸，我沒有什麼學問。18歲，那可真的是雙手捧着一顆紅心參加革命的。絕不是異類，不是要跟共產黨對着幹的。那時也算不上是什麼知識分子。那時候的知識分子（起碼要大學畢業吧）是要被改造的，我們進報社是參加革命，就是去改造知識分子的，我怎麼可能成了有學問的知識分子呢？我們天天在報社裏，就是看那些洗腦的書，而且是認認真真地看。回家後也還是喜歡看書嘛，各種書都看，胡風的書也看過一點，《時間開始了》嘛，左得很嘛，所以後來說胡風是反革命，我就困惑了。這不是什麼有水平的判斷，根本與學問無關，只是一種直覺而已。我的職業是編輯，編輯在社會上，從來不會給予

它很高的定位。說老實話，現在我們編輯的水平還是很低的，作為一個編輯，應該要掌握各科的普通常識，否則是做不好的。過去的報人，有的很厲害。民國，還是比較有文化的年代，但是國民黨的統治非常糟糕的，是對文化的破壞，但是它也管不了那麼多。它也就是東南幾省，東北就是張作霖的，它哪裏管得到？廣西、雲南，都是有自己的派系的。國民黨的專政是非常糟糕，否則我們不會那麼熱情擁護共產黨。到現在，總的看來，有些學科的水平，跟周作人都還差得遠。他雖然沒有專門發表什麼論文，但是字裏行間看到他對這些問題有研究。比如說神話學，就他談得到點子上，使我很服他。別人很少有這樣的論述，雖然堆滿了一些術語、名詞。又扯遠了。

彭：沒關係，你覺得他神話學談到點子上，他是怎麼說的？

鍾：你比如說，神話是什麼東西？我們中國也有神話，但是中國人的神話是很幼稚的。所有的神話都得從開天闢地講起，而中國盤古的故事很晚才有，先秦沒有。《楚辭》裏面〈招魂〉、〈天問〉好像談到，至少屈原有這麼一種世界觀，好像他有一個這樣的想像，但是這個東西是不是就是當時的俗信，是民間文學，普遍有這樣一種故事和傳說呢？很難說。可見這只是屈原個人的創作。〈九歌〉就是屈原個人的創作，如果是一個普遍鮮明的神話，在別的典籍裏面也應該會有。倒是堯、舜、禹，什麼開九河、鯀治水，這些故事可能有些這樣的傳說。

彭：女媧補天。

鍾：在中國，漢民族是一個農耕民族，農耕民族是很現實的，它不像希臘，它是靠海，靠海很早就會有通商，很早就有航海、打

魚，打魚的漁民要交流。農業社會的農民，古代生產力極其低下，他就必須守住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他離開家不可能超過兩、三天，他走兩、三天，莊稼就死了，這種文化是很現實的。中國人傳說的神話也是很幼稚的，更沒有像希臘那樣美的神話。希臘的神話裏，所有的神都是人格化的。希臘的神一樣會戀愛，一樣地私奔，一樣可以跟凡人戀愛，祂們的行為就是人，但祂是具有神力，這是原始人的想像。中國的神是什麼呢？是自然物，是土地、糧食。所謂社稷，社神是土神，稷神是穀神，這個穀神、土神也是後來學者提高的，祂就是土地公公，祂這個土地不是你這個地方的土地，祂是在保佑你這個地方。這棵樹成了精，出現什麼怪事情，那棵樹也成了什麼精，有這樣的自然物崇拜。再就是自己祖先的崇拜，希望祖先庇佑自己。你看，中國人的神，中國人的信仰，中國人信仰什麼？財神、菩薩、送子娘娘。如果我求兒子，就去送子娘娘那裏去許願，許願說如果我來年生了一個兒子，我就來跟你送一部神帳，在神像下許願，那很便宜。如果再虔誠一點，我出錢給你把身上鍍一層金，再造金身、重修廟宇是最大的還願。如果你沒有兌現，我也就不會兌現，這實際上就是行賄，而且是立合同行賄。中國人的敬神就是行賄，我送了錢給你，你是要給我東西的，你不給我東西後就沒有下文了，這是一種功利行為。外國人的宗教他有熱忱，他有獻身，比如說人肉炸彈，中國沒有，伊斯蘭有，中國人不會，中國人再不滿，他不會自己去死。人肉炸彈是自己要獻身的，不是我偷偷丟一顆炸彈自己就跑路。這種獻身非常恐怖，我們沒有這種宗教狂熱，當然，這

也不是壞事，宗教狂熱多了怎麼辦？我只是說宗教和信仰，每個民族都是不同的，我們的與中國的農耕社會有關係，游牧民族不一定有這種信仰。兩性關係上也是這樣，我們的文化是很重視宗族的、地方的、鄰里親戚的關係，我一輩子住這個地方不會動，所以我的女兒嫁給誰，我的媳婦討誰來，都是生定了的。所以有五服的關係，親疏，這是中國的社會，倫理是這樣的。所以，我們中國的神話是薄弱的，是後來的人想像的或編造的，我們構成不起一個完整的神話體系。後浪出版公司印了袁珂的《神話學》，那是很幼稚的。不是說我看人不起，事實上我去搞還搞不出來，並不是看輕他。我們沒有搞那個東西的資源，當然我也沒有去搞神話學，中國也沒有神話學。

彭：懂了，中國的神話、民間文學，還是形而下的；但是希臘神話，到了像「薛西弗斯的神話」裏面，它已經是有哲學思辨的內涵了。

鍾：周作人對神話裏的一些問題都有論述，而且他的論述是我很能接受的。他談的態度很平和，我能夠接受。他最難得的態度就是很誠實，哪個好就好，哪個不好就不好。比如，日本民族最大的好處就是愛美，所以外國人叫日本人是小希臘，希臘人也是愛美的民族，這也是我讀周作人的文章知道的。希臘人和羅馬人不同，羅馬的神很恐怖，它使人恐懼；希臘的神就是人，祂們也有人的弱點，那些神都是很有趣的，只是祂有神力，有神通，能做人所不能做的事，可是又會犯錯誤。祂愛女人，祂也犯錯誤，也喝酒誤事。神也有婚姻以外的性關係，有私生子，祂就是一個人，這是希臘人的神話觀念。希臘人把自己的願望投射到神身上了。而羅馬人的神是一種神化的、超能的力

量，使人恐懼。希臘神話裏面也有使人恐怖的東西，但是它很美。好比使人一看就會化成石頭的女神。有一個女神，頭髮是蛇變的，祂很美，一看到祂的人就會變成石頭，這很恐怖，但是也有辦法克服祂。希臘神話裏也有很多恐怖的故事，還有什麼人和牛的混合體，這是一個女神，是一個女王，去跟公牛交配結果生出半牛人，要殺人，拿人做祭品，迷宮的故事就是。一個人去殺死了它，因為人能破解迷宮，就給他一個線團，帶着小線他出來了。這就是希臘神話的故事，反正都有一個好的結局，人最後還是戰勝了它。

彭：你說周作人講的神話學的觀念是什麼？

鍾：他談希臘神話，都談得很得要領，他也翻譯《希臘的神與英雄》，英國勞斯寫的，是一個好的文學讀本，剪裁也很恰當。我們看起來故事沒有展開談，沒有多談，但是它剪裁得恰好，我覺得那是給中學生看的讀本，應該是這麼一個本子。

彭：你覺得他談的突出的要點是什麼？他在神話學方面，對你啟發特別大的是什麼？

鍾：對神話我也沒有專門研究，我對神話不是很感興趣，我只有一點很初級的了解。但是周作人使我知道了神話是最古老的文學，尤其所有的文學都是從神話裏面來的。我看書的面也許比較廣，但你再多問我幾句話，我答不上來了。反正我一點點關於神話的知識，就是周作人給我的，別人沒有給我。我首先講中國就沒有這樣的書，別人寫的東西，我看得不知所云，知道的還不一定比我多，我怎麼能夠從那裏得到東西呢？周作人沒有談什麼高深的理論，但他還是給我增加了知識。這一點是他

和「左聯」和胡風最大的不同。胡風談的盡是理論，盡是伊里奇（列寧）、約瑟夫（斯大林），我一看就頭痛。

「左聯」的那些人都是很熱忱的，都是熱血青年。他們是這樣一群人，都去搞新文學；但是講老實話，他們的文學程度都還是比較淺薄的，要我講我就講真話，我不因為你（指彭小蓮）父親是「左聯」的作家，就講客氣，我不必那麼談。中國的整個新文學都是很淺薄的。日本起步接觸西方並不比中國早，而且日本的舊文化完全是學中國的，他的文化、學問的源頭都是漢學，但是他們新文學的成就不是中國新文學可以比的，我們也沒有權力專門去評論日本文學，但是我們可以從西方翻譯日本很多文學作品，就可以證明這一點。但是中國有幾個中翻英？中國新文學真正搞出了些作品的是沈從文，他也是我們湖南人，他還是寫了一些小說，但是我也不同意把他評價太高，因為他只是一個無鳥之鄉的蝙蝠。周作人把他自己定位就是無鳥之鄉的蝙蝠，這是很可憐的，沒有成氣候。因為中國的發展時間太短，原來社會舊士大夫的勢力影響太重，兩性觀念等觀點深入到骨血裏面，不是幾代人能夠改變得了的。我們這種人，我自己認為我的思想很新了，在我們平輩人中間，我同樣也是舊文化的烙印很深，我講的中國舊文人的毛病在我身上也是同樣的深重，我沒有權力站在一個更高水平上來評論這些，好像我比別人都高明，那就錯了。我沒有這樣定位自己，我不夠格，我是把我自己放在裏面一起談的，我同樣是受舊觀念影響的，我就是這麼走過來的。

不過我還是有勇氣承認這一點。在某些方面，我也許比某些同輩好一點，但也只是一點點，並不很大。我的世界很小，不如朱正。抗戰時，他在耒陽，耒陽是省政府所在地，讀書的條件比平江好得多，他的父親是省圖書館的職員，¹ 他有機會看到比我多的書，他父親好像是會計，管報銷。我也是被批判的時候聽講的，朱正是職員家庭出身，他的家裏是裝電話的。抗戰期間家裏有一部電話，那肯定是高級職員。我不同，我是回到鄉下，到了平江。平江起義那個地方，長沙人講平江，笑話平江是笑平江的口語，口音很不好懂，它雖然直接跟長沙搭界，但不屬於長沙府，它的文化也不是長沙這條系統。因為那裏有條水是從江西出發，流過平江走汨羅，就是屈原自殺的汨羅江，所以講平江有文化，是那條江有文化，這其實是胡扯，並不會因為屈原在裏面自殺就提高什麼文化品位。它只是一個很偏僻的窮鄉僻壤，但是窮鄉僻壤裏面也有讀書人，也有書，也有識字的人，有些書也進去了。但是平江我估計不會有很多本，我因為想看書，我渴求書，就想方設法去借書。

就跟有的犯人他要求偶一樣，他就想方設法化妝成女犯，想方設法混到女牢裏面去。我們沒有想到，沒有那個點子，也沒有那個勇氣。但是我想看書是真的，我也會想方設法去找到書看，即使在勞改隊。你問我，說你在勞改隊還看什麼書，我在勞改隊看了很多的書，還看了很多內部書籍。有南斯拉夫的，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內部發行的，《南斯拉夫資料集》、《鐵托在普拉的演說》、《鐵托在拉賓的演說》，還有《第三帝國的興亡》都是在勞改隊看的，吉拉斯的《新階級》也是在勞改隊

看的，²勞改隊也有這樣的書籍進去，所以沒有去過中國勞改隊的人不會曉得的。它是一個社會，這樣的社會裏，什麼事情都有。裏面判刑的有抗戰期間的江洋大盜，在蘇北入了伙的，他當時是一個小角色，在那裏殺了人，殺的還是一個偽鄉長，後來他判刑只判了五年，因為他是歷史上的犯罪，不予追訴。他就告訴我，那種殺人黑幫的內部裏面的切口，裏面的一些章法，他是蘇北人。這些都是故事，我準備寫的《我的故事》裏面一個獨立的故事。

彭：現在「走向世界叢書」快出齊一百本了，後來六十幾本，你就沒有寫敘論吧？

鍾：我也寫了幾種，張德彝的都是我寫的，《海錄》那篇也是我寫的。別人寫的序也不一定不好看。他也還是介紹了那個作品，有些作品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賽金花，這是一個戲劇性人物，都是把她在德國那一段講得怎麼樣，和瓦德西怎麼樣怎麼樣，其實全是子虛烏有的事情。張德彝他那一次去是使館的隨員之一，每天詳細記載賽金花的活動，每天他都記載了。賽金花不僅沒有跟德國人的男性單獨接觸過，她跟使館其他男性也是不接觸的，住在樓上，連她過生日，大家怎麼樣去祝賀，他們送禮都是通過傭人，就是副官在中間講話，他們沒有一次單獨接觸過賽金花，賽金花生日他們送了禮，洪鈞收了，也擺了酒請他們，賽金花都沒有出面。

彭：都是演繹出來的。

鍾：演繹出來的。尤其賽金花，張德彝當然也見過賽金花，畢竟使

館很小，比如去看戲，使館裏面也有幾個人有家眷，有家眷的人就和洪鈞他們住在樓上，沒有家眷的單身漢就住在樓下，他們伙食都是單獨開的。三年中間，大概每年有幾次看戲賽金花是出來的，他都詳細記了。賽金花也出使館拜過幾次客，是洪鈞帶她到大使館的外國僱員家裏去應酬，那些外國夫人來玩，賽金花也接待過她們。外事禮儀洪鈞從沒有帶她去過，日本公使的夫人去了，中國使館也沒有人去。洪鈞從沒有把賽金花作為他的夫人介紹給外交界。

彭：所以說她穿的小鞋子，底下有一個洞，一面走路，一腳踩下去，裏面的香粉就噴出來的，都沒有這個事？

鍾：沒有這個事。據說古時宮廷裏面有人這樣做過，但是也不是清宮的事，清朝宮廷裏面有的使用非常豪華，排場很大，但是清朝內廷裏面是管得相當嚴格的，不是那麼奢靡的。古代的宮廷裏面，男女之防也是很看重的，越到後來越嚴重。真正搞得怎麼樣？婦女沒有地位，中國是一個男權社會，從古來說如此，但是在社會上怎麼男女之大防，嚴格的防範隔絕是南宋以後才有的事情，是理學家搞出來的，這個後來周作人講得很對，就是國家政治越不行，國家越弱，男女之防就越嚴重了。

彭：你看文革那時候就不得了啦，男女問題，只有皇帝可以胡作非為。

鍾：那時候倒還不一定，文革的時候社會上很亂，男女問題也很亂。社會上的生活和讀書人家庭裏的生活又是兩種生活。大院裏面的生活和街道上生活又是兩種生活。彭小蓮你雖然受到打擊，父母都挨了整，但是生活環境還是那個環境，你是大院裏出來的。就像我一樣的，我變成右派，我到街上拖板車，但是

我的生活還是和貧民不同的。我就是完全沒有工作了，我和朱純啊還是的，別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一個幹部。你不要以為你很平民，你是這樣認為的，你不要這麼認為。

彭：我身上沒有大院子弟的氣息。

鍾：你是後來有了自己的觀點，你認識上有了變化，不是生活上得到的變化，看得出來，你這個人是在大院裏面出來的人，就是走出來的人。我原來也不是平民世界中的人，但是我了解他們，好比我在勞改隊裏面，我跟扒手他們是挨着睡的。但是我永遠不是扒手，他們的生活我沒有，思維方式我不是他的，我只是了解他們，我還是一個讀書人，雖然我也沒有讀什麼書，實際上，我在學校裏面的時間只有六年。法國的小市民不是赤貧，和工人不同的，小市民是有產的，是有產者，並不是無產者。

彭：那也不是中產階級。

鍾：比中產階級低一點。小市民，有的中產階級也算小市民，在意識形態上，因為他不是社會精英，不是高級的人士。高級人士不一定有錢，他沒有錢，但是他是那個階層的，精神貴族。

彭：是啊，我們現在一天到晚講貴族不貴族的，講他們吃得怎麼樣，生活做派怎麼樣。這無非是留下來的生活習慣，他們即使很窮，拿着破搪瓷缸子，也會燒咖啡喝，會在那裏看書。就像吃飯，這麼簡單的飯菜，你們家每一個人也要弄兩雙筷子，很講究的。

鍾：兩雙筷子是朱純的規矩，我是按照她的生活習慣，就是我和她兩個人吃飯，也是每人兩雙筷子。

彭：所以這個跟窮富是沒有關係的，就是曾經有條件地生活過，留下的習慣。學不會的。

註釋

- 1 據朱正先生自傳《小書生大時代》，抗戰時朱先生的父親在耒陽的國立中正醫院任會計主任。
- 2 《新階級》(*The New Class*)是吉拉斯(Milovan Đilas, 1911–1995, 舊譯為密洛凡·德熱拉斯)所著。吉拉斯原為南斯拉夫共產黨四巨頭之一，地位僅次於鐵托(Marshal Tito)、卡德爾(Edvard Kardelj)，在蘭柯維奇(Zoran Rankovic)面前，被公認為「第三號人物」。

關於「四十八條」

到1957年的時候，鍾先生的人生經歷，才走過非常短暫的一段，那一年，他26歲。可是，在他所作所為的蛛絲馬跡裏，預示着他這個人，本身就是一個神話故事，當代神話。此時他還沒有見過大海，他沒有走出過閉塞的長沙市，他是在「一畝三分地」的農村長大，最多看見的是汨羅江，還有家門前的小溪小橋，可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已經走向很遠很遠的地方，越過大海去尋找卡夫卡 (Franz Kafka) 的《城堡》(*Das Schloß*)。他繞着《城堡》走，沒有人給他啟示，外牆高大，他根本不知道城堡會是什麼模樣，他甚至不知道有一本書叫《城堡》，更不知道作者「卡夫卡」的名字。他的故事變成了卡夫卡的現實版，他在夢魘裏得到了啟示，成了卡夫卡《城堡》裏的K，他就是想進入《城堡》，因為他覺得那裏有「民主自由」。他犟頭倔腦，誰都勸阻不了他。直到老了，直到老年羅章龍見到他時，一眼就判斷出眼前這個中年人，依然是一頭「湖南騾子」。

一九八八年八月，我帶着岳麓書社出版的《椿園詩草》到北京去看羅章龍。他已被安排到中國革命博物館當顧問，住上了「部長樓」，很熱情地接待了我，主動給我寫了這幅字。寫的詩是《椿園詩草》中〈炎冰室雜詠〉九首之六，我看過了幾遍的，於是便笑着問他：

「下一首還有兩句，『眾口悠悠安足論，吠堯桀犬本尋常』，看來你老人家的牢騷不小呀！還有『炎冰室』這個齋名，對世態炎涼恐怕也深有感觸吧！聽說你老早就申請恢復黨籍，不願跟李達那樣重新入黨，結果並不順利，是不是啊？」

「沒得的事，沒得的事。」他也笑着，連連搖手。

「你老也不想想，建黨黨員，三屆中委，你老這樣的資格，若是恢復了黨籍，位置又怎麼好擺呢？」我還是笑着問。

「沒得的事還要問，你也是匹湖南騾子，太倔了。」話雖如此說，他仍然滿面笑容。「語不驚人應便休」，看來他真是「休」了，一切都放下了，想開了。

（鍾叔河《左右左·羅章龍書自作詩》）

可是，鍾叔河很多事情肯定是放不下想不開的，他是太「湖南人」了，更印證了羅先生說的「湖南騾子」。他就是在吃了那麼多苦，文章被批判，又被退回來。但是他還是要自由，要個人的空間。鍾先生是最後的民國教育長大的一代，他讀的舊書、古書，同時他們也接觸到「五四」新文化，回頭來看中國問題在哪裏，會帶上「新」的視角。

「五四」的新文化，影響了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以文化中的「新」，那種世界的視野，那種走出傳統的制約，那種個性的解放，呼喚着年輕的鍾叔河，呼喚着中國的知識分子。所以，對於「新」，知識分子是情有獨鍾的。要把那些陳舊迂腐的理念打垮，必須翻它個底朝天，那才叫痛快啊！行路上遍地荊棘，「肖澗秋」那樣的人物，會犧牲自己的愛情，去挽救一個寡婦的命運。世界的未來，一定是比過去好。他們像吃了鴉片一樣着迷，在那種幻想裏，迷迷糊糊卻信心十足。1949年，「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啦！」又是一片新氣象！這一次，是全「新」的社會主義文化，遠遠超出了「五四」的「新」，「五四」充其量不過是一種思潮，但是社會主義文化，是把以往的一切傳統文化徹底切斷，非但切斷，新制度和新法律把以後的一切「新」都確定與合法化了。文化，已經不再是一個個人修養的東西，它劃入體制的建設，它要為體制和社會服務。一切與文化有關的事情，都必須由組織決定！

鍾先生不懂，他完全不能意識到這個「新」與以往文化的本質的區別，只是本能地對自己私人生活被人管起來，看書沒有自由，讓他渾身不舒服。到了年底，又要寫鑒定，人人過關，這到底是為什麼？他還是沒有意識到，這就是「新」，這是與「五四」的新沒有任何關係，雖然說的都是與「傳統決裂」，可訴說的未來和現實並不相同。只是，沒有人在質疑「新」的價值本質，誰會想明白，「五四」的新文化是和體制沒有關係的。

但是，思想改造來了，鍾叔河的「自由散漫」、「小資產階級情調」，必然是屬於「改造」範圍，因為他們的追求與組織的

觀念發生了矛盾，看郁達夫、周作人、胡適，更是「主要問題」。這裏，我們終於看見了這頭「湖南騾子」，他為什麼就不能改變，不能跟別人一樣？「湖南騾子」的精神，是反向思維的。鍾先生是在問，為什麼我就要和別人一樣呢？我錯在哪裏？

錯，大錯！「錯就錯在你要思想！」這是領導的話。

「我就是要思想。人如果不思想，一世豈不白活了麼？」鍾叔河的回答。

多倔啊，怎麼就是教不會的？他還是沒有意識到，1949年以後的文化，不管是舊的新的，都與傳統文化、五四文化已經沒有關係了。僅僅是一種本能，他渴望自由！看着報紙越辦越難看，主事的人又不會辦報，只會整人。正遇上朱純去省政協會議採訪，聽到幾位老民盟成員提議恢復《民主報》的建議。這似乎中了鍾叔河的願望，他本來就不喜歡在「機關報」工作，聽朱純回家說到這些提議，他就想離開《新湖南報》，他哪裏知道，要辦一份非黨的報紙，也必須是在黨的領導下才可能實現！他完全忘記了，朱純怎麼會從《民主報》安排到《新湖南報》來的？忘了。人很多時候是健忘的，就那麼幾年功夫，記憶力那麼好的鍾叔河居然就忘得乾乾淨淨。他是太鬱悶了，有一點「新動向」，就讓這些小青年興奮，朱純回來傳達信息的本身，就是和鍾叔河有共同的願望。鍾叔河覺得自己的想法是有根有據，不會出什麼問題。不就是想說一點真實的話，否則，報紙、新聞還有什麼意義？

李鴻章掌權，和他不同政見的人可以奏請「殺李鴻章以

謝天下」，李鴻章不能找他的麻煩。人們可以上書言事，湖南人可以講廣東的事情，可以公開講，這就是言論自由。

（鍾叔河《與之言集·啟蒙的作用》）

邏輯變得清晰了，所以鍾叔河對自己不大管束。他說：「這講起來是非常可笑的，因為我這個人呢，是嘴巴管不住的人，我不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有什麼話想說就會說，當然也不會自言自語地去說，那就變成精神病了。另外，別人要我談什麼，對什麼事情發表什麼意見，我也口無遮攔，怎麼想就怎麼說。55年不是搞機關內部肅反嗎？反胡風，反胡風以後，文化機關就變成了一個搞運動的地方了。我當時就被戴上了一頂帽子，成了「肅反對象」，罪名就是「居然說胡風不是反革命。」

鍾叔河的言論漸漸堆積起來，到了1957年，在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前，他是徹底地大逆不道了！

記得，我記得那些鋪天蓋地大字報的景象，雖然我剛剛過了4歲的生日。可是，記憶是清晰的。炎熱的夏天前，父親從監獄裏釋放回家了，暫時沒有安排工作。出了家裏院子的大門，對面就是上海電影發行公司，那裏有一個小花壇，我追隨着二姐去那裏，她在花壇上插上一個小木牌，上面寫着「愛護花木」。突然有一天，那個小牌子被人拔了出來，人家用它在漿糊桶裏攪和着，花木已經蹂躪得不見痕跡；一張一張的大字報被刷滿了花壇後面的牆壁。黃昏的時候，父親牽着我的手走

出家門，在大字報前慢慢地瀏覽着。我什麼都看不懂，可是我記得彌漫在空氣裏、一陣一陣散發着酸臭的漿糊味道。

夏天，來得那麼突然，知了的叫聲一次一次劃破我的耳膜，像是耳鳴的感覺，驚擾着我全部的記憶。陽光把空間照亮了，透明得難以想像，1957年的夏天，大家都是那麼快樂，北京發出聲音了，要大鳴大放，言論自由，可以向黨提意見，還可以任意貼大字報。一片歡樂的海洋，浪花互相追趕着往海岸上衝擊。鍾叔河同樣激動，「開始聽到『百家爭鳴』這個口號時，實在很佩服這用舊瓶裝新酒的本領，卻並不完全清楚此舊瓶的來歷。『百家』出於《荀子》是知道的，司空圖的『肯爭鳴而作怪』卻相當生疏，能想起的只有韓愈那句：『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大家爭先恐後地要發言，似乎是被壓抑得太久了，終於暴風雨可以把海浪高高地舉起。陽光依然照耀在海面上，燦燦發光，那一份炫麗，把年輕人、知識分子都照迷惑了。可是，我的父母沒有被捲入歡樂的海洋，沒有，他們蜷縮着，想辦法躲在角落裏不被人注意，他們喘着粗氣，卻努力把嘴緊緊閉住。他們比誰都害怕，不是因為他們在政治上有多麼「狡猾」，是有人告訴他們，「記住，沒有秋後不算帳的。」從延安整風到今天，記住！

母親說，單位的黨支部開會了，支部書記一張堆滿笑意的臉，誠懇地啟發大家給黨提意見。「啟發」，這是不斷使用的字眼，我並不明白，為什麼要「啟發」，媽媽說：「就是要『引蛇出洞』。」黨員圍着一圈坐在辦公室裏，不光是支部書記，黨支部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母親，因為她是最容易中標的。父親

剛剛釋放，她真的沒有怨氣？就是要從她那裏打開缺口，但是母親沉默着，她驚恐地沉默着，她驚恐，是因為她知道對於一個反革命家屬，連沉默都可以是一份罪行。當我成年的時候，母親告訴我：「他們都等着我，我再不說話，一定會認為我心懷叵測。於是我就說，我有三條意見……天吶，剎那間，屋子裏所有的小本子都打開了，支部書記柯崗同志，她第一個拿起筆在那裏等待。我看了他們一眼，就知道這群王八蛋要害我，那些人的眼睛都爬在我的身上。氣氛變得很緊張，屋子裏靜得出奇……我都被自己發出的聲音嚇了一跳。停頓了一下，我說，第一條意見，我覺得可以把我們工會發放給職員的理髮費，由一毛五，提高到兩毛錢，這樣可以提高職工的福利待遇；第二條，廠門口是否可以打掃得再乾淨一點，這直接影響到我們廠的形象；第三條，要求大家節約用水。我的意見完了。」

接下來，整個屋子開始沉默。母親低下頭，以一種認罪的姿態向大家表示，她這也算是意見。她不能落入圈套，因為父親已經被開除黨籍，家裏的五個孩子需要活下去。

是誰告訴了母親「反右」的內幕？她說，是王一平部長，是那個當初審理父親「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子的上海組織部長。當父親還是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時候，跟王一平在同一個樓面工作，但是他們不熟悉。父親說：「王一平是一個非常清高的人，他很有原則，說話也非常謹慎。」所以，他們互相並不了解，認識竟然源於1955年鎮壓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中。父親作為「胡風反革命分子」在1955年5月19日被捕，由王一平

負責審查。但是在審閱了父親全部的材料以後，他堅持強調：「不能僅憑報紙上的一點材料，就貿然採取行動。彭柏山在30年代，他和胡風是一起在魯迅的領導下工作的。抗戰中期後，他在新四軍與胡風中斷了九年的來往，甚至沒有任何書信傳遞。一直到解放以後，才來往比較密切。但是在這個階段，他和胡風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們之間是有分歧的，並且對一些文藝觀點也是有爭議的，這顯然都是屬於正常的討論範圍。」於是，王一平部長堅持認為，沒有足夠的材料證明父親是反革命，更沒有任何理由判定父親和胡風有什麼反革命和其他非法組織活動。

在一次一次討論父親的問題上，他提出了自己的論點。他不同意給父親作為「胡風反革命分子」處理。於是，上面領導清楚地指出王一平的右傾，政治壓力已經越來越大，王一平也非常清楚自己的處境，他站在邊緣上，依然毫不妥協地說：「是不是右傾，我說不清楚。以後再看吧！但是限時限刻要我把彭柏山搞成什麼分子，我沒有辦法。我看了他全部的卷宗，以及初步審查的情況，我已起草了一份報告稿，連同有關材料都在這裏，請市委另請人去搞吧。」王一平叔叔將所有的調查材料交出以後，退出了肅反專案的領導小組。並且主動請辭，放下了組織部長的職位，保留市委常委，成為上海博物館館長。

當父親釋放回家的時候，在炎熱的夏天，王一平穿着真絲綢的米色短袖衫踏進了我們的家門，他從包裹拿出折扇，不停地扇着。這時候，他跟父親成為了朋友，他尊重父親，尊重父親的為人和學識，他怕父親再出問題，但是他畢竟還是市委常委

委裏的人啊，他能跟父親說什麼？作為一個黨員，他必須堅持黨性，堅持黨的原則。他坐在父親的寫字桌邊上，看着他，父親沒有提問，他們互相注視着，那一份沉默裏，父親已經讀懂了太多的東西。夏天的炎熱，是鬱悶的，那時候沒有電扇，沒有空調，但是躋身在灼熱的安靜空氣裏，還是讓他們之間有一份緊張。王一平只有一句輕輕的提示：「要釣魚了，不要說話！」說完，王一平不停地搖晃着扇子。父親，沒有接話，只是深深地呼吸着，重新注視著王部長（應該稱呼他為王館長了，但還是改變不了以往的敬重，依然直呼其為——王部長）。

回想往事，不論是在白天還是黑夜，父輩都是在自己追求的「共產主義理想」下，被扼制得最甚、最讓人透不過氣時，被專制推進死屋。父親一直有一份後怕，仔細想想，在「反右」前夕將他釋放，或許就是一個「陽謀」，為的是讓他出來說話，讓他捲入監獄以外真實的生活，這樣就可以在他的「言論」裏找到問題，將他重新投入監獄置於死地。但是，王一平告訴他「不要說話！」就這麼一句提醒也好、暗示也罷，終於讓我的父母在「反右」運動中，安然無恙。最讓人感動的是，王一平頂住了巨大的壓力，保護了上海博物館的老先生、老研究員、老知識分子。在「反右」運動結束的時候，上海博物館幾乎是全國唯一的一個單位，沒有揪出一個「右派」分子。只是，王一平本人卻在1959年的時候，被內定為「右傾」，被邊緣化了。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我的小舅舅還是出事了，母

親每每說到這些的時候，就痛不欲生：「你這個小舅舅，我都跟他打過招呼了。他怎麼就聽不懂我在說什麼？我在信上再三再四地告訴他，不要提你父親的事情，不要提他的事。黨做的決定，就是一切！我甚至跟他都說白了，哪一次運動秋後會不算帳的？他自以為14歲參軍就怎麼樣了？最後一直被押上軍事法庭，打成右派。」「他為什麼要送軍事法庭？」「他當時在部隊裏啊！」「他說了什麼？」「他說，你父親是被冤枉的。說黨不能要用人的時候，就管人家叫『幹部』，不要的時候，就是『反革命』。」「就這麼一句話？」「這麼一句話就夠了！等的就是他這一句話！要他去說什麼呢？跟他都說得那麼清楚了，他就是要出那口氣。這不是害了自己一輩子？這就是政治啊！」於是，我這個剛滿27歲、與鍾叔河同年出生的小舅舅，都沒有來得及趕上談戀愛，正要從中尉提拔成上尉的時候，一句話，就把自己的後半生全部毀了。判刑以後，開除黨籍、開除軍籍，押送福建煤礦勞改。

1957年的「反右」運動，就是以這樣一個炫麗的場面開始，以五十五萬人被劃為右派，判刑、流放、勞改而告終。

古書讀得太多的鍾叔河，對歷史的理解，構成了系統的邏輯，但是他不知道任何邏輯是在正常的環境裏才有意義，進入一個荒誕的現實，邏輯，最終會在沒有邏輯的現實裏，變得荒誕且混亂不堪。1957年的鍾叔河對自己的現實沒有任何不滿，26歲的他已經是18級的幹部，家庭也沒有受過任何打擊，他沒有任何需要抱怨的。定了18級不久，又提了1級，成

為17級。當時，他大學畢業的姐姐，只是在市婦聯當辦公室副主任，副科級，只有20級，哥哥也只當了農業廳行政科的副科長。對自己的待遇，他從來沒有意見！但是，級別不能解決他內心的渴望，他平時的言論被人蒐集起來，「反右」運動的時候，又被人揭發出來。揭發他的人，是看見自己的命運出現危機時，要搶先一步撇清自己。定案之前，領導出示了大量打印材料，是鍾叔河的反動言論，有好幾十條，說：「這都是群眾檢舉揭發你的右派言論。鬥爭會上你不服氣，要爭辯。現在拿給你看看，你如果覺得別個揭發的不是你的原話，就可以把你的原話一條一條寫出來，定案就以你自己寫的為依據。」鍾先生覺得「反右辦」整理的這幾十條邏輯混亂，充滿了扭變和歪曲。這次可真地被「引蛇出洞」了，領導問他：「那麼，你的原話和本意是怎麼樣的呢？」

既天真又喜歡按邏輯出牌的鍾叔河回家，把自己思考的東西，認認真真一條一條寫下來，慎重地交給領導，他沒有去貼大字報，沒有！他也沒有明確地向黨提任何意見，因為那時候他的心思，就是在跟朱純和朋友商量着，要趕緊去黨外辦一份報紙，全心全意在想着他們的《民主報》，所以在鳴大放的熱潮裏，如果鍾叔河發了聲音，按他自己的說法，就是「鳴了兩次」。可是，人家不放過他，就是揭發出他平時的「反動」言論，他怎麼也不會想到，自己親手挖開了深坑，沒有人推他，每一條都是他狠狠鏟下的一鍬土，最後是自己陷落下去！這就是著名的「四十八條」。於是，「反右辦公室」的人，憑着這「四十八條」已經有足夠的證據，特為印了一本小冊子。這實在是

鍾叔河的「榮幸」，在反右運動中得到一份特殊的待遇。領導發話了：「如果報社只劃一個右派，那就是你鍾叔河。右派劃多少並沒有指標，有多少劃多少，不會冤枉。即使有冤枉，你這一個總是不冤枉的。只要有一個，肯定不會錯，那就是你。」

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條

鍾叔河

（一）關於自由

1. 自由的定義，就是由自——由自己。每一個人都只服從他自己，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約束，就叫做自由。
2. 自由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物質上的自由，這要發展生產，並且保證每個人都能合理地分配到生產出來的財富，沒有不平等的現象；一方面是精神上的自由，這要開放思想，讓每個人願意怎麼想就怎麼想，願意怎麼講就怎麼講，願意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不要任何的統治。
3. 人類追求的最終目的，就是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放，絕對自由。
4. 精神上的自由，不能有任何的紀律約束，紀律總是限制個人自由，妨礙個性發展的。
5. 理想的社會秩序，要靠道德來維持，不能靠紀律來維持。任何的強制，都不符合自由的精神。
6. 只要真正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都創造了絕對自由的條件，

人性自然可以得到完滿的發展，社會上也就根本不必要有紀律之類帶強制性的東西了。

7. 如果只注意發展生產，消滅剝削，保證人們物質上的自由，而對人們精神上的自由不予重視，那就還是不夠的。
8. 對於一個有知識的人來說，精神上的自由，有時比物質上的自由，來得更重要。
9. 強調領導就必然減少自由。有領導的自由，不可能是充分的自由。

(二) 關於民主

1. 民主既然是人民在政治上做主的意思，那麼政治就應當完全由人民直接管理，不能夠有任何更高的權力機構，不能夠有權威。
2. 民主不應該有限制，越多越好。政治上越民主，越讓人民直接作主，就越合理想。最理想的政治，必須是極端民主的。
3. 理想政治的標誌是：(1) 一切政治問題，都由人民直接出主意，不由任何「領導」方面出主意；(2) 政治機構辦的一切事情，都應該是人民提出來的，合乎人民當前要求的，沒有一件事情是政治機構向人民提出，反而要求人民服從的；(3) 政治機構的人員，完全由人民決定，向人民負責，他們除了人民以外再沒有任何「領導」需要聽從。而最

理想的政治，則更進一步，根本不需要政治機構，一切政治都由人民直接管理，只設必要的辦事機構執行具體事務就行了。

4. 民主就是人民對政治的要求，就是目的。把民主當成達到目的的手段，必然不可能實行真正的高度民主。

5. 民主的基礎是個人。集中當然需要，但如果強調集中，強調個人服從集中的意見，民主便削弱了。

6. 民主的政治形式是自治，自治的單位越小越好，這樣才便於人民直接作主，避免集中帶來的矛盾。任何形式的集權，都是阻礙民主的。

7. 政治決定由領導上作，作出後再自上而下貫徹，推動群眾實行，這不是民主的方式。即使領導是代表人民利益、為人民服務的，但這種方式畢竟不是群眾說了算。

8. 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沒有高度的民主政治，哪怕經濟上再強大，也是沒有很大吸引力的。

（三）關於無產階級專政

1. 奪取政權的時候，專政是必要的。革命勝利以後，就應當一步步擴大民主，一步步縮小專政。

2. 強調專政，勢必會限制民主、自由、使人民不能夠享受更多的權利。

3. 強調專政，政權就很難完全放在人民的監督之下，就容易脫離群眾，產生官僚主義。相反的，若不強調專政，只強調民主，把政權完全放在人民的監督之下，官僚主義就不會產生，產生了也會馬上被消滅掉。

4. 現在革命已經勝利，反革命分子已經不多，專政的職能交給少數專門機構掌握就行了，不必要當成整個國家、整個社會、全體人民的任務。否則的話專政就會擴大化，引起沒有根據的鎮壓。

5. 鎮壓、暴力、強制，總是不好的。進行革命的時候，為了消滅剝削壓迫，必須以暴力對付暴力，這倒可以理解。革命以後就應該盡量少用這類辦法，除非在不得已的情況下。

6. 一定要在專政結束，一切專政機構全部消失之後，才能出現理性的社會——真正民主自由、個人徹底解放的社會，也才有完全的社會主義。

7. 社會主義革命完成了，階級已經基本消滅，大家都是勞動人民了，何必單單提無產階級專政呢？專政的對象只剩下少數殘餘反革命，提「革命專政」還準確一點。

(四) 關於黨的領導

1. 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要實現自己的綱領，貫徹自己的路線，應該靠自己的工作，在政治上、思想上去影響人民群眾，影響政府政策。這樣的領導，才是不帶強制性的，合理的。

2. 黨不應該成為決定國家方針大計、向人民發號施令的政治機構。因為如果這樣，黨就不是處於一個政黨的地位，就變成了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變成了政府之上的政府，不合乎民主的原則。
3. 政黨的活動，主要應該在政治方面。對於人民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黨的領導只要注意掌握一下政治方向就行了。黨沒有必要領導一切，干預一切，這樣反而會削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領導。
4. 黨員在國家、社會中的地位，應當和普通人完全相同。每一個部門，每一個單位，都一定要由黨員來貫徹、執行領導，是不合理的。
5. 無論在哪一方面，領導者都應該由業務最熟、能力最強的人來充當。如果黨員不是業務最熟、能力最強的人，就不應該充當領導者。
6. 政治上、思想上的領導，這是黨的任務。但這也只能通過宣傳，通過教育，通過黨員向群眾進行解釋說服，使群眾自然地接受黨的思想影響，贊同黨的政治主張。然後，再通過人民群眾，影響政府的政策，保證黨的綱領、路線在國家中實現。不應該首先就肯定黨的領導地位，要求群眾必須服從黨的領導。
7. 太看重黨在一切方面的領導地位，要由黨員在每個部門、每個單位實行領導，就容易產生宗派主義。

8. 黨只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並不能完全代表人民。黨的主張人民也不一定百分之百地接受，如果非叫人民百分之百地接受，就會發生矛盾。

(五) 關於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列主義理論

1. 社會主義是一種人類進步的政治觀念，在共產黨出現以前早就產生了，並不是共產黨發明的。共產黨不過是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理論而已。
2. 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學說的一派。除了馬列主義以外，社會主義學說還有別的流派，像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它們也許沒有馬克思主義這樣科學，但也是真心要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也出過許多仁人志士的，把它們說成反社會主義是不合理的。
3. 就是馬列主義，也有一些不同的流派。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但它的路線、政策和蘇聯共產黨就有很大不同。
4. 究竟哪一派理論更正確，哪一條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更正確，現在還很難作結論。比如說，蘇聯就不一定比南斯拉夫正確。
5. 應該讓一切的社會主義流派，都能夠充分宣傳發展，實行它們的理論，這樣才可以顯出優勢。即使是共產黨絕對正確，也應該吸取別人的好的經驗。

6. 馬克思主義是一百多年前的產物，不隨時修正就不能保持正確。列寧把它修正了一次，但列寧的時代也過去三十多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南斯拉夫又把它修正了一次，可是原來斯大林卻不承認。現在證明，南斯拉夫的修正是對的，是馬列主義的新發展。

7.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如果不准修正，就會僵化，變成教條，反而要束縛人的思想。

8. 社會主義的基本概念，就是一切不平等的消失，人類的徹底解放。所以，自由、民主和社會主義是沒有矛盾的。

9. 只要贊成社會主義，思想、觀點和理論，應該隨人們去建立，去創造。不應當只允許一種思想、一種觀點、一種理論存在，這會窒息人們的思想意識，形成教條主義的統治。

(六) 關於階級鬥爭和知識分子問題

1. 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但能夠看出歷史發展前途，掌握歷史發展規律的是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一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有時可以超過同時代的千百萬人。

2. 歷史上一切的重大事件，都是知識分子領導的。工人、農民領導的也有，但那樣的工人、農民也是成了知識分子的工人、農民。

3. 勞動人民的確是基本的政治力量，但只是「自發的力量」，而不是「自覺的力量」，他們需要知識階層的啟發和引導。知識階層是社會的精神領袖。

4. 階級鬥爭的過程，往往也要受作為啟蒙者的知識分子的影響。俄國工人階級的力量沒有德國、法國的大，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沒有印度、日本的大，但是俄國和中國的工人階級卻革命得早些，這就是啟蒙者的作用。

5. 知識界——知識階層是獨立的，不屬於任何一個階級。地主階級的人也好，資產階級的人也好，工人階級的人也好，當他成為了依靠自己的知識生活、在思想領域裏進行活動的人以後，他就不再屬於自己出身的階級，而是知識界的一員了。當然，好與壞、善與惡、先知與後知、進步與保守、革命與反革命，這樣的區別在知識分子中是有的，但也是知識界內部的區別。

6. 不應該要求知識分子按照工人階級的面貌改造自己，那樣就會沒有知識界。相反的，倒是要使所有的工人、農民都成為知識分子，形成全民知識界。問題只是在於把知識分子吸引到進步這方面來，這也要通過知識分子自己去進行。

7. 進步的、有理想的知識分子，對於勞動群眾有兩方面的責任，一方面要了解他們，願意使他們和自己一樣得到徹底的解放，另一方面要啟發他們，引導他們努力提高知識水平（這是人類徹底解放，特別是在精神上徹底解放的前提）。至於向勞動群眾去學習，那是學不到什麼的。

（鍾叔河《小西門集》）

抄錄下六十年前(1957)鍾先生寫的四十八條，那時候他26歲，一個年輕人，在他面前沒有太多的人生閱歷，他健康的身體、敏捷的感知都對自己充滿信心，誰都不要想讓他停止思考，誰也不可能剽竊他的智慧。即使是幼稚的思考，那也是他個人的。他發出一點微弱的聲音，沒有錯誤，他既沒有具體地指責某個人，更沒有具體的物質需求。完全是一個年輕人的熱情，在那裏追求着空泛的「自由 / 民主」。沒有人跟他互動、爭議，他甚至有點自說自話了「人類追求的最終目的，就是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放，絕對自由」。不管鍾先生說了什麼，他的立場還是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上，他還是充滿誠意地在為黨出謀獻策，他要求的「絕對自由」，可能也是他對「共產主義」的理解，這些自由和民主都被鍾先生塗抹上了濃烈的烏托邦色彩，他根本不曾想到，這樣的渴望是沒有天日的；這樣發出的祈求會成為乞丐的哀嚎，因為土壤沒有賦予他條件，人們為自己建立了「神靈」，才會產生呼喚，它本身就是對「民主和自由」的一次否定！

不久，當運動進入尾聲的時候，他們這些右派分子無一不被拉上協操坪廣場時，那該是趨趨草抽穗的季節了吧？小時候他要趁父母不在家的時候，偷偷鑽進這個協操坪，內心充滿了喜悅和緊張，懇請家裏的傭人保密，他可以在這裏和其他小男孩用趨趨草鬥蟋蟀。還可以把趨趨草「挽成結子，兩個小孩各執一莖，將結子穿在一起，拉扯看誰先斷，以定勝負」。他也喜歡一個人躺在野草上，看天上雲彩的變幻，聽草中小蟲嚶鳴。但是，他從來不會想到，當他在26歲的時候會被人像畜生一樣拉上這草坪，雖然那時候已經成為體育場。

反右鬥爭的後期，省直機關在省體育場召開大會，右派分子也被召參加。我們機關的五十多名右派列隊入場，正站在那裏等開會。忽然有個右派大聲向監管人員報告，說另一個右派站在隊伍裏讀俄文字典，「不像接受教育的樣子」。本來那個人只是默讀，並沒出聲，眾目睽睽，誰都不以為怪。這個當場做出積極「接受教育的樣子」的右派分子的公開舉報，使得所有人包括監管人員在內都為之愕然。我原本誠惶誠恐在準備聽候處理，這件事卻使我猛然覺得世間竟有如此之醜，正如二十多年前在此猛然覺得世間竟有如此之美一樣，感慨係之，本來想努力接受教育的心思反而淡化了。

（鍾叔河《念樓集·協操坪》）

1957年，鍾先生從民國走來只有八年，那個讓他痛恨的國民黨統治的國度，卻是讓他完成了扎實的文化教育。根據這些教育，他還是沒有清楚地意識到，新時代是不一樣的，以為發聲是人的本能，他也沒有任何行為，發出一點聲音又能怎麼樣？即使是李鴻章，晚清的時代，人家都可以奏請「殺李鴻章以謝天下」。他更沒有想明白，烏托邦是「未來式」的，沒有人看見過，你呼喊的聲音，可能會把你帶入地獄。不要把自己和動物做比較，以為自己是「人」就可以發聲。儘管烏托邦的天堂給過鍾先生這一代年輕人很多夢想，總是在悄悄地說，有一天，這美好的未來一定會到來的！這是荷爾蒙的騷動，那陽光燦爛的天空，那小橋流水的河岸，還有綠色草地的森林，都是跟着情人走出來的幻想。最終，最終是幻想者疲憊的喘息。他還是年輕，太年輕，這樣的新社會沒有人經歷過，他犯下大

忌！即便是今天重讀「四十八條」，我還是覺得緊張、懼怕，他要求得太多了，他的存在，揭示出黑暗的日子，那些抹去了時間的日子。在他發聲的年齡，我要「成熟」得多，我連思想都是會自覺地去禁錮，我不想那麼多，我沒有要求，我撕去一頁一頁的日曆，我逼迫着自己不要看見歷史，我不想思考，我會像動物一樣活着，為了活下去。原來九斤老太說的「一代不如一代」，是這樣誕生的。

抄錄下往事的記憶，我們依然像站立在拐角上，我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樣的選擇？夢想，幾乎帶着可卡因的迷幻，太瘋狂了。對自由、民主的渴望，這都成了超現實的要求。鍾先生還舉例說到了南斯拉夫，一個遙遠的國度，現在這個國家都已經消失，90後的讀者，完全不知道「南斯拉夫」出現在「四十八條」裏，到底意味着麼什麼？

晚年鍾叔河在回答《瀟湘晨報》的記者時，對自己的評價是：「我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如果按照魯迅〈聰明人、傻子和奴才〉三種人來劃兩根線，我大概剛好在區分傻子和聰明人的這根線上。因為剛好在線上，所以算不上聰明，還有一些傻氣，如果不傻，1957年就不會當右派，1970年也不會坐牢。」說這些話的時候，鍾叔河已經非常坦然了，他把自己的「錯誤」認識得很清楚。

為什麼說羅章龍判斷的「湖南騾子」是正確的？因為他始終站在傻子和聰明人的中間，他沒有移位。直到二十一世紀到來的時候，2008年，鍾叔河準備出版他的散文集《小西門集》，他收入了這「四十八條」。

出版社卻要求刪去幾條，或者修改詞句。我不肯，要全文照錄。這不是說我現在還是有那樣的觀點，許多看法有了變化，但大的方向並沒有變。結果，換了幾家，耗了三年多，才公開出版。在「四十八條」的前面，還有一篇〈錯就錯在要思想〉，那是當時報社主持「反右」的一個人對我說的原話：「你錯就錯在要思想，要胡思亂想。」的確，對於視自由民主為洪水猛獸的人來說，我的思想確實「胡思亂想」。但胡思亂想又有何罪？所以，我後來常常對人說，被《湖南日報》劃作右派，我其實並不覺得冤枉。

（鍾叔河《左右左·答客問》）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鍾叔河居然「進步」不大，不管自己當年的思考是否幼稚，他要求還原歷史的原貌，他還是停留在對「自由民主」的思考上。

彭小蓮

活下去

四十多年以後，那個日子還清楚地刻在鍾先生的記憶中：1958年4月26日。這一天，《新湖南報》召開全社大會，宣布了報社內部的右派分子名單，共五十四人，占編輯部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包括前社長、副總編輯及大部分編委在內，都是報社的業務骨幹。很久以後，他才知道，新湖南報社的反右派鬥爭是全國新聞界的第一大案。1993年出版的《湖南省志·新聞出版志》這樣評價新湖南報的「反右鬥爭」：「株連之廣，比例之大，損失之重，全國新聞界無出其右。」

當年報社的副總編輯孟樹德「真可謂志得意滿，一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樣子」，一口氣宣布了歸屬六種處分的五十四名右派分子的名單，而給予鍾先生的「判詞」是：「右派骨幹分子，也就是極右分子，家庭和個人出身雖不算反革命，但思想極端反動，也差不多了。」被處以六種處分中的最高級：「情節嚴重態度惡劣者送勞動教養，其中情節特別嚴重、態度特別惡劣者，並開除其公職。」而同樣劃為右派的妻子朱純，原定為第二種處分：撤銷原級別，發給基本生活費，監督勞動。但

是，這位副總編輯特別強調，上級對於朱純的處理決定不滿意，認為她這樣的人不應該僅僅是監督勞動，也應該送交勞動教養，於是「照辦」。

整整六十年後，當我在電話中間起87歲高齡的鍾先生，當年反右的情形，他首先就向我仔仔細細地解釋了一遍，對於右派分子的六種處理決定，也許找出當年的那份紅頭文件，你會驚訝地發現，他的記憶分毫不差。如果不了解鍾先生和他的家庭在那之後經歷的一切，不了解中國當代史上轟轟烈烈的「反右鬥爭」的殘酷與恐怖，就不會真正理解鍾先生這份驚人記憶的重量。當巨大的災難來臨，所有人都惶悚不堪、不知所措，他仍在努力地保持清醒，試圖在那些幾乎要置他們於死地的冰冷文字間尋找，盡可能地尋找出一絲活下去的生存空間。

早於報社宣布「右派分子處理決定」前，鍾叔河就在民主人士、湖南省文史館館員的父親那裏，看到過一份中央整風反右辦公室的文件，對於右派分子的六種處理決定中，他敏感地發現，第一種處分，即是最嚴重的處分「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之下，在不顯眼的地方，還有一句說明：「本人不願接受處分者，允許申請回家自謀生活，由其家庭和當地居民委員會在政治上加以監督。」但是，在報社的大會上，那位宣布決定的孟副總編輯卻沒有把這句話念出來。

這時，鍾叔河已經打定主意要按照那句話的規定，不去勞動教養，而是「申請回家自謀生活」，他意識到這是他在沒有選擇時，唯一可做的選擇。事後證明，這個決定堪稱「英明」！2017年5月，在鍾先生長沙的「念樓」，又談起這段往事，彭小

蓮導演和我都不得不感慨，稱讚他怎麼這麼聰明，在那種所有人都敢不「堅決服從組織決定」的情況下，還能做出這種迴異常人的決定。他還是不緊不慢地用他的湖南話說：

他已經不要你了，你還去幹什麼？他已經把你開除公職，勞動教養了。我當時講我要遠離他，要離開他越遠越好，像搞高壓電的電工一樣的，要穿絕緣服。要害部門，就是要害你的，把你害掉。

一句話說得我們哈哈大笑，這就是鍾先生！

笑聲迴盪在他灑滿陽光的寬大書房裏，但是我不敢回頭看，不敢多想，因為身後是那一個黑暗得深不可測的時代，一句話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生死的時代。

那時的鍾叔河不敢把「處理決定」裏的這句話告訴其他右派分子，怕萬一有人告密，這條唯一的「生路」就堵死了。他只偷偷告訴了兩個好友、同被打成右派的李長恭和朱正。李長恭說他在長沙舉目無親，無處落腳，只好接受處分去勞教。朱正原本打算提出申請，但老父親擔心他留在長沙，會繼續跟鍾叔河往來，害怕再引起什麼「禍端」，勸他還是接受勞教的處分，他只好聽從。

朱純懷着個大肚子，身不由己，只得聽我安排……

父親是一個讀書不少但對世事了解不多的書呆子。一九五八年，我被打成右派開除，要送勞教，按「政策」可以申請回家自謀生活。找父親商量，他卻說：「我看去勞

教也沒有什麼不好，就當成是出國留洋好了。」從前有條件的人家，子弟結婚生子後，才會送出國留洋。這時我也結了婚、生了孩子，所以父親這樣說。他以為去勞教和去留洋差不多，都是離家幾年再回來做事，我真被他弄得哭笑不得。我只好對他說：「我和朱純都去了，小孩子你們帶得了嗎？何況朱純就要生了，我怎麼能去！」他說：「那麼好吧，你就申請回家罷，用我的口氣寫個報告給統戰部，只說我今後不請女工了，由朱純照顧我。你自食其力，我幫你養小孩。」

（鍾叔河《小西門集·錯就錯在要思想》、
《左右左·父親的淚眼》）

報告交上去後，鍾叔河就開始在附近的街道上找房子，等最終的申請得到報社批准之後，他立刻帶着朱純和孩子們從報社宿舍搬出，從資深編輯、國家幹部變為一無所有的底層庶民，開始了他在長沙街頭尋找生計的「新生活」。

而《新湖南報》右派分子們的悲慘命運才剛剛開始。

黃德瑜，五十四個右派分子中最早自殺的，他在一次批鬥會後，只穿着短褲和拖鞋出走，從此再無音訊。當時曾多方尋找，都沒有找到。直到1979年全面解決右派分子問題的時候，他都沒有出現，人們認為他必定早已不在人世了；

歐陽楠，在農村監督勞動中自殺；

李長恭，被送往長沙新生電機廠勞動教養，未婚妻被迫和他分手。1960年的一天，他加班到深夜，因為肚子餓，想把

次日的早餐換成當天的夜餐提前吃，去請示事務長，被睡意正濃的事務長大罵，並被定性為企圖利用糧食困難製造反革命暴亂，判刑十二年，在坪塘新生水泥廠服刑。文革開始，再遭批鬥，他終於厭倦了，跳崖自殺。

文化大革命中，新湖南報右派分子中的「黨內右派小集團」裏的一些人串連起來翻案。但鍾叔河和朱正都不相信文化大革命能給人以公道，不相信翻案能成功，都採取了旁觀的態度。最終，翻案人員中的蔡克誠被報社的造反組織關押、毆打、凌辱，自殺身亡；劉鳳翔因翻案被判刑十五年，並於1970年以反革命集團罪被槍決……

努力躲開了「要害部門」的鍾叔河同樣要面對生存危機：原本夫妻倆作為國家幹部，兩人合計月工資接近一百八十元，而此時已全部歸零，要養活三個嗷嗷待哺的年幼女兒，以及即將出生的第四個孩子，顯然是不可能的。

被打成右派之前，鍾叔河和朱純的生活是十分瀟灑的，當時兩人的收入在長沙都可以稱得上是中上水平，工資大部分都買了書以及請朋友吃飯，沒有留下什麼積蓄。鍾叔河帶着家人從報社宿舍搬出的第一天，就回到了父親家裏，母親看着他這一家人，憂慮他們未來的生活，埋怨他們當初不聽勸告，不知道存一些錢，這下讓自己的生活陷入了困境。鍾叔河聽了這樣的話，雖然能理解母親的心情，但還是負氣地立刻上街找房子，決定搬出父母家。

這時的朱純離預產期只有兩個月了，《新湖南報》人事科讓她暫時住在一間廢棄的小澡堂裏。於是，朱純讓鍾叔河帶着

兩個大一些的孩子暫時跟年邁的父母同住，自己則帶着三女兒住進澡堂，白天在報社的家屬工廠折書頁子。1957年8月中旬，朱純在鄰居老保姆的照顧下，順利生下他們的第四個女兒。產後四十天，朱純找到報社人事科，希望繼續在家屬工廠做下去卻遭到拒絕，並被勒令馬上搬出澡堂、自謀生活。就這樣，朱純帶着還在襁褓中的孩子，在好心同事的介紹下，在一家街道工廠打工。晚上，她就帶着兩個年幼的孩子借住在租來的房子裏。

終於，鍾叔河找到了房子，暫時安頓了一家人。這時，孩子們不能再去報社的幹部幼兒園了，送去其他幼兒園又負擔不



圖八 1957年，鍾先生和朱純帶着兩個女兒與鍾先生父母、姐姐們以及大姐的女兒合影。

起，幾經周折，決定讓朱純的姐姐把三女兒帶到南京，兩人外出打工時，就把孩子交給母親，晚上再把孩子接回來同住。即便如此艱難，他們也還是不願意跟孩子們分離，回家要陪孩子玩一會兒，還要帶着她們讀會兒書，給她們講《快樂王子》的故事：

「為什麼你不能像快樂王子那樣呢？」一位聰明的母親對她那個哭着要月亮的孩子說：「快樂王子連做夢也沒想到會哭着要東西」。

「我真高興世界上究竟還有一個人是很快樂的。」一個失意的人望着這座非常出色的像喃喃地說。

天真的孩子無法明白這些「快樂」故事背後有怎樣的陰雲。那一段艱辛求生的日子，在鍾叔河二女兒鍾亭亭的童年記憶中，竟都是快樂的。她說爸爸就是比較樂天派的人，總看事情好的一面：「他從來沒跟我們講過什麼苦，痛苦啊什麼。」那時她從未覺得自己的家庭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她記得一開始，爸爸獨自帶着她，從不會做家務的爸爸弄一盆麵粉，加點水和一和，沒有白糖就加點糖精，在爐子上蒸熟了，切成幾塊，就是父女倆一天的伙食，那黏黏的、有一點點甜的麵糊塊；她記得爸爸帶着她們出門看電影《孫悟空三打白骨精》，沿着鐵路走了很久很久，電影很好看，大家都笑得前仰後合，突然，整塊白色的銀幕坍了下來……她記得陽光燦爛的日子裏，爸爸會想到請人來給全家人照一張合影，把椅子搬到小院子裏，用媽媽種在院子裏、竄得特別高、開得特別燦爛的菊花做背景，爸爸媽媽坐好，讓女兒們站在他們身前，「笑啊，要笑啊！」

照片上的每個人都笑得很開心；她記得那時屋子裏常常都會響起歡笑聲，爸爸又在講笑話了。

孩子安頓了，生計問題就成了首要大事。鍾叔河在大街上看到當時運輸貨物還是以板車為主，有一條街聚集了很多拖板車的人在那裏等活兒，他覺得自己也可以試一試。當務之急是要置辦一部板車，雖然手上的餘錢買一部板車還是夠用的，但是自己租住的房子和父親的家裏，都沒法把板車拉進去存放，放在屋外又生怕被人偷了。權衡下來，他決定先去找有板車的老闆，做臨時工——到了上坡要費力的地方，幫忙推車，一次掙幾分錢。

鍾先生在街上拖板車的細節，在他寫過的文章裏我沒有看到過，是在一次電話採訪裏，他一點點說給我聽的。電話通話品質不佳，聽筒裏始終有「刺啦刺啦」的雜音，鍾先生緩緩講述着他的「生意經」：

我開始做的事情是推板車，（當時）長沙城裏面的運輸貨物，還是以板車為主，人力拉的，承載物品的是一個木方格子的平板，把東西放上面用繩子綁住，人力去拉動，輪子也是一根鐵棍子，一個木輪子，這麼滾的，沒有用軸承，沒有彈子，不能滾動摩擦，輪子也很小，大概直徑只有一尺多，輪子小就拖不重，大概一副板車只拉幾百斤東西，還是可以拉動，人的勞動力是要付出很多的，所以它有時候需要人幫助他到後面去推。街道並不是永遠是平的，有時候要上坡，有的路面不平。有的單位本身養了拖

板車的人，有的則是臨時喊人拖。居民在生活中，有時也要拖板車，所以那時候拖板車的有蠻多人，還有不少給拖板車的人臨時幫忙，去幫他推。跟了一個車夫，跟了一個車子，只是在上坡費力的地方，幫他推一下，給你幾分錢。搞了一下呢，覺得這個錢很累，很難賺到，賺的錢很少。你要去推，他望望你，不是一個下力的人，沒有力氣。他要小孩子，小孩子便宜，隨便給他一點錢。或者找老的，他看到那個人是一個老推板車的人。其實我總是用全部力量去推的，因為要生存，要他讓你做嚟。他不要你，你沒有辦法去推。這個錢靠它是養不活家的，要養活自己還要養活小孩。

忽然我發現，不知何時我已經哭了，冰涼的眼淚就掛在我臉上，我努力地控制着自己，在這麼頑強的人面前，盡量顯得不那麼矯情。我眼前的畫面令我說不清是難過，還是深深的敬佩，又或者只是一種錯愕——我很難把鍾先生精神上的高傲和這種完全在泥土裏掙扎的生活聯繫在一起：一個高瘦的白面書生，用盡了全力去推動一輛沉甸甸的載滿了貨物的板車，也許身邊的車老闆還挺不高興地抱怨着：「你這個人啊，會不會推啊，我看你都沒什麼力氣啊！」板車歪歪扭扭終於爬過了高坡，書生氣喘吁吁地靜立一旁，用他那雙瘦長的手接過車老闆給的幾枚輕飄飄的分幣……

慢慢地，鍾叔河覺得幫人推車實在是辛苦又很難賺到錢，還是下決心自己拉板車，一開始依舊很艱難，只能自己拉着板

車去車站、碼頭或者有貨拉的地方等活兒，但留給這些「散活兒」的，往往是一些別人不願意拉的貨，比如石灰、純鹼這種有腐蝕性的貨物，這就需要自己準備好竹簍子裝這些貨物，沒有竹簍子就攬不到這些活兒，但是車上堆了竹簍子，接別的活兒又會變成累贅。於是，在剛開始拖板車的那幾個月裏，非常狼狽也非常辛苦。但是時間長了，因為做事仔細認真、任何受託的貨物都會搞得很清楚、很妥當，鍾叔河竟然也漸漸積累起了一些「老客戶」，客人在一單貨物運完之後會主動告訴他「明天我在哪裏還有一批貨，你去幫我拉」，這樣就有了自己固定的「貨源」。

但是，對於他這樣一個從來沒有做過體力活兒的人來說，最難過的還是「體力關」。最痛苦的是晚上睡覺，每翻一次身都要忍受巨大的痠痛，苦不堪言。我終於忍不住問電話那頭的鍾先生：「在最痛苦的時候，你會不會對自己犯的這個所謂的『錯誤』有後悔的感覺，或者別的想法？哪怕是一點點？」此時，似乎我能看見電話那一頭鍾先生的面容，他以一種我從未見過的嚴肅一字一頓地說：「我給你講真話，我有的，只是憤怒。我沒有什麼，因為我不是偷東西、亂搞，我沒有什麼後悔的，我當時講的話，我認為對，我才講，現在我認為也沒有錯，當時我認為也沒有錯。」鍾先生說，那時他拖着板車，偶爾會在大街上遇到以前的同事，他說：「我又沒有做什麼丟人的事情，我沒有什麼好尷尬的。我就是拉板車。」倒是這些同事會有些不自在，尤其是那些原來跟他很要好的人。

僅僅依靠鍾叔河在街上拖板車掙到的錢，要養活一家人也還是不夠的。朱純就去街道裏跟家庭婦女、老弱病殘一起糊紙盒、製作包裝袋、為一些書籍做裝訂、串線，以此來補貼家用。在艱難困苦的生活中，他們互相鼓勵，頑強地生活着，鍾叔河跟朱純說：「飯還是要吃的，書還是要讀的，要我們死是不得死的。」

他們互相提醒「不能犯無知的錯誤讓自己生病、受傷」，注意出了大力回來不洗冷水澡，幹重活的時候預先脫掉衣服，停下來休息時趕緊披上衣服以防著涼，有時要記得多帶一件衣服，以備汗濕之後替換。鍾叔河發現拖着很重的貨物下坡，人一定不能走在前頭，否則板車溜坡、人控制不住，極容易受傷，那時拖板車的人中常常會因此發生傷亡事故。他特別注意下坡時把車子調個頭，人在車後，拖住車，慢慢地一步步往坡下走才會比較安全。

拖了幾個月板車，他發現一些學校需要油印講義刻鋼板，這個活計明顯比拖板車輕鬆一些，也能多掙一些錢，就轉去攬一些刻鋼板的活兒。一開始，他刻不好，別人一張蠟紙可以掙八毛、九毛錢，他只能掙六毛、七毛。但是送來待印的材料裏出現錯別字，他又忍不住要去幫人家偷偷改過來。時間長了，一些人發現這個人不僅可以刻鋼板，還捎帶着把校對的工作也幹了，於是又成了他的「固定客戶」。就這樣，刻鋼板的活兒最多時他一個月竟可以賺到五、六十塊錢，比拖板車強多了。

有一次，鍾叔河拖着板車在街上走，發現有家繪圖社在人行道上曬藍圖，想到自己高中時的「用器畫」（即：機械製圖）還是學得很好的，心想也許能在這裏找到活幹。於是，他徑直走了進去，問：「你們還要不要人描圖？」有人問他：「你會描嗎？」他說：「我試一下，我能描的。」這人就找了幾張比較難的圖給他，想試試他的水平。鍾叔河又向他們借描圖的圓規直尺，人家怪他：「你連工具都沒有，怎麼描呢？」他平靜地回答：「你們的總要比我自己的好一些吧！」幾張圖描完了，繪圖社的人很滿意，就讓他留下了。

後來，鍾叔河聯絡了熟識的兩位工程師，機械方面的行家，想辦一個小型的街道工廠。好友朱正的六弟在地質局物探大隊被遣散，成了實質上的失業人員，但他跟文藝路街道辦事處的關係不錯，就請他出面去聯繫。

事情很快辦妥了，一塊立新科技模型廠的招牌在蔡鍔北路的一個門面上掛了出來。這個「廠」一共不到十個人，六弟是名義上的負責人，技術上主要依靠兩位機械工程師，王席垣和楊君，這兩位真是從設計到工藝都精通的高手。鍾叔河負責一些公關和策劃方面的事情，也還要描圖。

（朱正《小書生大時代》）

鍾叔河就在這個街道工廠裏，憑着自己在繪圖社裏鍛鍊出來的描圖、製圖的本事，開始繪制起學校的教學掛圖來，農學院、醫學院關於植物、人體器官的掛圖他都畫過。有時繪制的

圖紙需要裝裱，他又無師自通地學會了裱糊。在工廠裏，因為是計件工資，鍾叔河做得又快又好，所以他的工資比別人要高。他畫的圖紙精細漂亮，在「同業」中竟慢慢地有了名氣。

被打成右派以後，鍾叔河感覺到最明顯的「好處」，是終於又有了可以逛舊書店的自由。在報社時，因為愛看舊書不積極學習常常挨批評，年年鑒定都要背着這個沉重的包袱不得喘息。被打入另冊之後，他終於可以放下這個包袱，工餘時間去舊書店「過過癮」了。上世紀50年代末期，長沙的古舊書店已經全部公私合營成了新華書店的門市部，整個長沙市內只剩下黃興南路的一處，而且線裝刻本一年比一年少，但晚清和民國時期的石印本、鉛印本還相當多，鍾叔河在這裏找到了很多胡適和周作人的書，每本大約人民幣三角錢。剛開始拖板車的鍾叔河每月工資只有二十八元，要養活一大家子人，拿出兩、三角錢也很是不易。隨着後來刻鋼板、繪圖等的「多種經營」，他的收入多了起來，買書的手腳又漸漸大了，甚至斥「巨資」三塊四毛錢買了十本一套的《高太史大全集》。

那時買書的經歷裏，最讓鍾叔河引以自豪、念念不忘的，應該算是那本「民國二十五年8月初版」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當時正是1961年秋天，他在古舊書店裏驟然發現了這本聞名已久的「寶貝」，卻被旁邊的一位顧客搶先一步拿在手裏，愛書心切的他這時也顧不得許多，竟然一把從那人手裏搶了過來，那人正要生氣地跟他理論，他卻不緊不慢地跟對方說：「莫急莫急，我只拿這本書問一個小小的問

題。」說着迅速走向櫃檯，問店員：

「你們收購舊書，檢查賣書人的證件嗎？」

「檢查的，大人看工作證，居民看戶口本，學生看學生證。」

「這本書是我兒子偷出來賣給你們的，我要收回。」

店員這時愣住了，只好說：「不行，對店裏有意見可以提，但書不能拿走。」這時的鍾叔河才故作寬大地說：「好吧，意見請你轉達，這本書就按你們的標價，一塊錢由我買回去，就當我沒有教育好兒子的代價。但是你們也確實不應該收購小學生的書。」店員一聽書的「主人」願意原價「回購」這本書，自然沒有二話，迅速收了錢開了發票，這本令鍾叔河「夢寐以求」的書就這樣被他「巧取囊中」。

鍾叔河不僅從微薄的生活費裏擠出錢來買書看，還拿着父親的「高知」特種借書證到省圖書館去借書看，甚至在他拖板車拖得骨頭都散架的時候，還會去借刻本的《金瓶梅》看，用他自己開玩笑的話說：「給10歲時的初讀補課。」書，不僅是他精神苦悶、生活困窘時的避難所，更是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雖然正是因為讀書和思考才給他帶來了這樣的災難，但他卻恰恰因此更覺出讀書的重要，不僅僅去讀，更要用心思考。一開始，他對於自己被劃成右派的命運想不通：「解放前，我是個堅決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革命青年，怎麼會成為『反革命右派』了呢？」正是抱着要弄清楚這些問題的目的，他在勞動的餘暇用心攻讀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書，「自由」地思考中國的過去和未來。他認為今天是昨天的繼續，希望從歷史中找到現實的答案。讀書也給了他對於未來的信心：「一個國家，

一個民族，恐怕不應該也不可能長期和別的國家、別的民族隔絕開來，不能夠自絕於這個世界……長期封閉的社會一旦開放，發生的變化是極其廣泛、深刻而激烈的。人們只要『走向世界』，他的價值觀和哲學就必然發生變化，這是改變封閉造成的落後狀態的強大動力。」同時，他仍然也讀各種各樣的別類的書，天文學的、樹木學的、人類學的、《金瓶梅》……

捱過了最初幾個月的「苦日子」，鍾叔河覺得自己漸漸適應了「右派」的生活，「下水」也沒有那麼可怕，社會上天天有這麼多人在忙忙碌碌地討生活，每個人都是今天賺錢去買明天的米，大家也過得很好，也在快活，也在談愛，生活依舊在繼續。

一次，他父親的房東，一位曾出任過民國時期高等法院院長的老先生，擔心自己家裏的一套好家具遲早會保不住，有意將一張紫檀木雕花炕榻以八塊錢的價格賣給他。鍾叔河看到這件家具做工精良、木材考究，不僅可以睡兩、三個人，還可以空出很大一塊地方堆放他的寶貝書，他向來就對木材有着特別的偏愛，正高高興興想接手，卻被父親執意阻止了。父親害怕「淪為」右派的兒子行事太過張揚，又會因此惹事，這才作罷。這張紫檀炕榻終於免不了被拆毀的命運，被樂器廠買下做胡琴去了。

「反右」、「大躍進」之後，在街道上為了明天的買米錢而終日勞作奔波的鍾叔河，在那個匱乏饑餓的年代竟仍有餘力去體嘗吃的樂趣，記取吃的逸事：

吃油餅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成了真正的高級享受。有一次我從奇峰閣店門前過，見人們正在搶占位子。那時年紀還輕，手腳麻利，疾步向前搶坐上了。沒占到位子的人就站在幸運者的背後，一對一，準備坐第二輪。

大堂內十幾張桌子坐滿人，人後面又站滿了人之後，服務員才慢慢地一桌一桌來收糧票和錢，一面呵斥站着的人讓開些，說是不一定有第二輪供應。……

有次和我同坐一條凳的是位退休教師，交出錢糧後等油餅來的時間顯得特別長，都想尋點話說，他就將「穩準狠」加上「等忍哽」，成為一個「排隊等吃六字訣」：

站死也要等，罵死也要忍。

擠位子要狠，出筷子要準。

夾要夾得穩，吞下喉嚨不怕哽。

及至油餅上桌，即無暇再談，狠準穩哽當場就兌現了。

（鍾叔河《小西門集·吃油餅》）

雖然，「舊書店」裏的尋尋覓覓、不受監視的閱讀和相對「自由」的思考能使人暫時忘卻那個艱難時世，飲食店裏的「等忍哽」能換來片刻口舌的歡愉、安撫疲憊的身心，政治的陰雲卻時刻籠罩着深陷其中的人們。被打入另冊、淪為異類的「右派分子」和他們的家人都在令人窒息的氛圍中戰戰兢兢地苟活着，不知道還有怎樣的命運在等待着他們，而未來又會如何。鍾叔河說：「身為右派，主要不是肉體上的苦。最大的苦是時

時刻刻都有被鬥被抓的可能，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沒有一點兒安全感。」

鍾叔河注意到父親的精神狀態差了很多。最喜愛的小兒子被打成了右派，這讓父親很意外，一個不小的打擊。而在這之前，他是父親的驕傲，年紀輕輕就被評定為17級的幹部，比當時在市婦聯作辦公室副主任的姐姐、在農業廳任職行政科副科長的哥哥級別都要高。在老朋友中間，人們都因為他有這麼一個在報社工作的能幹兒子而特別地尊重他、羨慕他。父親最高興的事就是邀上三五好友，到長沙最有名的館子「玉樓東」或者「萬利春」吃飯，然後叫上這個能幹的小兒子作陪，最後當面替老父親和長輩們把帳結了。鍾叔河說：「父親當時每月有六十多元的工資，這點錢他不是付不出，他只是要讓朋友們看，他有這樣的兒子。」但是一夜之間一切都變了，《新湖南報》頭版頭條，以整版內容、大字標題報道：「本報反右派鬥爭又獲重大勝利／另一個右派小集團原形畢露」，鍾叔河和朱純的名字赫然在目，隨後兩人又雙雙被開除公職，成了在街道上打零工為生的「無業遊民」。父親雖然從未埋怨過他，他們之間也很少就此有什麼交流，但他看得出來，父親因此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壓力。

早在1955年的反胡風運動中，鍾叔河和《新湖南報》的其他三位同事：朱正、張志浩、俞潤泉，僅僅因為有讀書的共同愛好，平時交談略多，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團」，從此四人的命運就這樣被緊緊捆綁在一起，同被打落到社會底

層，休戚與共。

一次，張志浩弄到一部郁達夫詩詞抄本，俞潤泉竟通宵不睡，複寫了四份，裝訂成冊，分送給大家，並在卷首題詩一首：

賞心樂事人人有，數我抄書事最奇。隔宿有糧先換紙，每朝無夢不親詩。

只緣偏愛元溫句，卻是傷心屈宋辭。寫罷富春才一卷，曉風涼霧入窗時。

也許正是有了這些同命運、共志趣的朋友在厄難時的彼此鼓勵，那個非人的殘酷時代才多了一點點亮色和暖意。三十多年後，鍾叔河依然能記得1961年的中秋之夜，張志浩提着一斤月餅來看望他和家人，當時兩人都沒有正式工作，靠刻鋼板為生。閒話片刻，張志浩起身告辭，鍾叔河照例送他回家。兩人在黯淡冷清的大街上默默地走着，一路只有樹梢搖落的秋聲：

張公一直不做聲，我偶爾說句把話，他也只以哼哈回答，於是我也沉默了。出了南門口，路更寬，人更少，法國梧桐的颯颯聲也更響，寂靜中我的心只覺得一陣陣緊縮，張公卻忽然低聲吟詠起來，是一首七言絕句：

今夜誰家月最明，城南城北滿秋聲。
長街燈盡歸何處，蕭瑟人間兩步兵。

「剛作的吧？」我問道。

「是的，送給你的。」

「是首好詩，」我說，「不過這裏只有一步兵，沒有兩步兵，我是既不能酒，又不能詩呀！」

張公不答話，卻低聲吟出了他的第二首詩：

艱難生計費營謀，日刻金鋼懶計酬。

未必此生長碌碌，作詩相慰解君愁。

「也寫得好，只是太樂觀了。」我說，心中不禁淒然。

他勉強一笑，聽得出，笑聲也是淒涼的。

這時已經走到侯家塘的十字路口，為了不打擾住在路旁菜土中矮屋裏的張公妻兒，我們便在路口分手了。

一個人踏着月色回家，夜深了，更冷清，我的心頭卻泛起了一股溫暖。

從那晚起，時間已經過去了三十五年，這兩首詩卻一直存在我心頭，無論在月黑風高的長夜中，還是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裏，它們都是那樣的溫暖，那樣的鮮明。

（鍾叔河《青燈集·今夜誰家月最明》）

然而，那樣一個黑白顛倒的混亂年代，人間的溫情總是那麼脆弱，轉瞬即逝。1960年「困難時期」，鍾叔河一家的日子更加難熬。夫妻倆日出而作地辛苦一整天，才能勉強買回「計劃口糧」供一家人度命。這時四個孩子中，大的兩個放在街道幼兒園，又請了一位老年農婦來幫忙帶小的那兩個。一家人的計劃口糧，還要多擠出一份來供這位老太太。但是一段時間以後，家裏的糧食竟不夠吃了！原來這位老太太擔心自己在鄉下

的孫子餓肚子，竟拿了鍾家的糧食偷偷送去自己家了。這樣一來，鍾叔河夫婦再也負擔不起這位老保姆，但兩人又必須出門打工才能養活四個女兒。萬般無奈之下，鍾叔河和朱純商量，既然實在養不活這麼多孩子，與其大家綁在一起餓肚子受苦，不如把最小的孩子送到孤兒院去撫養。朱純小時候就是在國民黨的孤兒院長大的，孤兒院送她讀了書、培養她自立，她以自己的經驗認為共產黨的孤兒院應該能讓孩子安全長大，接受起碼的教育，有一個好一點的前途，思前想後還是同意了。

送走孩子的前一天，鍾叔河夫婦帶着四個孩子去照相館合影留念，幼小的「四毛」好像預感到了什麼，哭鬧着不肯照相，最後只能塞給她一塊餅乾，勉強安撫住了。第二天，朱純帶着孩子坐三輪車去火車站，車子開動了，孩子的哭喊混合着三輪車的突突聲，鍾叔河淚流滿面，他跟在車後跑了很長的一段路，心痛不已又無可奈何。



圖九 鍾叔河的小女兒「四毛」（前排中）送去內蒙孤兒院前一天，四個女兒的合影。

「四毛」送走後不久，內蒙的孤兒院傳來消息，說那裏條件不錯，小朋友能吃上牛奶、麵包、大米飯，鍾叔河和朱純的心才略略平靜了一些。他們埋頭打工掙錢，計劃着條件好點兒了，就把四毛接回來。然而一段時間以後，國家經濟形勢惡化，孤兒院停辦，更壞的消息傳來，四毛被保育員送給了內蒙農村的親戚。年幼的女兒就這樣無聲無息地失散在茫茫人海中了。

經歷了失去「四毛」的錐心之痛，在物質和精神的雙重重壓下，生活，即便是如此壓抑無望的生活，也還是要繼續。鍾叔河和朱純格外疼惜身邊的三個女兒，他們特別約定好不在同一個單位打工，「雞蛋不要放在一個籃子裏」，這樣一個單位今天要開會學習，另一個單位可能就不開會，可以正常下班，他們倆就總有一人可以早些下班照管孩子。鍾叔河特別擔心孩子們在外面貪玩出岔子。那時鍾亭亭姐妹們特別要記住，無論在外面玩得多開心，爸爸到家之前是一定要趕回家的。否則，暮色中，曲折的小巷深處，就會響起爸爸那熟悉的、拖長聲音又有一點凶的喊聲：「鍾真真，鍾亭亭，鍾楚楚！」鍾亭亭說，小時候爸爸很少跟她們發火，唯一要生氣的事就是他回到家沒有看到孩子們。

1962年，長沙面向省直機關幹部的著名小學一師附小突然面向社會招生，鍾叔河聽到消息後立刻帶着7歲的鍾亭亭去報名，已經認識很多字的鍾亭亭看着爸爸一筆一畫地填着報名表格，唯一讓她好奇的是，在「職業」一欄裏，身邊其他小朋友的爸爸媽媽們填的都是「幹部」，只有爸爸寫的是「自由職業」。當時她想，爸爸的職業最好了，「自由」，多好啊！

鍾亭亭在學校裏成績優異，小學畢業後很順利地考上了長沙最好的中學之一——長沙四中。可是上了中學沒多久，班級裏有幾個男同學總是給她起外號，欺負她，一氣之下，沒有跟父母說，自己辦了轉學。新的學校離家遠了，有天午飯，鍾亭亭回家晚了，看到爸爸難得地掛着臉，不高興了。原來爸爸知道了自己轉學的事。鍾亭亭至今都記得，那次爸爸狠狠地訓了她一頓，但訓着訓着，他自己哭了。那是她第一次看到爸爸流淚，她這才明白爸爸內心深處的期待，「他希望我能在好的學校好好讀書，能夠讀書讀出來。」看着爸爸難過的樣子，鍾亭亭只好硬着頭皮去找自己的班主任，又轉學回到了四中。

1965年秋天，鍾叔河的父親去世了，享壽88歲。一想到父親的晚年，因為自己的右派問題長期擔驚受怕、鬱鬱寡歡，鍾叔河非常難過，父親火葬後回家的路上，左眼突然就看不清了。好在當時的房東老太太也是個學過醫的人，意識到鍾叔河的眼病非同尋常，催促他趕緊到醫院去看病，醫生診斷為高眼壓——青光眼，得到了及時的治療，但在那之後的幾十年中，還會時不時地發作。

一直懸在頭頂的「右派」陰雲，超負荷的生存壓力，與至親的生離死別，每經歷一次沉痛的打擊，鍾叔河和朱純都必須以更加頑強的毅力站立起來，互相鼓勵、攙扶，更努力地活下去，不僅僅在書頁中尋找活下去的力量與希望，更是在這個猙獰冷漠的世界為着幾分錢、幾毛錢、幾塊錢胼手胝足地勞作，在日常的柴米油鹽中努力生存，挺直腰桿、毫無懼色地，活下去。

在街道工廠畫教學掛圖、刻鋼板的過程中，鍾叔河和朱純發現做教學模型更賺錢，就又從零開始學習製作，慢慢地發展到可以自己製作翻砂用的木模，自己繪圖、自己設計。做教學模型的木工活是精細活，手上現有的工具常常不盡人意，鍾叔河在查找資料中發現，中國、日本、歐洲木工鉋的形制都不同，而中國鉋手柄在鉋身中部，左右兩邊用力，刃口出工件時易往下，只適宜粗木工，若細木工則遠不如使用歐洲式的鉋。於是就參考一本德國《細木工作業》書上的圖，利用撿來的「破四舊」砸爛的老家具邊角料，照着製作了兩把細木工鉋。

有了稱手的工具，鍾叔河的教學模型越做越好，幾年內竟成了同行認可的「內行」。當時有規定，街道工廠的技工最多不能超過6級，而朱純成了5級木模工，鍾叔河成了6級劃線



圖十 1967年鍾叔河和朱純在街道工廠做木模時自製的兩把細木工鉋。
(王平攝)

工，他們憑藉自己的能力和人合夥開了一家模型工廠。眼看着通過自己勤勞的雙手，一家人的生活正漸漸好轉，兩位被打入底層的異類分子，終於能在這個充滿敵意的時代，開墾出一條自給自足的生存之路。

誰都沒有想到，一場空前險惡的風暴正在前面等待着他們。

汪劍

與鍾先生閒聊（三）

鍾先生的經歷充滿了戲劇性：他因為堅持出「周作人的書」，讓領導很擔心，被「選下」了岳麓書社總編的位置；周作人的在天之靈很可能不會想到，當年這個拖板車的年輕人，有一天會為他出書。當年這個年輕讀者，向他索求著作和墨寶時，周作人都沒有追問讀者的背景，就給年輕的右派鍾先生寄去了。他只是感念一個愛讀他的書的讀者，誰都不會想到死後的事情……

鍾：給周作人寫信要他的書和墨寶，是當右派拉板車的時候。小時候，他對於我就是書上的一個作家，慢慢知道他跟日本人合作了，開始抗戰後，教科書上就不選周作人了。後來發現了舊書店裏賣他的書，便買了一本、兩本，對他漸漸發生了興趣。解放以後，我到長沙讀高中，又買過周作人的《苦茶隨筆》、《夜讀抄》。這個讀起來就很有味道了。劃成右派，被開除以後，看的書多了些，思索也多了些，才開始有意識地去蒐集他的書來讀。後來知道周作人還活着，就寫信到他家裏，問他要書。這樣就談到我對他文章的理解和尊敬。

周作人的意義在哪裏？在於他是中國舊的讀書人蛻變成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一個標誌。曾國藩就不是。曾國藩的時代，外國人已經來了，容闳帶學生去留學了，這就是曾國藩做的決定。辦江南製造廠，也是曾國藩拍的板。曾國藩要李鴻章出面，他曉得明哲保身，他要李鴻章去搞第一線的事，主意還是他拿的。他已經接觸了外國人，但是對外國人的態度還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他知道中國不變已經不行了，但是他要變的目的也是為了保留舊的體制和文化，曾國藩是舊體制的最後一個大人物。

他不僅僅是一個大文人，也是一個大的軍事統帥，但他是有學術的，有文章在，有他編的書在。而且就在那麼忙的時間裏，編了那麼多書，他也是搞編輯的一個標兵！中國古代的很多大學問家都是大編輯家，孔子他也是述而不作，「刪詩書訂禮樂」，刪和訂都是編輯工作，《詩經》也不是他自己的作品，是民歌總輯，是他選的三百篇，選和編就是編輯做的事。孔子自己沒有什麼著作，留下一部《論語》也是別人記的他的口述、他的語錄，他就是一個編輯。劉向¹也是一個大編輯。曾國藩編的《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都是傳世的讀本，在古文裏面是一派，湘鄉派。

吳汝綸、黎庶昌他們曾門四子，是晚清時候的文章大家，講傳統的文學史都要講這些人。所以曾國藩是舊時代、舊文化的集大成的人。但是研究曾國藩的重點是什麼？舊文化發展到同治、光緒年間，已經是晚清，已經千瘡百孔了，沒有再生能力了，只能拆屋重來，慢了一步，不可能明治維新了。明治維新還來得及，就是因為日本的天皇制度沒有完全腐朽，為什麼

沒有完全腐朽？因為有幕府頂了缸，對於日本的維新派而言，天皇制度還有利用價值。日本的天皇「萬世一系」，沒有改朝換代這回事。他為什麼沒有改朝換代？因為古時天皇不管事，只是一個象徵。

彭：就像英國一樣的。

鍾：所以沒有必要去打倒他。反對只是反對執政者，反對幕府。明治維新推翻的是德川幕府。幕府是經常變換的，好比平家講的《平家物語》，源氏、平氏就是朝代的替換，只換當家的人，天皇沒有權利，甚至於吃飯還要去領去討，變成高級叫花子。但是對幕府來講，日本的幕府的武士階層本身來講，還有一種接受西化、革新自己的能力，所以天皇也可以不被打倒，並不需要打倒他，只需要把政府換了，全部換成西洋的留學生搞就行了。

中國不行。中國舊制度的八字不好，加上有一條，最後的朝廷是異族，不是漢人，不是百家姓裏的人，「趙錢孫李周吳鄭王」裏面沒有一個「愛新覺羅」，漢人終究不能接受一個異族來統治。辛亥革命，孫中山十六個字，「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兩句話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同意、接受。「建立民國」就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同意，「平均地權」則百分之一同意的人都沒有。

搞社會革命，那時還太早了，但有百分之八十的人不要滿洲人來搞，要我們漢人來搞，要復國啊！所以開始成立的時候，黃興他們叫做大漢軍政府，四川的銅板上是一個漢字，這也就是中國的君主制度不能不完蛋的原因。曾國藩幫忙是幫滿族人。所以孫中山他們起義的時候就不接納曾國藩，覺得你不能幫助滿族人，洪秀全至少是漢人。

彭：曾國藩就退出歷史舞台了。

鍾：曾國藩他是一個例子，就是論個人能力曾國藩是最為卓絕的，他的能力是無與倫比的，跟拿破崙這樣的人一樣，幾百年幾千年才出一個的。他做事時間不長，四五十歲才出來做事，都做成了。清朝已經沒有辦法，眼看就要亡了，太平軍已經打到天津了，被他收拾得乾乾淨淨。滿清的正規軍不能打了，是他帶出來的湘軍，湘軍不要國家發糧餉，自己籌錢，這是群眾組織，是讀書人組織領導的農民武裝，居然搞成了這個事，在短短時間內掃平了太平天國，把清朝從就要滅亡的時候救起來，居然成了「同光中興」，還有能力去派學生留美，在那裏搞現代化的機械廠。他雖然沒有看到這件事情成功，他死的時候還不滿61歲，累死的，太累了。

彭：他還把湘軍解散。

鍾：他把兒子也教育成功了，他家裏沒有大少爺，曾家幾代，到台灣去了的，也都是人材。

彭：他把湘軍解散，基本上是華盛頓的作風，解甲歸田。

鍾：因為他那些事情都做得都很完美。他識人、知人善任，教育兒子也是最成功的，他教兒子的話，別的不說，《曾國藩教子書》，他教兒子寫字的筆法怎麼樣他都教，在那麼忙的時候，寫上千字，非常具體，很細。那個人付出的是太多，所以他很早就死了，他的兒子也都成了材，曾紀澤、曾紀鴻他們，但是他的兒子也都早死，他要求他們讀書太多，太累了。

彭：他後來一代一代都很成功。

鍾：曾家後人都還可以，家教好。

彭：他們的家教一直傳下來了！

鍾：他教兒子幾條，第一條他絕不給兒子任何特殊化和照顧，他給女兒也是這樣講的，絕不給她任何東西，出嫁只給一百兩銀子，你丈夫把你領走，按照舊的觀念，嫁出去了就絕不能回娘家，更不能說娘家有力量、有勢力去壓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婆婆他們，這個東西，舊的倫理道德，他做到了極致，所以他的女兒都很不幸。他五個女兒只有小女兒好一點，曾國藩死後，嫁給聶家，生兒育女。曾國藩死後曾國荃他們就是，一方面這是自己的姪女，另一方面哥哥死了，要善待他的姪女。給她很強大的支持，婆家也不敢怎麼對她不客氣，這事實上有很大的關係。曾國荃是兩江總督，聶是做事的，上海這些地方都歸他管。是因為曾國藩死了，他如果沒有死，她也沒有好日子過，這一點他對女兒太不好，這是一個問題。他在教兒女上都是很嚴的，他真的做到了這一點，所以他的兒女都是自己成功的。

彭：據說他們家現在過了好幾代，每一代都很成功。

鍾：只有五、六代，在台灣都很成功！比如說曾約農就是東海大學的校長，這是他的後人。李鴻章的後代就不行了，因為錢多，第二代必然會腐化，曾國藩的沒有腐化。研究曾國藩的意義在什麼地方？即使個人傑出到曾國藩這種程度，也無救於這個制度的滅亡，這就更深刻地說明了這個制度是不能不變的。雖然出現這樣的人物，也沒有辦法改變清朝走向滅亡的命運。剛才講了，任何國家都有特殊性，特殊的是最後中國這個王朝是一個愛新覺羅的異族人，漢人不能接受，一個國家去強力地統治一個民

族，不管你是統治者也好，被統治者也好，都是不可能的。民族自覺和民族自決都是不可避免的，這也是我的基本觀點。

彭：那鍾先生，你為什麼花那麼大力氣，出版「走向世界」、「曾國藩」、和「周作人」三套書，這個想法是怎麼慢慢形成的？

鍾：判刑以後，沒有想到自己還會當編輯，沒有這樣的預見性。任何有預見性的人都不會想到這一點，但是我預料到毛澤東死後，我會從牢裏放出來。即使他不死，只要不得老年痴呆，他也可能會放。因為我看到反革命團級以上人員，毛沒有死就決定全部釋放了。他又講給大家戴什麼帽子都摘掉，我就知道他自己也曉得把對立面越搞越多不行了。本來不是敵人的，你給他戴上敵人的帽子，這是對你自己不利的，對於這個被戴帽子的人也當然不利，但是被戴帽子的人不利還小些。我劃了右派以後，還是活下來了嘛！得罪我們這些人沒有關係。但是，得罪了我們，也是他的損失。我可以不當幹部，作為老百姓我也可以生活。講老實話，我生活得還可以。我做工具做得很好，我畫的圖紙比學機械的人畫得好，我自學工科我可以做機械設計，到勞改隊去能夠繪圖紙，那是不能濫竽充數的，設計起重機，5噸的、10噸的，掉下來砸死了人，你是要判刑的，圖紙是不能出差錯的。我做事向來認真，大家都承認，反對我的人也承認這一點，我不能讓別人講我不行。我做事一定要做好，而且我也能夠做好。假如不能做好，比如說打球我不行，我就不去打球，我就不去那個領域。

彭：你出來後怎麼會弄這三套書？

鍾：我認為中國應該走世界人類共同進步的道路，就是中國要接受全球文明，中國必須要走全人類共同走的道路，所有世界上、地球上的民族國家都要走的這條路，就是現在還在行奴隸制的國家，也遲早要走上這條路。

你發給我的一個問題我已經看見了，你說為什麼在東歐的國家，為什麼在這個體制內文學水平就高一些，這個問題很好答覆，捷克、匈牙利、波蘭它們原來就是歐洲的一部分，它們的文學有那樣的根底，它們原來都有很好的文學作品。匈牙利跟奧匈帝國是哈布斯堡王朝一起統治的，維也納是音樂的首都，它有那種發展，那種傳統。共產黨、勞動人民黨，在匈牙利執政以前，就有了那些作家。捷克更早就是發達的西方國家。斯柯達（Škoda）、野牛商標的重型汽車、皮革工業、玻璃工業在一次大戰以前就領先世界的，布拉格是德國的一部分，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

彭：卡夫卡在布拉格河邊的，他講德文。

鍾：你了解歐洲歷史的，他們都屬德語文化區域。奧地利是和普魯士在德意志聯邦裏爭雄失敗了，才來搞東方帝國，奧地利帝國，後來變成奧匈帝國變成二元帝國，因為匈牙利強大了，匈牙利跟他平起平坐，後來又準備把塞爾維亞也提升上去，搞三元國家。了解歐洲歷史的都知道，這是歷史常識。但是我們有很多人，包括一些黨校的博士，都沒有學過歐洲史，我也沒有讀過，是自己看書看了一點，這都是常識的範圍。總是要走向世界，難道還能不走向世界？

現在北京的奧運會不就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一

個世界，就是一個地球，就是全球文明，你怎麼有兩個世界、三個世界呢？全球文明就是走向人類共同進步。自由、平等、博愛，這是人類長期追求的社會理想和政治理想，也不是屬於西方的，中國也有民主自由的傳統，還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傳統中國、傳統文化不是黑暗一團，過去並不是全部都是專制生活。中國人也有自己的政治民主，只不過不用這個詞語。

我舉個例子，甲午戰爭，有人主張對日本打，有人主張不要打要和。左宗棠帶兵到新疆去平叛，李鴻章就主張不要去嘉峪關以外地方，我們不要去進入它，軍費拿起來在這裏把海軍建設好，把海防搞好，因為關外永遠不會成為中國的危險。他發表這個政見是公開發表的，這就是當時的民主，他發表意見沒有人算他的帳的。要不要辦洋務？四品以上都可以公開發表意見的。那幾本《洋務運動》，各省的奏摺都在那裏，張之洞主張怎麼樣，哪一個省主張怎麼樣，誰主張怎麼樣都可以。林則徐主張禁煙，有人主張不要禁煙，這都是公開的。這就是民主。

康有為向皇帝上書主張變法，是非常危言聳聽的，如果還不變法，「皇上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就是你會亡國，做老百姓都不可能了。康有為當時有權這樣說。但是像朝鮮這樣的國家，他硬要搞原子彈，我們的納稅錢何必拿去送給他呢？又比如，原來援助阿爾巴尼亞，我們有權利說，「歐洲的社會主義明燈」何必由我們送油去點嗎？你不要援助阿爾巴尼亞嗎？沒有。不僅我們沒有，政治局委員也沒有，他要發表，就會變成路線鬥爭的另外一面。我們的民主比清朝的時候還退回去了。

註釋

- 1 劉向(約公元前77-前6年)，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奉成帝之命與兒子劉歆編纂《七略》和《別錄》，為中國最早的國家藏書目錄著作。著有《新序》、《說苑》、《列女傳》等。

倒翻的紅墨水

文革是具體在哪一天開始的？我完全不記得了，印象中是1966年的夏天，突然覺得天上的紅墨水一下打翻了。生活像被點燃了一樣，到處都是紅色。櫥窗裏的陳設是第一個信號，它像吹響的小號，刺破天空，預示着生活的改變。櫥窗裏，不是掛上了紅色的橫幅，就是布滿紅色的「寶書」，有語錄、有四卷集的選集；然後街面上，緊跟着刷上了大紅色的標語，上面黑色毛筆字的墨汁還沒有乾透，順着紅紙頭往下淌，感覺很奇怪，像是一滴一滴黑色的眼淚在為「紅色」哭泣。整個世界的空間裏，每一個縫隙之間，都填滿了紅色。

我們都瞪大了眼睛，無所適從地張望着，街道上，那些「時髦」的女人和上海的老克拉，¹像過街的老鼠，抱頭逃竄。有的女人被眾人圍着，要剪掉她的小褲腳管；有的老克拉，手裏提着三節頭皮鞋，以往的神氣活現全然不見，光着腳往家跑；更要命的是，大多數的「時髦」男女會被紅衛兵剃了陰陽頭，把從他們腳上扒下來的尖頭皮鞋又掛在他們脖子上。街上的孩子，追逐在他們身後，朝他們吐口水、扔泥巴。總之，盡一切可能去徹底地羞辱一個人，把他（她）羞辱到底！

紅色的歌曲響徹整個城市，從小弄堂到南京路，學生都出來遊行了，普希金²的青銅雕塑被砸掉，那些廢銅爛鐵，很快還會被人收拾好賣掉；廟裏的菩薩，被拉倒扔在大街上燃燒，更多的是線裝古籍、世界名著，一起扔進火堆裏。行人停留在路邊，那些興奮的表情在瘋狂的行動下，顯得呆滯。很快就是大卡車上街，車子開得很慢很慢，上面押着五花大綁的資本家、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叛徒、特務和反革命。有的被打得頭破血流，鮮血還在流淌，依然被推出來批鬥。遇到像我這樣家庭出身不好的，也像過街老鼠那樣，貼着牆壁匆匆掃上一眼，往家裏躲。其實，躲是躲不了的，半夜裏，呼嘯着革命歌曲的大卡車在街道上停下來，整車人，衝進家裏抄家，翻個底朝天。那時候，做什麼事情都不需要理由，只要高呼：「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跟着毛主席繼續革命！」於是後面的一切都順理成章了，公檢法可以全部被砸爛、取締，生活的主題只有一個：毛主席萬歲！

那時候有一個非常聰明的作曲家，叫李劫夫，他作了很多很多的紅色歌曲，我們唱着他的歌成長，東唱西唱，卻一點沒有意識到他的能耐。其中最厲害的，就是他把毛澤東的文章變成歌曲了，很多是毛澤東的講話，講話不具備節奏和韻律，但他依然可以把它們譜成曲子，不知道李劫夫是怎麼把控的，硬是把口語的措辭製造出歌曲。於是一種特殊的歌曲誕生了，「毛主席語錄歌」！六億人民一起在革命的「想像力」下，高歌猛進。那些歌曲，即使不算是「達達主義」，也不是杜象（Henri-Robert-Marcel Duchamp）的「超現實」，但它們至少是以「後現代」的方式殺進我們的生活！

只是，再怎麼革命，歌唱得再怎麼激動人心，我們依然回到現實，燒飯的人間煙火還是在冉冉升起，小菜場的燈在早上四點半就亮了，物資緊張，上海人手上的那張豆製品卡，一人還是有四分錢的份額，如果家裏人多，就可以多買一點。我們把豆製品卡上塗上漿糊，當豆製品攤頭的工作人員，在上面用圓珠筆寫上我們用完的分額後，回家洗去了漿糊，也洗去了圓珠筆的痕跡；第二天，換一個豆製品攤頭再買。伙食，因此得到了改善！

糕餅店裏的點心就難了，那裏是收糧票的，全國就上海人想得出來，有半兩一張的券，於是小糕餅可以使用半兩券，我們製造不出鈔票和糧票。清晨，街角上，炊煙裊裊的大餅油條鋪子開了，大餅三分錢一個，油條四分錢一根，不需要糧票，但是光顧的人很少，對一般市民來說，這也不是很便宜的食物，早飯就是吃點隔夜的剩飯，在裏面倒上熱水就可以了，上海人管它叫「泡飯」。想想一個工人一個月的收入才三十六元，那是要維持一家人一個月的生活的啊！上海人的工資是屬於「8級城市」，比北京的高，和長沙比，那顯然要好多了。

那會兒，鍾先生是「拖板車階層」，但是他又可以拿到五十八元一個月，朱純和他一樣，在長沙是屬於當仁不讓的「中產階級」。那時候，鍾先生已經明白他不要加入「革命」了，他要過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要做一個「吃瓜群眾」！雖然他們不是那樣稱呼的，那時候管這個叫「逍遙派」，叫得很直接。這樣不好，一下就暴露了鍾先生不革命的態度。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省體育場又改名東風廣場，成為革命群眾集會的場所。我雖摘了右派帽子，仍屬

於「二十一種人」，沒有參加群眾大會的資格。不料卻有人檢舉了我反對文化大革命的言論，就是為「為反動文人金聖嘆翻案」。於是有次東風廣場的宣判大會，便把我押去「陪判」。八月長沙驕陽似火，革命群眾有草帽遮陽，有水壺解渴，不停地搧風，還一個個汗如雨下。我是被押去示眾的人，既不許破草帽遮顏，又不許亂說亂動，更無人供給飲水。呆呆地站立在火爐般的紅太陽下，只希望它快點落向西山；可是它卻絕對無意於退位，一直高踞在最上頭。

東方廣場的面積，僅僅為過去協草操坪的若干分之一，容納的人卻常常號稱十萬、十幾萬，起碼是過去的十幾倍。地上的草全被踩死踩光，頑強的趨趨草也不見蹤影了，只剩下一片赤裸的沙礫地，陽光照射下特別炙人。在低音喇叭聲中，望着插在死刑犯背上高高的標子，我心想：金聖嘆當年臨行時，情況不知如何，怎麼還能寫出這樣的詩來：

鞦鼓三聲響，西山日正斜。黃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

如果我現在被捆起來插上標子，在自己扯過趨趨草、憧憬過「山那邊啲」的地方告別這個世界，倒也是人生難得的遭逢，只不知會不會允許我做詩，若能允許，倒可以湊成這樣四句：

紅日科頭晒，高高不肯低。黃泉涼快點，好去鬥趨趨。

（鍾叔河《念樓集·協操坪》）

鍾叔河和朱純一邊挨整，一邊認真真過日子。他們關照三個女孩不要在外面瞎跑，不停課的時候，要準時去上學；停課了，也不許出去鬧，就是在家裏做功課。總以為，一家人團在一起，還是可以遮風擋雨躲過這個災難。其實這個「家」，也擋不住孩子內心所經歷的暴風驟雨。老大要求革命，希望加入「紅小兵」，小朋友堅決地把她踢出革命隊伍，因為她的父親是右派。鍾亭亭不相信，爸爸就是一個很善良、會講笑話的人。他們家和別的小朋友家都是一樣的，爸爸媽媽上班掙錢養活着她們。她不相信，回家翻箱倒櫃，把屋子都弄亂了，箱子裏的舊衣服攤得到處都是，屋子裏瀰漫着樟木箱的味道，她終於找到了1961年鍾叔河和朱純的「右派摘帽」的改正書。明明是摘帽了，可是爸爸媽媽真的曾經都是「右派」，是壞人？才11歲的孩子，哪裏搞得明白這個世界，她嚎啕大哭，為自己和別人是不一樣的痛苦、羞愧。對一個孩子來說，父母偉岸的形象，怎麼可以剎那間被摧毀？那份煎熬，卻是鍾叔河來不及關照的。

文革的時候，鍾先生的家在教育西街租賃了私人房屋，那是他父親文史館的同仁、民主人士陳書農的宅子，陳老夫婦都曾留學法國，對於鍾家來說，這是最好的房東了。於是朋友都喜歡往鍾家跑，有一個聚會、聊天的空間。在那裏，大家把在外面看見的「怪事」互相交流，把撿到的小傳單帶進屋子。鍾先生依然是那個「喜歡說話」的人，他的謬論很多；他記性不好，在那個「禍從口出」的時代，他竟然忘記了；1957年「反右」給他的教訓忘記了，他又在發表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圖十一 摘帽以後，鍾叔河與朱純帶着三個女兒在租住的教育西街17號院內的合影。

朱純依然對他是「寬容」的；他的朋友來家裏聊天，朱純一一接待；鍾先生的胡言亂語，她從來不加阻止。到了生活裏，鍾先生又成為一個「小兒子」、大少爺，完全忘記了自己拉板車的身分，看見好吃的雞肉鍋貼，他高高興興地叫來吃，但是朱純不吃，她說：「你要吃你吃，我不想吃，我要一個別的東西就可以了。」她不會說，為了節省錢就阻止鍾先生享受，她是克制的，她為家裏著想，能省就盡量節省。那時候，鍾先生覺得何必呢，你的錢跟我掙得一樣多，你用是應該的，

鍾先生心裏會笑話她的節約。因為年輕，他不會為家庭考慮太多，他只是覺得朱純年輕的時候不是這樣的。只有到了晚年，鍾先生才會感慨地說：「朱純對我是寬容的。」

1967年的時候，長沙已經不是像上海那樣能在「街道」上看熱鬧了，也不是櫥窗裏陳設的改變，他們是真槍實彈地開打了。江青和毛澤東支持造反派擁有槍枝，革命組織「長沙青年」的搶槍行動開始了。等到7、8月的時候，湖南各地的造反組織都緊緊地跟上，他們占了上風，逼着保守派向湘潭方向逃跑。湖南的蠻子，在「革命」的時候，徹底展現出他們的本性。楊小凱（1948–2004）的《牛鬼蛇神錄》裏描述的「三毛伢子」：

「長沙青年」乘機抓到了幾個長橋農場的幹部，其中包括當年迫害三毛伢子的那個幹部。三毛伢子把這個幹部弄到「長沙青年」的辦公室，開始自己「審訊」他。這個幹部進辦公室後，被命令坐在三毛伢子的辦公桌前。他坐下去時，突然衝到辦公桌前，搶奪辦公桌上的一枝手槍。旁邊幾個人馬上一擁而上，把這個幹部按倒在地。第二天早晨，三毛伢子一個人到關押這個幹部的房間，把他一隻眼睛挖掉了。

文革最瘋狂的時候，我在上海，還是一個小學生，我充滿恐怖地看着太陽升起，那時候我搞到一本朋友借給我的《海鷗》（*The Seagull*），我幾乎是背着裏面的句子睜開眼睛。那句子似乎在說：「我用我全部的愛，張開我的翅膀衝向太陽，迎接一天的開始……」真的是這樣嗎？還是我自己臆想出來的？完全

不記得了，但是真的是要鼓足了勇氣，才敢開始新的一天。有一點我是非常清楚的，每天晚上入睡前，我會驕傲地對自己說：我又戰勝了一天！

即使這樣，上海還是比長沙有秩序得多，我沒有聽說周圍有人眼睛被挖掉的。我父親那裏音信全無；母親被關進去，我依然每個月可以去她的單位拿十元生活費；我依然可以去學校上課，雖然我常常逃課；我依然被別人譏笑咒罵，可是有一天我憤怒時，我也是那個依然敢和人吵架、打架的女生！真的當一個人豁出去的時候，哪怕是亮出一張完全蒼白的臉，依然是會給人一種力量，戰鬥結果也常常是不清晰的，沒有勝負。

1967年的夏天，我就是那樣渾渾噩噩地過着。我完全不知道，那時候的長沙是什麼樣子，看到資料的時候，我嚇了一跳，原來上海的「日子」是過得蠻好的！而長沙，已經戰火熊熊，快成戰場了。保守派逃往湘潭以後，「長沙青年」豈能放過他們？於是造反派組織隊伍向湘潭進軍。但是，湘潭不是一般的湖南地界，那裏有好幾座軍火工廠，是當時的「三線」地帶，他們生產飛機、坦克和軍用品。因為保守派對於當局的支持，所以這些軍工廠也保護保守派，為他們撐腰、壯膽。

長沙的造反派全副武裝地爬上八輛大卡車，高呼口號，雷厲風行，內心充滿了英雄感，大家互相感染着、依靠着，真的有一種獻身革命的勇氣在鼓舞着他們，卡車直奔湘潭和長沙交界處的易家灣小鎮，大多數的造反派，手上都扛着五六式的半自動步槍，還有全自動步槍。大隊車輛出發了，浩浩蕩蕩，一輛緊挨一輛，路邊站滿了觀望的市民。

前面兩輛大卡車，是工廠的學徒們剛剛建立的造反派，叫「青年近衛軍」，他們更加瘋狂和充滿激情，因為年輕，完全不知道是怎麼被人點燃的，衝在隊伍的最前面，緊跟在後面的兩輛卡車就是「長沙青年」；最後四輛是由復員軍人組成的「紅旗軍」隊伍，他們甚至帶上了好幾門八二式迫擊炮。

復員軍人造反派是受過軍隊專業訓練的，所以當局也是害怕他們給政權帶來真正的威脅。1967年1月的時候，周恩來已經將他們定性為「反動組織」。即使這樣，他們一路唱着紅歌，高喊着毛澤東的語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在長沙，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們八輛大卡車載着滿車滿車的戰士、架着武器出發了。

可是當他們一路開去，接近易家灣的時候，響起一聲沉悶的爆炸聲，這時候大家才警覺到，迎面開來了幾個黑點點，但是當黑點點越來越大的時候，那竟然是保守派直接從軍工廠開出來的坦克！造反派在卡車裏都狂叫起來，大家都只有在電影裏看見過坦克，那個笨重而巨大的裝置，完全沒有想到它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又是一聲爆炸聲音，大家終於恍然大悟，是坦克在向造反派開炮了。

頓時車上的「英雄」都嚇趴了，大伙在那裏發抖，「青年近衛軍」裏，有的小戰士都尿褲子了，卡車往邊道開，大家迅速地爬下車，然後往四下的田野裏奔跑和躲藏起來。這個時候，他們大概都忘記了自己的「初衷」，革命意志消失了。很快，炮聲響起來了，這時候趴在地上的戰友們才想起來，後面四輛卡車上的「紅旗軍」是有八二迫擊炮的。炮聲在空曠的田野裏

散發開來，兩軍對峙，八二迫擊炮繼續發射，保守派感覺到形勢不對，坦克開始朝湘潭方向退去。「戰爭」暫時停頓下來。

等到1967年9月，造反派自己內部又發生分裂，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有席位的，逐漸形成了支持新當局的「工聯派」，而沒有席位的在野派形成了「湘派」，「長沙青年」成了「湘派」的成員。

「湘派」與「工聯派」發生過幾次武裝衝突，「長沙青年」占據了湘繡大樓對面的建築物，而湘繡大樓的六層正是被「工聯派」占領着，於是雙方開始互相射擊，「長沙青年」一派的人，架起一挺高射機槍，裝上燃燒彈和穿甲彈，向湘繡大樓掃射，幾輪射擊後，湘繡大樓著火，整個大樓完全被這場大火毀滅。這一下闖下大禍，於是「長沙青年」開始逃出長沙，當局也開始鎮壓這些「造反派」為反革命。

但是在9月之前，仇恨已經埋下了。「長沙青年」和「青年近衛軍」正埋葬他們在戰鬥中犧牲的戰友時，居然抓來了保守派活活拖去墊棺材，做陪葬。這個消息傳出去以後，在執行命令檢查屍體的時候，發現有兩個人沒有死，槍傷的地方不時湧出鮮血，但是頭還在擺動，於是造反派們乾脆上去再補上兩槍，直到他們完全不能動彈。

1967年底，新的政府在北京中央的支持下，成立了「治安指揮部」，與軍隊一起負責地方的治安和秩序，他們隨意抓人、打人、審訊，於是長沙更加陷入一片混亂之中，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極端分子，都被當成敵人抓進去了。每一派的目標，

都是「保衛毛主席，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個時候，毛澤東主席說：「天下大亂，越亂越好！形勢一片大好！」

「革命」讓人瘋狂了。紅色由鮮血染成，長沙已經是淹沒在一片紅海洋裏。其實在一百年前，當法國大革命開始的時候，勒龐³已經看清群眾運動的可怕。他說：

群體雖然有着各種狂亂的願望，它們卻不能持久。群體沒有能做任何長遠的打算和思考……因為數量上的強大使它感到自己勢不可擋。對於群眾中的個人來說，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孤立的個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時，他不能焚燒宮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這樣做的誘惑，他也很容易抵制這種誘惑。但是在成為群體的一員時，他就會意識到人數賦予他的力量，這足以讓他生出殺人劫掠的念頭，並且會立刻屈從與這種誘惑，出乎預料的障礙會被狂暴地摧毀。人類的肌體的確能夠產生大量狂熱的激情，因此可以說，願望受阻的群體所形成的正常狀態，也就是這種激憤狀態。

（勒龐《烏合之眾》〔*Psychologie des foules*〕）

「群眾」的力量，是讓人變得勇敢又無知，只有那些被踢出「革命群眾」隊伍的人，才明白一切都需要依靠自己。那種獨自的存在，沒有意義，因為不是你自覺選擇的，「革命」不接受你。就是在這樣的遺棄下，鍾先生成為一個看客，他漸漸建立起自己獨立的價值，站在人群外面，與自己的精神為伍，冷冷地觀察、思考着，他說：「《紅樓夢》、《史記》這些書為什麼燒掉？以後難得再印。」

讓他更加匪夷所思的是，沒有邏輯的現象，「已經是自己的『天下』了，怎麼可以說『天下大亂，越亂越好』？還說，『文化大革命過幾年再來一次』，這是你共產黨的天下，又不是國民黨的天下，亂了你自己，有什麼好？」當群眾運動開始以後，腦子都是熱的，人們喜歡在一句簡單的口號之下，明確方向。熱情裏面，不包含思想和邏輯。你如果理性地說上一串有邏輯的話，沒有人理睬，沒有人有耐心傾聽。只有振臂高呼的時候，人群就所向無敵了。

誰也沒有想到，鍾叔河說的話被人舉報了，儘管他低低的聲音混雜在人群裏，但是它太尖銳刺耳了，他居然不迴避，他說：「是的，我說過。」1970年3月17日那天，朱純回到家裏，突然居委會的主任進門問她：「鍾叔河會回家吃飯嗎？」朱純坦然地說：「會回來的。」轉身，居委會主任就帶着兩個造反派的人進來，宣布抄家！

朱純滅了灶頭上的火，從灶間走進臥室的時候，讓他們任意地翻箱倒櫃，孩子放學回家，看見的是這樣的景象，嚇得不敢進門，似乎這不再是她們自己的家。朱純護着孩子說：「不要怕，共產黨的政策是一人犯法一人當，與你們沒有關係。再說，你們的爸爸不會幹壞事，你們只管發狠讀書。」孩子們沉默着，這些話對她們來說，變得太深奧，以至於恐怖。

鄰居都很同情他們一家人，說是鍾叔河連一張大字報都沒有出去貼過，對人都那麼禮貌客氣，犯什麼法啊！邊上這些議論，對孩子會是很大的安慰；但是，這一天，鍾叔河還是被抓走了。為了鼓勵孩子們，朱純把她們在學校獲得的獎狀，把家

裏的破牆，貼得滿滿的。張志浩來看望朱純和孩子們，看見那些獎狀，幽默地說：「这不單是表揚了孩子，還可以闢邪哩！」

為了這個家，朱純忍受着痛苦，和大女兒一起打工養活一家。一年以後，鍾叔河被宣判了，罪名是：惡毒攻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判刑十年，遣送茶陵沅江勞改農場服刑。朱純墮入黑暗的中心，她說：「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那是1971年，鍾叔河剛踏入人到中年的40歲。

在鍾先生的書裏和他的談話中，只有簡單的描述：

勞改隊位於井岡山西麓茶陵縣境內，對外叫沅江農場。幾千名犯人分編六個隊，五個隊都種茶，只有六隊是工業隊，製造茶葉加工機械。

（鍾叔河《左右左·水滸葉子的往事》）



圖十二 鍾叔河在沅江農場服刑時，朱純母親（後排右）帶着朱純和三個女兒在公園散心時的合影。

對於被揭發、逮捕、判刑的過程，他沒有細說過；不像對當「右派」後的日子，鍾先生的文章裏有不少的敘述，不知道他是怎麼進的監獄，怎麼被宣判的，最後又是如何被押送去茶陵縣的洙江勞改農場。同去的還有朱正、俞潤泉先生。

朱正和鍾先生同年生人，一起服刑；他們「反革命小集團」的俞潤泉先生，他比鍾先生和朱正先生年長6歲，1949年畢業於廣西大學法律系，學識深厚，求學期間，曾任重慶《國民公報》記者。或許對法律有一份敬畏，他的性格就是謹小慎微、膽小怕事，與鍾先生差別很大，但是鍾先生一直對他有一份尊重，因為他的善良和深厚的學識。

朱正先生被判刑三年、鍾先生被判刑十年、俞潤泉先生被判刑十二年。後來在俞潤泉先生寫給朋友的信裏，提到「我們一群被押到洙江茶場，還記得鍾叔河暈車嘔吐……」鍾先生因為身體不好，吐得厲害。我打電話問鍾先生，想了解當時具體的細節，他只說：「明明從長沙去茶陵就幾小時（汽）車程，一定要開車把我們押送到另一個地方，然後又讓我們坐火車，又下來吃飯，再汽車押送去洙江勞改農場。就是要搞得很麻煩。」

我們一共三十多犯人就是一位獄吏和一個班的士兵押送到離長沙二、三百里的岳陽建新勞改農場去。兩個人共戴一副手銬，每人一雙手銬在銬子的一端。我們背着自己的行李由軍人押着步行半小時到達火車站。沿途人們都用好奇和鄙視的目光盯着這群光頭、瘦削、蒼白和穿着破爛的犯人。那種人格受辱、遭受迫害的感覺，真使人傷感不

已。周圍的人穿着漂亮(儘管與一九八〇年代相比是太單調了)，膚色健康，特別是那些漂亮的姑娘們用鄙夷的目光看着我們這些正當戀愛年齡的男人，真使人傷心不已。外界的景觀與我們看了近兩年的監房相比真是天堂與地獄的對照，我當時那種對不被社會所容的處境的悲憤感，真是不能用筆墨形容。

(楊小凱《牛鬼蛇神錄》)

這是摘錄了楊小凱在1971年從監獄被押往「建新勞改農場」寫的感受。可以想像，這個兩次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的澳大利亞的科學院院士，當他回憶起自己年輕時的經歷，即使「諾貝爾獎提名」的輝煌，依然抹不掉內心曾經有過的屈辱。看着他描寫的細節，似乎看見的是鍾先生的歷程，他們也正是在這一年被押解到「沐江勞改農場」。一樣是短暫的路程，卻用火車、囚車押送；一樣被路人羞辱。

那時候鍾先生剛剛踏進中年，對於他們這些讀書人，物質上的艱苦是可以克服的，甚至完全不在乎；可是對一個人的尊嚴的侮辱，是會讓他們刻骨銘心的。那個被剃掉的光頭，那個堅硬冰涼的手銬，還有在正常人中間他們身上的囚服，直到半個世紀過去，我們問起鍾先生，「對你做過的事情，你後悔嗎？」他說「不後悔。」「你現在回想起來，是什麼樣的感受？」他會停頓一會兒，(這不是他說話的節奏，他的答話總是敏捷、迅速，但是現在他停頓下來)他說：「憤—怒！」他一字一句地說道！刻骨銘心！這和「寬容」沒有因果關係。

重新再問起他勞改農場的經歷，鍾先生總還講一些犯人的故事，不知道是他不願意回憶，還是他真的不在意，他不描述自己的狀態和感受，只有注意傾聽，才可以捕捉到一些細節。

「我們都睡了七年多了，一個人一塊板子，1米寬；下面睡十二個人，上面睡十二個人；一共是二十四個人，有時候就會缺一、兩塊板子，大家就要擠一擠睡，多數時候不會缺少。

「也有很不好的犯人，在裏面是很被鼓勵的，兩種犯人是
很討厭的，小的幹部或者什麼老師，有點文化的，這些人就會打小報告，都是這些人。工人、農民很少去幹這樣的事情，他也知道這樣的事幹了對他沒有什麼好處，最多被表揚一下，減刑勞改隊沒有這個權力，勞改幹部權力很小。

「在裏面，有一部分是真正的刑事犯罪分子，如果真的刑事犯罪分子幹的是很壞的事，犯人也是看不起的他們的，比如說強姦幼女的犯人，一般的犯人都認為那種人是很髒，很看不起那種人的。他跟別人爭執，別人就拿出他犯的事來講他。犯人不
管他內心怎麼樣，至少表面上對這種人看不起，因為他幹的不是人幹的事情。在犯人中，『地位』最好的是反革命。」

「就像你們這樣的！」

「社會上本有各種各樣的犯罪分子，比如說職業的扒手、竊賊，這種人還好相處，扒手一般的比較講義氣，不會去出賣別人，或者是看到什麼，或者這個人在講什麼東西，他不會去報告的，他們自己也是，他們叫作江湖義氣，他們比較講究這個東西。當一個小幹部的，尤其是他又是一個區長什麼的，就喜歡『靠攏』政府了。」

「那鍾先生，像你這樣的現行反革命多嗎？」

「在文革中很多，大概占三分之一左右。」

「你們這些人，互相交流嗎？」

「勞改隊中的反革命，不一定是有思想的反革命。文革的時候，只要派系不同，都判你是反革命！林彪是反革命、劉少奇也是反革命。所以犯人裏面有很多這樣的人，有些老犯人在裏面過了幾十年，反彭德懷的時候，他是彭德懷的社會基礎，反劉少奇的時候，他又是劉少奇的社會基礎，反『四人幫』的時候，他又可以是『四人幫』的社會基礎。他們老早就在那裏為你們這些人定位，說你們是在政治上反對他。這是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也好，作為一個社會組織也好，他最不高明的一點。就把他自己黨內的鬥爭，把他所謂的路線鬥爭，把他和社會上所謂的階級鬥爭混為一談，他從來就是這麼一個邏輯。」

「你覺得他們為什麼要這樣一個邏輯？」

「而且一般地來說，整自己人還特別下得了手。這是歷史上任何統治集團，甚至幫會都不這樣幹的。幫會裏面有幫會處理的手段，他是絕對不容許把幫內的人和外面的人一樣處理，他是要區別對待的。也要殺，幫內也有死刑，要執行死刑的時候，對待自己弟兄去執行的時候，與對外面的人待遇是不同的。吃喝得好一點，他還區別對待的，有一種這樣的感情，有這種幫派的義氣。」

說着說着就扯遠了，鍾先生還是沒有談到他在涿江勞改農場的事情。是在不斷地提醒下，鍾先生才說起自己的事情，頸椎骨受傷，至今還會隱隱作痛。在勞動隊睡的是兩層高低鋪，

每個犯人一塊床板，那個床板大概是1米寬，一間房子睡二十四個人，上面十二塊床板，下面十二塊床板，說話之間，他指着自己的屋子：

「那間房還沒有這麼寬，去了床鋪2米多，剩下的地方還沒有一塊床板長，冷天要烤火，裏面可以挖一個火爐，火爐挖在地下的，犯人什麼樣的人都有，自己裝，弄得很好，爐膛打得很深，圍着那裏烤火，無法圍成一個圓圈，只能圍成半圈，要留一條路，另外生活用品放在旁邊，有一個架子。當時沒有什麼空間活動，有時候過年過節休息，人就不到外面去，只能坐在自己那一塊床板，我在那裏，我做一些什麼事呢？

「那時候報紙有《人民日報》和《湖南日報》，那是允許犯人讀報的，我又管這個，報紙上用一些隸書字做標題，我就想把那些隸書字剪下來，蒐集那個字。有兩套，《湖南日報》和《人民日報》的字不同，我都在蒐集，有一些字通用的大量出現，那就蒐集一、個兩個就可以了，有些字很偏僻的，偶爾會發現，那就很好，因為蒐集了幾年，收齊了好幾百字，有意思。

「一個一個字剪下來，黏在上面黏死了，無法挪下來，貼在一張有韌性的牛皮紙上，牛皮紙再剪到大一點的紙上，有一點邊。那個牛皮紙可以貼着挪動，我黏上的，有時候調整，好比偏旁，劍字，旁邊有一個利刀邊，要黏在一起，有時候要挪動，那個偏旁很少的，占了一個位置的，挪動多了就要調整，搞這個消遣過日子。

「有一年過春節時間很長，又下雪，不出工，我就坐在上面床板上，一直低頭做這個東西，我做事情很專心的，沒有人

打擾我，除了吃飯以外，因為一直低頭低了好多個鐘頭，就是在低頭，忽然聽見輕微的『喀嚓』一聲響，就是頸椎斷裂的響聲。後頸根先是一麻，接着那個痛啊！我知道不好了，我都聽見斷裂的聲音了。

「看病還是允許看病的，勞改隊裏面也有醫生，本身這個隊也有一個醫生，另外一個上鋪上面，就是一個醫生，是犯人醫生，也是裏面的犯人。他看了我的情況，就說要趕緊去照片子，需要去縣醫院，於是送我到縣醫院照了一個片子，頸椎骨折。腰椎後來又受了傷，又是這個原因，就是久坐，沒有改變姿勢，但是腰椎受傷不是很嚴重。」

鍾先生對於「文字」的痴迷，只有做學問的人才會有深切的體驗。記得何滿子先生告訴我，他被遣送農村以後，看不到一本書，連報紙都沒有！於是，他就等着年底，可以買到一本台曆，每一頁上，有一段「生活小常識」或者「中草藥指南」之類的「豆腐乾」大小的文字說明。何滿子先生如獲至寶，慢慢地咀嚼着看完，365頁。然後給「說明」改錯別字，再給它修改語法，最後是在台曆本的下半記事用的空白頁上，重新組織好正確且簡潔的句子，重新再寫一遍。這幾乎和鍾先生蒐集隸書字體一樣。在他們的生活裏，不能沒有文字，否則就是將他們拋棄在荒原中，這將是他們精神上的荒原，它比現實的荒原更讓他們懼怕。

誰都知道勞改的人都是處在饑餓的狀態，進去的人都說吃不飽。關押在岳陽建新勞改農場的何敏，是1948年中山大學

畢業，1949年以後一直在做工程師，但是文革的時候被判刑進勞改農場。

每天飯後，他總是爭着去倒洗碗的桶裏的水，他小心地把水倒掉，用一塊紗布把桶底的飯菜渣滓接住，然後吃掉。洗澡的時候，何敏會露出了他鬆鬆的肚皮，看得出，他以前是那種大肚子的上層人物，洗澡肚皮下的脂肪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層鬆鬆的皮。他一定是以前肚量很大，才會顯得如此饑餓。

（楊小凱《牛鬼蛇神錄》）

這是楊小凱對他們勞改農場他的「老師」的描述，他最尊敬的一位數學老師的饑餓狀態。我們問鍾先生，你在勞改農場吃飽了嗎？

「俞潤泉比我還吃得乾淨一些，我吃不完的，你看俞潤泉在勞動隊沒有什麼剩飯，他吃完了，我卻有時吃不完那碗飯，我從來身體弱，飯量小，但是我沒有病，體弱沒有病，有病就不會活到現在。好在還不生病，就是青光眼那段時間也沒有發，但是朱純還是每年寄兩瓶藥水去，因為怕它復發，如果發病了，不要講監獄，就是在長沙也不得了，發病去治療，也沒有錢治療啊！

「犯人每個月吃兩次肉，規定是每次一個人半斤肉，但是事實上會剋扣一點，憑良心說，幹部沒有剋扣，而是那些做伙房的犯人多吃一些，在別人裏面剋扣。有一天有一個犯人，拿着一個小碟子，有這麼大，也不知道他哪裏弄來一個小碟子，

他的肉把這個小碟子鋪滿了，肉好像是很乾淨的，但是有點異常，像現在小店子切的，小酒館，小城市的，你有二兩酒切一盤菜，好像是那樣的菜一樣，鋪得平平的，鋪滿了，看得出用心擺了一下，擺滿了一碟子，很乾淨端來，喊我的名字，說你飯吃不完……因為我常有吃不完的飯，就有犯人守在這裏來吃這個飯。

「我有間房子，監房我和另外兩個犯人所謂搞宣傳教書的，白天就在這房子裏『出工』。這房子也是犯人圖書室，他就來幫着打掃一下，做點事，就吃我的剩飯。我的原則是誰來了我就給誰吃，我不給固定的人。吃不完的給誰吃，現在是不可能的，沒有這樣的人。你吃剩的他來吃，現在沒有這樣的人。但是在勞改農場，絕大多數犯人都吃不飽。

「這個人，端着這一小碟的肉說，你的飯都給我吃，我把肉做交換。我說我不搞這個交易，也許我吃完了呢？我剩了，擺這裏，誰來了誰拿去吃。我也不要你的肉，我的肉我吃的也夠了。謝絕了他。故事在後面，他走了以後，又進來一個人，問我：『你吃了他的那份肉嗎？跟他交換了嗎？』我說我沒有吃，我不跟他搞交換。『好在你沒有吃啊！他那一份肉，他給你幾片肉，是每一片都放在自己口裏面吸了很久，吐出來擺在碟子裏面的。』

「這就是勞改隊才會有這樣的生活，你想都想不出這樣的，在口裏使勁吸過後擺在這裏。勞改隊不會有廚藝，肉片上面並沒有什麼調味品和包漿，他還要拚命在這片肉上面吸取一點油水。這件事完全是真實的，而且俞潤泉親眼見的！」

看着鍾先生，我們失去了想像力，如果鍾先生吃了那個人給的肉，那是噁心得吐都吐不出來！鍾先生微笑着搖了搖頭。他不會的，對他來說沒有「如果」，這是很簡單的問題，他為什麼要吃別人的東西？鍾先生骨子裏的種驕傲，所謂的「富而不淫」，就是這樣的，是常人不能意識和理解的，他的「富」是精神上的富，是超驗式的富，所有這些物質上的東西，對他根本構不成誘惑。

判刑的十年，鍾先生堅持不讓朱純和孩子到勞改農場看望他，他覺得「女兒還沒有成年，我看見別人的家屬接見，男犯人見了女人的那種眼光，那種談吐，自己的妻女絕不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不要她們去，去幹什麼？反正可以寫信。」鍾先生怕給孩子心靈上留下太多黑暗的東西，他寧可寫信，其實那信裏也是什麼都不能說的。他甚至不想讓孩子看見的是，他穿着勞改農場發的棉衣，「後來我回家就不穿那件棉衣，那個怪模怪樣，小孩子看到會特別難受，朱純也是我不要她去，我原來在那裏沒有放出來之前不要她們去。你沒有到過監獄，那是一個很特殊的社會，並不是所有關的人都是政治犯、思想犯，什麼樣的人都有，我不想讓她們看到這些。」

那是什麼樣的棉衣，鍾先生笑了，棉衣是隔一年發一次，頭一年發棉衣，第二年發棉褲，於是鍾先生就很「聰明」。「我都採取這種辦法，第一次就領一個特別小號的，隨你自己選，只有大中小號，沒有其他號碼，我領一個對於我來說是很小的。隔年再一領，就領一個對於我來講是特大的，這兩件可以套着穿。舊棉衣是不要上交的。」就是這樣，他扛過了九個嚴冬。

「那時候，你四個女兒，一個在內蒙古，還有三個女兒都朱純帶着？」

「都在的，一個大女兒現在美國的那個，跟她的媽媽在一起做木模，在打工。其實，我在那裏生活，我並不是很難過的，事實上我比她們在外面生活可能還輕鬆一點，因為人判了刑，在那裏就沒人專門來盯着你了。自己管女兒也管不着了，負責任也負不了什麼責任了，就不想了，想也沒有用。你們沒有到過這個境地，到了這個境地的時候不會想那麼多東西的。我跟朱正和俞潤泉三個人在勞改隊的時候，我們還是一樣在做詩，還一樣在寫東西，還一樣在探討歷史問題，甚至都在談法國大革命，別人並不會想像有那樣的生活，你問朱正吧，什麼都談。」

「那你們那時候談這些東西，不怕別人舉報？」

「當然，第一沒有人在旁邊聽，在旁邊聽的農民也聽不出我們講什麼東西，你不知道那些人的生活是另外一種生活。」

是的，這是另外一種生活，被蹂躪的生活，我們完全失去了想像力。在如此殘酷的時刻，鍾先生一直在問自己：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是什麼原因呢？原因是那時的中國和全世界不同步了，文化大革命時，國家走上過岔道，國家已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我們在舊社會生活過十幾年，更重要的是知道一些歷史上的情況，知道個人讀書，書生議論，隨便怎麼樣，任何時候都不會抓去坐牢的。比如說清朝的文字獄

厲害，但不接觸滿漢問題，不發動武裝造反，他不會殺你的。文字裏發牢騷的多得很，文人寫詩沒有不發牢騷的，沒有牢騷就沒有詩了，都是不滿才寫詩。發牢騷，罵罵人，沒有關係的，罵皇帝的多得很。

「想來想去，只要我們走上全世界別的國家、別的民族都走的路，只要走到全人類共同發展的軌道上，我們就不會坐牢了。事實上也是這樣的，1979年我就出獄了，並沒有坐滿十年。在判刑的時候，那時候沒有公檢法，都是軍管，也沒有上訴，一張判決書就往牢裏一送，我判十年，朱正判三年，俞潤泉判十二年。當時朱正講了一句話，他說放心，我這個三年會坐滿，在看守所就關了一年半了，你們十年和十二年是絕對不會坐滿的。為什麼呢？毛澤東活不了十年了。

「差不多，我坐了九年，這句話當時出去講了，馬上就會槍斃，事實上就是這麼一回事。本來嘛，我們這些人本來就沒有犯法，沒有觸犯任何什麼人，沒有打人、又沒有貪污，應該說我們是奉公守法的良民，做事是最為兢兢業業的。兢兢業業不是為討老闆歡心，我本身就是一個做事的人，自己做的事自己要負責，比如說，如今這個書怎麼分冊怎麼搞得好一點，怎麼印得好一點，他不來找我，我也找他們，把書印得好一點，有錯字就把它改一下。這是最好的良民吧？做什麼行業盡心搞好這個行業，賺點錢，養家糊口，養老婆生小孩。」

鍾先生一直說，他在勞改農場從未受過體罰，肉體上並沒有吃多大的苦，甚至說，苦難鑄造了他的靈魂，思考點燃了他

的智慧。因為勞改隊的人都沒有什麼文化，他已經練出了機械設計製圖的本事，不弱於、甚至還超過了本科畢業的工程師，所以他很快就混到一個無須付出太多體力的差事，附帶出出黑板報啊，出牆報啊，還可以出去買文具，因為他們屬於「自由犯」，勞改農場也相信他們這些人是無法逃跑，也不會逃跑的，對他們管束不嚴格，甚至還有機會看自己感興趣的書。在生存的最後底線上，鍾先生只能考慮生命的意義，因為如果沒有意義，等待着走出監獄的每一天都會變得無望。

在勞改隊裏，讓他無法忘記的是那個12歲的少年犯，因為唱錯一句《東方紅》，被判刑十二年，鍾先生「無論怎麼想也沒有想到的是，這個孩子居然是快樂的」，因為勞改隊裏過年時有他從來未吃過的好東西，比如包子、油條，他想每年吃到一樣，十年就該吃遍了，他甚至還想把他弟弟也弄進來吃一次包子。當精神上的「生命意義」被吃飽飯替代的時候，鍾先生是痛心的，這或許比體罰他更讓他難以承受，一個孩子的青春，怎麼就會與每年吃一次包子對等起來？

更糟糕的是，有次給犯人分發服裝時，每一個人都領到了一條長褲，有一個犯人覺得自己領的褲子短了，他要求換一條長的，被拒絕。就在大家說說笑笑的時刻，這個人竟然抽下褲帶，回監房把自己在高低鋪的槓子上，吊死了。

大約是一九七六年底、一九七七年初的一個大晴天，我被叫到場部去「搞宣傳」，有意從潘漢年夫婦的住房走過，只見潘漢年穿着棉大衣，戴着三折帽，坐在屋外晒太



圖十三 沅江勞改農場某服刑人員繪製的油畫：《農場景色》。

陽。他的面孔向着一大片菜園，替幹部種菜的犯人們正在菜園裏勞動。我只看見他的背部。

這是最後一次見到他。

一九七七年二月，聽說潘漢年病重，在場部醫院治療。場部醫院的醫療水平，大概等於長沙市的街道衛生院吧！三月間，又聽說上頭叫把潘漢年送到長沙去搶救。不知道是出於什麼考慮，反正人是用汽車送走了。送走的消息我是事後才知道的，接着便聽到了他的死訊。據說，他的病是肝癌。送到湖南醫學院附屬醫院去時，用的名字是化名。

老實說，潘漢年的死並沒有使我特別悲哀，我的情感

早已鈍化和麻木了。那麼些年，死人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我曾親眼看見一個犯人用菜刀將自己頸項拉開一個大口子，還用手從口子裏往外拉氣管（或者是食管）。我還曾親眼看到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婆，因為「為劉少奇翻案」被判處死刑，當場槍斃示眾。用一根褲帶或繩索懸梁自盡的屍首，少說也目睹過三五回。像這樣「正常死亡」，而且死前被送到「大醫院」去搶救，要算是絕無僅有的了。我只有一種煩躁的感覺，為什麼「四人幫」已經倒台，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還做得這麼遲緩。

（鍾叔河《小西門集·潘漢年在汴江》）

在這空間裏，時間被剝奪了；生命，失去了全部的價值和意義！

由於鍾先生有設計繪圖的經驗，所以是派到六隊，也就是工業隊，做一些繪圖、描圖、晒圖的工作，還要去車間幫忙操作看圖紙。等到有什麼「運動」需要的時候，他還要幫忙兼搞宣傳。似乎「搞宣傳」讓鍾先生快樂了一些：

「搞宣傳」對自己也有好處：一是有限的書報能先看到，二是收工後和休息日不會再被派別的勞役，三是可以和其他隊「搞宣傳」的犯人互相往來。三隊的俞潤泉是老熟人，二隊的胡君里學過美術，後來刻印水滸葉子，他二人都出了力。

（鍾叔河《左右左·水滸葉子的往事》）

趕在1976年初，批林批孔的時代，鍾先生這個已經關押了

六年的犯人，他居然興致勃勃地「配合運動」，他們拿到了新出版的《水滸全傳》，看見了他小時候就在尋尋覓覓的陳老蓮畫的水滸葉子，於是立刻和俞潤泉、胡君里商量，把上面四十幅《水滸》人物像摹刻出來。做成了3寸來寬5寸來高的「巾箱本」。

摹刻圖像我叫胡君里幹，他卻說無法在厚厚的書本上刻蠟紙，因為從來沒這麼幹過。於是只好由我先用繪圖筆尖蘸上墨汁在描圖紙上將插圖描下來，再將油印蠟紙蒙在描圖紙上勾出線條，然後交給胡刻鋼板。胡君里刻鋼板的本領的確不錯，我描勾的只是輪廓，他卻能對照書上的插圖，摹刻得相當逼真，很不容易。

（鍾叔河《左右左·水滸葉子的往事》）

這也是他的勞改生涯。那一年毛澤東去世了，一時氣氛緊張，監獄如臨大敵，一切從嚴，他們刻印的「水滸葉子」也被收了回去。鍾先生事先已經偷偷地寄給朱純一本，朱正、張志浩共一本，然後，「我麻着膽子，假意遺落在圖紙堆中了，才又留下一本。」而這一本「遺落」的陳老蓮的「水滸葉子」，在他出獄以後，多年後去北京開會時帶在身上，想給李一氓看看，「因為讀過他的文章，他也是對陳老蓮的水滸人物頗有感情的。」

就是在尊嚴被剝奪的環境裏，鍾先生還是保留着對文化的熱愛，這份熱愛，支撐着他活下去。侮辱，是對「犯人」最好的折磨，這成為監管他們這些人的職業。作為一個人，鍾先生早就失去了價值，他是在殘酷的威脅下、縫隙裏，不斷地為自

己尋找最後的生存的「意義」。靠着這一點文化，得到了救贖。這是真正的救贖，它不再是廝殺後的勝利，而是能在苦難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寧，找到自己靈魂的安放地。每一個字，都給鍾先生悲慘命運帶來營養，他依然活在自我的思想境界裏。一個脆弱的個體，在面對着一個強大的、要陷害他們的社會和體制面前，終於存活下來。

我是在原判刑期還差一年的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平反，離開第三勞動改造管教隊既沘江農場的，董慧在我離開之前二十來天死於茶場醫院。

（鍾叔河《小西門集·潘漢年在沘江》）

彭小蓮

註 釋

- 1 編註：老克拉也稱老克勒，指老上海閱歷較豐、收入較高、在文化休閒上獨領潮流的男性族群，大多出身名門。
- 2 編註：Aleksandr Sergeyevich Pushkin，俄國詩人、劇作家，俄國浪漫主義代表。
- 3 編註：Gustave Le Bon，法國社會心理學大師。

圓 + 方 = 境界

經受了折磨，疼痛在漸漸地消退，那個消退的過程，是鍾先生思考的歷程；從過去到現在，他體內塞滿了各種傷痛和煎熬，從肉體到精神；但是他不訴苦，不滿足於自己僅僅是一個肉身的個體，他在那裏讀書、編書、寫作，他要找出疑問的答案。倒是我，像祥林嫂一樣，什麼事情說着說着就會扯上鍾先生。實際上，在我生活的圈子裏，幾乎沒有人知道「鍾叔河」三個字，我試着在微信上問了二十個朋友，全部都說不知道他是誰，只有其中兩位立刻在百度上查了一下，確認他是一個出版人，主持出版了《曾國藩全集》。偏偏就是這套書，我沒有讀過。

年輕時候的鍾先生，即使當了右派，家裏緊緊巴巴沒有吃的，還是興興頭頭過日子，喜歡為來客留飯；人來人往，家裏總是那麼熱鬧。可是現在，那進門就能在大客廳裏看見的書桌，被他挪進自己小小的臥室裏，為了避免見客。很多客人，他讓小謝（家裏的保姆）擋在門外。熱情在他的成長中消失了，他一步一步往上走，可以跟上他步子的人很少。他說：「除了朱正和周實、王平，跟誰都沒有太多好說的。」

看着他和朱正對話時，笑得那麼歡樂的樣子，你無法相信這是兩位88歲的老人。朱正先生穿着皮衣，風度翩翩。可是年輕時候的朱先生不是這樣的，他是家裏的長子，下面有弟弟妹妹七個，鍾先生一直說，「朱正是孝子，他會自覺地承擔起做長子的責任。」那會兒，朱先生總是一身樸素的布衣，他整潔、利落，向世人凸顯的，他就是一介書生。但鍾先生就是中山裝，做毛嗶嘰或者是華達呢，或者派尼斯；天熱，做好一點的料子，找好一點的師傅訂做中山裝，做的式樣不是像發的制服式的。鍾先生努力不要讓自己看上去像個學生，要有點派頭！

他們倆都生於1931年11月，朱正11月16日生於長沙，鍾叔河11月19日生於澧縣。他們不僅是同一個湖南人，而且還是同一個星座；可是，他們的性格卻孖然相反。鍾先生是紅塵中人，他入世就必然是世俗的，但是他乾淨坦然；他世故，但能辨是非；他有城府，但不薄情義！朱正先生完全相反，他是真正的讀書人，所以他更乾淨單純；他嚴謹，所以他尖銳；他邏輯性強，所以他非常理性。就是這樣兩個人，似乎在隔岸相望，最終卻成了一生的摯友。

由此我更加堅信，什麼星座不星座的，完全是胡說八道，當你親眼見到兩位大先生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性格裏沒有任何一點相似之處，只是他們興趣相同，都是博覽群書、記憶力超強、過目不忘的那種人。兩個人像在比賽一樣，一個比一個看書看得快，看得多，從年輕到今天。

朱先生和鍾先生是今天湖南文化界的兩棵大樹，就像我當年插隊時，村口的兩棵大樹一樣，是一種象徵又是村落的保

護神(我不敢說更大的詞彙，不然兩位老先生都會要求我修改文章)，他們高高地豎立在那裏，遠遠地你就會看見回家的路。他們的存在揭示了一個時代的故事，他們的明智把這個世界詮釋得更深；讓人們驚訝的是，在他們這個年紀，他們的步子沒有停頓，即使有空襲警報傳來的時候，他們還在讀書、還在思考。

他們倆的性格從一開始就沒有銜接點，各自在自己旅程上探路，但是他們那時候才是十幾歲的高中生，於是一個比一個「左」。沒有謀面，是在1949年一位同學的紀念冊上，激情昂揚的鍾叔河寫下一段話，大概是「要做一個普羅米修斯¹」這樣的人，舉着火把，將光明帶給人民！」朱正也在紀念冊上留言了，他居然是針對那個不認識的鍾雄而來，「鍾雄」是鍾先生讀書時的名字，「致一個不相識的鍾雄同志」，這開頭就有一股霸氣，他直接批評鍾先生，不應該把自己看作高高在上的普羅米修斯，而是要全身心投入到人民的戰爭中去。接着又講了一段大道理。朋友一直保留着那個紀念冊，一直到四十年之後，1989年，朋友和朱正、鍾叔河見面，拿出紀念冊的時候，朱先生自己都笑了，「我那時候竟然比你鍾叔河還左！」年輕啊，那燃燒起來的激情，一直在往上竄，誰甘於被人熄滅？那時候他們不認識，可是他們已經是在一個境界裏對峙和建立自己。

但是，與鍾先生的境遇相比，朱先生簡直慘得更加匪夷所思。

朱正的祖父是一個清廉的稅務局長，因為清廉，家境也很一般。比起錢來，祖父更看重的是名分。後來當他父親生下朱正的時候，祖父母都對這個長孫特別的溺愛，他說了一個故事：

我剛出生後，祖父要求我父親整夜不要睡覺來照看我，這當然做不到。我的父親對他的父親說：「不要講是生了個崽，就是生了個爺，也不能整晚不睡覺呀！」

（朱正《小書生大時代》）

父親朱品瑀（1909–1977）幾乎有點自學成才的架勢，然後成為湖南省中山圖書館的會計。所以，從成分上看，朱正的家庭出身非常好——職員，沒有歷史問題。父親對兒子的期望，就是家裏祖祖輩輩將誕生第一個大學生，肯定就是朱正！但是激進的朱正太年輕了，「在那兩年裏，我很想加入共產黨，就跟阿Q苦於找不到投降革命的門徑一樣，我也一直沒有找到。」

這時，朱正馬上要高中畢業了，他決意參加革命！聽說「新幹班」招生，還不是你想考就可以考的單位，必須有黨員介紹，於是不聽從父親的勸告，跑去考「新幹班」了，錄取以後被分配到廣播電台。他的選擇是自覺的，對前途是有思考的，他和鍾叔河不一樣。鍾叔河是追隨一個女孩子，糊里糊塗捲入了「革命隊伍」。臨去上班前，「爸爸對我說：『以後你的前途由你自己去創造了。我這枝鋼筆給你吧！』」話是哽咽着說的，眼上兩個紅圈。」晚年，朱先生深刻地記着這個畫面。

革命的道路是艱難的，艱難到何種程度，是誰都沒有想像力的。



圖十四 1950年考入新幹班的朱正。

天真的朱正，上來就在「革命的道路上栽了一個跟頭」，他得罪了領導。

朝鮮戰爭也影響到了我們廣播電台的業務。電台從國民黨的湖南廣播電台接收下來的器材設備就只有那麼多，真空管燒壞一隻就少一隻，再不及時補充就不能進行了。而美國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許多電子器件不能進口。於是，就由黨支部書記兼副台長帶着一個技術員去香港採購，除了為公家採辦電子器件，他還買了一些手錶之類的東西回來。

當時我只會用一種理想化的標準去看人看事，聽說他從香港買了手錶送給他的戀人，覺得很不應該，就寫了一封信給《人民日報》，批評說不應該挪用外匯作私用。信寫完以後，我讓丁寒、鄧耀群幾個人看，他們也贊同，有五、六個同事在信上簽了名。《人民日報》覆信說，來信已

轉到中共湖南省委處理，於是我天天在等待，根本沒有想到將被處理的會是寫信的我。

（朱正《小書生大時代》）

這以後，朱正就成了「劣等公民」，父親被陷害，在「三反」運動中被打成老虎，關押起來，怎麼被批鬥，家裏人都不知道，只看見「打虎隊」的人把他們家的東西都抄走「抵債」了，最後運動結束時，證明打錯了，東西是還回來一些，但是祖父躺椅上一張完整的虎皮墊子，連虎頭都在上面，卻沒有退回。

後來庚妹有事到那位打虎隊頭頭的家裏去，看到那虎皮就擺在他們家的躺椅上。那是祖父的東西，並不是父親的，父親幾次想索回，祖父知道了，反倒勸說：「算了算了，平安無事就好，不要生出事來。」

（朱正《小書生大時代》）

因為得罪了領導，很快朱正就被列為「朱正反黨宗派小集團」，挨整的日子就這樣開始了。「由於他的『反省不深刻』，朱正被開除了團籍。不久被分配到我們《新湖南報》去了」。鍾先生是這樣跟我們描述朱正的調動。這可不是一個愉快的見面，首先報社就向他們青年團員宣布，「有一個幹部在廣播電台犯了嚴重的錯誤，反黨性質的錯誤，開除了團籍，現在調到湖南報來了，當然他還是幹部，大家也還是可以跟他接近，但是大家要以正確的態度去接近他，去幫助他，幫助他認識錯誤、改正，不能受他的影響，要進行一次消毒，因為他是開除團籍這樣來的。」

鍾叔河或許對幫助人認識錯誤，沒有什麼興趣，他喜歡有自己的生活；本質上，他對「革命」沒有熱情。鍾叔河是小時候在農村讀着不正規的小學，看舊書長大的，所以他更不會在意這個開除團籍的朱正。有一天，「發現了一本解放前商務印書館的《小百科叢書》，我記得很清楚，是誰介紹王陽明的，反正是一個學者寫的書，上面簽的名是『學古』，即朱正，這是朱正的一本書。我說朱正還看書啊，還看這類書啊，因為我是看這類書的，別人都不看了，解放以後，都只學馬列了，我就對朱正有了一個好印象。朱正讀書還是比較多的……」

就從一本書裏，鍾叔河找了知音，他和這個「需要幫助的」，「有嚴重錯誤的」年輕人結下了友誼。那時朱正到處投稿，發表很多，他倒不見得是要成名、要成為作家，他真的在乎那個稿費，因為家裏的弟弟妹妹都在上學，母親沒有工作，父親原來的工資被減少了，朱正作為長子的擔子很重。

鍾先生編輯的業務刊物，幾乎每期都會刊登朱正的文章，也會發給一點稿費。他非常感慨地說：「在我們新幹班也有大學生、研究生，還有老報人裏面同樣有大學生和研究生的，但是沒有幾個人寫得出朱正那樣的文章。你可以問朱正。朱正的文章寫得好，所以我最初對他有好感和接近，是因為覺得他有才。當然這說明我自己認為自己也有一點才啊！」說到這裏，我們和鍾先生一起哈哈大笑！

但是鍾叔河很快就發現，這些稿費朱正一分不差，都交給了母親。這個對鍾叔河是有觸動的，他工資比朱正高那麼多，除了請父親吃飯，從來沒有想到要貼補父母。一直等父親去世



圖十五 朱正（前排左二）50年代與祖父、父母及弟妹們的合影。

了，當然這時自己也成右派了，每個月才交一點錢給母親，心裏還是不那麼情願，總想自己多留一點。他越來越意識到，朱正的節省、顧家，對父母的孝順，這是很好的品格，是自己所不如的。

只是，「在抵抗打擊、應付壓力方面我比他要有辦法一點，我和他有一點很不同，就是我比他世故，他比我單純，也比我純潔，我一直是這樣認為的！被開除以後，我很快融入了社會，而且在社會上表現出了比較強的生存能力，好比說怎麼樣跟社會上的人混在一起，怎麼搞，我比較容易進入人群。從小就是如此，我會一個人跑到協操坪來玩，他絕對不會去的。在舊書店，我會從別人手裏搶過《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他也不會搶的。」

很快，1955年底，肅反運動開始了。他們這個《新湖南報》裏老虎有二十幾個，輪流批鬥，攤到朱正和鍾叔河他們就沒有幾次。突然有一天：

蔡克誠傳我去談話，喜形於色地說：「你講你們不是反革命集團，你倒說說，某日，在烈士公園，你對鍾叔河都說了些什麼？」我說：「我全部交代過了呀！」他反問一句：「你全都交代了？」於是他講了一個很具體很生動的故事：那天，在烈士公園裏的一處（地點很具體），在一個怎樣的環境裏（場景也很具體），我對鍾談了一個很具體的反革命計劃。我越聽越覺得離奇，連聲說：「哪有此事！哪有此事！」蔡說：「你不承認，人家可是交代的——你敢對質嗎？」我說：「當然敢。」他馬上出去把垂頭喪氣的鍾叔河帶了進來說：「你對他說吧！」鍾以一種很沉痛的態度和語氣說：「朱正哪，時至今日，我想我們還是老實交代好。」接着他把蔡克誠對我講的那個故事複述了一遍，加上更多的細節描寫。我真沒想到他會來這樣一手，又惱怒，又絕望，不等他說完就打斷了他：「你不用說了。」我轉身對蔡說：「我承認了，就是他說的這個情況。」蔡把鍾叫了出去，讓我寫材料，我把題目裏講的故事寫了下來。蔡特別興奮：這當然是一個重大突破，反革命集團這個題目終於可以做出文章來了。

（朱正《小書生大時代》）

這就是年輕的鍾叔河，他覺得這麼荒謬的運動，他們要你說什麼，你何必去堅持去爭辯呢？胡編一通，說完就可以出去吃東西嘛。他的想法是：如果真有其事，那是不能招認的；如果根本沒有的事，他們硬叫你承認，那就是胡鬧，胡鬧則只能以胡鬧對付之，反正又不是法官問案。去年搞「三反」，那麼多「老虎」，後來定案，不是一隻「老虎」也沒有了嗎？如今也是在瞎胡鬧，定不了案的，肯定會對質，對峙時朱正肯定會駁斥的。想不到朱正卻完全沒駁斥，也「承認」了。於是他立刻去找了肅反的總頭頭，說明了真相。當然，從此肅反者再沒有鬥爭鍾叔河，再沒叫他坦白了。

而誠實方正的朱正呢，談到此事時卻叮囑我們：「因為是好朋友，好朋友之間就會發生只有好朋友之間才能發生的事。沒有必要寫到文章裏去。」他不理喻「運動」，竟然在那裏遊戲「運動」。那時候鍾叔河已經從18級升到17級了，而朱正正從20級降到21級。這件事，讓朱正先生很惱火，但是現在還會跟我們說：「你們就是掌握一個分寸，就說是好朋友，好朋友之間就會發生只有好朋友之間才能發生的事。沒有必要寫到文章裏去。」可見他很在乎這段友誼，怕我們寫了，傷了鍾先生。我們沒有寫，這些都是摘自朱正的自傳《小書生大時代》裏的描述。很快事情發生了突變：

朱正的《小書生大時代》書中接着的敘述是：

過了一些日子，蔡克誠又叫我去，還是問那在烈士公園裏的反革命密謀，我把那故事背了一遍。他一反常態地問：那時你確實是這樣談的嗎？確實有這麼一回事嗎？我答道：

要說到確實，那麼確實沒有這麼一回事，既然你說有，鍾叔河也說有，那就只好算有嘛。蔡說：現在鍾叔河又翻供了，他說沒有這件事。我苦笑着說：本來嘛！我本來就說沒有這事，你不相信。蔡克誠仍然有理：我們是實事求是的，既然沒有這事，那天對質，你也應該堅持說沒有呀！

認真、實誠，方方正正的朱正也原諒了鍾叔河的玩世不恭。

可是到1957年的秋天，朱正和鍾叔河又一起被打成了右派，毫無疑問，他們是「一丘之貉」。還沒有過上26歲的生日，他們一邊當右派，一邊還是要上班執行國家的指令。當時開始推行「除四害」了，他們每天上班就是在報社裏面掃地，搞衛生，把垃圾送到新河三角洲去。鍾叔河覺得很累，但發現幹這個活很好啊，垃圾拖出去以後，就沒有人管了。既然沒有人管，為什麼一定要倒在指定的地點？隨便找一個地方把垃圾倒掉就是，誰知道呢！於是就可以找個地方坐下來休息，等到下班的時候準時回去。就這樣，他和朱正一起開始「除四害」。朱正說，「這右派處理了，變成每個人要交多少蚊子蒼蠅，也是滑稽。」全民運動，每天晚上街道還要敲鑼打鼓，講起來是舉國有光！鍾先生感慨地說，「其實蒼蠅蚊子是消滅不了的，有水就有蒼蠅蚊子；而且作為生態，蒼蠅蚊子全部消滅了，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也很難說；麻雀老鼠全部消滅了嗎？至少麻雀消滅了沒什麼好處，現在全世界都在滅老鼠，但是也消滅不了啊！」

後來，鍾叔河發現報社裏面有扔掉、磨損的鉛字，再加上辦公室所有窗戶把手都是銅做的，如果搞一點「廢銅」放在垃



圖十六 1957年朱正在新湖南報社。

圾車上拖出去，出報社不遠，到了貧民窟，別人就要這個垃圾了。你就可以倒在他家裏。長沙的地勢，有的進屋就是下坡，住家的人，總是想把後院填高；再從報社拿出那些廢鉛字，這些東西就可以再賣一點錢，往那裏一倒，一天的活又幹完了。狡猾的鍾叔河，「很快就找到了這個竅門，我也不管，公家的東西我也拿一點擺在上面，在報社不可能拿出大門，我把它埋在底下，出去了，把那些貧民需要的東西放在上面，他自然會喊你的。這樣的事我覺得真是好玩！我從小在家裏就調皮，這一類的點子我是很容易找到的，在這方面朱正和我也是大不一樣的。」

這些做學問的人，最後被逼成搗蛋鬼。即使這樣，混日子的階段也很短，批鬥越來越厲害，他們已經被判為「極端反動」

的一類。朱正就是一個被溺愛的好孩子，他讀書好，他對父母孝順。等到反右運動推到高潮的時候，朱正感覺到極大的壓抑，那些肅反時整他的問題，又沒完沒了地開始了，完全沒有依據的揭發和檢討，以至於用「荒謬」都不能解釋。他不得不問自己，為什麼一個人要屈從這樣的荒謬？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局面？這樣的折磨，在任何一個基本層面上，都會磨去這份難以解釋的糾結和痛苦，足以讓人對生命感到厭倦。鍾先生用濃濃的湖南話跟我們說：「多擇（單）群（純）的朱正啊！那時候，他都沒有談過戀愛。」那種痛，到了88歲時，鍾先生都找不到措辭表達。他們一起被判為「右派骨幹分子，也就是極右分子，家庭和個人出身雖不算反革命，但思想極端反動！」

鍾叔河同樣放不下朱正。反右鬥爭激烈時，朱正曾經表示厭煩得很，甚至對鍾叔河談到了死。鍾叔河便認真認真給他寫了一首七律：

莫行江上賦懷沙，江水清寒不是家。
一死豈能逃怨責，半生何必在悲嗟。
有酒易尋千日醉，亡情休種四時花。
我自笑人人笑我，傷心今古滿天涯。

這裏的「懷沙」當然是意味着屈原赴死前寫的絕命詩〈懷沙〉，鍾叔河口口聲聲讓朱正「莫行」啊，因為江水清寒不是家！寥寥數字，已經把痛徹肌膚的感覺描述出來了，那更加不要說鍾叔河內心對朱正的感情了。

這首詩，在他們幾個彼此無話不談的「右派」中傳閱，朱正、張志浩、李長恭都作了和詩。

這時候，最狠的處理出爐了，他們這些「極端反動」分子要開除公職，送去勞動改造！但是鍾叔河從民主人士的父親那裏，看見了正式文件，發現不引人注意的一條，即使最嚴重的處分「送勞動教養」之下，還附帶了一句：「本人不願接受處分者，允許申請回家自謀生活，由其家庭和當地居民委員會在政治上加以監督。」他的「世故」體現出來了，他不告訴別人，否則會給自己帶來「抗拒改造」的結果，但是朱正是一定要知道的，他們要幫助「單純」的朱正一起避免更大的災難。於是朱正以家庭負擔重為理由，要求留在長沙養家糊口，並且也得到了批准！

1958年4月28日，報社用一輛大汽車把十幾個右派分子送往勞改集訓班了。鍾叔河和朱正都沒有在卡車上。可是，新的恐怖誕生了，朱正的父母非常害怕。

兩位老人對我又是安慰又是勸說，讓我放心家裏，不要掛念他們；叫我聽黨的話，這一次就用接受處分的行動去表明悔改的決心，也許可以換取以後較為寬大的對待。一家人的心情沉重極了：一面竭力敦勸我到那個去不得的地方去，一面又為我面臨災禍感到痛惜。父親輕聲地說道：哎，可惜不能換人，真願意是我去，把你留下來。我想起了清人黃仲則的詩：「褰帷拜母河梁去，白髮愁看淚

眼枯。慘慘柴門風雪夜，此時有子不如無。」要是從來沒有我這個惹是生非的兒子該有多好！我給鍾愛我的父母平添了多少憂愁，多少羞辱，多少驚惶！雖然他們並沒有能夠說服我，但是感動了我。

（朱正《小書生大時代》）

當晚，朱正就下決心去勞改集訓班了，他立刻跑去告訴了鍾叔河自己的決定。實際上，父母還擔心，如果朱正留在長沙，又和鍾叔河天天泡在一起，他們兩個人只有找對方才有話講，到時候又會變成反革命集團。臨走前，鍾叔河陪着朱正去遷戶口，因為勞改的大隊伍已經出發，朱正將獨自到勞教隊報到。派出所門前遷戶口的隊伍很長，慢慢地移動，他們等待了好幾個小時。在這長長的隊伍裏，站着兩個27歲不起眼的小伙子，他們低着頭一前一後，互相無話可說。

沉默中，萬念俱灰的朱正，輕輕地念了一句詩：「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站在他身後的鍾先生接了一句：「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朱正沒有回頭看他，就是繼續吟誦，接着下一句：「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鍾叔河回道：「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朱正：「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說到這裏的時候，站在朱正身後的鍾叔河已經熱淚盈眶，他克制着，不發出哽咽的聲音，念了最後一句：「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鍾叔河完全不知道，站在他前面的朱正，早就淚流滿面了。

這首詩名為〈贈白馬王彪〉，是曹植描述他與白馬王曹彪在回封地的途中，倆人被迫分離時的複雜心情，感情非常沉痛淒婉。全詩分七章，這是第六章，曹植強自寬解，以豪言壯語和白馬王曹彪互相慰勉。

隊伍還是繼續往前挪，這兩個年輕人一句一步，一步一句，時間越來越沉重，拖着雙腿幾乎穿越到漢末三國，他們既想逃避現實，又被現實所裹挾，和社會的「低端人口」一起，走向不明確的明天。朱正馬上就要遷出戶口、離開長沙，眼淚也抹不去他們內心的蒼涼和恥辱。

如今重提往事，鍾叔河還是會說，「我無法勸他一定不要去，我說能夠不去就不去，去了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現在是它不要我們，我們應該離它越遠越好，這裏說的『它』當然指的是報社，可是後來又變成我的反革命言論，說我要離開共產黨越遠越好。」朱正還是走了，後面的艱辛、苦難真的比鍾先生在淞江勞改農場還慘，一個文弱書生，就被徹底蹂躪了。

饑餓讓很多人生了病。我們中間浮腫的人越來越多了，當時稱做水腫病。一些人腫過一段日子又變得乾瘦。這麼多人得同樣的病，並不是因為傳染，只是病因相同罷了，這病因就是：長時間持續的饑餓和過度的勞累。得病之後，也就是發腫之後，病人渾身無力，開始政府幹部還不知道要讓這些人休息，還每天把他們趕到工地上去拖石塊。終於由饑餓發展到餓死人了。三天兩頭抬着出去一個。我們組的石德義，外組的左達、朱祖璋，都是這樣死的。

（朱正《小書生大時代》）

朱正活下來了，活得非常艱難，人瘦得不像樣子。父母去探望的時候，總是帶點吃的東西。

有一種豬肝醬罐頭，大約一百克一罐，我覺得很好吃。後來我才知道，那是拿長沙居民定量供應的肉票去買來的。我吃了豬肝醬，家裏的人就沒有肉吃了。說實在的，即使當時我知道這一點，我還是會吃那個罐頭的。饑餓可以破壞人的道德觀念和感情。

（朱正《小書生大時代》）

饑餓之後是對生的渴望，只是渴望裏面會產生感情，這對一個勞改犯來說，比一罐豬肝醬還奢侈。饑餓和折磨，不僅讓精神損傷，連最基本的人性也會消失，當人們都無法顧及精神財富的時刻；人，依然是無法被改造的，這和「主義」不能阻止一個人的思念一樣。越是饑餓，越是絕望，思念常常越是強烈！在那樣的時候，朱正給鍾叔河寄去一張明信片，反正你們這些人都是看不懂的，他堂而皇之地展示在眾人眼前，那張已經沾上灰塵、髒兮兮的明信片，落在鍾叔河的手上時，朱正的每一個字，都比吃着豬肝醬時感覺更加饑渴，鍾叔河品出裏面難以表達的感情。

季子平安否？長令我無眠。

夢裏依稀相見，執手為鳴咽。

漱玉香箋錦字，烈馬寶刀紅拂，神采固翩翩。

煮酒論南北，豪語小孫袁。

一時時，一日日，一年年，
天涯咫尺，辜負三生石上緣。
長沙故人問我，為道賤軀頑健，書癖卻依然。
千萬善珍攝，寒食落花天。

「這是朱正在株洲勞教時，寫在明信片上寄給我的，明信片沒有保存了，這是他做得很好的詩，水調歌頭，我念斷句給你聽，我不需要看，我背得出。『季子平安否』，這是一句有名的詞，清朝有一個顧貞觀他用這句話打頭的，他原來的是『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哪堪回首？』他就借的那一句作為開頭，下面都是他自己做的了，我是老三叔河，季就是老三，『季子平安否，長令我無眠』，想念。『夢裏依稀相見，執手為嗚咽。漱玉香箋錦字，烈馬寶刀紅拂，神采固翩翩。』這三句話是寫我的，原來給我寫信的女孩子很多。『煮酒論南北，豪語小孫袁。』便是形容我們兩個了……」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鍾先生還能一句一句背誦着朱正寫給他的詩。他們的友誼，他們「為道賤軀頑健，書癖卻依然」的狀態，長令我無眠……

到了1960年的夏天，省勞改局要建大樓了，去勞改隊挑選一些還能幹活的人，於是朱正被選中。朱正不知道水泥對皮膚是有很大的腐蝕作用，在細沙漿攪拌的時候，一不小心，腳被腐蝕後破了皮膚，肌肉神經都暴露在外。可惡的是監督勞動的隊長，也是一個右派分子，為了表現積極，不管不顧地逼迫着朱正，吼叫道：「快點走，快點走！」鑽心的疼痛，怎麼走

啊？對於這種人，你沒有什麼好說的，於是朱正找到了給他們派工的頭目，讓他看自己的腳已經傷到什麼樣子，小頭目沉默着，沒有任何表情的臉，看着朱正，停頓很久以後說：「明天開始，你去篩沙子吧！」這樣走動少了，腳，漸漸地開始恢復。

就在離開篩沙子不遠的地方，隔着籬笆可以望見街道上過往的行人和車輛，但是朱正就是那麼認認真真地幹活，從來不會朝籬笆外邊張望。鍾叔河那時已經開始在繪圖，能夠有些閒暇在外面溜達。他會到郵局去看閱報欄，把所有的報紙看一遍；他每天從蔡鐸路經過，那裏正是「新生企業大樓」，招來的勞改犯朱正正在那裏幹活。突然，他看見朱正在篩沙子，他愣愣地站着，期待着朱正抬頭，能有一個回眸一望。可是朱正就是那樣認真的人，一直低頭幹活。

第二天，鍾叔河又跑到那個地方去，朱正依然沒有抬頭，周圍是看管他們的人，鍾叔河不敢發聲，就是在那裏看着他，「一時時，一日日，一年年，天涯咫尺，辜負三生石上緣。」「朱正啊，你怎麼就那麼單純，你就不能抬頭看一下，不要死幹活呀！」鍾叔河心裏真是感慨萬分。他站在那裏看了幾天，終於有一天發現在人行道上釘了欄杆木板子，他要是走到門口，小聲講話朱正是能夠聽到的。正好看見監督的人走開了，他趕緊喊道：「朱正，朱正。」也不能大喊，萬一被別人聽見了呢？就會出大事的。「回眸一望」，簡直成了偵探片裏的行為，所有的期盼都讓人絕望，朱正你就抬頭看一下啊！「今日埋頭忍清淚，當年引頸盼紅旗」，這是朱正的詩句，可鍾叔河是「今日引頸盼回眸」啊！幾乎在絕望的時候，幸好朱正聽見了鍾叔

河的聲音，他挪動了一下位子，低着頭朝籬笆那裏走去。走近鍾叔河的時候，抬頭看着他，沒有任何激動人心的場面，隔着籬笆，他一句話都沒有說，鍾叔河只輕輕說了一句：「我現在搬家了，住在余家塘」。兩人像地下黨接頭一樣，說完暗號，交待了地址，沒有囑咐，更沒有告別的措辭，各自掉頭離去。

不久後的一天，朱正被安排去醫院做X光透視檢查，就在鍾叔河住的余家塘邊上，做完透視，趁人不注意，他跑去找鍾叔河了。緣分，鍾叔河在家！進門，兩個人竟然詩意全無，朱正只說了一個字：「餓！」他問鍾叔河：「家裏有東西吃嗎？」鍾叔河慚愧地接不上話，家裏居然拿不出任何東西招待朱正，可是朱正不在乎，他說：「冷飯也可以！」不說還好，這一說，讓鍾叔河心痛得都想流淚，他老老實實告訴朱正，家裏連冷飯都沒有。「那時節，哪一頓飯有得剩呢！」朱正在自己的文章裏寫道，他趕緊往工地趕，鍾叔河陪着他走，「一路上交談了別後的情況。他這樣的自謀生路的右派分子，由街道派出所編成一個學習組，有時候被叫去開會學習。他以描圖維持生計，大約每月有四、五十元的收入。他說，『你當初不去就好了。』我說『這事就不用提了。』」

從1958年的5月到1962年10月，朱正終於被宣布解除勞動教養，他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到長沙。幾年後，鍾叔河與他熟悉的兩個工程師，機械方面的專家，打算在街道上辦一個小型工廠。因為朱正的六弟，一個非常能幹的初中畢業生，與街道的關係不錯，於是就在他的名義下，很快建立起一

個「立新科技模型廠」。十個人不到的團隊，在蔡鶚北路一本正經地掛上了牌子，也算一個「廠」了。看來，這些人搞在一起，就能經營。收入不菲，計件工資，朱正和鍾叔河一起去幹活了。結果到年底發工資，鍾叔河拿的錢比朱正要多出不少，朱正非常生氣，跑去找鍾叔河評理，但是鍾叔河說，「這是計件工資啊，我做得比你多嘛。」

朱正像個中學生，氣鼓鼓的，說不出道理，把鍾叔河家裏的書櫥玻璃給砸了。我們聽到這個細節，都忍不住哈哈大笑，還是年輕啊，那麼深的學問也擋不住年輕人的熱血，這應了朱先生現在跟我們說的話：好朋友之間就會發生只有好朋友之間才能發生的事！

鍾先生說：「一般的說，你到別人家裏來砸東西，那是要蠻大的問題，而且當廠長的是他的弟弟，管錢的是他的弟弟。他覺得他拿錢拿少了，找我生氣，這個事情我覺得我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事後他的弟弟來向我道歉，但是我的身分不可能我去定這個工資，是他的弟弟在當廠長，在那裏做事，是按計件做的事，不是按照文化水平，也不是按照報社的工資級別，這個我認為是他生氣，我並不恨他，我覺得，他吵了就吵了，我不生氣。」

他們吵架的時候，互相指責對方，朱正先生說鍾先生：「市儈氣！」

鍾先生毫不猶豫地回敬他：「你是師爺氣！」

說完以後，鍾先生也像朱先生那樣，關照我們：「這些你們不用寫，兄弟之間還打架嘛，也只有兄弟之間才會發生這樣

的事嘛！」可是，我要寫，這一點無損兩位老先生的形象；我看見的是兩個年輕人的友誼，那種心煩意亂和熱血澎湃攪和在一起，它們穿透感情的表達，肆意狂妄，詩人！

文革開始了，朱正和他的右派妻子鄭柏齡搬到文藝路二里牌，住在矮小的平房裏面。家門口被造反派掛上一塊「匾」，上面寫着「右派分子鄭柏齡」。文革攪得所有人都是熱愛毛主席的，於是打着這個旗號，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於是一陣翻案風掀起，他們《新湖南報》受迫害的人，都紛紛起來「造反」，以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由，要求平反。鍾叔河冷冷地站在邊上看着，不屑地說道：「要是翻（案）成了，在平反大會上，一定會有一項批鬥真右派的議程，又會把我們牽去鬥爭一回。」說完這話，不出多久，鍾叔河就被捕了，被一個大學生舉報。他，謝強安（音）「讀書不多，但是很聰明的，聰明程度不會比我和朱正差，但是讀書比朱正少得多，見識當然也就差了，因為他聰明，就喜歡他，跟他交談……他先被抓進去了，他指出，有些話是從我那裏聽去的。他要找一個轉移的目標，他才可以脫身嚟，要有另外一個更顯著的目標。『那個人家裏，很多人到他那裏去，』自然就是我家了。」

朱正活得非常艱難。

其實我的信心，比柏齡堅定不了多少。我們在二里牌的住處實際上只有一間房，一家子住着太擠了，每天吃過晚飯，我就把曉兒放在自行車上，推着車到楊家山我父母那裏去睡。那時他才一歲多，正在學說話。有一回在路

上，我問他：「曉兒，這日子過得出來嗎？」曉兒很快地回答：「過得出來。」當然，他完全不懂這話的意思，他只不過像鸚鵡學舌一樣學大人發音罷了。可是我，就像一個求籤問卜的人求到一支吉籤一樣，把他這一聲回答當作一種預言，感到了一點點寬慰。

（朱正《小書生大時代》）

他們就這樣一步一步往前走，那時候朱正搬家也遠了一點，和鍾叔河的接觸不是那麼頻繁了。1970年初，他突然聽到鍾叔河在3月17日被捕的消息。4月4日，也是報社右派的劉鳳翔被槍斃，這個影響了楊小凱一生的人，以莫須有的罪名槍斃了！說他要建立一個「中國勞動黨」的反革命組織。

我既悲哀又感動，鳳翔出了這麼大的事，命都送了，對我卻沒有絲毫牽連。就憑我們私下交談的「三反言論」，就憑他逃避追捕時在我家躲藏了半個月，如果不是他決心保護我，只要不小心多說一句話，我就牽連了，我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在悲哀中，我寫了這樣一首詩：不見一抔土，無依三繞枝。霸才輕委棄，天意固難知。觸目皆新鬼，支頤憶舊詩。百身如可贖，九死亦奚辭。

（朱正《小書生大時代》）

朱正是緊張的，他不知道鍾叔河會不會又像「烈士公園」那樣編一個故事出來，如今的運動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殺人是隨心所欲的，來不得半點的「玩笑」；更糟糕的是，他不知道鍾

叔河是什麼原因被捕，萬一要他揭發交代的話，怎麼蒙混過關呢？鍾叔河被捕以後，一直是安靜的，顯然，他沒有「揭發」他倆之間的任何事情。但是，朱正以他自己的邏輯做出決定，不論問什麼，就是「一口清」，什麼都說不知道。即使讓他說，他們平時都是談詩論文的事情，也不行。因為，審訊的人都是沒有文化的，只要是他們不懂的東西，就會在裏面瞎做文章！更何況，他無法和鍾叔河聯繫，不管他說了什麼，只要有一件小事被他們抓到把柄，他們就會訛詐鍾叔河，結果互相都會被捲入進莫須有的罪名裏。就是一口咬定，什麼都不知道。就這樣，造反派找過朱正幾次，他就以「什麼都不知道」僥倖過關。

可是9月30日，朱正準備去父母家吃中飯，突然一切都發生了，戶籍警從他父母屋子裏衝下樓，迎面抓住朱正，把他押回自己家，同時給他拷上了手銬。

抄家正在進行，屋子裏的人很多，幾個警察，還有居委會的治安主任等人，我一家老幼都站在窗外的空地上靜靜地望着那些人。我戴着手銬，坐在門外一張矮凳上。這時候晴兒才一歲七個多月，還不會說話，正在學步，她繞着我一圈又一圈蹣跚地走着，當她又走到我前面的時候，我伸出戴着手銬的雙手把女兒抱起來放在我的腿上。一個街道積極分子吆喝道：放老實點！我沒有理睬，心裏想：我抱起自己的女兒，有什麼不老實的。

（朱正《小書生大時代》）

很快，朱正被押送到長沙市左家塘看守所21號。24平米

的屋子，只有一扇高高在上的小鐵窗，陽光幾乎從來沒有從那裏投射進來。白天屋子是不開燈的，可以想像在黑暗中，人的心情會是什麼樣子，更不要說，時不時有人被拉出去審訊、槍斃的。屋子很小，五張雙層床，一邊三張床，一邊兩張，留下的空間是放一個糞桶，牆壁上還有一個水泥做的小便池，小便直接從那裏流到室外。直到1971年5月，朱正被轉移到「23號」監房，進去那裏的人越來越多，其中就有鍾叔河，見面時，他們誰都不說話，心裏都明白馬上要結案宣判了，不然為了防止他們串供，是不會把他們關押在一起。鍾叔河輕輕地對朱正說了一句：「我並沒有提到你們。」朱正相信！



圖十七「反革命小集團」成員鍾叔河、朱正、張志浩（從左至右）
文革後合影。

等到人都到齊的時候，窺視的孔眼裏，不斷地塞進一個個宗卷，就聽見看守喊話：「你們每個人拿自己的！」朱正判決刑期為三年，鍾叔河十年！在閱讀朱正《小書生大時代》的口述自傳時，我竟然發現，朱先生描述他們被押往茶陵沅江勞改農場的過程，竟然和楊小凱敘述的，如出一轍！在沅江勞改農場，他們共同熬過來了，朱正期滿三年就離開了那裏。鍾叔河一直待到1979年的3月16日才離開茶陵沅江勞改農場。

出來第一件事情，鍾叔河就是跑法院，人家也是懶得搭理他，他就不停地去催，法院的人說，「哎呀，我們現在積案有多少你知道嗎？那麼多積案，哪裏來得及啊！」鍾叔河說：「你們積案再多，也不是我的問題，是你們的問題。我的問題為什麼不能解決，朱正的問題都解決了！」法院告訴他：「那朱正你怎麼能比呢，人家朱正是知識分子。」

鍾叔河第一次知道，知識分子又成了一種待遇，心說「我不也是知識分子嗎？」但最後還是給他辦了。多不容易啊，鍾先生終於「進入」了知識分子階層。問題一解決，朱正趕緊找到湖南出版局的局長兼書記的胡真，向他推薦了鍾叔河，因為他也不願意再回《湖南報》，胡答應了，很快卻跟朱正說：「不行，我去了解了一下，有些同志的反應和你不一樣。」

「有什麼反應不一樣？」

「很多同志說，老鍾人很驕傲，不好領導。」

「這恐怕是對的。可是，我現在向你推薦的是一個能幹的編輯，不是一個修養完善的人。在你胡真同志的領導下，哪有什麼不好領導的幹部呢？」

胡要求朱正帶着鍾叔河去他辦公室面談一次。朱正說：「那鍾叔河能說會道，比我會講得多。於是，胡真馬上就下決心要調這個人，等到胡真要調人的時候，《湖南報》又不肯放了！我跟他不同，是《湖南報》高高興興地放我走的，我去那裏，人家馬上就開介紹信，說是右派已經改正，介紹到湖南出版局；但是鍾叔河，人家就是不把關係介紹到出版局。他們也知道，這是個人才嘛！」然後，朱先生自嘲道：「我就是看着像沒有用的人嚟。」胡更加在乎這個鍾叔河了，跟財務科說，「交給他們一個任務，不要他《湖南報》的關係，直接每月給他開工資。」領導這麼說了，財務科就照辦。《湖南報》一看，鍾叔河都在人家那裏領工資了，人是回不去了，乾脆做個人情，這才把關係轉了出去。

一年後，1981年，同是50歲大壽的時候，鍾叔河掐指一算，他們都認識三十多年了，為此他給朱正寫了一首詩：「同屆知天命，相從三十年。論交吾與汝，諳味米和鹽。監房分餅宴，報社賣文錢。卻憶青春事，華髮兩蕭然。」

可是華髮再蕭然也不行，五年後「哥倆好」又不愉快了。鍾先生有一本他在人家手上搶下來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他拿給朱正，讓他重印出版。因為鍾叔河已經調到岳麓書社，是一家古籍出版社，不能印外國小說，他還說：「我認為朱正可以出，我把書給他，朱正出版以後，我問他要的代價是一百本書，但是後來他沒有按我的要求做，受了處分他又生我的氣。如果我自己來印，不會受處分，我只賣書票，我不會去賣書，我也不會在一個廠子印，讓他盜印很多，我一個地方印

書，另一個地方裝訂，只賣書票。他賣五塊錢一本，我要賣五十塊錢一本，作為內部參考資料賣。我先發函，你要的話先把錢寄來，我才給你一張書票，拿書票領取，我沒有必要印幾十萬冊，我印十萬冊就可以了，我賺錢還賺得多些，我不會出問題。他交給一個人承包，印這個書，那個人賺了很多錢，買了一個護照到泰國去了，卻處分了他。他生我的氣，其實我無意嫁禍於他。如果我自己做我不會受處分，我在岳麓出書沒有受過任何批評，我都是搞清楚了路子，才去做的。假如說這個事會查辦，我就不會做。因為我是在這個體制下做事，我會去搞清楚我才去做，所以我做的事，我印《曾國藩》80年代也沒人敢印的；印「周作人」，就更沒人敢印了；印《三字經》、《百家姓》，也有人反對。但我印了都沒有什麼問題。」

這就是鍾先生的「世故」！朱正先生也有他的說法，書票的事情，是他早就想到的。這沒有問題，但是他確實不會把後面的事情處理得那麼「聰明」，他被人抓到把柄了。

朋友連忙告訴我，這書不能出，瀟江出版社報了這個選題，沒有批准。他們還給我了一張打印件，大意是，瀟江出版社：你社選題計劃中的《恰特利夫人的情人》²不得安排出版。當時叔河也正好在北京，我把這個打印的公文給他看。我說，這書恐怕是出不成了。他說，這是給瀟江出版社的，又不是給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你管它幹什麼。

（朱正《小書生大時代》）

問題出在後面，朱正堅持不要出了。但是社裏的大多數人

都主張出，特別是發行科，徵訂數直線上升，從三十萬，到開印時已經是三十六萬了。1987年1月12日左右，書就印出來了。匪夷所思的是，哪裏是追着文學而來，是買家看見了「性」和「商機」，於是汽車在印刷廠門口排隊等候。沒有想到，查禁令下達，出版社又四處追回已經發出去的書，有人提出全部銷毀。朱正不同意：「只把還沒有來得及裝訂的化漿吧，已經成書的都封存起來，聽候處理。」幸虧挽救下了成書，不久以後，這些書被批准出售，出版社靠這書，掙錢了。但是，朱正接受了處分，撤銷他總編職務。這個處分讓人也有點哭笑不得。湖南出版局還有從延安來的老幹部說：「什麼書不好出，要出《撒切爾夫人的情人》，這不會影響同英國的關係嗎？」

即使是世故的鍾叔河，一年之後，也因為省新聞出版局的領導在岳麓書社搞了「一人一票」的選舉，鍾先生落選了。他沒有意見。計劃出版一百種的「走向世界」叢書，僅出來三十六種。他收拾好其他的六十四種資料，都全了，帶回家裏。他就想：如果書不出了，我會把這些賣掉，刻本、抄本都是我個人收得的，不是公物。

終於在他有生之年，還是看見了這一百本叢書出全了。他還為其中的四種寫了序論。鍾先生的問題是他做得太好。「越是搞得名聲大，有的人對我越不高興，認為對他的威脅更大。他總認為，為什麼沒有人表揚我，只表揚鍾叔河。其實我完全沒有組織別人來評我評書。那些人，李銳、錢鍾書他們，不是你有辦法就能喊得來寫的。我又沒有主動去他（錢鍾書）那裏，是他叫董秀玉帶我去的。錢鍾書寫來的第一封信，也還是交給

董秀玉轉寄給我的。我去了以後，地址都沒有留下，我暈車，沒有吃藥，很不舒服。他覺得這個書他要支持一下，這個書很好。從未請客送禮或者通過什麼關係要別人寫書評的，我也沒有這個力量。」

如今，鍾先生對我們說：「我現在活到88歲了，可以對一生來評價了。我承認朱正，我一直是這樣承認的，他比我單純得多，某些方面也可以說是純潔得多，社會上的事情他不一定很瞭然，怎麼樣去謀生、怎麼樣去搞。結婚以前，他是沒有和任何女性發生過關係的，我是這樣認為的。我不是這樣的情況，講老實話，我有那麼多經歷。我覺得，應該說他是比我好的好人。好比我自已女兒，是去找一個鍾叔河這樣的人，還是找朱正這樣的人？我傾向於她去找朱正這樣的人。這是我講的真心話。但是我是不是很壞？當然，我覺得我也不是壞人，事實證明我也不壞。」

朱正先生是學者，他不會那麼隨意、幽默地跟我們評價鍾叔河的，他思考嚴密、說話慎重！他只是淡淡地說道：「他的《學其短》拿給你們看了嗎？那本書做得很好，但是那種工作又何必由鍾叔河來做呢？我覺得，這些事由別人來做也可以做；比如像我現在寫的這本書，還有反右啊什麼事情，如果他願意，他都可以做得出來。這我很了解他……」

鍾先生從小是在大自然裏長大，在宗族的七大姑八大姨裏穿梭，他的生活裏，他身上，彌漫着煙火氣，他懂人情世故，所以，他會喜歡周作人。朱正先生是在柏油路的城市出生，他讀的是知識分子教授的新式學校，雖然他古文學養也好，但是

他不會像鍾先生那樣，在八股文那麼機械枯燥的文章裏，還會讀出一點趣味。影響他一生的蕭老師，儘管只教了他一個學期，但正是從他那裏，開始對魯迅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以至於在1955年肅反運動，整治他的時候，24歲的朱正可以面壁而思，在沒有任何資料和書籍參考的情況下，憑記憶完成了《魯迅傳略》。他從魯迅這裏走向文學、走向學術。

如今，在88歲的高齡，朱正已經摘下了「魯迅研究專家」的身分，開始研究近代中共和共產國際的關係，早期共產黨的歷史。鍾先生說：「這是他的強項，因為他的思辨能力很強。這個方面那些專門研究黨史的、研究國際史的專家，掌握的資料和外文資料應該比他多，這方面他沒有什麼優勢，但是他們的思辨能力不如朱正，所以他的研究成果現在來講還是別人不能及的。好比他寫《反右鬥爭史》，他就是全部用《新華文摘》、《人民日報》的資料就夠了，他很會用這些公開發表的資料和檔案！」

但是朱正會非常惋惜地說：「鍾叔河是非常聰明的，是我們這一輩人中間少有的聰明。他是可以做更多、更大的事的材料，至少比我聰明。我就覺得他很可惜，他把一些現實的東西看得重了一些，所謂理想追求的東西好像少了一點。」

他們倆實在是兩類人，鍾先生在他的現實裏，依然是興興頭頭過日子、做學問，他是「圓」的，行雲流水一般；朱先生在他的學術裏，繼續嚴謹、深入地思考！方正有序！他們都像各自的名字。

遇到湖南衛視的製作人，我問他：「知道你們湖南的鍾叔河嗎？」

「不知道」。

「採訪過朱正嗎？」

「朱正是幹什麼的？」

這可是中國第一收視率的電視台啊，於是我終於為自己不看電視，找到了最好的理由。我想，如今在湖南的文化界，沒有朱鍾，不成方圓。這是最低的底線和境界。

彭小蓮

註 釋

- 1 編註：Prometheus，希臘神話人物，是最具智慧的神明之一，名字有先見之明的意思。
- 2 編註：《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另一種譯名。



圖十八 如今鍾叔河與朱正見面的情景。（王平攝）

與鍾先生閒聊（四）

喜歡聽鍾先生的講述，是因為他總是會把很複雜的東西，用最簡單的句子表達清楚，就像他的文章，很「短」。他在最隨意的閒聊裏，那些不經意的話語之間，蘊含着很深的道理。他不吊書袋子，都是他長年積累沉澱的流露。

彭：鍾先生，能談一下你對「五四」的看法嗎？你覺得你們這一代人受到「五四」的影響嗎？

鍾：「五四」的影響完全是正面的，「五四」在歷史上的地位我認為是要肯定的，是傳統中國走向現代中國很重要的一段歷史。

彭：你對「五四」「反傳統」的這一點，是怎麼看的？

鍾：反傳統沒有錯，因為中國的傳統確實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傳統文化在這方面起着很重大的消極作用。但是任何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都不是可以全部否定的，事實上也否定不了。比如說我是黑頭髮、直頭髮，黑眼睛，我永遠是直頭髮、黑眼睛，傳統詩詞我也很喜歡，中國的漢語文，中國的文言文我都很喜歡；文言文有很多可取的地方，一個是，它沒有

什麼很嚴密的文法，它的詞性是可以變動的。所以全世界的文字，敘述同一件事情，紙張最少的是古漢語，這是它的優勢。所以古漢語很難取代，這個優勢我很喜歡它，我選了幾百篇古文，原來是選給我外孫女讀的，結果她們沒有誰好好地學，倒是她們的母親學了一下。

現在還有一本《學其短》，《念樓學短》則有幾個本子，「邏輯思維」買版權在印，掛了一個名字「千年的簡潔」我也同意。出版社去印，我也可以收一點稿費。印幾萬冊，幫助人們學一點古漢語。學古文有兩條途徑，一條是從《弟子規》、《百家姓》入手，另外一條是從《大學》、《中庸》入手，都是錯誤的。《三字經》、《弟子規》這些東西，「五四」時候就反對了，世界觀很舊，《儒林外史》就批判它了。《四書五經》對少兒讀本也不適合，太深了。我選的這些文章，是給高中生的讀本，是一種基礎的古漢語。我們當然要做現代人，要走白話文的路，穿漢服，扮古人是很可笑的，你很不方便嘛。學一點古文絕不是提倡復古。[見書信九]

彭：你認為「五四」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它很激烈，產生那種「左翼」的文化，都是因為「五四」的原因產生，你怎麼看？

鍾：也不能完全這麼看。第一，矯枉要過正，我不講矯枉必須過正，矯枉會有一些過正的現象，不可避免，但是它自己就會糾正的。你看那些「五四」的現象，它後來自覺、不自覺地都糾正了自己的偏向。魯迅、周作人都是「五四」的健將。

彭：包括陳獨秀。

鍾：都有激進的成分，但後來自然會修正的。破除傳統婚姻，破除這個男尊女卑會帶來女性解放，包括性解放，會有一些偏頗。

彭：鍾先生，你覺得「五四」對你一生的成長有影響嗎？

鍾：當然有影響。我是無條件地接受「五四」先行者的觀點。胡適也是「五四」健將，真正搞舊學搞得好的也是「五四」那些人，對不對？當時反對「五四」的那些老先生，有一派人，搞古代學術、搞傳統學術，他們那些人也不如新的人，因為時代變了，方法變了，手段變了。所以時代在前進，我們要肯定這一點。

彭：不對，時代也會重複歷史的錯誤。

鍾：那是局部的。會出現逆流，會出現回潮，但是總體上人類總還是在進步和發展。假如這一點我們都不相信，那就很糟糕了，那我們就沒有信心了，我們幹什麼呢？

彭：我覺得不會，人類像轉圈子一樣，也會倒退得很厲害。

鍾：不會，總體上來講是進步的。

彭：進步什麼？埃及文明就滅亡了，你到埃及去看看，一塌糊塗。

鍾：文明滅亡了，現在的埃及人還是比古埃及人過得好。古埃及尼羅河再氾濫也養活不了幾千萬的人。就是那時的幾百萬人，把那麼多巨額的黃金去陪葬君王，比起那種制度來，如今總還是進步了。

彭：埃及文明沒有了。

鍾：現在是阿拉伯人，這是一個文明史的問題。所有的古老文明，七大古文明古國，原來講四大文明古國，四大文明古國唯一存留至今的就是原來我們漢人，你和我都是殷墟先民的後裔，只有我們漢族。古老的巴比倫，現在的伊拉克，是阿拉伯人了，古老的埃及現在也是阿拉伯人了，古代的印度文明現在是雅利安人，也是外來的，印度的文字已經變成英文，印地文、梵文沒人認識了。印度人懂梵文的還不如英國多。現在只有我們中國的漢字還是殷墟的那個字，男、女、東、西、南、北，都是原來的。我們漢人，所以我們這個民族是很古老的，說明我們這種文化的複製能力非常強，複製能力強的文明也就是保守的文明。日本便由明治維新一下子現代化了。

彭：他們的傳統文化為什麼比我們保護得好呢？

鍾：正因為他們全盤西化，所以他就能夠保存得那麼好。他曉得傳統文化應該珍視。日本人為什麼，剛才我沒有回答你那個問題，都是在十九世紀才開始被迫開發，中國和日本在這一點上沒有什麼不同。日本原來是沒有文字的，他是叫做全盤唐化，他什麼東西都是學隋唐，文字也是拿漢文去拆開、去做拼音，拿了漢字才去創造日本文字，他們原來讀書也是讀漢文，只是搞不一樣的注音，把日文搞出一個文法來。標註，最早的日文典籍是這樣的，字還是一個一個都是漢字，後來慢慢的，日本的文字變成漢字只記專有的名詞了。

正因為它原來沒有文字，所以才能夠全盤唐化，後來又能全盤西化，全盤西化就變成了現代化的民族，現代化的民族就知道自己傳統的可貴，他才能真正用科學的態度來整理和保存

他自己固有的文化，傳統文化比中國保存得好得多。他全盤唐化，也沒有變成唐人的殖民地，中國人從來沒有去統治過日本。他全部西化，美國人也沒有把它變成殖民地，而且它還把美國打趴在香港。全盤西化沒有問題，全盤西化了，日本人還是日本人，並沒有變成金頭髮、藍眼睛，還是黑頭髮，直鬍子，變不了的。

彭：鍾先生，剛才你家的事情還沒有說完，你爸爸是很寵你的，你們家幾個兄弟姐妹？

鍾：我的這個母親生了四個，兩個姐姐一個哥哥，我是最末一個。我母親是我父親的第三個妻子，她比我父親小21歲，民國元年，我父親是38歲的中年人了。我父親生我的時候是58歲的老年人了，那是民國二十年，我就是1931年生的。我不願意他帶我出去，帶我出去同學都認為他是我的爺爺。

我生在這個家庭裏面也是有很多舊時代的畸形。我的母親因為年紀比我父親小得多，她在家裏並不如意。我是她最小一個兒子，按照道理應該愛自己最小的兒子，相反，我母親對我特別嚴，我認為她近乎苛刻，為什麼呢？她喜歡我哥哥，因為他比我「聽話」。我的哥哥還在，比我大7歲，也是一個離休老幹部。我的哥哥比我聰明，也比我長得好。他小的時候是我的偶像，我寫什麼東西都向他學，我寫詩詞也向他學。我哥哥自己也始終認為他比我聰明，他沒有劃右派。

彭：他現在還活着？也住在這個樓裏？

鍾：活着，沒有住在這個樓。他94歲，他的聰明就是盡量少做

事，盡量求平安，他也確實做到了。母親是我在牢裏去世的，她是1977年去世的。

彭：文革都結束了。

鍾：母親的死，我是在牢裏面知道的，我當然很難過，因為我母親也不容易，她是一個農家女，我父親是中年喪偶，喪偶的時候，我母親因為長得還好看，才成為我的母親。我們兄弟姊妹都不難看，完全是我母親的遺傳，但是她的文化比我父親低得多，智商則比我父親高，這也要謝謝我的母親。我母親對我的確很嚴，因為我小時候不是很聽話，頑皮。但是我認為沒有到頑劣的程度，後來我有一個毛病，因為母親管得



圖十九 1952年鍾叔河和家人大哥及兩位姐姐的合影
(後排右二為鍾叔河)。

嚴，所以我的逆反心理特別強，你如果講「你不聽話不聽話」，我就會更加不聽你的話、不去討好你，也不會去表現給你看，絕不會。

彭：你覺得你母親聰明表現在哪裏？

鍾：我母親是文盲，父親讀詩，憑她聽的記憶都能背誦很多首唐詩。這就說明她很聰明。就憑這一點！另外還有一條，她堅決要我兩個姐姐讀書，一定要她們讀，不要她們做家務，所以兩個姐姐都不會搞一點家務。其實我認為女人和男人一樣，都要會做一點家務，生活才會有一點趣味。我也不是不能做家務，我做飯也能做；但是我老了，確實不想做，我事情多，做得手上油膩，無法做事。

我父親家裏有點錢。在清末，我父親是不敢革命的，他怕他那些幹革命的民黨朋友，就是因為他們借他的錢從來不還。那些人，參加同盟會的國民黨老黨員，其實都比我們家有錢，但是他們再多錢也是不夠的。父親有錢就借給他們花，他們也不還。所以後來他們當了權，也給他一個官做，就是中華民國二年湖南省財政司（就是現在財政廳）「制用科」的科長，他再不能上去了，司長就是楊德麟（時年出任湖南省財政司司長兼民政司司長）。

我父親解放後沒有受打擊，解放以前領乾薪，解放後仍然領乾薪，雖然不高，溫飽沒有問題，文革家裏也沒有抄家，他是一個民主人士。後來安排在文史館。毛澤東講，文史館不反右，要反右個個是右派。他也不上班，不學習的，特許。錢，不是很多，比我還低。

我媽媽嫁進鍾家，日子是難過的。我坐牢時，女兒看到奶奶，她就說：「你爸爸關在那裏不知道是什麼樣子了。」母親哪有不愛兒子的，她之所以對我嚴格，因為哥哥他們讀書去了，只我在她跟前。她丈夫比她大20歲，是個老頭，她生活不滿意，就在我頭上撒火。我也理解，這是我後來自己成家才會理解到這個層次上。小孩子的時候，你對我凶我就離開你。所以我只要有可能總在學校待很久，待到沒有辦法才往家裏走。她越守着我，我就越這麼幹。

她倒有一點好，她也不知道我在看什麼書，她認為只要在她面前看書就是好的，這也讓我得益。這種感覺都是後來才會明白的，是理性地分析出來的。當時我只覺得她偏袒姐姐，偏袒哥哥。後來懂些事了，我就同情她了。她沒有讀書，年齡那麼小，丈夫常常不在家，她回到平江後，大家庭，姪媳婦年紀都比她大，別人都是門當戶對嫁過來的，欺負她雖不敢，因為她是長輩，但內心裏是看不起她的。好比說我在那裏調皮，他們暗中示意，公開又不敢講，暗示着：「這到底是鄉下女人養出來的孩子」。

彭：那你兩個姐姐呢？

鍾：兩個姐姐，大姐姐是右派，二姐姐還在，大姐姐去世了。大姐姐為什麼會劃右派？也與我有關係，第一她在那裏也不能劃右派，解放前參加民主同盟，解放後是長沙市東區婦聯主任，後來到市婦聯當辦公室主任，也算一個官。長沙市只等於上海的區的級別。她後來講，她覺得自己當了主任，就應該要管一點事，就這一條，就成了右派。再加上要鳴放的時候，早幾天在

我家裏聽我扯談，聽我談什麼南斯拉夫也不一定錯，蘇聯也不一定對。

我是看了蘇聯原來罵南斯拉夫，後來赫魯曉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又跑去向鐵托認錯，喊「親愛的鐵托同志」，這是報上登出來的。原來情報局通過一個決議《在殺人犯和間諜掌握中的南斯拉夫共產黨》，¹ 那個決議的名字就叫這個。劉少奇也是第一個響應的，在情報局的雜誌上面，那個雜誌的名字也很怪，《爭取持久和平 / 爭取人民民主》，刊物印在布拉格，但是在中國出中文版，沒有人訂的，報社有一份。劉少奇在上面發的文章是〈論民族主義〉，批判民族主義，左得很。

本來共產主義就是批判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他要工人無祖國。後來中東路事件，是要中國共產黨都去支持蘇俄，那時候奉系軍閥跟蘇聯有矛盾，因為蘇聯要去統治中東，就是現在中長鐵路。那條鐵路兩邊，每邊15公里，30公里一條帶是特別行政區，蘇聯在那裏享有特權，這明顯是侵犯中國主權，奉系軍閥跟蘇聯發生衝突，軍閥當然不是蘇聯紅軍的對手，蘇聯還要中國黨支持他，講中國人要反蘇是不行的。這樣的搞法怎麼行？

彭：你姐姐聽了就出去說了？

鍾：她在那裏講，把我的話出去講，因為她還講不清楚，確實也講了幾句，並未多講，因為她的國際知識還不如我多，我也沒有很多。首先我是不懂外文的，國際知識是有限的，但是我看了中文的東西，我沒有看到什麼內部知識，反正你公開發表的，你原來說「鐵托是殺人犯、間諜」，現在又是「親愛的鐵托同

志」，我信誰的呢？我只能信你的呀！我姐姐她聽我這樣講，大概覺得不錯，於是也說了幾句，就這樣被打成右派了。

註釋

- 1 1949年12月，蘇共情報局第三次會議上通過的決議。

《念樓學短》合集序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錢鍾書曾主動為鍾叔河先生的《走向世界》一書寫過一篇序文。那時的錢鍾書才七十五歲，精力充沛。《走向世界》一書是促使國人向前看。

時光如水，不舍晝夜地流逝。二十年過去。世事也隨著變易。叔河先生這回出《念樓學短》合集，要求書價便宜，讓學生買得起。他現在是向錢看了。他曾我為這部集子也寫一篇序。可是一轉瞬間，我已變成年近百歲的老人。老人腕弱，要提筆寫序，一支筆足有千斤重啊！可是“雙序珠玉交輝”之說，頗有誘惑力。反正我實事求是，只為這部合集說几句恰如其份的話。《念樓學短》合集，選題好，翻譯的白話好，註釋好。批語好，讀了能增廣學識，讀來又趣味無窮。不信，只要試讀一篇兩篇，就知此言不虛。多言無益，我這幾句話，自有千鈞之重呢！

楊絳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二日

書信九 楊絳撰《念樓學短》合集序的手稿。

一個人的文字遠征

自1970年3月17日，鍾叔河被捕入獄後，他每年都寫一封申訴書，「因為我並沒有犯任何法啊！申訴有沒有用我不管，總要把我的道理講出來。」1976年下半年開始，他發現勞改隊裏的氣氛正在悄悄地發生變化，繪圖室裏談話的內容多起來了，工人師傅和管教幹部對待他的態度也與以往不同了。這年的11月間，他又交出了重新寫過的申訴書，最後一句是：

我要求的並不是憐憫，我要求的不過是（而且僅僅是）公正。

終於，1979年3月16日，鍾叔河被「提前釋放」。他的二女兒鍾亭亭來沅江茶場接他。當年他被突然逮捕的時候，鍾亭亭還是個瘦弱的初中生。父女倆再次相見竟隔了整整九年！這時候的鍾亭亭已經是個24歲的青年人了。她遠遠地看見有個人穿着長長的、直拖到地上的棉褲，一手拎着棉褲的褲腰向她走來，她馬上認出了這就是父親，但是他瘦了很多，整個人看上去像縮小了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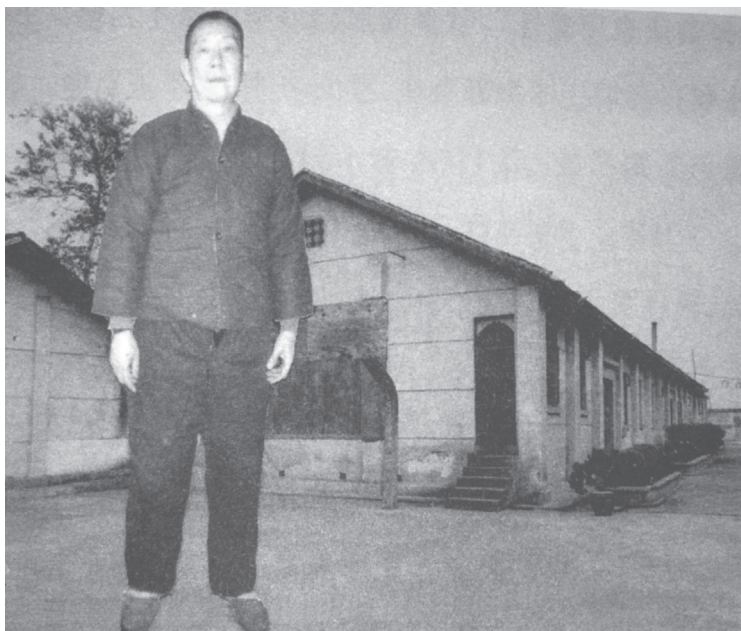
父女倆的久別重逢，沒有什麼戲劇性的場面。鍾亭亭聽父親迅速地向她交代着明天離開這裏之前要做的幾件事，要帶好的東西，第二天一早要搭管教幹部的車去縣城轉火車等等。她覺得父親的急迫裏有一種深深的恐懼，他想要立刻離開這裏，害怕又發生什麼變故，把他留在這個他一刻都不想待了的地方。

在一個平素對他有好感的青年工人的幫助下，鍾叔河穿上了厚厚的勞改服在監房外留了影。短棉衣吊在身上，顯得非常不合身，袖子很短，鍾先生在照片下面特別註明，「我特意穿上這件棉襖留影」。照片上的鍾叔河面容平靜，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拍照的人取了仰視的角度，令他看上去格外高大，高過了勞改農場的老樹，也高過了身後農場「教育堂」。



圖二十 鍾叔河在沅江農場服刑期間，二女兒鍾亭亭（後排中）在湖南懷化農村插隊，回長沙過年時，母女四人的合影。

離開了茶陵，綠皮火車走走停停了好幾個小時，終於到了長沙。走下火車，鍾亭亭聽到遠遠的出口處有人在喊她，還有人大聲喊着「叔河！」她看到人群中，有兩隻高高豎起的手臂，一隻是媽媽的，一隻是朱正叔叔的。近四十年了，頭髮花白的鍾亭亭在鍾先生寬大的客廳裏給我講這個重逢的場面，她高高地舉起手臂，像當年的媽媽和朱正叔叔一樣，一直很冷靜的她流淚了，她說：「朱正叔叔踮着腳，伸着手，很高，這樣子喊。這是永遠都記得的一幕。我爸爸的親哥哥都沒有去接，反而是朱正叔叔去了。」



圖二十一 1979年3月，鍾叔河平反出獄時在監房外留影，
身後為農場「教育堂」。

我又問鍾先生：「您還記得從農場回來，再見到朱純老師和朱正先生，當時您是什麼感受呢？你們都說了些什麼呢？」鍾先生說：「當時就是接回了家，那時候在車站講什麼話呢？小孩子也是大人了，不會有什麼戲劇裏寫的那些的。回家的第一天談的就是要找回四毛的事情。」

文革前，四毛失去下落後，鍾叔河和朱純一直都在四處打聽，決心要把她找回來，否則「死不瞑目」。他們一方面繼續託人查訪情況，一方面努力打工賺錢，為了找回孩子做準備。1970年鍾叔河入獄前，他們已經在計劃要去一次內蒙尋找「四毛」了，因為那時孩子已經12歲，鍾先生說：「如果是男孩子就不用那麼急，可是女孩子不行，放在外面不放心，怕遇到壞人啊！」可是鍾叔河突然被捕入獄，判刑十年，尋找四毛的心願只能偷偷放在心裏了。

鍾叔河從勞改農場回到長沙，第一件事就是想盡快找到四毛。通過在內蒙的親戚朋友多方查找，「四毛」終於找到了！可是那時21歲的四毛竟然已經結婚了，孩子都1歲了。行事周密、謹慎的鍾叔河決定讓四毛一個人先回一次長沙，這樣方便向她了解婚姻和家庭的情況。萬一不和睦，再另想辦法。

失散了近二十年的四毛回來了！如今鍾先生說話很坦然，但是當時不是這樣的。「找到她，先把她弄回，問她這個婚姻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她說是自願的，那個男孩子是在另一個旗裏的青年，是一個高中生，但是那個高中是程度很差的，內蒙農村的高中生嘛；到她這個旗，內蒙是叫旗的，他們是相鄰的旗，說到這邊來搞什麼，中學畢業搞什麼宣傳隊，搞什麼演



圖二十二 1979年，從內蒙找回的小女兒四毛（後排右二）與鍾叔河全家人合影。



圖二十三 四毛與丈夫帶着女兒回到長沙與家人團聚。

出，他們就有接觸。四毛的養父又找了一個繼母，她不喜歡那個繼母，是她主動向現在我這個女婿示好，讓他找人來說媒提親的。既然是她自己自願要他的，不是她不喜歡他，我們就連他一起搞回，後來我們發現這個男孩子很好，現在跟我的關係也是很好的。」

回到長沙後，鍾叔河的另一項重要事宜，就是找法院、檢察院，努力為自己爭取平反。一開始，被改判成「免予刑事處分」，他認為自己牢都快坐到頭了，怎麼還能叫「免予刑事處分」呢？於是，繼續上告，結論改成了「雖然在『文革』中說過錯話，但不構成犯罪，予以釋放」。鍾叔河依然不接受！宣布結論的人開導他說：「哪個沒說過錯話呢？」他反問：「那你也說過？」對方說：「當然也說過。」「那你為什麼不坐牢？」來人啞口無言。鍾叔河一直上告到中央組織部，直到1979年的9月才被徹底平反，按照街道工廠的月薪六十八元補發了九年的工資。

平反後，鍾叔河不想再回到報社做文字工作了，想憑藉自己在街道工廠和勞改農場鍛鍊出的機械製圖的本事，去機械工業廳當一名工程師。正好湖南省機械廳的一把手早年接受過他的採訪，對他印象很好。鍾叔河找到這位領導，領導同意他進機械廳工作，卻還是要他去秘書科，做「筆桿子」，他只好苦笑着拒絕了。

這時，已經在省出版局工作的好友朱正向局長推薦了鍾叔河，經過「資格認證」的「作文考試」之後，他重操舊業，成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編輯。苦難中的鑽研與思索，成了他走出監

獄後的「起跑線」，那些親歷的荒謬和困厄讓他更加堅定地認為「中國要摒棄封閉、落後的傳統，一定要走向世界。只有吸收全世界有益的東西，中國才能進步，才有發展」。他想通過編書、出書影響他人，推動社會變革。

在社會底層輾轉謀生，甚至身陷囹圄的這二十多年中，鍾叔河瀏覽過近兩百種晚清人物考察西方的記述，他進入出版社的第一個選題就是想從這些晚清古籍中，選取一百種出版，把百多年前，晚清的官員、士大夫甚至商人記錄下來的，第一次遇到西方世界的火輪船、德律風（電話）、巴力門（國會）等現代事物的經歷與思考介紹給廣大讀者，以紀念這些先行者，啟迪後來人。

鍾叔河先請人抄錄這些古籍，然後親自校對、註釋，從發稿到付印，都是他一個人來做。第一次編書，那些編輯的案頭工作，關於圖書開本的選擇、版式的安排、題目和正文字體字號的確定、校樣修改的程序、各種校對符號的用法……等等，對於他來說，都很陌生。他就請來一位熟悉業務的女同事，請她坐在身邊做指導，一個多小時後，便全都學會了。



圖二十四 1980年代工作中的鍾叔河

1980年8月，這套叢書的第一種《環遊地球新錄》出版，之後平均一個月出版一種。第一輯共三十六種，於1986年出齊，總印數超過了七十萬冊。這就是後來赫赫有名的「走向世界叢書」。

「走向世界叢書」一百種，等於近代中國從閉關自守到對外開放這個歷史過程中的一百個斷面和側面。當改革和開放已經被確定為國策但還在不斷受到干擾和懷疑的今天，回看第一代「走向世界」的知識分子們所走過的道路，至少可以起到一點幫助打開門窗又防止傷風感冒的作用吧。

（鍾叔河《與之言集·談「走向世界叢書」》）

叢書第一輯三十六種密集地依次出版，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了吸引更多的讀者、研究者認識到這套書的價值，鍾叔河還在每種書前寫了很長的導言，介紹作者的基本情況、他到國外去的背景，以及他記載的最有意義的事物，透過這些記載，引導讀者看出原作者的心態和見識。

後來這些導言集結成書，時任國務院古籍規劃小組組長的李一氓為這本序論集《從東方到西方——走向世界叢書敘論集》寫了序，其中說到：

這些人都在東西洋遊歷、考察、從事外交活動之後，留下各種著作，記述翔實，態度認真，這在當時有極大的現實意義，現在看來，也具有極大的歷史價值。因為從另一方面看，這正是自十九世紀下半葉起，中國的社會變革

不得不緩慢而痛苦地前進的紀錄……叔河同志在主編此叢書時，費力既勤且精：凡重要段落都在書頁旁加註要點，每種書後又增附「人名索引」和「譯名簡釋」，對原書人名、地名的異譯都加註原文和今譯。這都是麻煩費力的笨工夫，實堪佩服。

在廣泛閱讀和研究的基礎上，鍾叔河又寫成了一本近四十萬字的書，書名《走向世界——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歷史》，從來不願意為他人作序的錢鍾書先生破天荒地主動為此書寫了序言：

我首次看見《讀書》裏鍾叔河同志為「走向世界叢書」寫的文章，就感到驚喜，也憶起舊事。差不多四十多年前，我用英語寫過關於清末我國引進西洋文學的片段，常涉獵叔河同志所論述的遊記、旅行記、漫遊日錄等等，當時這一類書早是稀罕而不名貴的冷門東西了。我的視野很窄，只局限於文學，遠不如他眼光普照，察看歐、美以及日本文化在中國的全面影響；我又心粗氣浮，對那一類書，沒有像他這樣耐心搜羅和虛心研讀。一些出洋遊歷者強充內行或吹捧自我，所寫的旅行記——像大名流康有為的《十一國遊記》或小文人王芝的《海客日譚》——往往無稽失實，行使了英國老話所謂旅行享有的憑空編造的特權（the traveller's leave to lie）。……叔河同志正確地識別了這部分史料的重要，喚起了讀者的注意，而且採訪發掘，找到了極有價值而久被湮沒的著作，輯成「走向世界叢書」，給研究者以便利，這是很大的勞績。……

「走向世界」？那還用說！難道能夠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嗎？哪怕你不情不願，兩腳彷彿拖着鐵鐐和鐵球，你也只好走向這世界，因為你絕沒有辦法走出這世界，即使兩腳生了翅膀。人走到哪裏，哪裏就是世界，就成為人的世界。

「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和上述兩書出版後，受到了讀者的熱烈歡迎，對中國知識界產生着深遠而持續的影響。二十年後，2006年1月6日的《新京報》上發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副所長、陸建德教授的文章〈重讀「走向世界叢書」〉。文章提及叢書中張德彝在光緒六年所記的日記：

一位倫敦的馬車夫因為鞭打馬匹過甚而被處以罰款並監禁一月，一工匠因拉馬尾巴而被監禁六週，待動物如此，待人就不必說了。

諸如此類的記載不勝枚舉，這套叢書所收著作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大開國人眼界，同時又讓讀者意識到，身邊很多習以為常的「小事」都是值得關注和檢討的。時至今日，這套叢書讀來依然具有讓人不安的力量。

就這樣，鍾先生一步從涿江勞改農場「走向世界」。

1982年初，國務院召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會議，討論《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參與者大都是當時國內一流的學者和專家。儘管編輯出版了重磅圖書「走向世界叢書」，當時的鍾叔河卻仍是地方出版社的一名普通編輯，但就是這位「普通編輯」被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李一氓特別點名，請他赴京參加

會議。當鍾叔河得知「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中只列入了《曾文正公全集》的影印刻本，馬上向會議提出這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刻本中刪掉、漏掉了大量的書信和批牘，還有不少集外文、大量保存於湖南的曾國藩未刊稿，都有蒐集並編印的價值，應該把曾國藩所有的資料編成一部「大全集」。他從北京圖書館找來舊的《曾文正公全集》刻本和新發現的曾國藩資料，同時搬到會議現場，一篇篇、一條條地指出舊版本的不完善和錯漏處，力陳新編擴大容量、出版全集的必要性。鍾叔河的三次發言引起了與會專家們的關注與共鳴，最終由李一氓拍板定音，將原來「規劃」中的出版影印《曾文正公全集》影印刻本改為由湖南岳麓書社出版新編的《曾國藩全集》。



圖二十五 1980年代初工作中的鍾叔河

曾國藩，被稱為「中國近代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並稱「晚清四大名臣」，對清王朝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他的倡議下，建造了中國第一艘輪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學堂，印刷翻譯了第一批西方書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學生，是中國近代化建設的開拓者，也是中國近代史無法忽略的重要人物。

作為朝廷的重臣，曾國藩戡定太平天國、平定天津教案、創辦洋務運動，在繁冗的政務、軍事活動之餘，他還留下了大量的書信、批牘。他寫給家人、幕僚的書信，不僅是珍貴的歷史記錄，還傳達出他作為封建士大夫的代表人物身處「五千年來未有之創局」中的所思所想以及「修身齊家」之道。自曾國藩家書初刊的1879年始，直到1949年這七十年間，這部家書幾乎是那時中國讀書人的「必讀書」。1947年，歷史學家范文瀾在他的《中國近代史》一書中，把曾國藩稱為「漢奸劊子手」，從此，這本流傳了七十年的「讀書人必讀書」在中國大陸銷聲匿跡。

鍾叔河小時候曾經讀過這部《曾文正公家書》，覺得生動談諧，很具可讀性。年歲漸長，他更加覺得曾國藩其人不簡單，有人格魅力。「我對曾國藩感興趣的是他超凡的能力：判斷分析的能力，協調組織的能力，制定方針政策、把一件事做成功的能力。他的學習能力也很強，他的道德觀念和倫理哲學自成體系。」「曾國藩不只是一個政治人物，他是一個學者，有很高的水平，深入研究了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且做了大量編

輯整理的工作。」如此重要的歷史人物，「舊文化的最後一個集大成者」，僅僅因為「漢奸劊子手」的標籤式定論就徹底消滅不存，從歷史研究的角度而言，無疑是輕率、反科學的。

鍾叔河認為，近幾十年中，在曾國藩身後是非這件事上，至少存在着兩個問題：

第一，不能客觀冷靜地對待歷史和歷史人物，總是從此時此地的政治需要，也就是從功利主義的目的出發，來給古人定性，給歷史硬套上這樣或那樣的模式和「規律」。尤其可笑的是，居然幼稚到了這樣的程度，凡是被定性為「反革命」和「階級敵人」的人，就把他的言論、文字禁錮起來，以為如此便可令其永遠消失，在世界上流行的就只有自家唯一的真理了。

第二，「凡讀書識字者」的絕大多數，都不肯用、不敢用、不能用自己的腦子思想，總是習慣地或被迫地接受官方的指示，以領袖和導師的說法為說法。某些時候，大部分甚至絕大部分讀書人，甚至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充當了應聲蟲和吹鼓手，以至競相趨附，爭取配合，謀取個人的小小功利（或賺點錢，或出書出名，或謀取「政治地位」）。

（鍾叔河《籠中鳥集·曾府家酒不必喝》）

中國要走向現代化，「快步地走向明天，必須深刻地認識昨天，清醒地面對今天，如果不查明遺傳因子帶給我們的先天性弱點，不找出潛伏在我們大腦皮層和心肝血管裏的病根，就不可能造成健康的自我和健康的後代。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切

過去的文化積澱，我們都有責任加以清理；越是過去產生過大的影響的東西，越有必要加以重視和研究。從孔夫子到胡適之都是如此，曾國藩亦不例外。」（鍾叔河《書前書後·關於曾國藩家書》）「就是反對曾國藩，也得研究他的書，研究他的全部著作。……而且越是研究曾國藩，就越是發覺，連曾國藩這樣有作為、有能力的人物都無法挽救舊體制的崩潰，那只能說這個舊體制的確到了不能不崩潰的時候，這能夠更深刻地說明舊中國必須改變。」（鍾叔河《與之言集·生活簡單，思想複雜》）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鍾叔河在回歸出版界之初，就向出版社提出了整理出版《曾國藩大全集》的建議，最終通過1982年確立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而正式將《曾國藩外集》（輯佚）和影印《曾文正公全集》立項。1984年，鍾叔河調入岳麓書社擔任總編輯，重新選定了鄧雲生（唐浩明）擔任《曾國藩全集》的責任編輯，開始著手編輯《全集》的第一冊《曾國藩家書》。

當時能找到的《曾文正公家書》的底本，都是光緒己卯（1879）傳忠書局刻本，其中也有不少錯誤。比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9月18日曾國藩寫給四位弟弟的信，有一句在後來的標點本中印作：

子思、朱子言：為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漫火溫。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過。

鍾叔河覺得這段頗令人疑惑：為什麼公元前四百多年的子思（孔子之孫）會和公元後一千二百年的朱子（朱熹）站在一起

說話呢？而且所用的語言不似先秦，卻更像宋儒的口吻。於是他翻找了近十種不同的版本，只發現一種民國二十五年上海世界書局的印本（只圈斷，無標點）改正了刻本的錯誤，原來這幾句話是：

予思朱子言。為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慢火溫。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過。

原刻本裏將「予」字錯成了「子」字！

另有原刻本中將信中的時間弄錯了，鍾叔河又去找來曾國藩的日記，一天天的內容詳加對比，最終得以糾正。

岳麓書社將所有能找到的「家書」版本都盡量找來，一本一本地比較，最後以曾國藩故居所藏的家書為基礎，廣泛徵集百年來發表和未發表的曾國藩家書，全部收錄。最終選定的《曾國藩家書》足足有一百萬字，是光緒原刻本的兩倍多。

《曾國藩家書》出版後，有人在《湖南日報》上發表長篇文章《如此家書有何益》，反對這本書的出版。有人向省委告狀，說曾國藩是漢奸劊子手，岳麓書社為何如此熱心出他的全集？面對來勢洶洶的質疑和反對，鍾叔河對出版社的同事們說要沉住氣，不必參與這種爭論，爭論一旦展開就會沒完沒了。只要國際上，至少在全國範圍內造成了正面的影響，只要大家覺得這個書出得好，反對的聲音自然就壓下去了。

很快，內地、香港、美國的報紙都發表了評論，對於岳麓書社出版曾國藩全集的文化意義給予了高度的評價。美國紐約的《北美日報》發表社論「還歷史以本來面目：評中國重新出版

《曾國藩全集》」，文中說：

出版一套「曾文正公全集」看似小事，實際上它是中國文化界人士的思想突破了一大禁區的標誌，也表明中國的文藝政策確實比過去大為開放了，因為這在過去根本是不可想像之事，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國發射一枚新的導彈或衛星相比擬。

文章還引用了中國哲學史專家、復旦大學教授嚴北溟對於曾國藩家書的評價：「曾氏道德文章，世所推崇，回憶幼時讀其家書，深受啟發，印象至今猶存。蓋有關待人接物，修養學習之道，即使對今日青年一代，實仍不失其教育意義。」

1994年，岳麓書社繼陸續推出《曾國藩全集》各冊之後，一次性推出全部三十冊、總計一千五百萬字的《曾國藩全集》，首版印數八千冊，半年後又加印五千冊。一套大型人物史料圖書在半年內發行兩次，在中國出版史上極為罕見，造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引發了至今不退的「閱讀『曾國藩』熱」，甚至帶動了形形色色的「曾國藩讀物」持續不斷地大量出版。

走出牢門、回歸出版界，鍾叔河最想做的兩件事情，一為編輯出版「走向世界叢書」；另一樁「夙願」就是編輯一套《周作人散文全集》。這一心願源自他多年來對於周作人文章的愛好，也源自於多年前他被貶為底層庶民時，這位「五四文壇老宿」「看得起」他這個「板車夫」，彼此書信往來的那份感情。

時年不滿三十的苦力，當然不敢在五·四文壇老宿面前妄託知己，不過在讀到周作人隨後寫了寄來給我的古人詩句「萬卷縱觀當具眼」之後，我還是不禁暗喜。因為於冥冥長夜中知道自己還有一雙看得出好壞的眼睛，在漫漫長路上也就不會像原來那樣不知所從了。

（鍾叔河《念樓序跋》，一卷本〈周作人美文〉序）

這一份知己之感，就成了我後來肯花時間力氣編輯出版周作人全集的動力。

（鍾叔河《與之言集·人不會永遠安於封閉》）

一直以來，他堅信周作人文章的重要價值，特別是他的思想見識所具有的啟蒙意義，要了解「五四新文化」和中國現代新文學，就必須研究周作人的著作。周作人首倡「美文」一詞，但又不僅僅只是美文家，他更是一位愛智者（philosopher），追求理想和智慧，追求真與美，「在『詩與真實』兩方面都顯出動人的力量，這便是周作人高出別的散文作者的原因。」（鍾叔河《籠中鳥集·談美文》）「他們（指魯迅和周作人）是最深刻地批判舊文化中消極東西的兩個人，其深刻性現在也沒人能夠超越。在周作人的文章裏，找不到反人文、反社會主義的話，全是對文化專制和思想統治的批判，對蔑視自由的意識形態的深惡痛絕。在這方面，周作人絕不遜於魯迅。」（鍾叔河《與之言集·談談周作人》）

1985年，鍾叔河調入岳麓書社的第二年，他就開始着手選編《知堂書話》，這是中國大陸1949年之後第一部署名「周作人」的新書。他計劃重印《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等「周作人自編文集」，並在《光明日報》上刊登了「重印周作人著作」的廣告：

人歸人，文歸文。周作人其人的是非功過是另一問題，其文之主要內容是對傳統文化和國民性進行反思，對中西和中日的文化歷史作比較研究，今之讀者卻不妨一讀。

湖南省出版局的一位離休老局長得知此事後開始四處告狀，大聲疾呼應該制止鍾叔河「偏愛漢奸，大出周作人」，引起了省出版系統的顧慮，認為「出書必須慎之又慎」，要出版周作人的書必須先向北京中宣部報告，得到批准方可出版。鍾叔河去北京出差，在文化部出版局偶遇一位並不相識的中宣部副部長，副部長叫住他，大聲地說：「鍾叔河！你出周作人，要適可而止啊！」這時鍾叔河才知道，出版周作人的書已經在中宣部成為重點關注的對象。副部長的話讓他開始擔憂正在進行的周作人著作出版計劃，擔心有關部門的一紙禁令會讓這套極有價值的著作就此夭折。

這時，因為「走向世界叢書」而相識的錢鍾書先生告訴鍾叔河，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當年與他同在清華大學讀書時，酷愛周作人的文章，也是個周作人迷。於是鍾叔河把自己編著的《周作人兒童雜事詩箋釋》寄給了胡喬木，並附信表達了自己想編輯一部《知堂文化論集》的願望。很快，胡喬木就寫來

了回信：「謝謝你寄書，祝你的《知堂文化論集》獲得成功。」最終，湖南省拿到了出版周作人著作的批文，批文中特別點名鍾叔河，說他作為一名認真負責的編輯，可以由他來編輯周作人著作，但不能夠出全集，只有抗戰前和解放後的文章可以出。作家、藏書家黃裳後來告訴鍾叔河，是胡喬木不顧別人的反對，力排眾議批准了周作人著作的出版計劃。

然而，在出版過程中，攻擊和反對的聲音一直不絕於耳。有人認為岳麓書社是古籍出版社，出版不屬於古籍的周作人著作是「不務正業」、「出漢奸的書」。有朋友提醒鍾叔河：「不怕戴賣國主義的帽子嗎？」勸他不要自找麻煩。這時，一位解放前認識的副省級幹部拿了自己的詩稿給鍾叔河看，希望岳麓書社能出版他的個人詩集。鍾叔河說：「我不懂舊詩，你的詩寫得再好我也沒辦法給你出版，因為岳麓書社只出古人的書、死人的書。」這樣一來，這位領導就開始寫文章「批」鍾叔河，說他「左」，看不起舊體詩，卻偏愛周作人。

鍾叔河對於這樣的「批評」不予理睬，他說：「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從不看『官』們的臉色，從不拍『官』們的馬屁，頂多不當這個總編輯就是了，這實在是無足輕重的。」他還拒絕了省裏每年給予岳麓書社四萬元的補貼，他認為要是拿了這個錢，「今天出這個領導的書、明天出那個領導的書，賠的還不止四萬。」

終於，省出版局到岳麓書社組織了一次「一人一票」的選舉，當時湖南出版界正在開展整頓，點名批評幾本「自由化」出版物，簡稱「三種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醜陋的中國

人》以及周作人。於是，鍾叔河不出意外地落選，提前從工作崗位上退了下來，這一年他58歲。三十五種周作人著作的出版計劃就此中斷。

雖然被迫放棄想做的事，對於鍾叔河來說既難過又不甘心，但他還是不屈不撓地想要把周作人的作品能夠按照自己最初的構想，盡可能完善地印出來。於是，他謝絕了出版社的續聘，依照自己的心願回家，繼續編輯周作人著作。但離開了出版社，就不可能以個人的名義出書，他只能自己編輯，然後交給其他出版社出版。此時，他手邊的周作人著作資料就是周氏自編的三十部文集，但這套自編文集中存在着三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第一，自編集中除去篇目重複的以外，總計一千多篇，僅占周作人全部散文的三分之一，1949年之後的一千多篇散文未能收入；

第二，周作人對於自編的各集都沒有親自校對過，其中錯誤不少；

第三，周作人一生作品數量多，題材範圍廣，僅憑一些選本、幾種文集很難盡覽他各個時期的代表作，從而品味他散文的獨特風格。

於是，鍾叔河決定盡可能地全面蒐集周作人的作品，認真校訂，改正排印和傳抄的錯誤，編出一部完整的散文全集，「給要讀周作人散文的人一個滿意的交代。」

為了盡可能地忠實於原作，鍾叔河費盡心思尋找周作人的

原稿。如周作人1911年所寫的〈望越篇〉，雖然好幾本刊物都曾登載過，但排印都有錯誤，存疑處又不好妄改，他輾轉託人，費了很大的力氣，終於在紹興找到了〈望越篇〉的原稿。周作人民國時期的很多文章都登載在當時的《北京晨報》上，後來這份報紙改名《新晨報》，資料很難找。當張中行（1909–2006）先生知道鍾叔河要去北京圖書館查找周作人在《新晨報》上發表的文章，他找到自己的老同學、當時北京圖書館的館長任繼愈，請他幫忙，最終將資料的複印件交到了鍾叔河手上。香港的鮑耀明、羅孚先生都是主動提供，他們個人珍藏的周作人50、60年代與海外的通信及未刊手稿，上海的現代文學史學者陳子善提供了《周作人集外文》的有關資料，鍾叔河將這些難得的第一手資料，匯集成十卷本的《周作人分類文編》，在1992年辦理離休的同時，交給了湖南文藝出版社。但書稿交出後，出版社卻未能在預計的1993年底出版。其間鍾叔河多次向出版社詢問，都沒有得到明確的答覆。

直到1998年，湖南文藝出版社才最終匆促出版了這套《周作人分類文編》，但未能應鍾叔河的要求加入這四、五年間蒐集到的佚文，以及新發現的錯漏，且整套書四百多元，必須成套購買，鍾叔河對此不滿意，卻也無能為力。

60年代，「板車夫」鍾叔河和周作人通信時，周作人曾親筆抄錄了自己的一首詩——《丙戌雜詩》之〈文字〉，送給他：

半生寫文字，計數近千萬。強半災梨棗，重疊堆幾案。
不會詩下酒，豈是文作飯。讀書苦積食，聊以代行散。
本不薄功利，亦自有誓願。誠心期法施，一偈或及半。

但得有人看，投石非所憾。飼虎恐未能，遇狼亦已慣。
出入新潮中，意思終一貫。只恨欠精進，回顧增感嘆。

鍾叔河把這首詩放在這套《周作人分類文編》的序言裏：

詩中表白了他寫文章的態度——不只是為了消閒（下酒）和維生（作飯），而是懷着誓願，在向大眾傳道作布施，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出入新潮中），這個意思總是一貫的。詩中又表示了他對自己所寫的文章的期望——只要能有人看，即投石遇狼，亦非所憾了。

從1984年開始蒐集材料，到1995年全書編成，1998年終於出版，鍾叔河以十年之力編成了這十卷書，他說「『但得有人看』，也就算是對他『誠心期法施』的一點回報。」

1989年秋冬間，鍾叔河心境不佳，唯有編輯喜歡的書稿可以給灰色的心情帶來一些亮色。追憶早年跟周作人先生的書信往來，有一組很特別的文章〈兒童雜事詩〉令他念念不忘。那是1950年，他初入湖南報社，偶然見到上海《亦報》連載的《兒童雜事詩》，署名「東郭生」，由豐子愷配圖，非常喜歡。於是，他訂閱了全年的《亦報》，並且精心地將每一期的「雜事詩」都剪下來保存。直到後來他跟周作人先生通信，才知道「東郭生」就是周作人。

1966年8月，整個中國陷入一場瘋狂、恐怖的「革命」浪潮之中，周作人在這樣的日子裏重新抄錄了這些《兒童雜事詩》，他在8月14日的日記裏寫：「上午抄兒童詩丙編，至下午了。」九天後，他遭到紅衛兵的抄家、毒打，寫了一輩子的日

記至此絕筆。他不堪忍受這番痛苦和屈辱，去當地派出所申請自殺，遭到拒絕。九個月後，1967年5月6日，周作人離世。

這份剪報歷經文革的劫難，被鍾叔河精心地收藏着，幸運地保存了下來。在心情沉鬱壓抑的時刻，他想要回到自己喜歡的文字中去，把這份書稿整理出來，並且為每一篇小詩作箋釋。為此，他向熟悉的朋友和學者徵詢，希望得到更清晰的《亦報》插圖的底稿，最終卻發現，朋友們寄來的卻都是鋅版圖的複印件，而且還不如他自己保存的這一份清晰，這時，他不禁感慨「文字遇合，亦有前緣」。

對於這七十二首《兒童雜事詩》的箋釋，鍾叔河一向反對以摘抄字典辭書的方法「作註」，因為這些「雜事詩」的文字並不深奧難懂，它們最重要的價值是其所記錄的百年前的民俗，具有重要的民俗學和文化史的意義。因此，他的箋釋主要從民俗與文化的角度入手，在周作人生平著作的數百萬言文字中細細搜尋，「並旁及其他，地方文獻、野記雜書、故老言談、友朋通信，都在採輯之列」。

如〈新年拜歲〉一文，鍾叔河的箋釋不僅援引古籍《越語》、《荊楚歲時記》，周作人的堂叔周冠五的《紹興的風俗習尚》，還引用了當代漫畫家李濱聲的《舊時京城兒童髮式考》的生動圖像，來展現周作人雜事詩中所描述的舊時兒童「小辮朝天紅線扎，分明一隻小荸薺」的樣貌。每篇短短的箋釋都不是簡單地「註釋」原文，而是精煉濃縮了很多有趣有料的文化掌故，其中凝結的學問、涉獵以及「細細搜尋」的心血令人嘆為觀止。

鍾叔河為《兒童雜事詩箋釋》一書設計的裝幀和排版同樣令讀者愛不釋手，張中行先生讚嘆這本書，「開本、版式、套色、邊框、字體、行距，等等，都美得不得了。尤其箋釋，每一首的，與詩和圖對稱，也是遍全書，恰好兩面，真是神乎技矣。」

自1986年起，第一本署名「周作人」的新書、鍾叔河編輯的《知堂書話》出版，直到2009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鍾叔河編訂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岳麓書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等都在不斷推出各類周作人著作。岳麓書社最初出版的周作人「自編文集」《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等等，也一再重印，截止2003年，總印數即達二十多萬冊。「周作人」終於不再是出版禁區，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讀者借由鍾叔河二十多年的戮力開拓與耕耘，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這位文學大家穿透滄桑歲月的不朽價值。

2008年，年近八旬的鍾叔河接受了《南方都市報》的採訪，回顧自己的編輯生涯，他說：

我做編輯，也只編我想要編的書……書是別人的書，我怎麼編，怎麼加工，最後出來，就是我的編輯作品，我通過它來宣傳我要宣傳的思想，推動我要做的事業。

我在想：中國這個國家怎麼辦，不是暴風驟雨、群眾運動可以改變的，只能慢慢來，在人們中間慢慢地啟蒙，改變人的思想。這個好像很慢，實際上很快。寫一本書印一萬冊，可能會有五千個讀者，有些人買書並不讀的。五

千個讀者中，可能會有一千人讀了後會受到一些影響，還可能有幾百人會介紹給別人看。我出的所有書，曾國藩的也好，周作人的也好，都指向一個方向：中國不能不改變，中國必須改變。

（鍾叔河《與之言集·啟蒙的作用》）

2016年，85歲高齡的鍾叔河重新編訂的《知堂書話》（全五冊）再度出版，除去1986年岳麓書社的第一版，之後相繼有台北百川書局、海南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各出了一版，這一版是第五版，鍾叔河說這是自己編的最後一個版本了。

前度劉郎今又來，可算物歸原主，時間卻已過去三十年了。

人生能有幾個三十年？我從一九四九年始入職場學做編輯，到一九七九年重入職場再做編輯，雲裏霧裏耗去三十年。《書話》初版精平裝各印萬冊很快銷完，接着陸續開印《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各種，印到《秉燭談》戛然而止，至今又過去了三十年。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真堪浩嘆。

但我卻還能夠樂觀，因為通過編書，我看到了文字的生命力，知道好書會比人活得精彩，活得久長。……周作人也只活了八十三歲，但只要《安德森的十之九》、《阿麗思漫遊奇境記》諸文還有人讀，還在印行，知堂的名字便

不會被忘記。此即是文字和書的一點為帝力所不及的力量，也是我八十五歲還能夠樂觀的原因。

（鍾叔河《知堂書話》新序）

汪劍

與世界達成協議

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經歷過50、60年代運動的，每一個人都會有一部長長的苦難史，說出來可以非常相同，細細追究以後，卻發現完全不同。特別是很多大家，他們走出了紅塵，冷冷地看着這個世界，在他們自己的精神世界裏修煉。張中行先生，閉門讀書，哪怕是遣送回老家農村；沈從文先生鑽進他的歷史服飾的研究中，不再創作寫小說；賈植芳先生從十二年監獄後，再到十二年勞改隊，用他的黑色幽默抵禦着迫害；他們舉起「驕傲」的旗幟，精神上真正地驕傲，任何世俗的羞辱，都不可能傷害到他們的靈魂！太多太多這樣的老先生了。馬寅初先生、陳寅恪先生、俞平伯先生、孫瑜先生，總之各個領域的大師都沉默了，大有「立身苦不早，為樂當及時」之意。張中行先生晚年說起鍾叔河時，是那麼謙虛，他說：

古人志在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是至多走到一半就停止了。或者不止於量而兼算質，我之所求只是羅漢果，他（鍾叔河）則一貫修菩薩行。

（張中行〈書呆子一路〉，《讀書》第1期〔1994〕）

在黑暗中，鍾先生伸出他書生氣的手在推着板車，他無從修他的菩薩行，因為他完全不知道去何處尋找修行的精神力量，他還沒有上路，怎麼可以一半就停止了？他試圖在周作人給他的墨寶裏，接過火炬，照亮自己前方的路程，那火炬就是讀書思考。文字蹭滿了他的全身，即使在勞改農場，那些文字都給他點亮了前方的道路。不是隨時拽住身上那些星星點點的文字，那樣的歲月，每時每分都很容易被磨蝕了；他甚至把文字像一塊糖果，含在嘴裏，帶上全部的熱量，保持着生命的存在。

1957年打成右派，他剛剛抵達27歲的彼岸，他還需要成長，他不可能像這些大師，用「清高」兩個字，就可以用監獄一樣的鐵門，刷地一下拉上，與這個世界隔絕。因為他們已經擁有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他們情商不高，否則他們不會落到那樣悲慘的地步。他們可以與體制打個擦邊球，依然體體面面地活下去。可是，他們太驕傲了，他們連情商都不屑放在眼裏，要這些幹什麼？他們要把自己的思想體現出來，警世恆言，讓國人知道，人的價值，人的尊嚴，為什麼要成為一個獨立的人！他們還有士大夫的情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與他們相比，鍾叔河還是一個在成長中的年輕人，他必須在塵世裏討生活，他必須學會世俗的本領，他不能被人欺負。

我一本一本看着鍾先生的書，他年年有新書出來，閱讀的速度趕不上他出書的速度。他的書特別好看，這好看裏面還有一份「容易看」的意思。他談歷史，他的歷史裏有人物、有故事、有民俗、有娛樂，最後不管他說了什麼，一定是有他的思想。他

寫的文章，遣詞造句都非常講究，簡潔且通俗。有的新書裏，會有老文章再次出現，我還是重頭讀起，像沒有讀過一樣，然後又悟出新的道理。很多時候，也有比讀英文書更困難的地方，他學問太深，突然出現的生字，我怎麼都不認識。英文可以在谷歌翻譯裏解決，可是你讀不出的漢字，現代漢語字典上都查不到。如果說，我對中國歷史有了一點了解，就完全是讀着鍾先生的書完成的。因為我古文底子太差，很多古詩、辭賦都是看不懂的，平仄也搞不清楚。採訪中，他說的古詩詞，我常常斷錯句子。鍾先生的《念樓學短》讓我讀懂了很多古文。他寫的〈民意和士氣〉，名字就這麼直白，但是看了裏面他寫的《林屋山民送米圖卷子》的故事，我會淚流滿面，這幅畫是清光緒辛卯（1891）、甲午（1894）年間俞曲園、秦散之等人的詩書畫，後來到了1948年胡適和張東蓀等人又在畫上題字，上面還有暴方子本人和林屋山民送米的材料，這是一份極具藝術價值的作品，胡適認為，它也是「中國民治生活史料」。鍾先生會說：

中國的「民」，向來是被「治」於人的。「治於人」的民眾，對於「治人」的政府和政府官員，總會有各種各樣、或好或壞的意見，這便是民意。社會的「民治」的程度，全視民意能不能伸張，起不起作用。暴方子因廉而貧，又能「遇催租蠲賑事一意庇民」，民眾就同情他；上司因其「不媚上官媚庶人」而撤他的職，民眾就不同意。七八千人送米，一人送兩斤即達一萬幾千斤，怎麼吃得，自然是有意向上司示威，也就是民意的表現。

（鍾叔河《籠中鳥集·民意與士氣》）

於是一幅畫，鍾先生就會給你講一個故事，然後又說到朱自清的詩，接着就在敘述中完成了中國歷史的一幅長卷畫。後代暴春霆將畫交「彩華印刷局」印成的一百冊書，只分贈給題跋諸人，並未對外發售，原件則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

在拖板車的日子，他讀書也貪戀着吃，吃完以後，又把朋友的狼狽樣子，幽默一下：

同時受優待的還有幾位，一位坐醬油罈子上，像豬八戒吃人參果似的將他那一份油餅吃完，站起身來，雪白的府綢襯衫後襠拖在罈子裏，醬油已經爬上背心了。

（鍾叔河《記得青山那一邊·吃油餅》）

在那些艱苦的年代，有點吃的，鍾先生完全不會放過，他喜歡享受，哪怕就這麼小小的一點油餅，都能吃出各種情調來。他依然興興頭頭過日子，直到有人想賣掉自己的紫檀木雕花炕榻的時候。連那麼書呆子氣的父親都知道不是時候，睡這樣的「大床」太招搖了，房門抬不進，屋子裏也擺不下。被父親「勸告」下來，否則鍾先生是很願意去享受享受這樣的「大床」。雕工、藝術、木質和他的物質願望，都在「大床」上體現了。他的世俗層面裏，自有他的文化追求。

鍾先生的智商高我們從來沒有質疑過，但是和大多數的讀書人不一樣的是，鍾先生的情商也高，這在讀書人裏是很少見的。一般情商高的人，會玩伎倆，會算計，可是到鍾先生這裏，還是誠誠懇懇做人最好；你算計他的時候，他那麼深的城府，早就一眼把你看透。很年輕的時候，他就看見吳宓先生的日記中，記載了陳寅恪先生的一段話：

1919年9月8日

孔子嘗為委吏乘田，而其事均治。抱關擊柝者流，孟子亦盛稱之。又如顧亭林，生平極善經商，以致富。凡此皆謀生之正道。我儕雖事學問，而決不可倚學問以謀生。道德尤不濟饑寒。要當於學問道德以外，另求謀生之地。經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謀生之正道）。若作官以及作教員等，決不能用我所學，只能隨人敷衍，自儕與高等流氓，誤己誤人，問心不安。

那個年代，讀書人就明白，如倚學問以謀生，即不能不隨人敷衍、屈己從人。做學問寫文章如果是成為贏求名利的手段，即不能不犧牲獨立性和純粹性，水平和價值都不能不大打折扣。所以，讀書人，首先要在經濟上獨立，要有生存的能力。

你以為鍾先生最後要求平反僅僅是為了那個名譽？不是，他是要得到具體的物質的存在，他要生存，他也是用物質的退賠以證明自己的清白。他不要什麼空泛的允諾和「平反」，這些不可能把他糊弄過去，你必須把我每個月六十八元，九年的工資退還給我！是的，他就是要這個錢，這個錢不髒，是必須屬於他的！這時候的鍾先生一點都不「清高」，就是衝着錢來的。佩服！人間煙火，點燃了生活裏的黑暗，我們這些小市民對鍾先生充滿了崇拜！

但是，你千萬不要以為拿個錢就可以賄賂鍾先生，他只拿乾淨的錢。省裏撥給他們四萬元出版補助，80年代，四萬元啊！多大的數目，在長沙那樣的小城市，又是他們「岳麓」這樣的小出版社，可是總編鍾先生斷然拒絕。他算得比你們更

快，「要是拿了這個錢，今天出這個領導的書、明天出那個領導的書，我賠的還不止四萬，這個錢拿不得！」

對我們來說，鍾先生是一個幾近完美的知識分子，連帶他的缺點都彰顯着幽默和可愛。可是他自己卻不是這麼評述的，在和朱正做比較的時候，他說：「講老實話，我有那麼多劣跡，生活上做不到『不二色』，運動中又和朱正去『對質』，所以應該說他是比我好！」這是什麼意思？經歷多只能證明你經得起大風大浪，這有什麼不好的？後來，他又對我們說：「講老實話，我不是一個很好的丈夫，我自己認為，其實我最對不住的人是朱純，這是自己很內疚的一個事情，越是她走了，越是感覺她不容易，我給她帶來的麻煩，確實比較多。」

聽鍾先生這樣說話，我們幾乎不敢插嘴，不敢提問。他這麼痛心地走進自己的內心，我都是一種犯罪感，像觸碰到了他暴露在體外的神經，那個疼痛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體驗到的，縈繞着鍾先生的，依然是一種我們無法進入的晦暗。我們不知道怎麼去判斷、去認識。我們習慣了單一的「純潔」，但是每一個個體不是那麼簡單被組成的。你即使想幫助鍾先生走出那段暗淡的記憶，他依然隨着時間，逆向而行，讓自己的眼睛去適應更深的黑暗。

黃昏在漸漸地消失，攝像機上的曝光指數已經不再正確，我必須打燈才能拍攝。但是，我不說話，我幾乎拍到的是鍾先生的剪影，他坐在黑暗中，一點一點在走進自己的生活，我們

不能感受到他的胸膛中的壓迫，只有他自己可以體驗。他說，「朱純的思想，決定她也會被打成右派，但是因為我，她被處理得太狠了；我們兩個人一起落難，特別是坐牢出來以後，我就全心全意做好丈夫了。畢竟我這個人不是很壞的人，被她感動了，覺得這樣的人必須是要忠實於她的。」

我吃驚地問道：「那鍾先生，你在朱純之前，反右以前，做了什麼對不起她的事？」

「就是第三者。」

「你也有過第三者？」

「原來很年輕，在結婚以前，那不叫第三者。結婚以後，也還有這樣的事情，那就不對了。」

「多嗎？」

「不是很多。」

「你有幾個？」

「沒有幾個，就一個。」

我覺得鍾先生說的口氣，他完全就是一種精神戀愛，那麼純粹的一種交流。但是，我還是要證實這一點。「那時候，你們那時候第三者，會發生性關係嗎？」

提問一出口，不要說汪劍，連我自己都被驚到了。我就是被美國紀錄片的教育訓練搞壞的，什麼零距離紀錄，你必須時刻保持自己的冷靜和犀利，還有你的敏感，抓住每一個細節，直追到底。可是，面對鍾先生的時候，我覺得自己變得過分了，沒有禮貌和教養，不能提出這樣的問題。我看不見鍾先生臉部的光線，完全暗下來了，他身後的檯燈，留下一縷冷冷的

青光，那份內疚，像尖銳的小刀刮過脆弱的玻璃，一聲聲刺啦啦的響聲，就讓我們停止在那個呼吸中。倒是鍾先生微微地發出聲音，打破了黑暗的寂靜。

「我說傷害了朱純，當然是有這個關係的。只是朋友，朋友很多，那是正常的，她也有，她也是一個現代女性，她也有異性朋友，都是正常的關係，便無所謂傷害了。」

「鍾先生那時候你會想過離婚嗎？」

「有的，是想過的，後來出了『右派』這個事呢，這個朱正也曉得的，有些原因。」

「什麼原因？」

「因為她會寫，她寫的東西很好。」

「有才氣！」

「確實寫得很好，她這個人，這個人是很複雜的，有個時候自己也很矛盾，覺得朱純沒有什麼過失，從來沒有什麼對不住我的地方，我們已經生了好幾個孩子，但是有的時候，覺得那個人的才情還是很有吸引力。」

「她漂亮嗎？」

「不是很漂亮，當然也不難看，朱正也很熟的。我坐牢的時候，她還也一直在跟我寫信，也一直在給我寄東西。」

「她自己也結婚有家庭了？」

「沒有，她一直沒有結婚。」

我漸漸地釋然了，我覺得鍾先生心裏的痛。她本可以結婚，可以建立家庭，卻……但到了他可以說出口的時候，已經痊癒了一半。她，比鍾先生年輕幾歲，現在算起來，墮入愛

情的時候，她頂多才二十三四歲。可是，從那時候起，她再也沒有朝另外一個男人多看一眼。

鍾先生是被打成右派以後，和她說清楚了，他不會離婚，他不能再讓朱純受委屈，他不能做太對不起朱純的事情，他要和朱純共同承擔起家庭的責任。即使這樣「說清楚」了，他偶爾還是會去看望她。她依然獨自一人，鍾先生心裏又是一份內疚，他說：「你還年輕，不要老是一個人待着，好好找一個人，建立一個家庭。」可是，她沒有任何猶豫，看着鍾先生說：「我願等你！」鍾先生沉默下來，他不會再做任何對不起朱純的事情，他沒有答話。

她，給鍾先生的詩和詞，寫得都很漂亮。鍾先生也回她的詩詞，這些精神上的交流讓鍾先生建立起很多樂趣。可是，這不是一般的「精神交流」，來來往往的詩詞以後，朱純真的有點生氣了，她脾氣很好，她不說話，但是看得出來，心裏是不快樂的。鍾先生是敏感的，於是就在自己的蒲扇上寫道：縱起秋風也不捐。朱正一看，就知道他是寫給朱純表態的，於是說：「嗯，你這個態度是對的！」

這簡單的一句話，就是想表達，不論鍾先生內心再有什麼漣漪，縱是秋風吹起，天不再炎熱，但是這把扇子是不會「捐」出去的；他不會放棄，將永遠忠實於朱純！於是，押往淞江勞改農場的時候，在簡單的行囊中，就有這把蒲扇。在解釋那把蒲扇的時候，鍾先生還特為用手比劃給我們看。這把蒲扇，既是對朱純的思念，也是對自己的制約。

扇子用着用着，扇把已經折斷了，他親手做了小竹片插進

扇面，作為扇把子繼續使用。九年，實在是太漫長的時間，扇子最後還是壞了，他只能扔掉。感情，是埋在心底了。那些日子，朱純和她，都會給鍾先生寫信，其實，那些信都是要被看管檢查閱讀過，才交到鍾先生手上，所以，信裏肯定就是天氣還好嗎？身體要注意了，不要感冒，都是這些雞毛蒜皮的事情。即使這樣，每一封信上都帶着溫度，感受到身後的注視，他信心滿滿地在那裏「勞改」。有的時候，鍾先生會收到她寄來的幾塊錢，這可以讓他手上有點錢用。

朱純正帶着孩子一起在街道上糊紙盒子，還要贍養鍾先生的母親，日子非常艱難。她跑去看望朱純和孩子，她和朱純一起商量，怎麼寫申訴書，要推翻這個錯判。兩個女人，互相對視着，從眼神裏看見了真誠，讀到了信任。她們成為朋友，一起在那裏為鍾先生寫申訴、奔波，這裏沒有任何卿卿我我的東西，沒有嫉妒也沒有仇恨，有的是女人身上的一份善良和牽掛，她們互相攙扶着、幫助着，為了能使鍾先生早點脫離刑期。她，不會在朱純面前停棲着羞恥的感覺，她認定自己的真誠和坦然，那是在最黑暗的時候，人性的表達。看見朱純的善良，她盡自己的努力幫助，她對朱純說，「你跟鍾叔河離婚吧，這樣你可以解脫了，孩子們也不會因為父親受牽連。我去跟他結婚，我會幫助他的！」朱純感謝她的善意，這裏不是情人之間的爭奪，直到冬末的時候，你才會感受的那份刺骨的寒冷裏，依然是可以有躲避的地方。她，掏出自己的全部真誠幫助朱純，或許她也是想幫助自己完成最後的情感。

朱純拒絕了，她說：「孩子需要父親。」

情感的表達，互相的理解，在這樣模糊的邊緣，展現了女性身上最美的瞬間。

如今，兩位女性都已遠行，鍾先生已無顧忌，他會談起她，會拿出毛筆，把她寫給自己的〈水調歌頭〉抄在上好的生宣上，那蒼勁有力的毛筆字，每一個人看了，都會說：詞好字也好，他這個年紀手還這麼穩健，實在不易！

廿載江城客，落落有誰知。

冰弦一曲清淚，三月暮春時。

寂寞綠榆芳徑，零亂黃花輕雨，好夢惹愁思。

咫尺天涯遠，相見已嫌遲。

人慟慟，思渺渺，恨依依，

倚欄竟日無語，立盡月華西。

不信此身長碌，天意從來難問，前路復奚疑。

留取心魂在，千里與君期。

水調歌頭 王怡德君六六年作以相贈 迄今未曾作答
亦無能作答 今王君已成古人 思之亦不禁傷感也
重經丁酉八十七歲 鍾叔河抄留憶念

雖然鍾先生迄今未曾「作答」，她依然在「千里與君期」。這個期，讓我們都黯然傷神。87歲的時候，鍾先生依然會背出她在1966年寫下的〈水調歌頭〉；五十一年過去，不知道這首詞，在鍾先生的心裏，反反覆覆被吟誦過多少遍。她知道鍾先生明白，可是她自己是想不明白的，這樣無望的等待「落

落有誰知」，這個「誰」是她自己。

鍾先生被宣判無罪後，拿到九年的工資賠償，第一件事，他和朱純商量，要把這錢的一半給她送去，「我說這個東西我是要去還這個帳的，不能以那個錢數計算的，在勞改隊寄的三塊、五塊錢，不能還三塊、五塊錢，我要補償她！」那時候，鍾先生的孩子都二十多歲了，他解釋道：「我到79年出來，她們是五幾年出生的，有的孩子都已經成家了，因為她獨自一人，老了，又沒有很好的退休工資……」朱純，沒有任何異議，朱純就是那樣一個大氣的女人，鍾先生一直說，「沒有人對她有意見，我的朋友都是她的朋友，對我有意見的，對她都沒有意見。」

鍾先生去看望她了，希望朱純和他同去，朱純拒絕了，鍾先生帶着二女兒去的。如今，當我們問起鍾先生的時候，他會說：「她，當然是清貧的，但是生活也還過得去，因為她家裏原來很有錢，我曉得她有一架鋼琴還是很好的鋼琴，到60年代鋼琴賣給湖南音協了。文革以前，在改革開放以前，要拿外匯買歐洲的鋼琴是不可能的，省級單位批不到那個外匯。她家是湘西的資本家，可能她的母親好像也不是她父親的正室，她家裏的衣服和家具都是很好的。」

「她自己是在音專學鋼琴的？」

「音專恐怕不是學鋼琴的，我沒有問她，她學什麼搞不清楚，她進大學不久就解放了。」

其實現在算來，鍾先生去送錢的時候，她才四十多歲，還是年輕的。可是她，接受了鍾先生的援助，不是錢，完全不是

為了錢，是她看重鍾先生對她的「在乎」，這一份「在乎」是她心心念念期待的，從她墮入愛情的第一刻起，就意味着她和鍾先生是沒有緣分的，因為朱純的存在，朱純的大氣和寬容，讓他們沒有理由去傷害她。他們之間的分歧沒有對錯，不是善和惡的對峙；這是一場善和善、真情和真情的較量，於是，不管哪一方勝利了，都是傷心的。鍾先生在她生活中的存在，正是她最在乎的。

「在她家裏，謝謝她，談清楚，我就談清楚了，我以後只會在家裏做好丈夫了，而且我要一個孩子陪去的，談清楚了！後來講，事實上她晚景不好，我還是一直每一年送錢給她，但每次我都是同一個老朋友去的，開始是張志浩，後來是浣官生，每次都一同去，我就再沒有越雷池一步。」

「你後來去看她，你還是在經濟上一直支持她？」

「支持她，最後一直都支持她的。」

「那她為什麼後來晚景不好？」

「這個人80年代曾到師大去教書，教書她又不能好好教，她又滿口怪話。她那個人眼界高，能寫，寫那麼好的詩詞，她也有工作，她是醫生。」

「她是醫生？」

「一個開業的醫生。」

「私人醫生？」

「中醫師。」

「那應該收入蠻好的？」

「不是很好，那時中醫師都要參加聯合診所，那時候是不

允許有個人的什麼空間，連小商販都要搞合作商店。本來她是一個自由職業者，原來是一個大小姐。」

「那還是很厲害的一個人。」

「她寫的詩詞是寫得很好的，朱正那裏也有她的詩歌。」

回家了，鍾先生認認真真在做好丈夫，好父親。雖然他還是能記得1966年她寫給他的〈水調歌頭〉，他還是回家了！直到鍾先生反反覆覆說「講清楚了」，但是我知道，這份感情，是永遠也「講不清楚」的。是在這個時候，我終於理解了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 1890–1960)與伊文斯卡婭(Olga Ivinskaya, 1912–1995)的愛情。

到2004年10月，鍾先生在得知朱純得了乳腺癌，並且已經擴散，預告凶險。那麼強大的鍾先生，幾乎被擊垮了，他比朱純更緊張，焦急地為她治病，整整緊張了一年，當病情漸漸穩定的時候，他才「慢慢恢復了神氣」。(朱純語)。但是在2007年1月21日，朱純還是走了，走的時候，像她自己立下的遺囑那樣「57年沒有打垮我，70年沒有打垮我，這次病來得很凶，人又老了，可能被打垮，但垮我也不會垮的太難看，哭哭啼啼。只要能動，就會活得快樂。」她就是這樣充滿陽光地生活着，臨走前，還是幫「老頭挪書房」。這就是朱純！鍾先生記得朱純對他說的最後一句話：你不要睡得太晚。

朱純走後的日子裏，鍾先生度日如年，那空空的「念樓」變得如此虛妄，陽光和日照都解不去內心的傷感，「妻走了，五十多年來我和她同甘共苦的事情，點點滴滴全在心頭，每

一念及，如觸新創，總痛。」他用寫作融化痛苦，可是他無力捏住那小小的一枝筆，直到八十天以後，一篇不到兩千字的《談毛筆》，前前後後，花了四天時間才完成……這次，他沒有回頭多去修改，似乎那每一個字裏，都讓他回憶起朱純。當散文集的成書收到時，他拿着一冊新書，送到她托體的山樹下，以此作為對她的週年祭。心中還反反覆覆祈禱着：「朱純啊，我不久就會來陪伴你的，你就先在這兒看看書，好好的休息吧！」

十一年過去了，像朱純預料的，「他父親活到90歲，母親也八十多，長壽因子一定會遺傳，肯定還活得幾年十幾年……」鍾先生活着，活在「書」中。喜歡鍾先生的女性朋友還是有，她們上門拜訪，孩子們會從「阿姨」們的態度上，看出蛛絲馬跡。她們不說話，這是父親個人的事情。鍾先生是聰明人，他熱情地招待她們中的每一個，非常紳士，非常有誠意，這正是他從周作人那裏學到的標準，「看一個男人，就要看他如何對待婦女兒童的」。當他送她們任何一位出門，走到電梯前的時候，一定是親切地關照：「年紀都大了，不要這樣跑來跑去，很辛苦。好好保重，要多關心自己。有什麼事情，可以打電話……不必再上門跑來了！」

我們問鍾先生，你不會再想找個老伴嗎？鍾先生搖了搖頭：「我老了，生理上沒需求了，如果精神上不能交流，家裏多個人不是麻煩？」長長的停頓以後，他說，「朱純和她都走了……」

總以為鍾先生是心灰意懶了，我說：「鍾先生，你年輕的時候是那麼激進的，你改變很多。為什麼這種激進的態度沒有了？」

「我在社會觀念上，還是和從前一樣的，認為不民主不自由總是不好的。民主總是多一點好，專政總是少一點好，這是我1957年『四十八條』的一條。自由也是多一點好，自由就是由自，自己要由自己作主。過去我們完全不能作主，時間也不能作主，都不能做主。現在還好了一點。」

「比過去好多了，我現在還能到這裏跟你講講話，不然我都嚇死。」

「如果57年以前，外面兩個人跑這裏來談話，那就是問題了，鄰居就會去報告的。」

「如果是70年代末，我都不敢來敲你們家的門啊！」

我又在讀鍾先生的新書《念樓隨筆》，在他平靜的書寫裏，我再一次讀到了人間的「煙火氣」，他貼心溫暖，他是我們芸芸眾生裏的一員，我覺得我感受到他的學問時，是他的古典的人文主義傳統，讓他一直在追求着「民主」、「自由」。因為生活在不自由的社會下，人們都是趨利避害的，但是追求精神活動的人，像鍾先生，才會同時產生比自由人更大的勇氣。我們陷入黑暗的中心，我們膽怯，但是鍾先生比那些沒有經歷過黑暗的人，更加看清黑暗的本質，活得坦然且快樂！突然恍然大悟，原來學問如此深厚的人，他也始終沒有走出紅塵，他放下身段，和我們這些平民百姓一起生活在歷史中，他一次一次和

世界達成協議。他用讀書和自己的學問對峙着老年、對峙着病體、對峙着寂寞；他如此強大，卻如此親切；如此有學問，又如此深刻。

彭小蓮

與鍾先生閒聊（五）

進入老年是讓人恐慌的，人會恐慌於虛無和病體的肉身。但是鍾先生的存在，讓人看見了精神富足以後的老年，他依然自信、驕傲；他的意志又主宰着他的精神繼續飽滿。他向我們證明了一個現實，世俗之人，也可以不媚俗、不空虛、不愚昧。

鍾：我到現在對做編輯工作還是有興趣，因為編別人的書比自己寫書好，別人的書本來就寫得好些、深刻些嘛！自己的文字自己總是看不得，看了就要改。這是一個毛病，我認為是變成一種毛病了。改來改去，後來甚至覺得原來的還好一些。周作人他們用毛筆寫的，一氣呵成，很少改動。這就是水平，是我和他們的差距。錢鍾書也喜歡改，他給我寫的那序便改過三次，稿子都在我這裏。他還授權我可以改，我也確實改了，改什麼？改掉他褒揚我的話，他也認可了。信都在這裏，他自己講「文改公之謚法，所不敢辭」，古人講文正公、文襄公，他說文改公，開玩笑的。

論文字水平，在我們那一代人中間，比如說在「新幹班」同學中間，朱正和我應該說還是在平均線之上的，看書比較快，也比較記得住，涉獵範圍比較廣，有的書好像當時沒有什麼用，但實際上是有用的。好比說，我看周作人談河水鬼，周作人有一篇文章，他收錄到《草木蟲魚》裏面的，他講日本也有河水鬼……

汪：落水鬼？

鍾：日本人認為它是一種實有的生物。譚延闓日記裏面談到，他們鄉下也有人講，落水鬼是一種動物，這就很有意思。最近我才讀到譚延闓日記，這就可以印證。我在《兒童雜事詩箋釋》裏面有一節說河水鬼，現在便可以把譚延闓的日記加進去。朱正寫我的一篇文章，就是《述往事思來者》，他講自己只看與自己研究有關的東西，其實他也不是這樣。我右派後還買天文學的書，到現在仍然感興趣，在勞改隊時也看，最早復刊的雜誌是《天文知識》和《化石》，還有《集郵》，我都記得。那些東西好像於個人沒有一點用處，但是卻有意思。

古代天文家沒有現代儀器，最初連望遠鏡都沒有，望遠鏡是偶然發現的，他就是肉眼觀察，把恆星、行星的軌道算出來了，古人算出來的月點的距離和現代精密測量的相差不大，那很了不起的。古人有的畢生就是觀星，一生如此，毫無功利，這才最偉大的人。他純粹是個人興趣，沒有任何功利性目的，所以也只有奴隸主和貴族才有可能去研究，他衣食無憂，他不要去謀衣食，如果老婆孩子要養，還要賺錢養活，就沒有時間去進入那種超然的境界了。

比如我們現在看譚延闓日記，這是台灣整理的，錯誤很多，台灣的大學生去整理這些，應該說台灣大學生、研究生一般比大陸的（大學生、研究生）中國語文（水平）高一點，但是他們同樣對清末民初的掌故不一定很熟悉，對於湖南的社會人文更不熟悉，所以錯誤很多的，我們就能看出來。他（譚延闓）用古文寫的東西，他們書讀得比我們多，他的文字能力強，文筆也好，他們隨便談的東西都是古代的典故。讀譚延闓日記沒有語詞困難，困難在於人名、事物，你不懂得這個名物，看句子是看不通的。

汪：是的。

鍾：前輩學者之所以強於我們，就是這些方面強於我們，我們比起周作人真的差距大的很，而且那是不可比的數量級的差異，為什麼呢？嚴格來講，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如果沒有外語就不可能成為完全的知識分子，很多東西沒有辦法接觸資料，也沒有辦法用比較的方法去觀察，周作人他們就強在這一點，他們讀的西方、日本古典的東西都是讀的原著。我們讀的都是譯本，譯者的水平已經大打折扣了。

鍾：（又）好比講蔡倫造紙，還有《鄭和號》，把兵艦叫《鄭和號》，簡直是開玩笑，一個太監，外國海軍是最代表國家的陽剛之氣，我們也並不是歧視太監，但是太監不逗人喜歡。這是事實，他本人被殘廢以後，他的心理肯定不是正常的心理。所以太監沒有做好事的，魏忠賢、李蓮英、劉瑾都是反面人物，都是害人的人。鄭和，航海是一種專業，我們都不可能去航海，

我們只去做旅客。他從小(入宮)做太監，怎麼可能懂得駕海船？他去航海，這不可能的事。他去航海是事實，是皇帝派他去監察的，太監是皇帝的耳目，他只對皇帝一個人負責，是一個人的奴隸、家奴。明朝的皇帝，派一個太監去監軍，直接向他報告。

永樂派人下西洋的目的是尋找建文皇帝的下落，既不是通商，更不是殖民，也沒有要求到國外去發展經濟、擴充領土，都沒有這些事，就是搞了點奇珍異寶回來，而且他一死，就沒有搞了，因為這個是很耗費國家財產的事。把鄭和還搞一個軍艦，《鄭和號》，這不是開玩笑？一個太監，也沒有必要把他列為中華民族的祖先，中國軍人的象徵吧，有什麼意思呢？不正常。

其實太監個人很值得同情，但他總是一種病態的東西，病態社會的產物，本是一個病態的人。當然這不能包括司馬遷，因為司馬遷是成人以後，他的人格已形成，他受到的迫害，殘害他，這不會影響他的人格，他已經形成了。但是太監必須幼兒才能進行的。所以這是常識，就如我講的油炸檜一樣，這是很荒唐的。而且秦檜，早在抗戰以前呂思勉就談過，他寫的中國史，他認為秦檜是南宋的功臣，他是真正愛國的，他不愛國不會從金朝跑回來，(說)他是金人的間諜，那不是事實，而且他的孫子、重孫都是抗金而死的。

汪：他跟兒子兩個人都是狀元。

鍾：狀元讀書當然是很會讀的。南宋是文化和經濟最發達的時候，四川和江浙、福建的深度開發都是因為南宋。如果沒有南宋，中國早已統一於金了，中國在元朝以前(就會)出現一個金朝。

南宋有一百五十年歷史，南宋時詞是最成熟的詞，文學南宋最發達。

汪：那時候為什麼那麼發達？是有亡國壓力在？

鍾：跟那個沒有關係。文化和人口往南邊來了，人口增殖、人口流動有助於文化的發展。沒有文化的人就不會逃難，地在那裏，誰來就向誰交糧。而且後來金人也已經漢化了，元好問就是金人，曾國藩選十八家詩，他是最後一家，成了漢詩的代表。後來金人是同時亡於蒙，金人和南宋是同一年亡於蒙古的。在建康時，宋高宗剛剛在南京建立南宋時，如果那時和金人打仗，肯定是南宋滅亡。我們中國歷史上認為誰主張和就是漢奸，李鴻章主張和，也是漢奸。不能打的時候，不和怎麼辦？還要以人民的利益為上。

我們中國有兩次亡國，一次亡於蒙古，亡了九十年；一次是亡於滿洲，亡了二百多年。假如不是亡國，那就史可法不是忠臣，吳三桂不是漢奸。因為語言都不同，文字都不同，姓都不同，愛新覺羅，百家姓裏面沒有這個姓，四個字，是夷狄。所以成立滿洲國，法理上是有根據的，本來是兩個國家，滿洲，中國。蒙古如今還在，只是他滿人自己不爭氣。但兩次亡國，漢人漢文化還是發展了。

香港現在的高官，都是英國培植出來的，他們出生在香港，在香港讀英國書，留學英國，出來替港英服務。他生出來他就是英國人，就是英國在統治香港的時候。曾國藩也一樣，他的父親的父親的父親就是滿洲人統治下的老百姓了。而滿人來統治，並不是曾家父親的責任，是明朝沒有搞好，是執政的

人沒搞好才亡國，老百姓有什麼責任？我們的觀念是日本人來了，全民抗戰，如果不能抗戰就應該自殺，八女投江，都自殺了，不僅亡國，還滅種了。日本人到這裏來，沒有人，更好殖民，那就真變成它的領土了。

汪：我還挺好奇的，像你寫「走向世界」這些叢書、緒論，你其實是在勞改、右派的時候做了很多準備，你做筆記嗎？

鍾：沒有。在勞改的時候並沒有想到會來編「走向世界叢書」，但是對這些人、這些事情我從來都很感興趣，我曾經將黃遵憲的詩句集成了好幾首詩，不知道是幾首了，送給朱正，他還記得裏面的幾句。這些都沒有筆記的。

汪：那你以後寫緒論的時候都不需要參考，馬上可寫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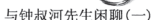
鍾：還是要找書。

汪：馬上都能找到，都在腦子裏？

鍾：也有一些新發現的資料，首先把別人研究過程當中的東西都找來看，好像台灣有一本郭嵩燾年譜，便有不少資料。他也寫日記，我也正好在整理郭嵩燾日記。我那時是1979年、1980年左右。「走向世界叢書」，為什麼要取這樣一個書名？因為我不想它看起來像古籍。不是說岳麓書社只是一家「專業分工的古籍出版社」嗎？我就是要打破這個框框。它們本來就不是古籍，寫的是火輪船、德律風（電話）、巴力門（國會）之類的現代事物嘛！

我本是世界的一個人，牢獄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不可能和社會隔絕，思想更是牢門管不住的。在坐牢的時候，我就長時間思考過中國該往何處去，中國為什麼會走到現在這一步，以

至於把我這樣的從不犯法、更不造反的讀書人都關到牢裏了。錢先生為我書寫的序不就是說，「『走向世界』，那還用說！難道能夠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嗎？哪怕你不情不願，兩腳彷彿拖着鐵鐐和鐵球，你也只好走向這世界，因為你絕沒有辦法走出這世界，即使兩腳生了翅膀。人走到哪裏，哪裏就是世界，就成為人的世界。」



2017年的春末，我们从上海赶去长沙看望钟叔河先生，他不喜欢出门，我们想请他在家对面的电影院看“摔跤吧，爸爸”，他拒绝了。但是，我们在他家聊了整整一天。晚上想起来没有跟他合影，得到许可，又赶回去照相的时候，钟先生在量血压，这让我们非常惭愧。但是，聊天的过程是受教育的过程，受益匪浅！真希望他是我的邻居，隔几个月过去去看望他一次！

钟：《走向世界》里有些书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在家里就看过。最看的是容闳的《西学东渐记》，我看的是一本“万有文库”的本子，它在抗战前就收入了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它不是一本什么很难得的书，但是删改也没有充分评价过这本书。搞现代史的人的书也看了一些，也都是不是很难找到的书。好比黄炎超、熊秉真。熊秉真是曾门弟子之一，曾国藩的幕僚里面有几个会写文章的，他算一个，贵州遵义人，遵义会议那个地方，他很有名，他在贵州，是很偏僻的地方，文化也不发达，但是能出来好几个很有名的学者和文人，熊恩昌就是其中一个（所谓遵义三杰还有郑珍、莫友芝），郑珍是很著名的经学家，出现在的语言学上，他是中国古代的音韵学家和经学家，莫友芝是著名的版本学家、文献学家，都是有著作的，学术地位很高，但是熊恩昌是一个读书人，读出来首先在曾国藩的班子里面做事，当时相当于入了曾国藩的幕僚，清朝的官职是幕僚这些大，都是私人聘用，跟他们是一个主宾关系。师爷，政府不发工资的。做得好，跟的这个人好，这个官（就）提上去，可以保举他做一个官。李鸿章开始也是曾国藩的幕僚的人，后来他文章写得好就让他去搞洋务，搞洋务就跑到国外去，熊恩昌就写了《西洋杂志》，写西班牙、法国、法国当参赞，在西班牙当参赞，文章写得还可以，蛮好的。这些书，家里都有。我家的第一个家庭，是一个家塾，父亲就是教数学的，因为他认识那些朋友和同学是国民党早期的党员，后来这些人都不当教了。因为湖南人白从宋教仁被杀以后，在国民党里面就不当了。如果宋教仁没有（被）杀死，就是在国民党最有话语权的。孙中山就是一个大炮，孙中山，名义上的领袖，做组织工作的是宋教仁。宋教仁杀死了就是陈其美，蒋介石都是陈其美提拔出来的，陈立夫、陈果夫就是陈其美的侄儿，就是浙江人当了权。因为旧中国的政党是旧中国社会的缩影，是很讲地方势力，讲山头，讲派系的。

彭：就是帮派派？

钟：因为中国是传统社会，有三种力量是很大的：一种是地方关系，一种是宗族关系，另外一种是科第关系，比如“同年”。我不是和你都是31年生的，就叫“同年”。同年就是我们都是31年中的进士，这是“同年”，31年中的举人也是“同年”。这种“同年”是一辈子的关系，就是这种关系。后来湖南人不当权了，湖南人都是些老官僚，但是我父亲，毕竟老党员（国民党）老官僚，他还是有一点影响，他一个时期，家里还是有一些书卷气。我看得比较早，现在也看不懂，但看得多就看懂了。所以我想学外文多看就懂，我觉得这是至理名言。文言文是看懂的，看不懂还会有兴趣往下看吗？没有别的活动，又不敢走出大门去跟农村孩子交朋友。因为抗战，到

附錄一

鍾叔河行年簡表

1931年11月19日 (辛未年十月初十日)	生於湖南澧縣，不久後即隨父母回長沙紅牆巷本宅。
1938年秋	侵華日軍逼近湖南，隨父母回老家平江西鄉神鼎山，開始以自習的方式讀書。
1941年冬	第二次湘北會戰，老家房屋被焚。
1942年	隨家遷居平江東鄉濁水楓源洞，秋季入東郊鄉中心小學六年級，是為入學讀書之始。
1943年秋	高小畢業後，考入平江縣立初級中學(天岳書院)就讀。
1944年	日軍大舉南犯，因平江縣城淪陷而休學，後始至學校遷徙處湘贛邊「馬大丘」復學。
1945年8月	抗戰勝利，隨學校遷回縣城(父母勝利後已回長沙，居岳麓山)。
1946年9月	因鬧風潮被學校辭退，休學留平江半年。
1947年初	至長沙入崇德中學初中三年二期，畢業後考入長沙文藝中學讀高中。
1949年6月	在護校活動中，被打傷，住院二十日。
1949年8月	投考「新華社」與「新湖南報社」合辦的新聞幹部訓練班，未受訓即被選送入「新湖南報社」從事採訪、編輯工作。

1953年	與「新湖南報社」同事朱純結婚。
1955年	在肅反運動中，與朱正、張志浩、俞潤泉四人，被「新湖南報社」列為「反動小集團」，受到批判鬥爭。
1957年7月	在「新湖南報社」反右派鬥爭中，與妻子朱純一道被列入「策劃創辦反共反人民的《同人報》右派小集團」，受到批判鬥爭。
1958年4月	<p>被「新湖南報社」定為「情節特別嚴重、態度特別惡劣」的「右派骨幹分子」，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朱純「送勞動教養」，未開除公職）；於是父親以「民主人士」名義向統戰部寫報告，代子媳申請回家自謀生活，得批准。</p> <p>其後，在街道上「自謀生活」十二年，從事過拖板車、刻鋼板、繪圖和模型製作等工作，1964年由長沙市二輕工業局評定為「6級劃線工」，朱純為「5級木模工」（當時技工實行「8級工資制」，街道工廠最高不超過6級）。</p>
1970年3月	被捕，以「惡毒攻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判刑十年，押送湖南省第三勞動改造隊（沅江茶場）服刑。
1979年3月	<p>被「提前釋放」，回到長沙。同年9月徹底平反，按照街道工廠6級月月薪五十八元的標準補發了九年的工資。</p> <p>平反後，拒絕回報社上班，在朱正的推薦下，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開始編輯出版「走向世界叢書」。</p>
1981年	赴京參加全國古籍出版規劃會議，建議將新編《曾國藩全集》列入國家規劃。
1982年	評為編審，並經國家出版局審核批准。
1984年	調入岳麓書社任總編輯，策劃組織編輯出版了「走向世界叢書」、《曾國藩全集》、《鳳凰叢書》、《古典名著普及文庫》、《知堂書話》和其他周作人著作，廣泛獲得好評。

1988 年	在省新聞出版局安排的「選舉」中落選（其他省市出版社無一進行過此種「選舉」），不再擔任岳麓書社總編輯，旋調省新聞出版局，未安排具體工作，直至 1992 年 60 歲離休。
1991 年	獲「國家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晚清國人對西方的直接觀察及其反應」課題的研究和出版）撥款支持。
1992 年	因「突出貢獻」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1994 年	獲第三屆韜奮出版獎。
2012 年	岳麓書社重啟中斷了三十餘年的「走向世界叢書」續編工程（2018 年完成），仍被邀出任主編。

附錄二

鍾叔河作品簡表

(一) 著述作品

- 蛛窗述聞(存稿, 1946;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6)
- 日本雜事詩廣注(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長沙: 岳麓書社, 1985、2007)
- 走向世界——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歷史(北京: 中華書局, 1985、2000、2010; 台北: 百川書局, 1990)
- 千秋借鑒吾妻鏡(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5)
- 從東方到西方——走向世界叢書敘論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長沙: 岳麓書社, 2002)
- 中國本身擁有力量(香港: 中華書局, 1989;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5)
- 兒童雜事詩箋釋(北京: 文化藝術出版社, 1991; 北京: 中華書局, 1999; 長沙: 岳麓書社, 2004; 合肥: 安徽大學出版社, 2011;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7)
- 書前書後(海南: 海南出版社, 1992、1997;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2)
- 鍾叔河散文(杭州: 浙江文藝出版社, 1999)
- 百家文庫·鍾叔河卷(長沙: 湖南文藝出版社, 2000)
- 念樓學短(長沙: 湖南美術出版社, 2002、2010、2012、2014、2016、2018)

- 鍾叔河序跋（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3）
- 念樓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偶然集（江蘇：鳳凰出版社，2003）
- 學其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 天窗（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4）
- 青燈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 籠中鳥集（青島：青島出版社，2009）
- 念樓序跋（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0）
- 小西門集（長沙：岳麓書社，2011）
- 記得青山那一邊（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
- 與之言集（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
- 念樓小抄（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
- 大托鋪的笑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
- 左右左（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
- 人之患——為別人作的序（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
- 舊鍛坊題題題·鍾叔河卷（蕭躍華合著）（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
- 一片二片三四片（深圳：海天出版社，2017）
- 念樓隨筆（江蘇：鳳凰出版社，2018）

（二）編訂作品

- 過去的大學（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2019；北京：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北京：同心出版社，2011）
- 走向世界叢書（四十種）（長沙：岳麓書社，1985、2007、2017）
- 曾國藩教子書（長沙：岳麓書社，1986、2002；海南：海南出版社，1993；香港：天地圖書，2015）
- 知堂書話·序跋·題記（長沙：岳麓書社，1986、2014；台北：百川書局，1990；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2011）

- 曾國藩家書(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1989；香港：天地圖書，1994；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4；海南：海南出版社，1994；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
- 曾國藩與弟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海南：海南出版社，1993；長沙：岳麓書社，2002)
- 知堂談吃(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0；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北京：中華書局，2017)
- 唐詩百家全集(海南：海南出版社，1992)
- 唐宋詞百家全集(廣州：廣州出版社，1994)
- 周作人文選(廣州：廣州出版社，1995)
- 曾國藩往來家書全編(海南：海南出版社，1997；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 周作人美文選(香港：明報出版社，1998；長沙：岳麓書社，2015、2017)
- 周作人文類編(十卷)(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
- 林屋山民送米圖卷子(長沙：岳麓書社，2002；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1)
- 周作人散文全集(十四卷、外索引一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www.chineseupress.com | HONG KONG, CHINA

ISBN 978-986-237-126-2



編輯家鍾叔河的故事，
是中國現代出版史上一個堂吉訶德的故事。

他拖過板車、坐過牢，
五十歲才開始編輯生涯；
憑着自己的學問、膽識與堅持，
出版多部重要作品，
啟蒙了一代讀書人。